

2009 年 4 月修訂版

改革－革命－再革命－繼續革命－
告別革命（改革開放）的歷程
（1900-2000 年）

中國歷史科教師專業發展課程

講座紀錄

連浩鋆博士（Dr. Alfred HY Lin）

香港大學歷史系名譽副教授

2009 年 4 月修訂版

第一部分：晚清民國時期的改革、革命與再革命

緒論：「改革」、「革命」與中國現代化

「改革」是在維護建制的大前題下，力求建制更趨完善。

「革命」是要推翻建制、打破條框，以達到建構嶄新制度、樹立新範式之目的。

本書的主題是：「改革－革命－再革命－繼續革命－告別革命（改革開放）的歷程」。這裏的「改革」是指「清末新政」，「革命」指「共和革命」；而「清末新政」與「共和革命」，標誌著中國政治現代化的開端。「再革命」有兩個涵義：其一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所掀起的思想、文化革命；其二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一種自下而上、動員群眾的共產主義革命。而「繼續革命」是指後革命時期（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不斷發生的革命，即毛澤東在沒有階級的社會裏繼續不斷策動的階級鬥爭。最後，「告別革命」指鄧小平於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台後堅決地放棄「以階級鬥爭為綱」，並以「改革開放」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是一部改革與革命的歷史，亦即是一部現代化的歷史，因為改革和革命是推行現代化的兩種不同方法、手段。

中國的現代化始於十九世紀中葉，是由西方列強的侵略所引發。在這個層面上，西方充當了「侵略者」與「文明使者」的雙重角色。對充滿「文明的使命感」（civilizational mission）的西方國家來說，中國的現代化歷程，同時也是一種「文明化過程」（civilizing process）。然而，中國在十九世紀所接觸到的西方文明，其實是「現代性」大扭曲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中國進行現代化，是爲了回應這個扭曲的「西方現代性」的挑戰，是被迫的；因此，中國的現代化之根本動力來自「雪恥強國」的意識。在很大程度上，中國的現代化，是一種「反西方的西化」（anti-Western Westernization）。

從文化層面來理解，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可以說經歷了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器物技能的現代化，這從洋務／自強運動開始。由於西方的「船

堅炮利」嚴重威脅中國，中國也開始追求「船堅炮利」。傳統的「經世致用」精神，確實能為中國早期的現代化提供原動力。洋務思潮經歷了由「師夷長技以制夷」到「中本西末」，再到「中體西用」的過程。而洋務運動又經歷了由發展軍事國防工業到發展民用工業，即由「求強」發展到「求富」及「富強並舉」的方針。

第二個階段是制度的現代化，這從百日維新、清末新政、辛亥革命開始。甲午戰爭之後，部分有學識的人認識到現代化國防不但需要現代化的交通、教育、經濟，並且需要有現代化的政治和國民，故主張「體」與「用」皆須變革。有人主張「君主立憲」，也有人主張「共和政體」，遂產生了百日維新、清末新政、辛亥革命的歷史事件。

第三個階段是思想、價值、行為的現代化，這從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始。民國成立以後，「共和」有名無實，更有復辟之舉。先進的知識分子認為中國需要的是國民思想、態度、價值觀以及人格的改造，故產生了「打倒孔家店」、迎接「新思潮」的五四新文化運動。

值得注意的是，這三個階段的發展是並行不悖的。第二個階段的開始不等於第一個階段的結束，第三個階段的開始不等於第一、二階段的終結。就推行現代化而言，第一個階段是改革，第二個階段包括改革和革命，第三個階段是革命，並且是深層次的文化革命，有別於第二階段的政治革命。從 1928 年南京國民政府主政開始到 1949 年，自上而下的、資本主義模式的改革是中國現代化的主流。挑戰這套模式的是一種自下而上、動員群眾的共產主義革命。1949 年實現了現代化範式的轉變，革命成爲了主流。由 1957 年到 1978 年，中國實行「以階級鬥爭爲綱」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1978 年底，再度體現了另外一次現代化範式的轉變，即以「改革開放」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現代化進程的特徵，實與現代化運作背景密切相關。中國推行現代化除了前文提及是被西方列強侵略所迫外，還有本身的問題需要解決所使然。從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開始，中國出現人口過剩、自然資源相對稀缺的現象；十九、二

2009 年 4 月修訂版

十世紀又長期處於憂患當中，因此推行現代化是以解決國家民族所面臨的危機為依歸的，具有功利的目的。新文化運動原本的目的是要把西方的啓蒙文化帶來中國，但是中國當時的當務之急卻是「救亡」，其導致的結果就是李澤厚所說的「救亡壓倒啓蒙」。

另一方面，作為一個後發展國家，中國的現代化急需政府的參與、主導以及推動。又因政府長期面臨嚴峻的局勢，故當權者無一例外地把個人利益置於集體利益之下。這裏的集體，可以指國家、民族、政黨、階級、群眾等，以致集體價值觀始終壓倒個人價值。這是中國無法擺脫的一個傳統。儘管知識分子、社會改革家的自覺性理念對現代化進程起了某些作用，但現代化的大方向、目標、策略等，總是取決於政治領袖的主觀意志，即現代化要為政治服務。

第 1 章 清末新政、共和革命、民初政局與軍閥割據（1900—1927 年）

1. 清末新政與中國政治現代化

1.1 八國聯軍進京後的局面與清廷頒佈新政的目的

1900 年對中國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年。此後，清政府的統治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這是因為《辛丑條約》（1901 年 9 月 17 日）的條款比以往任何條約條款更苛刻，包括處死官員、賠款四億五千萬兩白銀、拆除炮台、在 45 個城市停辦科舉五年等等，這使清廷認識到非進行改革不可，由是開創了徹底改革的局面。許多學者對清廷的改革不約而同提出一種意見：清廷改革的誠意不足。

探討清廷改革的誠意，必須著眼於改革的目的。從下放權力給漢人的角度來看，可以批判清政府的改革並無誠意。但無可否認的是，所有主持改革的統治者最終的動機，是希望通過改革的成果來鞏固、加強自身統治的合法性基礎。而清政府的改革目的，無疑是加強中央集權，以確保其統治地位的穩固不變。若從這個角度來分析，便無須懷疑其改革的誠意。

當時的局面，可與四分三個世紀後的局面作一比較。「文化大革命」（1966—1976）結束，中國共產黨面臨「三信危機」，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1978 年 12 月）上台後，認為非推行徹底的改革不可，於是開創了劃時代的「改革開放」局面。我們亦無須懷疑其改革的誠意。

1.2 清末新政（1901—1911 年）的內容

清廷於 1901 年開始推行的改革，是全方位、多層面、空前的變革。有關改革的詳情，可參看：（1）徐中約著，計秋楓、朱慶葆譯：《中國近代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 年）上冊，第十七章〈清末新政和立憲派〉；（2）費正清、劉廣京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室譯：《劍橋中國晚清史 1800—1911

2009 年 4 月修訂版

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3 年)下卷, 第七章〈1901—1911 年政治和制度的改革〉。這裏對改革的情況只作扼要及簡單的介紹。

首先, 是在行政制度方面的改革與預備立憲。改革內容包括精簡官僚機構、裁汰冗員、創設新官署; 並且於 1909 年舉行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選舉, 同年成立諮議局, 1910 年 10 月成立資政院。

1909 年, 全國各省舉行第一次諮議局選舉。選民資格為滿 25 歲之男子, 在選區內居住 10 年以上, 同時有 5,000 元以上之不動產或中學畢業。候選人資格相同, 但須滿 30 歲。當時的選民雖只佔總人口的 0.45%, 但此舉已是政治現代化的進程中重要的一步。還有, 諮議局、資政院是中國第一批具有現代議會性質的政府機構。

在軍事制度方面的改革包括廢武科、創設武備學堂及建立練兵處, 導致了新式軍人階層的出現。他們素質較高, 在掌握現代軍事裝備和技術的同時, 也較易受自由民權思想的影響, 因而開展了日後軍人政治化的趨向。

教育方面的改革包括以時事策論取代「八股文」、設新式大學堂、中等學堂、初等學堂及廢除科舉考試。而廢除 1,300 年來的科舉制度, 的確是具有革命性的意義。清廷又挑選學生出國留學 (1901 年: 不足 300 人。赴日留學生: 從 1901 年 274 人增至 1908 年 3 萬人; 赴歐留學生: 1908 年達 1.2 萬人), 這又是非常重要的一項改革, 因為它培養了一批現代知識分子。

此外, 還有財政、經濟、社會各方面的改革, 在不同程度上加速了社會變革的步伐。

雖然這些改革釋放出變革社會的能量, 卻不能將其納入推進制度變遷的非革命性途徑, 反而引發了革命, 這是清廷想不到的。

2. 共和革命與中國政治現代化

2.1 孫中山對中國政治現代化的貢獻

長期以來，史學家把辛亥革命的歷史說成是孫中山個人革命的歷史，以此突出孫中山對推翻清朝的貢獻。而這一觀點亦受多數人贊同。持相反意見者則指出，孫中山自 1895 年廣州起義失敗後便離開中國，雖然他曾長期致力籌款支持革命，但在歷次起義當中鮮有親身督師（1907 年廣西鎮南關一役除外），即使武昌起義也是在事成後才由美國趕回來。因此不應誇大他的貢獻。孫中山對中國政治現代化貢獻多少，可謂見仁見智。

孫中山對推翻專制及對中國政治現代化是有貢獻的，主要體現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孫中山創造了一個革命傳統。他成立第一個反清革命組織——興中會，藉以「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檀香山興中會盟書〉，1894 年 11 月 24 日）；並且，策動了第一次反清革命——廣州起義。

在此必須先解釋「革命」這個詞的含義。有現代意義的「革命」（revolution）一詞，始自啓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時期，意指帶有進步意義的歷史變化。早在中國的《易經》中也有提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義大矣」，意即按照「天命」改朝換代。這與現代的「革命」有所不同。康有為也曾經在《法國革命記》寫法王失去「天命」，又批判「革命」造成社會動亂。而當時傳教士（如 Timothy Richard 李提摩太）則將“the French Revolution”譯成「法國大亂」。

廣州起義失敗後，孫中山逃往日本，曾表示從此將自己的政治活動稱為有進步意義的「革命」。他大概是中國第一個用帶有現代意義的「革命」這個詞語來形容自己政治活動的人，可說是創造了一個革命的傳統。

其次，孫中山創建了第一個革命政黨——同盟會，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帶有現代性質的政黨。在《同盟會宣言》（1905 年 8 月）中，孫中山為革命性質定位為「前代為英雄革命，今為國民革命。所謂國民革命者，一國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即皆負革命之責任，軍政府特為其樞機而已。」「國民革命」之目標為：「（一） 驅除韃虜；（二） 恢復中華；（三） 建立民國；（四） 平均

地權」。「國民革命」之進程式分三期：「(一) 軍法之治；(二) 約法之治；(三) 憲法之治。」

第三，孫中山創造了一套革命理論。1905年10月20日，孫中山在《民報》發刊詞中提出了「三民主義」，即「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並在1906年12月2日的東京《民報》創刊周年慶祝大會的演說中作了解釋。

在闡釋「民族主義」時，孫說：「民族主義，並非是遇著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許那不同族的人來奪我民族的政權。」

在闡釋「民權主義」時，孫說：「我們推倒滿洲政府，從驅除滿人那一面說是民族革命，從顛覆君主政體那一面說是政治革命，並不是把來分作兩次去做。講到那政治革命的結果，是建立民主立憲政體。」

在闡釋「民生主義」時，孫說：「我們實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時候，須同時想法子改良社會經濟組織，防止後來的社會革命。……兄弟所最信的是定地價的法。」

孫中山在作總結時這樣說：「我們革命的目的，是為眾生謀幸福，因不願少數滿洲人專利，故要民族革命；不願君主一人專利，故要政治革命；不願少數富人專利，故要社會革命。」

「三民主義」不但是革命的綱領，亦可稱為中國歷史上比較完整的現代化發展之策略。

3. 從政治現代化的角度再探討清王朝的覆亡

3.1 中國政治現代化的兩個先鋒：君主立憲派與共和革命派

其實，立憲派與革命派的關係不應被視為保守勢力與進步勢力的對立關係。

立憲派與革命派有一些共同主張：兩者都是中國政治現代化的先驅；都致力於革新中國的政治組織，並認為代議政治適合中國；都要求民主，主張民權，主張提高政府的效率和中國的國際地位。

2009 年 4 月修訂版

立憲派與革命派的分歧主要在於：第一，中國現代政治的形式應採取君主立憲還是共和政體；第二，達成現代政府的方法是改革還是革命。值得注意的是：立憲派所反對的不是民主政治，而是革命這一手段。孫中山走遍歐美，認為中國落後，應仿效美國。而梁啟超於 1903 年遊歷北美後，亦承認中國落後；不過，梁認為中國情況不像美國而與法國相似，認為革命將導致混亂和軍事強人的統治。

《新民叢報》與《民報》於 1905—1907 年展開了激烈的論戰，反映出兩派的分歧所在：

第一，立憲派認為漢滿兩族在很多方面已融為一體了，主張用合法手段去爭取政權開放，並確信清廷誠心誠意地預備立憲。其基本態度是「容滿」。革命派則認為滿清一向採取歧視及壓迫漢人的政策，以「假立憲」欺瞞中國人民，不可能建立妥善的政府，所以若想有效地改革，必須先消滅滿清政府。其基本態度是「排滿」。

第二，立憲派認為建立共和政府要有先決條件、要漸進，即人民必須先達到某種程度的教育水準，並有參與政治的實際經驗。革命派則強調快速的變革、急速的現代化，並批評立憲派低估了中國人的實力。

第三，立憲派恐怕革命會導致外力干涉。革命派則想爭取列強的同情及支持。

3.2 革命派與清廷：長期鬥爭

革命派與清廷長期處於對立、對抗的關係。1895—1911 年 10 次起義失敗後，革命派才於上海成立同盟會中部總會。湖北的革命組織共進會和文學會雖與同盟會有聯繫，卻非同盟會的一部分。辛亥革命的爆發是出乎同盟會人意料之外的，其過程亦不大受同盟會人控制，其結果更與同盟會人的預期相差很大。

3.3 立憲派與清廷：從合作到決裂

立憲派與清廷的關係則較為複雜，經歷了從合作到決裂兩個階段。前面論述

立憲派與革命派的分歧時，已解釋立憲派支持清廷籌備立憲的原因。立憲派與清廷其後交惡，兩者的矛盾衝突可分為三方面：

第一，政治上的矛盾與衝突，主要涉及召開國會及限制皇權的問題。新選出的諮議局議員，大多屬立憲派的紳商，由於他們面臨洶湧澎湃的革命潮流，遂於 1910 年 1、6、10 月三次向滿清政府請願，要求立即召開國會、準備立憲。1910 年 10 月資政院開幕，清廷只答應把預備立憲日期由 9 年縮短到 6 年。這使許多立憲派人士決定雖不會主動參與革命，但一旦革命爆發，將保持中立的態度。1911 年 5 月清政府成立內閣，13 個任命者當中只有 4 個漢人，5 個是皇親國戚，因而被譏為「皇族內閣」，激起了立憲派的不滿。

第二，經濟上的矛盾與衝突，主要涉及鐵路國有化的問題。由於許多立憲派紳商在四川、廣東、湖南、湖北投資鐵路，而清政府卻於 1911 年 5 月宣告將鐵路國有化，直接打擊這班投資者的經濟利益，使立憲派更為不滿。

第三，立憲派於武昌起義後的最後抉擇。1911 年 12 月，14 個省的諮議局宣佈獨立，令清政府孤立無援。1912 年 2 月清帝退位，可說一半得之於地方獨立，一半得之於袁世凱的中央政變。

3.4 清王朝覆亡的歷史意義和啓示

辛亥革命創建共和，是中國走上「現代」的象徵，也是中國古老文明的政治秩序解體的標誌。帝制在一般中國人心目中成爲一種逆現代化潮流的反動現象，從此在中國政治舞台上消失，這是辛亥革命最大的成就。

傳統史學家認爲，清王朝的覆亡，是建制外的進步勢力打倒建制內的保守勢力的結果，這種看法雖有一定合理性，卻把複雜的歷史實際簡單化。清廷在其統治最後的十年間是一個積極推行改革的政府。重大的制度變革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帶來了高升的期望，帶來了利益重新分配，但亦帶來了改革者未能預期的、超越了自己能力所能解決的問題，最後令改革者處於進退兩難的局面。清王朝的覆亡在某個程度上可說是建制內矛盾激化的結果，是一個改革的政府與建制內各

種既得利益集團衝突、決裂所造成的結果。二十世紀初，共和、立憲的呼聲高唱入雲。清王朝雖盡力掙扎求存，但最終還是被政治現代化的巨浪所吞噬。

3.5 改革、革命與中國現代化

改革與革命是清末政治的兩個主流。改革失敗及引發革命，並非是因為改革本身的性質問題，而是由於改革進程中許多主觀、客觀因素所導致。

在二十世紀期間，人們對改革與革命的看法，經歷了很大的變化。辛亥革命之後，受反滿觀點和革命觀點影響，人們認為改革是保守的，不徹底的，革命比改革先進。從 1980 年代開始，人們厭倦了革命，認為要告別革命，又走向另一個極端，否定了革命在歷史發展過程中起的積極作用。

其實，從長遠的歷史角度看，改革是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普遍方式，革命則是推動社會進步的一種特殊形式。在人類的歷史發展和社會進步中，並不存在改革與革命誰優誰劣的價值判斷問題。

4. 民初政局：袁世凱倒行逆施與共和理想幻滅

4.1 共和的剎那光輝：第一屆國會選舉（1912 年 12 月—1913 年 1 月）與國民黨的勝利

民國成立之初，共和曾有過剎那的光輝。這麼說是因為 1912 年 12 月—1913 年 1 月舉行了中華民國的第一屆國會選舉，國民黨獲得了勝利，而國民黨的領導人宋教仁是一位非常投入於「民主共和」的領袖。

民初的《選舉法》的內容，實建基於 1909 年全國各省第一屆諮議局選舉法，但向前邁進了一大步。選民資格如下：滿 21 歲之男子（1909 年為 25 歲），在選區內住滿 2 年以上（1909 年為 10 年以上），兼具有下列資格之一：有不動產 500 元以上（1909 年為 5,000 元以上），小學畢業（1909 年為中學畢業）。此改動使選民人數增加至總人口的 10.5%（1909 年僅佔 0.45%）。候選人資格相同，但須滿 25 歲（1909 年為 30 歲）。

選舉中宋教仁組織了國民黨，而袁世凱則組織了一些政黨與宋教仁對抗，即統一黨、共和黨、民主黨（其後三黨合併為進步黨）。袁曾於晚清時期對中國的軍事現代化作出了很大貢獻。但他不信「民主」，認為「共和」會帶來混亂，非有一點權威不可。袁曾說：「我這個總統，總也總不得，統也統不得」；又說：「憲法只會限制我，沒有一點是幫我的。」由於他急於抓權，故不惜採取了恐嚇和賄賂的手段來阻止國民黨勝出，但國民黨還是在選舉獲取勝利：在眾議院 596 席中獲得了 269 席，在參議院 274 席中獲得了 123 席。當時眾議院是按各省人口比例選出的，每 80 萬人選 1 人；參議院則按由各省省議會選出代表，每省議會選出 10 人。

4.2 袁世凱的反撲與民主進程的大轉折：政治軍事化（militarization of politics）

袁世凱為奪回權力，採取了一系列的行動。1913 年 3 月 20 日，當宋教仁準備從上海前往北京領導國會、組織責任內閣時，在上海火車站遭到刺殺。有證據顯示，主使這樁政治暗殺的人，正是袁世凱。宋教仁的死，證明了用國會和責任內閣來牽制袁的權力是無法實現的。當時孫中山主張用武力推翻袁世凱，可惜力有不足。

袁世凱深知欲要取回權力，資金非常重要，於是又與英、法、德、日、俄五國銀行團於 1913 年 4 月簽署 2,500 萬英鎊的所謂「善後大借款」。借款未經國會批准；他還答允於 47 年內還本利共 6,785 萬英鎊。

為打擊革命黨，袁於 1913 年 6 月罷免國民黨都督李烈鈞（江西）、胡漢民（廣東）及柏文蔚（安徽），但此舉引發了「二次革命」。由於當時人民渴望和平、安穩的生活，使革命黨處於孤立地位；又由於革命黨缺乏資金，不久便被鎮壓。9 月，「二次革命」宣告失敗。袁世凱遂派心腹到各地取代國民黨都督（如派段祺瑞到武昌、馮國璋到南京），這樣做使得北洋軍人勢力到處擴張。

另外，袁在 1913 年 11 月解散國民黨、1914 年 1 月解散國會、1914 年 2 月解散省議會及所有地方自治團體，這直接打擊了地方勢力。孫中山 1914 年再次

2009 年 4 月修訂版

流亡日本，把國民黨改組為中華革命黨。到此，議會政治告終，獨裁政治抬頭。

1914 年，袁世凱的勢力達到了頂端。是年 3—5 月，袁召開國民大會，修改《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制定新的《中華民國約法》，改總統制為世襲。中華民國因此出現了兩部憲法，加深了由帝制崩潰所導致的法統危機。

1915 年 5 月，袁不理段祺瑞、馮國璋、梁啟超等人的反對，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這導致建制內部分裂。當時許多人支持集權中央，但反對袁世凱對日本妥協。袁世凱的權力因此受到了削弱。

最後，袁於 1915 年 8 月開始推行帝制復辟運動。蔡鍔在雲南組織護國軍反對帝制，各省紛紛響應，相繼宣佈獨立；袁於 1916 年 3 月被迫放棄「洪憲帝制」美夢，並於 6 月 6 日去世。

4.3 袁世凱與軍閥割據的關係

一般歷史學家認為袁世凱是「軍閥之父」。原因如下：

第一，袁統領北洋軍，而北洋軍是後來眾多軍閥隊伍的前身；

第二，袁當總統時刻意將北洋軍人勢力擴展至華中、華南地區；

第三，袁用武力去解決一切（包括非軍事）問題，立下了壞榜樣，並形成了「政治軍事化」的局面，此為軍閥割據時期的一個特色。

上述三點反映出袁世凱與「軍閥割據」有一定的關係。值得注意的是，袁最關注集權中央，故極力防止軍事分離局面(military separatism)的出現。他於 1914 年權力最高峰時把各省都督（都督管理軍事、民政）改為將軍，只管軍事，另設巡按使一職，理論上職位高於將軍，掌管民政，以牽制地方軍人力量，無奈政策未能生效。可說，袁死後出現軍閥割據，絕非袁所想見到的局面。因此，袁世凱與軍閥割據的形成有很大關係，但並非他個人希望造成的。

5. 軍閥割據：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全面軍事化

5.1 何謂「軍閥」？

所謂「軍閥」，是指擁有私人軍隊，控制著或企圖控制一定的地盤，一切所作所為都出於維護其自身權益的軍事將領。

5.2 晚清地方勢力抬頭（regionalism）與民初軍閥割據（warlordism）

西方學者稱晚清時期「地方勢力抬頭」為“regionalism”，又稱民初「軍閥割據」為“warlordism”。不少人以為英文字尾加上“ism”，都是「——主義」的意思，故把“regionalism”說成是「地方主義」，又把“warlordism”說成是「軍閥主義」。其實“regionalism”與“warlordism”並非兩種主義，而是兩個歷史現象（historical phenomena）。

晚清地方勢力抬頭與民初軍閥割據有相似之處，也有不同。在此比較兩者的異同。

相同之處在於兩者皆代表一種離心力量（centrifugal force），導致權力分散（decentralization）甚至地方分離（separatism）現象的出現。

不同之處主要有三點：

第一，地方領袖（regional leaders）與軍閥（warlords）的出身、價值觀不同。地方領袖全是科舉（即儒家）出身，稱為「士人」。而軍閥出身較為複雜，有武科出身（張勳）、新式武備學堂出身（段祺瑞、馮國璋、曹錕、吳佩孚、李宗仁）、日本軍校出身（閻錫山）、新式學校出身（陳炯明）、農兵出身（馮玉祥、張作霖）、土匪出身（張宗昌）；

第二，地方領袖與軍閥對中央政府的態度不同。地方領袖效忠中央政府；而軍閥稅收不歸中央，任命地方官員不受中央管轄；

第三，地方領袖之間的關係與軍閥之間的關係不同。地方領袖聽命中央，不會打內戰，軍閥之間則互相傾軋、爭霸。

從這些角度去看，雖然軍閥割據在某程度上是從晚清地方勢力抬頭發展而來，但兩者有很大差別。

5.3 軍閥割據的緣起及發展：軍人參與、干涉、把持政治的過程

軍閥割據這個歷史現象，可說是軍人參與、干涉、把持政治的過程。這個過程可分七個階段說明：

第一階段：清末新政——新式武備學堂與新式軍人階層出現。部分軍人對政治開始感興趣，產生了軍人政治化（*politicization of military men*）的趨向。新軍參與革命活動是軍人政治化的體現。

第二階段：清朝覆滅，共和成立——皇權崩潰，法統（政權合法化）危機（*crisis of legitimacy*）出現。皇權政治建基於「天命」；革命打倒了皇權，卻未能樹立新權威。當時，「皇帝」在人們心裏已根深蒂固，「總統」卻仍未完全被接受。

第三階段：共和理想幻滅——革命勢力退卻，軍人勢力滲透全國範圍。儘管共和成立，革命勢力卻只局限於廣東、安徽、江西幾個省。「二次革命」後，袁世凱解散國民黨，孫中山再次逃亡到日本，北洋軍人勢力席捲全國。

第四階段：袁氏獨裁——議會制度崩潰，一切依賴武力解決，即政治軍事化（*militarization of politics*）。

第五階段：討袁之役——以武力反復辟，加劇政治軍事化。袁世凱企圖恢復帝制，這是個政治問題，本應以政治途徑解決，但無法實現。蔡鍔建立護國軍以武力解決問題，各省響應，加強了政治軍事化。

第六階段：南北戰爭——「護法運動」出現，加劇法統危機。袁世凱死後，孫中山從日本回來領導「護法運動」，以 1912 年制定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為正統。而當時統治中國的北洋政府，則以 1914 年制定的《中華民國約法》為正統。人們對法統這個大是大非問題，爭持不休，到底何為正統的「法」，無法達成共識。

第七階段：勢均力敵局面（*equilibrium of fragmented military forces*）出現——軍閥割據現象持續。軍閥割據的時期出現了大小不一的許多軍閥，但沒有一個能夠消滅其他的軍閥，因此需要聯盟。由此角度看，割據持續久遠的現象可以得到

解釋。

可見，軍閥割據是由「軍人政治化」發展到「政治軍事化」（以武力解決國家社會的所有問題）的一個過程。從另一個角度看，軍閥割據是一個過渡時期的產物，即舊秩序已經解體而新秩序還未建立起來的過渡時期。那是一個無任何秩序可言的時代，而「沒有秩序」也成為這個過渡時期的特色。

軍閥割據究竟持續到那時？一般歷史學家以 1928 年為軍閥割據時期的下限。這個設定合理嗎？這些問題，討論南京政府「十年建設」時將會交代。

5.4 軍閥割據時期的中國

下文會說明當時中國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的特色。

5.4.1 政治方面

在 1916—1928 年間，1,300 個大、小軍閥打過 140 場大、小戰爭。打仗，主要是為了爭奪地盤。大軍閥爭奪中央政權，因為誰控制了中央政府，誰就能合法地舉借外債，發行公債，把持中央財政。小軍閥也爭奪地盤，因為沒有地盤就沒有徵稅和招兵買馬的基地。長期的戰爭，導致政局極度動盪不穩。從中央到地方的政權，頻頻易手，直接影響行政效率。

軍閥為了鞏固和擴充地盤，皆以開源為其一切政策的依歸。儘管中國還有總統、內閣、國會，共和卻名存實亡，一切取決於當權者的主觀意願。中國明顯地仍是一個人治國家，管治的準則仍未改變。

軍閥以武力為解決一切問題（包括非軍事問題）的手段，又把大量軍方人員安插到各行政單位，擔任文職工作，使政治更邁向軍事化。

5.4.2 經濟方面

軍閥混戰，嚴重破壞社會生產力；政權四分五裂，根本無法落實全國性的、甚至區域性的經濟發展計劃，阻礙了中國現代化的進程。

2009 年 4 月修訂版

軍閥雖然每能達到開源目的，但往往把在其控制範圍內的金錢、資源、人力、物力花光於戰爭及其他軍事用途上，這對現代化有不良的影響。唯一得益的大概是軍事和軍火工業。

不能否認，中國的民族工業（包括紡織、麵粉、絲綢、火柴、水泥、煙草、糖等工業）在軍閥割據時期有長足的發展，但這與軍閥統治無直接關係。當時工業之所以得到發展，實由各種內外因素所促成。外因是第一次大戰期間，國際市場對中國民用工業製成品及中國農礦初級產品原料的需求大增；內因是政府大部分精力用於爭奪地盤，對現代經濟的控制放鬆，有助民族工商業的興起。同時民國成立後，派遣留學生出國學習之風盛極一時，致使中國培育了第一批企業家、科學家、經濟學家、工程師、經理和技術人員，形成了新的社會力量，有助推動工商業的發展。

5.4.3 社會方面

對一般人來說，生存是最大的問題。由於發生戰爭與天災，到處都出現飢荒。更不幸的是，軍閥割據使傳統的全國性官方救濟機關完全停止運作。美國紅十字會又因飢荒每多是由人禍（軍閥的戰爭）所造成而拒絕救濟；The China International Famine Relief Commission 只好更改了飢荒的定義之後才實施救濟。軍閥割據時期出現了大量農民離村及人口大遷徙的情況，令社會更動盪不安。

5.4.4 文化方面

出現了春秋戰國後的另一次百家爭鳴的局面。似乎在中國歷史上，中央政權崩潰之時，總是會有思想的革命，不知這是定律還是巧合。

第 2 章 五四運動、中國共產黨的創立與 第一次國共合作（1915—1927 年）

1. 五四運動

1.1 五四運動的定義

1.1.1 時人所指的五四運動

時人所說的五四運動，是指 1919 年 5 月 4 日在北京發生的一件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事件。該事件在全國範圍內引起廣泛的反響；直到 7 月下旬，事件才告一段落。具體情況如下：

1919 年 5 月 4 日：北京數千學生上街遊行示威，反對凡爾賽和會有關山東問題的決議；32 人被捕。

1919 年 5 月 6 日：被捕學生獲釋，但北大校長蔡元培其後被迫離任。政府派親北洋軍閥的官員擔任新一任校長，引發新一輪抗爭。

1919 年 5 月 18 日：北京學生發起罷課、杯葛日貨運動，並在《罷課宣言》中首次用「五四運動」一詞（學生領袖羅家倫為它起的名詞）。運動擴大到其他城市。

1919 年 5 月 26 日：有人在文章中談及「五四的精神」。

1919 年 6 月 3-4 日：北洋政府逮捕千多名學生。

1919 年 6 月 5-9 日：上海工商界發起罷工、罷市，支援學生；運動擴大至各大城市；9 日，北京親日官員被迫辭職。

1919 年 6 月 28 日：中國代表團拒簽巴黎和約，代表了五四運動獲得勝利。

1919 年 7 月 22 日：中國學生會宣佈停止罷課，蔡元培復職。

1.1.2 後世一般歷史學家所指的五四運動

1935 年 5 月，胡適談五四運動時說：「當年若沒有思想的變化，決不會有五

四運動。」(見〈紀念五四〉,載《獨立評論》,1935 年 5 月 5 日)胡講「思想的變化」,當然是指「新文化運動」。其後歷史學家所稱的五四運動,多數是就廣義而言,即包含當時所稱的「五四運動」(史家叫「五四事件」May Fourth Incident)及該事件發生之前、之後出現的「新文化運動」(孫中山最早用的名詞)。即是說,五四運動泛指 1915—1921 (有說 1923) 年間的一系列思想、文化、政治、社會活動,包括文學革命;迎接新思潮與反傳統;學生遊行、示威、罷課;杯葛日貨;工商界罷工、罷市。各項活動的背後動機是救亡;故五四運動是一場反傳統、反軍閥、反帝國主義的愛國運動。

1.2 新文化運動：現代中國的第一次文化、思想革命

新文化運動可以說是中國版的十八世紀歐洲啓蒙運動,以「科學」(理性)和「民主」(人權)為整個運動的題旨。它是現代中國的第一次文化、思想革命。

1.2.1 新文化運動興起的原因

新文化運動興起的原因可分為兩點。

第一,一些先進知識分子在啓動新文化運動的《新青年》雜誌上發表文章傳播新思想,起指導、啓蒙的作用。《新青年》原名《青年雜誌》,由陳獨秀於 1915 年 9 月創辦。在創刊號,陳獨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向青年提出 6 項指導性的原則:

1. 自主的而非奴隸的;
2. 進步的而非保守的;
3. 進取的而非退隱的;
4. 世界的而非鎖國的;
5. 實利的而非虛文的;
6. 科學的而非想像的。

《青年雜誌》1916 年春停刊,9 月復刊,改名《新青年》,以「改造青年的思想」

2009 年 4 月修訂版

輔導青年的修養」為復刊宗旨。《新青年》提出：中國社會的改造，應建基於國民（尤其是青年）的人格、素質和價值觀念的更生。這成為新文化運動啓蒙思潮的主體內容。

第二是北大新任校長蔡元培的改革。蔡元培訂定大學教育的目的是「探求學理、掌握科學知識、培育人才新風」，又訂定辦大學的方針是「兼容並包、思想自由」。從 1917 年開始，北大出現了非常活躍的氣氛，可謂百花齊放。師生各自創辦雜誌，宣揚自己的主張：有由先進知識分子（如陳獨秀、胡適）辦的《新青年》、由先進學生領袖（如傅斯年、顧頡剛、羅家倫）辦的《新潮》；亦有由傳統保守知識分子（如劉師培、辜鴻銘）辦的《國故》，並得到校外學者嚴復、林紓的支持。

1.2.2 新文化運動的內容

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內容有二：第一，文學革命；第二，新思潮與反傳統。

先談文學革命。

文學革命主要是反對文言文，提倡用白話文寫作。又反對文以載道（即宣揚儒家價值觀），鼓吹寫實主義（realism）。

爲了奠定白話文寫作原則，胡適提倡「八不主義」，即：

1. 不用典；
2. 不用陳套語；
3. 不講對仗；
4. 不避俗字俗語；
5. 須講求文法之結構；
6. 不作無病呻吟；
7. 不摹仿古人，語語須有個我在；
8. 須言之有物。

儘管胡適鼓吹「八不主義」，他還是談「文學改良」而非「文學革命」。（見〈文

2009 年 4 月修訂版

學改良芻議》，載《新青年》，1917 年 1 月 1 日）

提出「文學革命」這個口號的第一人是陳獨秀。陳認為要推行「文學革命」，就必須要：

1. 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
2. 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
3. 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見〈文學革命論〉，載《新青年》，1917 年 2 月 1 日）

自 1918 年 1 月開始，《新青年》完全採用白話文。這時期出現了新詩、戲劇、散文、短篇小說（如魯迅的《狂人日記》）、用白話文翻譯的現代歐洲文學。可以說，中國文學界步入了新的創作階段。「五四事件」發生後的半年間，中國出現了 400 多份新的、採用白話文的期刊。1920 年 3 月，中國政府正式宣布白話文為國語。小學、中學的課本都一律棄用文言文。

白話文運動是新文化運動中收效最快、成就最顯著的一個領域。它創造了一個語義系統，適應了現代社會心態及與外部世界交流的需要。

當時文學界的先進分子雖然在棄用文言文這方面已達到共識，但是對於文學該走哪個方向則爭論紛紛。因此，五四作家很快便分道揚鑣。1920 年代初，中國文壇上主要分成了兩派。其中一派的代表人物有周作人、茅盾。他們於 1921 年 1 月成立文學研究會，認為文學應反映社會及人的境況，實不自覺地承襲了文以載道的精神，只是他們的「道」與傳統的「道」截然不同。另一派的代表人物有郭沫若、郁達夫、田漢。他們於 1921 夏成立創造社，深受浪漫主義、個人主義影響，主張為藝術而藝術，偏愛創作藝術。

以下談新思潮、反傳統。

當時許多知識分子嚮往西方的文明，出現了接受西方學說的熱潮。受五四知識分子歡迎的西方學說包括達爾文的進化論、社會達爾文主義、實用主義、經驗主義、互助論、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科學（「賽因斯」science）、民主（「德莫克拉西」democracy）。當中最受歡迎的是「科學」與「民主」。

知識分子更以西方思想作為標準來評價儒家學說，因此出現了反孔（子）運動。1916 年 2 月，易白沙在《青年雜誌》1 卷 6 號上發表〈孔子平議〉，首開點名批評孔子的先例。《新青年》於 1916 年 10 月起更將「平議」上升為「倒孔」。胡適又把孔子及其信徒譏為「孔家店」，但胡相對疏離「倒孔」運動。相反，陳獨秀、吳虞、魯迅是「倒孔」先鋒，領導「打倒孔家店」。

陳獨秀認為「主張尊孔，勢必立君；主張立君，勢必復辟」，「提倡孔教必悖共和」，「信仰共和必排孔教」（〈復辟與尊孔〉）。他又認為孔教道德造成了「君虐臣、父虐子、姑虐媳、夫虐妻、主虐奴、長虐幼」的殘酷現實（〈答傅桂馨〉）。

吳虞說儒家「由天尊地卑演而為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尊婦卑、官尊民卑，尊卑既嚴，貴賤遂別」，這就為專制制度提供了理論依據（〈儒家主張階級制度之害〉）；他認為「禮教」之遺害最大（〈吃人與禮教〉）。

魯迅則借用諷刺文學批孔。例如，他在《狂人日記》中寫道：「凡事總須研究，才會明白。古來時常吃人，我也還記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裏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由於魯迅的作品深入人心，故其影響更為廣泛。

思想界的先進分子一致認為要摒棄中國的傳統才能救亡，但卻在其他方面意見不合。他們很快便分道揚鑣，主要有兩派，胡適代表其中一派。他堅持要多研究問題、少談「主義」，認為「沒有一種靈丹妙藥可解決中國所有的難題；每個問題必須分開研究，分開解決。」（見〈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載《每週評論》，1919 年 7 月 20 日）李大釗代表另一派：他認為「主義」能為解決社會問題提供一個「總方向」，是必須的；必須有個根本解決的方針，才能有希望解決一個一個問題。（見〈再論問題與主義〉，載《每週評論》，1919 年 8 月 17 日）

1.3 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

現從現代化、思想發展、愛國主義發展三個角度探討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

1.3.1 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化的里程碑：思想現代化的開始

從文化層面去理解，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可以說經歷了三個階段，即器物技能現代化、制度現代化、思想現代化。第一階段從洋務／自強運動開始。第二階段從百日維新、清末新政、辛亥革命開始。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化的一個里程碑，因為它標誌著第三個階段（即思想現代化）的開始。問題是：中國為何在民初體現了現代化範式的轉變？理由是：帝制雖滅，但中華民國只有共和的軀殼而無共和的實質，更有復辟之舉，這使關心國家的知識分子明白硬搬外國政治制度來中國實在是徒勞無功的；若要救亡，就要有根本的變革，即徹底改變中國人的態度、世界觀、價值觀，來一次思想、文化革命。

1.3.2 五四運動是近代中國思想發展的轉折點：「整體性的反傳統主義」(totalistic anti-traditionalism) 的出現

新文化運動並非一夜間突然發生的；可以說，新文化運動是晚清以來中國文化、思想轉變歷程中的一個新高峰。正如史華慈 (Benjamin Schwartz) 說：“When view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revious thirty years,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no longer resembles a mountain range rising up abruptly out of a flat plain, but simply a somewhat higher range in a long stretch of complex mountainous terrains” (Benjamin Schwartz (ed.), *Reflections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 Symposiu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史華慈指出，晚清思想界出現了「突破的一代」(the breakthrough generation)，代表人物有嚴復及梁啟超。嚴復翻譯、介紹了許多近代西方文化思想的經典著作，包括《天演論》(T. Huxley, *Evolution and Ethics*)、《群己權界說》(J.S.Mill, *On Liberty*)、《群學肆言》(H.Spencer, *Study of Sociology*)、《原富》(A. Smith, *Wealth of Nations*)、《法意》(C.L.S. Montesquieu, *Spirit of the Law*)。梁啟超則論述了「自由」、「民權」等西方政治概念，提出「新民說」。他們對促進中國思想現代化所作出的貢獻，

絕不能低估。可以說，沒有晚清的思想變化，就沒有五四的思想革命。

雖然說新文化運動是前期思想變化的延續，但新文化運動本身又具有其獨特性（uniqueness），即林毓生所說的「整體性的反傳統主義」（totalistic anti-traditionalism）。（見 Lin Yu-sheng,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Madison, 1978；林毓生：《中國意識的危機》，貴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為何五四反傳統要「整體性」地反呢？林毓生解釋，這是因為五四知識分子在他們的深層意識中，受傳統有機一元思維模式影響，把傳統看做一個有機的、不可分割的整體，又認為傳統文化與現代化是互不相容的，因而「整體性」地批判傳統，繼而主張「全盤」打倒傳統。晚清知識分子跳不出儒學的框框，而五四知識分子則全盤地否定傳統，故「打倒傳統」是五四時期的一個特色。對林毓生來說，「打倒傳統」與五四知識分子希望中國建立起民主是背道而馳的。他認為，儒學雖有別於民主，但兩者決非相互排斥。他因此提出了「創造性轉化」（creative transformation）的概念，主張通過這個方法把西方民主落實到一個已「轉化」的儒家中國中。所謂「創造性轉化」，是指使用多元的思考模式將一些中國傳統中的思想、價值、行為模式加以重組與／或改造，使之變為有利於變革的資源，同時在變革中得以繼續保持文化的認同。林毓生批評五四知識分子的「整體性的反傳統主義」，認為中國錯過了一次推行真正民主的機會，正是由於他們這種激烈的思維模式所致。

打倒傳統是思想革命。現代中國的思想發展經歷了兩次革命，第一次是五四新文化運動革了儒家的命，第二次是毛澤東思想革了傳統及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命。這是從「思想內容」（thought contents）的角度看現代中國思想發展，突出了發展中「變革」一面，即從儒學強調「三綱」、「五倫」到五四強調「科學」、「民主」，再到毛澤東強調「階級鬥爭」。若換了用「思維方式」（mode of thinking）的角度看，則會察覺到現代中國思想發展呈現了一貫性。為何這樣說呢？原因是儒家強調修身，新文化運動強調確立民主、科學、理性的世界觀，毛澤東思想強調要「紅」（即以階級的角度去看問題），三者都是把人的意識（human

consciousness) 放到最重要的位置。三套傳統都認為，改造人的意識(transformation of human consciousness) 是推行一切政治、經濟、社會變革的先決條件。可見，現代中國思想發展也有「繼承」／「延續」的一面。

1.3.3 五四運動是中國愛國主義發展的里程碑：跨社會階層愛國運動與「整體性反傳統的愛國主義」的出現

清末新政時期，不同形式的愛國運動在中國政治舞台上出現，包括排滿運動、收復主權運動、1905 年的杯葛美貨運動及 1908 年的杯葛日貨運動。五四運動則首次體現了學界與工商界，即城市居民的聯合反日、反軍閥政府的愛國運動。這是一次空前的、最廣泛的表達民族感情的運動。它以「民族國家」為效忠對象，不像以往以「宗室」、「種族」、「國君」為效忠對象。

五四愛國主義是一種極端複雜的、充滿矛盾的愛國主義。其矛盾之處可從兩方面說明。首先，五四知識分子一方面傾慕西方文化，要「全盤西化」來救國，另一方面卻痛恨列強出賣中國的利益，要反西方。這種複雜、矛盾的心態，大概是當時不少知識分子欣然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因，因為它是反西方的一種西方學說。其次，五四知識分子一方面認識到非全盤打倒傳統不能救國，另一方面又知道全盤放棄固有的文化是不可能的事，故陷於痛苦、矛盾的心態中，並產生如林毓生所說的「中國意識的危機」(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基於「整體性反傳統」的五四愛國主義，可說是世界歷史上獨一無二的一種愛國主義。

1.4 對五四運動的反思

五四運動開啓了中國人對傳統文化的全面反思，它帶給我們最寶貴的價值，應該是一種「批判性反思」的精神。站在繼承五四精神的立場上，我們也要對五四這個新傳統作嚴肅的反思。

研究五四運動的學者往往強調，新文化運動標誌著中國走上科學、民主之路。我們對五四運動作出反思就要問：為什麼科學、民主一直到現在只是被人叫

喊的口號呢？科學、民主之未能在中國植根，除了在某程度上是因為客觀環境起了負面影響外，五四知識分子對待西方思想的態度，正是問題的關鍵。五四知識分子接受西方思想，乃基於一種功利的動機。五四新文化運動，原本是一場啓蒙運動，但運動發展下去卻變成是手段，救亡才是真正的目的。對於某西方學說，知識分子不是整套去理解和接受，而是只選擇其有用的部分，以圖達到救亡、富強的目的。因此西方思想在輸入中國的過程中，已被扭曲。

五四倡導民主，但重點卻放在民主制度上（即民主的「用」而非民主的「體」），而忽視民主的「包容」精神；知識分子看事物採用非白即黑的兩分法，肯定一切，否定一切，把世界的多樣性、複雜性約化爲一種簡單、絕對的理想主義。他們談民主，又鮮及法治；只講民主，不講法治，不是演變成「極權民主」，便是演變成「無政府主義式的自由」，彷彿只有蔡元培、胡適等極少數人真正深入了解民主。

五四又倡導科學，即求真的精神。但五四之後出現「科學崇拜」、相信「科學萬能」的現象，是郭穎頤所說的「唯科學主義」(scientism)(見 Daniel W.Y. Kwok, *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 1900—195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郭穎頤著，雷頤譯：《中國現代思想中的唯科學主義（1900—1950）》，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年）。

科學、民主，成爲只被人叫喊的口號，且與西方人所主張的科學、民主，有不同的理解。一般人認爲近現代中國深受西方思想的影響，即就科學、民主兩個概念而言，我們有必要重新檢討這個看法。在深層次上來說，中國人受科學、民主的影響並不大，似乎一切外來思想輸入中國都會被「中國化」(Sinicized)，加添了中國的特色。

1.5 五四運動所產生的三大思想流派

五四運動產生了三大思想流派：

第一，自由主義民主 (Liberal democracy)，代表人物有胡適。自由民主派厭

惡軍閥政府，鄙棄政治活動，致力於學術研究和教育，故鮮有在中國政壇上發揮影響力；

第二，馬克思列寧主義（Marxism-Leninism），代表人物有陳獨秀、李大釗，將會在討論國共關係時作詳細交代；

第三，新傳統主義（Neo-traditionalism），即新儒家／新儒學（Neo-Confucianism），代表人物有梁漱溟，下文就此作些補充。

研究新文化運動的人，大多集中探討五四知識分子如何迎接新思潮、反傳統；儒學彷彿已走到窮途末路，除了成為被人「打倒」的對象外，似乎沒有什麼值得一談。傳統國粹派面對「倒孔」的狂潮，因未能提出任何新的儒學觀點，而顯得一籌莫展。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反孔」之激烈氣氛中，有一位年青教授卻能獨排眾議、力挽狂瀾，為儒學重新包裝，並突出其現代意義。他是首創東西文化比較研究法的梁漱溟；1920年在北大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講演時，座無虛席。

梁漱溟第一次提出把世界文化分三大體系，即西洋、中國及印度，並闡明每個文化必按其「意欲」發展。他指出「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為根本精神的」，故西方人具奮鬥態度，著眼解決問題、改造局面；「中國文化是以意欲自為調和，持中為其根本精神的」，故中國人隨遇而安，不去解決問題，只尋求自我滿足；而「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後要求為其根本精神的」，故印度人具禁欲態度，傾向於根本取消問題或要求。就此，他舉了個例子，若一間房子房頂破了滲雨，西方人會拆掉重建，中國人會修補，而印度人則根本沒意識到他們在一間滲雨的房裏。

梁認為，西方人勇於戰勝自然，發展科學，但過於追求物質慾望，引發了世界大戰。因此，「現今西方思想界已鮮明的要求改變他們從來人生態度；而且他們要求趨向之所指就是中國的路，孔家的路」。他大膽地預示：「質而言之，世界未來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的復興」。重要的一點是，梁認為在中國歷史裏看到的並非真正的儒家，亦非孔子的儒學，故此應重新審視，追求真正的儒學，為未來中

國文化復興奠下基礎。1921 年，梁氏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至 1929 年已印至第 8 版，可見其為學術界人士所重視的程度。

2. 陳獨秀、李大釗與中國共產黨的創立

中國共產黨於 1921 年成立，是一個以馬克思主義作為其理論基礎的政黨。而馬克思主義是闡釋資本主義社會裏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鬥爭的理論。新文化運動初期，較少人注意到馬克思主義，這大概是因為當時中國尚非資本主義社會、工業社會，資本家、工人的人數不多。但為何馬克思主義在三數年間就吸引了許多先進的知識分子？現試從中國共產黨的創辦人陳獨秀、李大釗二人的心路歷程看五四知識分子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原因。

2.1 新文化運動開展時的陳獨秀和李大釗

新文化運動開展時，陳獨秀任北大文科學長。他創辦了《新青年》，領導「文學革命」和「打倒孔家店」，並鼓吹科學（「賽因斯」 science）與民主（「德莫克拉西」 democracy）。當時他主張的是英美式的民主。（詳情見上文「五四運動」一節）

而李大釗當時任北大圖書館主任和教授。他的哲學思想體現了道家的世界觀，但由於受到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響，故有積極、進取、樂觀的一面。他相信「宇宙無盡，無初無終」，認為「今」最寶貴，提倡「青春中華」的創造。

1916 年 9 月，李大釗發表〈青春〉，把希望寄託於青年。他寫道：「吾願吾親愛之青年，生於青春死于青春，生於少年死于少年也。……青年循蹈乎此，本其理性，加以努力，進前而勿顧後，背黑暗而向光明，為世界進文明，為人類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創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國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類，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資以樂其無涯之生。」

1918 年 4 月他又發表〈今〉，當中寫道：「無限的『過去』都以『現在』為

歸宿，無限的『未來』都以『現在』為淵源。『過去』、『未來』的中間全仗有『現在』以成其連續，以成其永遠，以成其無始無終的大實在。……這就是過去未來皆是現在的道理。這就是『今』最可寶貴的道理。」

可見新文化運動初期，陳、李二人似乎和馬克思主義拉不上關係。

2.2 陳獨秀、李大釗評論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Bolshevik Revolution)，1918－1919 年

陳獨秀在 1918 年 3 月的〈駁康有為《共和平議》〉中首先提到俄國革命的重大歷史意義：「二十世紀俄羅斯的共和，前途遠大，其影響於人類之幸福與文明，將在十八世紀法蘭西革命之上。」原來陳把革命和革命的理論基礎分開看；他在表示歡迎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同時，卻對該革命的理論基礎——馬克思主義學說表示懷疑。這可見於他在 1918 年 12 月的《每週評論》中所講的話：「馬克思的社會主義今日已經沒有根據了，所以他的勢力在〔德國〕國會上也漸減少。」

1919 年底，陳獨秀聽了胡適的老師杜威（John Dewey）在北大講授民主，對民主有更深入的理解，並在此刻仍堅持自己對民主的信念。他在 1919 年 12 月的〈實行民治的基礎〉中寫道：「中華民國的假招牌雖然掛了八年，卻仍然賣的是中華帝國的藥，中華官國的藥，並且是中華匪國的藥。……我們現在要實行民治主義，是應當拿英美做榜樣。……我們不情願階級鬥爭發生，我們渴望純粹資本作用——離開勞力的資本作用——漸漸消失，不至於造成階級鬥爭。」

有趣的是，李大釗對俄國爆發革命作出了同樣的反應；他一方面表示歡迎布爾什維克革命，另一方面卻不認同作為布爾什維克革命哲學基礎的唯物主義。

他在 1918 年 11 月的〈Bolshevism 的勝利〉中提到：「Bolshevism 這個字，雖為俄人所創造，但是他的精神，可是二十世紀全世界人類人人心中共同覺悟的精神。所以 Bolshevism 的勝利，就是二十世紀世界人類人人心中共同覺悟的新精神的勝利。」可見他用自己的觀點去理解布爾什維克革命。

他又認為精神與物質同等重要，不應像馬克思主義那樣強調物質第一性。

2009 年 4 月修訂版

1919 年 5 月發表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裏面寫道：「我們主張以人道主義改造人類精神，同時以社會主義改造經濟組織。不改造經濟組織，單求改造人類精神，必致沒有效果。不改造人類精神，單求改造經濟組織，也怕不能成功。我們主張物心兩面的改造，靈肉一致的改造。……平心而論，馬氏的學說，實在是一個時代的產物，在馬氏時代，實在是一個最大的發見。我們現在固然不可拿這一個時代一種環境造成的學說，去解釋一切歷史，或者就那樣整個拿來，應用於我們生存的社會，也卻不可抹煞他那時候的價值，和那特別的發見。」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來說，當時的李大釗是一個唯心主義者。

2.3 從蘇俄傳來的新信息，1920 年

1920 年出現了兩個新動向，致使一些中國知識分子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

其一是 1920 年 4 月「加拉罕對華宣言」(Karakhan Declaration) 首次在中國公開。它歷史性地宣布蘇俄將無條件放棄沙俄在華所奪取的一切權益。儘管蘇俄沒有立刻履行諾言（及後「宣言」並沒有落實），但這項舉動卻與西方列強剛在凡爾賽和會出賣中國利益之舉形成了反差，不少中國知識分子因此對馬克思主義的態度開始改變。

其二是 1920 年 7 月列寧提出了「殖民地與半殖民地革命」理論。它為「半殖民地」中國的知識分子提供了一個具體的救亡行動綱領：中國革命須分兩個階段進行，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這個具體的反帝國主義「兩次革命」論滿足了正為救國迷惘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期望。

2.4 陳獨秀、李大釗成爲馬克思主義的忠實信徒

從 1920 年秋天開始，陳獨秀、李大釗對蘇俄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的看法有了很大的轉變，而且很快便成爲馬克思主義的忠實信徒。

陳獨秀在 1920 年 9 月寫的〈談政治〉中說：「若不經過階級戰爭，若不經過勞動階級佔領權力階級地位的時代，德莫克拉西必然永遠是資產階級的專有

物。……我承認用革命的手段建設勞動階級（即生產階級）的國家，創造那禁止對內對外一切掠奪的政治、法律，為現代社會第一需要。」

在 1920 年 12 月的〈民主黨與共產黨〉中，陳又寫道：「民主主義是什麼？乃是資本階級在從前拿他來打倒封建制度的武器，在現在拿他來欺騙世人把持政權的詭計。……資本和勞動兩階級未消滅以前，他兩階級的感情、利害全然不同，從那裏去找全民意？」

李大釗在 1920 年 12 月的〈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中提出：「從前的歷史，專記述王公世爵紀功耀武的事。史家的職分，就在買此輩權勢階級的歡心，好一點的，亦只在誇耀自國的尊榮。……唯物史觀所取的方法，則全不同。他的目的，是為得到全部的真實。……這不是一種供權勢階級愚民的器具，乃是一種社會進化的研究。」似乎他無條件地接受了唯物論，對一年前自己提出的許多疑問則不了了之。

從陳、李二人的言論可得悉在短短一年內他們完全改變了自己的觀點。這反映出二人是為了解救的目的——即出於功利的動機去接受馬克思主義。其實，他們所接受的，並非強調無產階級革命的經典馬克思主義，而是強調反帝國主義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即經過列寧改造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可說是「帝國主義時代的馬克思主義」，Marxism-Leninism is “Marxism in the era of Imperialism”）。本來，接受馬克思主義理應是為了解讓工人階級獲得更多的利益，但當時陳、李等知識分子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目的卻不是那樣；他們所接受的只是列寧突出的帝國主義階段的馬克思主義。當然，在成為馬克思主義的信徒後，二人亦欣然接受了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

這一過程體現了五四時期的中國知識分子接受西方的學說，是出於救亡的功利動機。由此看來他們在短時間內完全改變觀點是可以被理解的。

2.5 中國共產黨的誕生（1921 年 7 月）

由於蘇俄受到西歐各國孤立和敵視，列寧開始將注意力轉移到亞洲。眼見中

國知識分子似乎非常擁護馬列主義的革命理論，列寧遂派第三共產國際（以後簡稱「第三國際」Comintern）東方局代表維丁斯基（G.N. Voitinsky）來華支援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 1921 年 7 月舉行，這表示中國共產黨正式誕生。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了由不在場的陳獨秀當選中央局書記。大會議決堅持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因此對其他政黨（包括國民黨）持敵對態度；又派代表去莫斯科參加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

1922 年 7 月，中國共產黨舉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並議決參加第三國際，成為它的支部；接受「兩次革命」理論，確認「反帝國主義」及「反封建主義」為現階段革命之目標，奠下與國民黨合作的基礎。

以下將分四個部分闡述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包括第一次國共合作（1923—1927 年）、國共鬥爭（1927—1937 年）、第二次國共合作（1937—1945 年）及國共內戰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1946—1949 年）。

對每個部分逐一加以說明之前，會先著重地提出兩個有關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問題：第一、運動是否一帆風順、持續擴張？第二、運動是否一直由毛澤東領導？在此提出這兩個問題是有道理的。歷史學家往往因事後看問題而影響了他們分析事物的客觀性。1949 年，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打敗了執政的國民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事實，直接影響了一般學者對整個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看法。

首先，由於共產黨打敗了國民黨，一般學者都將注意力集中在共產黨如何取得勝利，往往忽略了 1921 到 1949 年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起伏和波折。從 1921 到 1927 年，共產主義運動藉國共合作而持續擴張；1927 年國共合作破裂，陷入了低潮。1930 到 1931 年，共產黨在華中地區成立了許多蘇維埃根據地，再次擴張；但由於蔣介石進行「圍剿」，共產主義運動於 1934 到 1936 年又轉入低潮。抗日戰爭爆發後，國民黨撤退到四川，而日本軍隊只能控制沿岸及鐵路沿線地

區，因此共產黨得以在廣大農村腹地擴展抗日根據地。1939 到 1941 年，日本軍隊全力掃蕩華北抗日根據地，使共產主義運動再次陷入危機中。直到 1944 年，共產黨才開始重新擴張勢力。抗戰勝利後不久內戰爆發，起初國民黨軍隊勢如破竹、所向披靡，直到共產黨於 1947 年 7 月開始全面反攻，形勢才急轉直下，最後共產黨取得勝利，國民黨敗北遷台。事實基本如此。

其次，由於 1949 年共產黨的勝利標誌著毛澤東領導的革命獲取勝利，而毛澤東本身表示革命是農民的革命，因此許多學者聚焦於共產主義運動中毛澤東領導的農民革命，而忽略了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複雜性。當時中國的共產主義者主要分為兩個派別。其一聽命於第三國際，主張在城市進行革命；另一派由毛澤東領導，主張在農村進行革命。其實，從 1921 年到 30 年代中期紅軍長征，第三國際都直接影響了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期間毛澤東曾遭到排斥，長征中途的遵義會議，才再次得到認可。直到 1942—1943 年在延安進行整風運動，他的權威領導才得以確立。

3. 第一次國共合作

1919 年 3 月，列寧成立第三共產國際，以推廣共產主義運動。眼看 1921 年 7 月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力量非常薄弱，第三國際便致力在中國尋找一個較有影響力的政黨來與中國共產黨合作。

3.1 國共合作的醞釀與「聯俄容共」政策的制定（1923 年）

第三國際在和孫中山在第一次國共合作的醞釀中擔當了重要的角色。

1921 年，第三國際派馬林（H. Maring）到桂林聯繫孫中山；翌年又派達林（S.A. Dalin）與越飛（Adolf A. Joffe）分別到廣州和上海與孫會面。由於孫中山的革命事業正陷於低谷，他因此對布爾什維克黨組織及紅軍深感興趣。1922 年 6 月廣東軍閥陳炯明叛變，對他打擊尤大，孫中山於是決定接納第三國際的建議，

2009 年 4 月修訂版

制定了「聯俄容共」政策，為第一次國共合作打下基礎。

要注意的是孫中山的「容共」政策規定中共黨員必須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換言之，所謂「國共合作」並非兩黨平等地合作，而是要中共黨員承認國民黨在「國民革命」中的領導地位。1923 年 1 月 12 日，第三國際向中共發出「一月指示」，務使它依照孫中山提出的方式進行合作。其實，中共中央局書記陳獨秀是不贊成「容共」政策的。他恐怕這種合作方式會危害黨的獨立性和黨員的階級性。他又承認「祇不過是因為第三國際的壓力，中國共產黨才勉強承認在國民黨內開展活動的必要性。」陳為了服從第三國際的指示而執行違背自己意願的政策，可說是「黨性」的具體表現。

在中共接受了「黨內合作」形式之後，孫中山與越飛遂於 1923 年 1 月 26 日發表《孫文越飛聯合宣言》，指明中國目前不適宜實行共產主義或蘇維埃政體。這符合了孫中山的願望。另一方面，蘇俄對中國政局的影響從此大增。第三國際立即派來鮑羅廷（Mikhail Borodin）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又派來加倫將軍（General Galen，原名 Vasily Blucher）協助孫中山訓練一支黨軍，黃埔軍校於 1924 年在廣州成立，蔣介石成為第一任校長。

3.2 國民黨改組與分裂（1924 年）

1924 年 1 月，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會上宣布改組。一般歷史學家認為，鮑羅廷在國民黨改組一事上影響最大。無可否認，這次改組是以蘇聯之組黨方式為依歸的，但孫中山亦發揮了很大的影響力，使改組後的國民黨符合他本人的意願。

大會確定孫中山為總理。新黨章規定總理為全國代表大會及中央執行委員會之主席，有最終決策權，這使總理權大於黨。值得一提的是，出席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半數成員及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所有成員都經孫中山親手挑選。孫又於同年 6 月創立政治會議（或稱中央政治委員會），它應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一個附設機關，但實際上有權先斬後奏，所以它的權力大過中央執行委員會。孫

2009 年 4 月修訂版

中山領導革命經過幾次失敗後，意識到作為國民黨的領袖必須掌握大權。國民黨改組後，孫儼如黨的獨裁者。

另外，國民黨一大確定了「聯俄、容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這使國民黨成爲一個與下層社會有廣泛聯繫的革命政黨。此時孫中山認爲群眾應成爲革命的積極參與者，因此又在中央成立了農、工、婦女、青年、宣傳等部門，由中共黨員領導。

孫中山終於掌握了實權，但是派系鬥爭也開始了。國民黨爲何分裂？基本原因是國民黨黨員對「聯俄容共」政策產生分歧。其中部分高級黨員（如中央監察委員會之張繼、鄧澤如、謝持等人）基本上反對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政策，成爲國民黨右派。他們因避免公開批評孫中山，故把矛頭指向共產黨。1924 年 6 月，右派彈劾中共黨員破壞合作，違反《孫文越飛聯合宣言》的精神。而國民黨另一些高級黨員（如汪精衛、廖仲愷等人）則支持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政策，成爲國民黨左派。要注意的是，國民黨左派成員並非中共黨員，他們只是根據孫中山的主張與共產黨合作而已。

國民黨左右兩派的勢力可從改組初期的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各派人數的對比看到：國民黨左派有 5 人，共產黨 3 人，國民黨右派 16 人。若將中共黨員撥歸國民黨左派陣營計，則國民黨左右兩派人數的比率爲 1:2，可見當時右派勢力較左派強。雖然中共黨員控制了國民黨中央黨部的大多數部門，但在軍隊中沒有影響力。孫中山用個人的影響力緩和兩派的鬥爭，防止其惡化；但隨著孫中山於 1925 年 3 月逝世，兩派鬥爭越發激烈，國民黨左派勢力上升。

3.3 孫中山逝世與國民黨左派勢力的上升（1925 年 3 月—1926 年 3 月）

孫中山死後，國民黨左右兩派對「三民主義」的闡釋出現了分歧。在「民族主義」方面，左派認爲應該策動群眾推翻帝國主義及其國內支持者，右派認爲要恢復過去光榮傳統。「民權主義」方面，左派強調「憲政」，右派強調「訓政」。而「民生主義」方面，左派強調它是孫中山制訂之「平均地權、節約資本」政策，

右派則認為孫中山所說的「民生主義」是「民生史觀」，不是什麼具體政策。

權力鬥爭也激烈。孫中山逝世後，由誰來繼承他的領導地位呢？當時在廣州，有五個有力競爭者。其中胡漢民為右派領袖、廣東省長、代理大元帥；汪精衛、廖仲愷都是左派領袖；許崇智是粵軍統領；蔣介石是黃埔軍校校長、國民黨黨軍的領袖。

1925 年 7 月 1 日，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需要注意一般所說的國民政府是指 1927 年 4 月 18 日蔣介石成立的南京國民政府，而 1925 年 7 月到 1927 年 4 月的這一段歷史，可說是蔣介石「起家」之歷史，在國民黨史籍甚至一般教科書中並不強調。其實，國民政府早在 1925 年已成立。

當時國民黨左派已控制了國民政府。左派領袖汪精衛、廖仲愷分別被任命為國民政府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以及廣東省長、財政部長、工人部部長。右派領袖胡漢民則只獲委任為外交部長，因而深感不滿。況且，廣州國民政府未被列強承認，其外交部長一職形同虛設，無怪右派怒氣衝天，將矛頭直指汪、廖二人。

1925 年 8 月，廖仲愷被刺。國民政府立即成立「特別委員會」，由汪精衛、許崇智、蔣介石進行調查，得出結論是廖被右派刺殺。「特別委員會」認為胡漢民對廖被殺一事雖沒有法律上的責任，但應負政治上的責任，結果他被「派」去莫斯科，國民黨右派因而受到嚴重打擊。一部分右派成員於 1925 年 11 月在北京附近西山召開會議，形成「西山派」。他們宣稱由汪精衛領導的廣州國民政府不合法，但沒有攻擊蔣介石。

蔣介石又於 1925 年 9 月指控許崇智濫用公帑，並勾結陳炯明，把許放逐到上海。到 1925 年底，廣州國民政府的重量級政治人物只剩下汪精衛、蔣介石二人。

1926 年 1 月，國民黨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對比左右兩派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中的人數，國民黨左派 13 人，共產黨 7 人，國民黨右派 16 人。若將中共黨員撥歸國民黨左派陣營計，則左右兩派人數比率為 5:4，左派的勢力明顯加強了。

3.4 「中山艦事件」(1926 年 3 月 20 日) 與蔣介石的崛起

1926 年 3 月 20 日，蔣介石逮捕具中共黨員身份的中山艦艦長李之龍，並宣布戒嚴，監視蘇俄軍事顧問住宅，史稱「中山艦事件」或「三月二十日之變」。

對於「中山艦事件」的起因，至今仍有不同說法。蔣介石認為共產黨密謀要把他擄去莫斯科；而共產黨相信整個事件是由蔣介石虛構出來，目的是蔣想找藉口清算中共。國民黨右派說此事是中共與蘇俄顧問合謀策劃要搞掉蔣；國民黨左派則認為是右派挑撥離間，使蔣相信汪會對他不和。其中左派成員陳公博在其回憶錄《苦笑錄》中有具體的述說。

「中山艦事件」後汪精衛逃去歐洲，從中見到汪「不能積極地解決問題」這一個弱點，並使他更加地可疑。最終，蔣介石成為廣州國民政府中權力最大的一個人物。國民黨左右兩派鬥爭，其結果是鸛蚌相爭，漁人得利。

值得指出的是，「中山艦事件」發生後，陳獨秀向第三國際反映他主張兩黨要在平等的關係上合作——即改「黨內合作」為「黨外聯盟」，但並未得到接納。

3.5 北伐與國共分裂 (1926—1927 年)

蔣介石掌握權力後，發動北伐戰爭。陳獨秀反對北伐，認為它會帶來新的軍事獨裁，但他也只能接受第三國際的指使參與北伐。

為準備北伐，蔣介石在廣州預先徵稅開源，強迫廣東商人買公債。這使廣東的商人對他非常不滿。他又收買地方軍閥，將他們委任為北伐軍（即國民革命軍）軍長。委任的具體情況如下：黃埔黨軍作為第一軍，軍長為何應欽；第二軍湘軍，軍長為譚延闓；第三軍滇軍，軍長為朱培德；第四軍為粵軍，軍長為李濟深；第五軍也是粵軍，李福林為軍長；第六軍是第二支湘軍，軍長是程潛；第七軍為桂軍，軍長由李宗仁擔任；唐生智則擔任第八軍——另一支湘軍的軍長。1926 年 6 月，國民政府任命蔣介石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7 月，蔣誓師北伐。到 1927 年 3 月進駐上海時，國民革命軍已由最初的 8 個軍增至 40 個軍。

1926 年 7—9 月，北伐軍集中討伐湖南、湖北的軍閥吳佩孚，並攻下長沙、漢陽、漢口、武昌。在湘一帶，由唐生智領軍，收了速戰速決之效。中共黨員隨軍北上，沿途策劃群眾運動，在農村組織農民協會清算地主，在城市組織工人搞罷工。國民黨左派坐鎮武漢，爲了遵守孫中山的「扶助農工」政策，支持由中共黨員領導的群眾運動。

蔣介石開闢另一戰場，轉戰江西。1926 年 9—11 月，他討伐控制著江蘇、安徽、江西、浙江、福建的軍閥孫傳芳，目的是防止孫 20 萬大軍與吳佩孚會合。北伐最激烈的戰事發生在江西，蔣最終攻下南昌。孫傳芳戰敗後投靠東北軍閥張作霖，蔣介石則坐鎮南昌。

到了 1926 年底，革命陣營中出現兩個權力中心：武漢與南昌。國民黨左派控制武漢，蔣介石控制南昌。雙方在重大問題上出現了分歧，重要分歧如下：一、有關下一步的軍事行動，是取北京還是取上海？二、有關「國民革命」的領導權，是誰人應擁有最終決策權？三、有關社會革命，是應鼓勵還是禁止？在這個問題上要注意到工人的罷工已直接影響生產，引發出許多問題。尤其是在武漢，外商正在將資金移往上海。四、有關反帝國主義運動，是應該支持反帝還是維護外商在華利益？兩派在上述問題上均持對立的觀點。

1927 年 3 月，國民黨三中全會在漢口召開。當時左派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蔣介石缺席的情況下，邀請了汪精衛回國主持政局。汪於 4 月 1 日抵滬，蔣介石不願與武漢政府妥協。他在蘇浙一帶有較大影響力，於是決定攻取上海、南京。

當時蘇聯的斯大林（Joseph Stalin）與托洛斯基（Trotsky）正進行鬥爭，此對北伐有很大影響。由於斯大林一直主張與蔣介石合作，即使對蔣有所懷疑，還是指令由中共領導的總工會不要阻止蔣軍進駐上海。1927 年 3 月，蔣介石輕易進駐上海。上海當時是商業中心，有大批外國僑民，蔣答應保護外國資產，防止了列強趁機干預。

進駐上海後，蔣以總工會與工商業聯合會的武力對抗爲藉口展開了「清黨」。從 4 月 12 到 14 日，「清黨」運動從上海不斷擴大到南京、杭州、福州、廣州；

2009 年 4 月修訂版

其間發生了一系列流血事件，許多與中共有關聯的青年和學生被無辜殺害。「清黨」標誌著國共合作開始破壞，但國共合作尚未終結，因為當時共產黨仍得到武漢國民黨左派的支持。

1927 年 4 月 18 日，南京國民政府成立，與武漢國民政府對峙，史稱「寧漢分裂」。武漢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解除了蔣介石一切職務，並把他開除出黨。

國民黨左派在武漢仍與共產黨合作，但由於工人罷工停產、資金流走、貿易停頓，武漢經濟幾乎陷於崩潰境況。這使得國民黨左派很快便出現困境。在湖南，共產黨又繼續領導農民清算地主。土地革命使不少北伐軍軍官的家鄉土地被農民協會沒收；軍隊不滿群眾運動，在長沙發生兵變。

而共產黨在武漢也陷入了困境。斯大林於 6 月 1 日發給中共一項指示，要求中共繼續與國民黨左派合作，但同時要主動建軍、直接進行土地革命。陳獨秀接到指示後，面對進退維谷的局面。他認為如要執行斯大林的指示，必須另起爐灶，即先停止與國民黨左派合作，但這樣做又顯然違反斯大林路線。他只好解釋說這些任務「不是即時都能實現的」，結果第三國際批判陳獨秀犯了「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

蘇俄顧問羅易（M.N. Roy）把斯大林 6 月 1 日電文副本交給了汪精衛，使汪明白中共的目的是要在合作的架構內奪權。1927 年 7 月 15 日，武漢「分共」。但「分共」與「清黨」以武力解決的方式不同，而是以和平方式解決衝突。另外汪精衛決定東征討蔣。共產黨員隨張發奎東征，賀龍、葉廷在南昌起義。汪精衛遂決定清洗共產黨。至此，第一次國共合作全面瓦解。眼見南京、武漢相繼與共產黨決裂，國民黨右派於是出面調停寧、漢之間的糾紛，最後上演一場「寧漢復合」。實際上，國民黨仍然內訌不已。蔣介石雖於 8 月下野，但又於 1928 年 1 月正式復職，主政南京國民政府。這解釋為何南京國民政府雖然成立於 1927 年 4 月 18 日，但史家皆以 1928 年 1 月為「南京十年」（the Nanjing Decade）的開端。

第 3 章 南京國民政府「十年建設」的成敗得失（1928—1937 年）

1. 解決「政權合法性」(regime legitimacy) 的問題： 「訓政」及「建設」的實施

1.1 1928 年 10 月通過的《訓政綱領》：「軍政」時期的結束與「訓政」時期的開始

蔣介石爲了建立南京政權的合法性，宣稱國民政府的所有政策將以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爲依歸。根據孫中山的革命理論，「國民革命」分三個階段完成：（一）實行「軍法之治」的「軍政」時期；（二）實行「約法之治」的「訓政」時期；（三）實行「憲法之治」的「憲政」時期。1928 年，北伐完成，結束了「軍政」時期。國民政府遂於是年 10 月通過《訓政綱領》，這標誌著「訓政」時期的開始。

所謂「訓政」，是由執政黨（國民黨）訓練國民行使「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種權力，領導全國邁向地方自治，完成民主選舉，還政於民，最終實行「憲政」。理論上，「訓政」爲期六年。國民政府遂於 1934 年由立法院擬定《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並於 1935 年通過、1936 年 5 月頒佈。立法院原本打算在 11 月 12 日召開國民大會，議定憲法，但由於政局混亂，國大代表未能如期選舉完竣，故不得不繼續實行「訓政」，直至國共內戰的後期。

1.2 「訓政」與「建設」的關係

「訓政」與「建設」是相輔而行的。孫中山在《建國方略》表示：「夫革命之有破壞，與革命之有建設，固相因而至、相輔而行者也。今於革命破壞之後，而不開革命建設之始，是無革命之建設矣；既無革命之建設，又安用革命之總統爲？」他認爲，「軍政」時期是破壞時期，而「訓政」，是修復、「建設」時期。所謂「建設」，就是我們說的「現代化」。

1.3 孫中山的「建設」理想

孫中山的「建設」理想，可見於他的三部著作：

(1)《建國方略》，1917—1919 年寫成，分〈行易知難（心理建設）〉、〈實業計劃（物質建設）〉、〈民權初步（社會建設）〉三個部分；

(2)《國民政府建國大綱》，1924 年 1 月 23 日提交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審議，主要內容是規劃建設的程序和政府機構的設置；

(3)《三民主義》，1924 年 1—8 月在廣州國立高等師範學校演講的筆記稿，經孫中山修改後印行，分〈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未講完）三個部分。

在《國民政府建國大綱》中，孫中山扼要地提出「建設」最重要的三點：

第一，「建設之首要在民生。故對於全國人民之衣食住行四大需要，政府當與人民協力，共謀農業之發展，以足民食；共謀織造之發展，以裕民衣；建築大計劃之各式屋舍，以樂民居；修治道路、運河，以利民行。」

第二，「其次為民權。故對於人民之政治知識能力，政府當訓導之，以行使其選舉權，行使其罷官權，行使其創制權，行使其複決權。」

第三，「其三為民族。故對於國內之弱小民族，政府當扶植之，使之能自決自治。對於國外之侵略強權，政府當抵禦之；並同時修改各國條約，以恢復我國國際平等、國家獨立。」

孫中山所主張的「革命建設」，就是要建立一個現代的、獨立的（擁有主權的）、民主的、經濟發達的國家。

2. 充滿「內憂外患」的十年：南京國民政府所陷的困境

對「十年建設」作出評價之前，首先要明白南京國民政府長期面對各方挑戰，以致精疲力竭，嚴重影響到「建設」的推行。當然，政府不能完全推卸責任，誘過於人。評價應把主觀因素連同客觀因素一併考慮，才能做到公允。

對國民政府而言，威脅主要來自三方面：中國共產黨、地方軍閥（史家稱「新軍閥」或「地方實力派」）及日本。一般人對中共、日本在當時的活動比較熟識，但「新軍閥」其實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一般課本較少提及，所以下文會作較詳細的交代。

2.1 「新軍閥」／「地方實力派」的威脅

2.1.1 軍閥割據格局的延續

蔣介石於北伐期間收買地方軍閥，取得快速的勝利，但結果後患無窮。直到 1930 年代中期，蔣只能直接控制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數省，軍閥割據格局仍延續著。歷史學家稱南京國民政府統治下的地方軍閥為「地方實力派」或「新軍閥」。著名的有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廣東的陳濟棠；雲南的龍雲；四川的劉湘；新疆的盛世才；華北、西北的馮玉祥；山西的閻錫山，以及東北的張學良。

蔣介石認為要真正掌握權力，首要的是裁軍。1928 年，蔣召開全國編遣會議以達裁減地方軍隊數目之效，當然引起了軍閥的不滿。1929 年，「新桂系」進攻湖南，被趕回廣西，但未被消滅。其時大局未定，北方馮、閻又興兵，1930 年更發生「中原大戰」，國民黨左派領袖汪精衛領導「改組派」加入，在北平建立新政府，直至張學良率領東北軍入關助蔣，事件才告平息。1931 年，蔣介石軟禁國民黨右派領袖胡漢民，各反蔣勢力雲集廣州，成立「廣州國民政府」。雖然該政府於 1932 年瓦解，但兩廣及後「半獨立」，直到 1936 年止。1933 年，福建又成立「人民政府」。西南及西部多省亦到紅軍長征時因受到威脅才歸順中央政府。在「南京十年」（1928—1937 年）的大部分時間裏，蔣介石並未真正地控制全國，只有名義上的統一。

其實，蔣介石最大、最終的願望是統一中國。他未能統一中國，是因為他沒有能力同時剷除所有「地方實力派」。只要他企圖這樣做，所有政敵就會聯合起來搞掉他。為了分化敵人，蔣只能使用拉一派、打一派的方法。對他有利的是，

各方矛盾錯綜複雜，反蔣集團除了一致反蔣外，幾乎沒有共同目標可言。無怪 1930 年代的中國仍然陷於權力分散（decentralization）、地方分離（separatism）、勢均力敵（equilibrium of fragmented military forces）的局面。這明顯是 1920 年代軍閥割據格局的延續。

2.1.2 為何歷史學家把 1928 年設為「軍閥割據時期」的下限？

既然軍閥割據的格局延續到 1930 年代，歷史學家為何把 1928 年設為「軍閥割據時期」的下限呢？這是因為「法統」這個大是大非的問題在北伐完成後最終得到解決。在此之前，列強只承認北洋政府為中國的合法政府，各地軍閥和黨派都不承認它的合法性，但北伐結束了這個局面。很多地方軍閥參加北伐後，成了國民黨黨員，並以孫中山的忠實信徒自居。他們自然承認南京國民政府為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並把「三民主義」奉為圭臬。

然而，這並不代表 1928 年後的「地方實力派」真的追隨蔣介石。每當南京的政策違背他們的權益時，就起來反對蔣介石，說蔣背叛了孫總理的「三民主義」，非打倒他不可。他們甚至會另起爐灶，建立新的國民政府與南京分庭抗禮，只不過他們針對的是蔣介石個人而已。

2.1.3 「新軍閥」對國家「建設」的影響

地方與中央不同形式的對抗（從陽奉陰違到兵戎相見），對國家「建設」自然有不良的影響。而地方財政獨立則嚴重打擊中央財政收入，對中央政府的影響最大。當時地方稅收分國稅、省稅兩類；田賦歸省稅。各省所收國稅，例應繳交中央，但由於各省浩大的軍費開支，訂定為國庫支付，故各省少有盈餘上繳中央。

南京國民政府只靠其直接控制的數省提供稅項，幸好長江三角洲是中國最富庶的商業中心，否則後果不堪設想。中央政府主要稅收有關稅（48.5%）、鹽稅（22%）、商品稅（12.6%），合計佔總稅收 83.1%；中央政府主要開支是軍費（46%）、歸還債、息（34%），合計佔總開支 80%。可見在經常預算中能用於「建

2009 年 4 月修訂版

設」的款項極少。政府當時的確大搞建設，但資金從何處來呢？原來，每辦一項「建設」，政府都開徵新稅，這當然會加重人民的負擔。

2.1.4 「新軍閥」與地方「建設」

不少 1930 年代的「新軍閥」是史家所稱的「改革派軍閥」(reformist warlords)。他們在其管轄的範圍內大搞「建設」，力圖將自己的地盤變成「模範省」，與蔣介石一比高下。較為突出的例子有陳濟棠搞的「廣東省三年施政計劃」；新桂系搞的「廣西建設運動」；閻錫山搞的「山西十年建設計劃」；韓復矩搞的「山東鄉村建設運動」。

「新軍閥」明白公路對運輸與軍事部署的重要性，於是在 1930 年代大力發展公路網；直至今日，中國仍沿用當時的公路網。「新軍閥」又為了擴充經濟實力與中央抗衡，往往在其所據地盤內興辦實業，客觀上對地方經濟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

2.2 中國共產黨的威脅

下一部分將會詳細介紹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崛興，這裏只談蔣介石對中共的態度。無可否認，蔣視中共為頭號敵人；他因此在 1930—1934 年間發動 5 次「圍剿」中共根據地的戰爭。面對日本與中共的威脅，蔣的既定政策是「先安內後攘外」。1933 年 4 月，他在江西省會南昌對部下解釋說：日本只是「皮膚小病」，中共才是「心腹之患」。我們有理由批評蔣介石不及早抵抗日本的侵略，但應當承認他有先見之明，明白能打垮他的不是日本，而是共產黨。其後事實證明他的看法是對的，1949 年令其下台的正是共產黨。

2.3 日本的威脅

蔣介石在日本策動「九·一八事變」後備受國民抨擊，怪他不及早抵抗日本侵略。蔣也許有他的原因，除了想先消滅共產黨外，蔣大概認為中國還未準備好

與日本開戰，兼且明白到大規模的戰爭將會帶來巨大的災害、摧毀許多已建設好的現代化設施。蔣不對日本開戰的確失去了一次團結全國人民的機會，但八年抗戰的史實證明打仗要付出巨大的代價。蔣又於全面戰爭爆發前反對中國單方面廢除不平等條約，因而觸怒了不少愛國人士。他也許知道要與西方列強保持良好關係，因為日本一旦發動戰爭，他要靠這些西方盟友的幫助，而事實證明他這樣做是有理的。

上述說法並非要維護蔣介石，只是想說明一點：我們無須認同蔣的行爲，甚至可以強烈批評它，但我們不應因此而否定它有合理的一面。蔣對日本步步進逼沒有還擊，這不能證實他沒有愛國心；他也許有自己的一套考慮。歷史學家的工作不是說教，而是解釋已發生的事爲何就是如此般發生（The task of a historian is not to moralize, but to explain why things had happened in the way they did）。當嘗試用當事人的角度去看問題，便可以更好地理解看似不合常理的事，更好地理解歷史。重要的一點是嘗試去明白，但明白後卻不一定要同意或接受（To understand does not predispose one to agree or to accept）。

3. 「十年建設」的回顧與分析

3.1 政治方面

就政治方面的建設而言，國民黨實行「以黨治國」。現分析當時黨、政系統建構的成效。整體來說，國民黨與國民政府皆具備現代政黨和現代政府的模式，但兩者都未能發揮整合（integrate）國家的功能。

3.1.1 黨的建構

國民黨早於 1924 年 1 月在孫中山領導下改組，確立了全國代表大會制度。理論上，國民黨的最高權力機關是全國代表大會；由它選出中央執行委員會，再選出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另外設有中央政治會議（又稱中央政治委員

2009 年 4 月修訂版

會)，是孫中山於 1924 年 6 月成立的最終決策機關（見下一章），它在組織上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附設機構，成員亦由中央執行委員會推定，但人選不一定限於中央委員。這個機關對立法原則、施政方針以及政務官的任命等等，皆有議決之權；決議直接交國民政府執行。

國民黨在 1928—1937 年間未能發揮整合國家的功能，是由於其在組織與運作上皆有嚴重的缺陷：

第一，國民黨缺乏群眾基礎。它從未致力吸收基層人士，故其黨員只局限於社會上層的精英分子。黨員的地理分佈顯示他們來自某些城市和地區（主要是「剿匪區」）。國民黨只在 11 個省，6 個城市和 348 個縣（全國有 1,890 個縣）設有黨支部；

第二，國民黨由於資金不足，不重視訓練新加入的黨員，直接影響黨員的質素；

第三，黨中央與省市黨支部溝通不足；

第四，國民黨內部派系林立，這可說是最大問題。

國民黨內部派系可劃分為兩大類別，每類又可分為若干派：

第一類是不滿蔣介石的派系，有：

(1) 國民黨右派，以胡漢民為首。1928—1930 年，蔣介石拉攏國民黨右派牽制國民黨左派。到 1931 年 2 月，胡因堅持反對召開國民會議及制定「訓政」時期之約法，被蔣囚禁於南京湯山，導致蔣與右派決裂；

(2) 國民黨左派，以汪精衛為首。1931—1937 年，蔣介石拉攏國民黨左派牽制國民黨右派；

(3) 「地方實力派」，包括李宗仁、白崇禧、陳濟棠、馮玉祥、閻錫山等主要人物。有關他們與蔣之間的關係，可見前面「軍閥割據格局的延續」一節。

上述派系領袖不乏資深革命黨員，有些還追隨孫中山搞革命。他們挑戰蔣的領導地位，懷疑蔣是否適合繼承國民黨的革命傳統。蔣因此感到極度不安。

第二類是親附蔣介石的當權派系，有：

(1) CC系(CC是Central Club的縮寫,即「中央俱樂部」),以陳果夫、陳立夫為首,又以組織部為其大本營。這系成員多文職出身,控制省市縣黨政組織,又指揮特工系統,掌管宣傳。他們擁護蔣介石為至高無上的領袖,堅決反對共產主義、帝國主義,提倡恢復傳統道德。

(2) 黃埔系,以戴笠、賀衷寒為首,成員皆黃埔軍校出身之嫡系將領。他們隸屬不同名稱的組織——力行社、革命青年同志會、中華復興社、藍衣社、鐵血團,用法西斯手段消滅反蔣人士,以鞏固蔣的權力;又主張廢除不平等條約、工業國有化、徵兵制。戴笠掌鐵血團,為特工、暗殺組織;賀衷寒掌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部,專派人滲入地方軍隊搞破壞。黃埔系因插手宣傳、文化、出版,與CC系產生矛盾。

(3) 政學系,由不同背景出身的人組成,有軍人(黃郛、張群、熊式輝等)、知識分子(楊永泰、王寵惠等)、銀行家和工業家(吳鼎昌、張嘉璈等)。他們沒有追隨者、組織、政治綱領;只有興趣追求權力、財富、地位,因此與CC系、黃埔系有利害衝突。

值得注意的是,派系鬥爭不是蔣介石製造出來的。它是中國政治的一個組成部分。蔣善於玩弄權術,收買、恐嚇、分化、拉一派、打一派,是他的拿手好戲,也是他在政海中生存的策略。對此,他別無選擇。正如 Guy Alitto (艾愷)說:“China’s political arena at the time was a veritable sea of particularistic relationships, from patronage networks to cliques. Those significant political actors that emerged and survived did so because they could swim in it. [Condemning Chiang Kai-shek (Jiang Jieshi) for playing with factionalism] is the equivalent of condemning the strongest swimmer for swimming! The only alternative Chiang (Jiang) had, after all, was to drown, as many of his fellow political figures in fact did” (Guy Alitto, “Chiang Kai-shek in Western Historiography”, *Proceedings of Conference on Chiang Kai-shek and Modern China*, Vol. 1, Taipei, 1987)。無可否認,蔣玩弄權術的結果是進一步激化派系鬥爭,使國家統一難於實現。還有,蔣為要保住權力,只能容

忍黨內各派貪污、腐敗的存在，以換取它們的支持。可以說，這是當時中國政治的悲哀。

3.1.2 中央政權的建構

南京國民政府體現了孫中山倡議的五權分立制度，即五院制——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院。可惜這些負責執行「治權」的機關未能真正「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d)。

現以考試院為例說明問題。考試院分兩個部門，即考選委員會及銓敘部。政府的招聘條例規定，公務員必須通過考試合格才能錄用。從 1928 到 1937 年，考選委員會舉辦過高考 3 次、普考 11 次、特考 6 次，共計 20 次，當中只有 8% 考生合格，而且亦不是所有合格者均獲錄用。其實，只少於 1% 公務員通過考試合格，公務員的聘任與升職都是由銓敘部決定的，這反映出南京政權「制度化」程度低，不脫「人治」本色。

3.1.3 權力高度集中：權力中心究竟在哪裏？

理論上，國民政府總攬「政權」，但由於南京政權實行「以黨治國」，其主要官員（包括國民政府主席、委員，五院院長，各部、會首長）都由國民黨推薦出任；他們必須執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決定。

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是黨的最高權力機關。有趣的是，其成員人數不斷地增加：從 1924 年的 24 人增至 1926 年的 36 人、1931 年的 71 人、1935 年的 119 人。這是蔣介石用崇高的職銜來換取政敵支持的結果。中執會成員人數增加並不意味著它的權力上升；實際上，中執會的權力不斷地下降，其成員雖享有地位，但越來越無實權。

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委員會）亦只有孫中山在世時把它作為最終決策機關，它在南京國民政府主政時期沒有實權。

至於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理論上只能執行中央執行委員會或中央政治會

議的決定，但實際上常常由其主席蔣介石基於軍事形勢考慮作出重要決定。蔣親身督師「剿匪」後，則常以「剿匪總部總司令」的名義就地作出重要決定，南京方面只是形式上通過其決定而已。可見民初以來政治軍事化的現象仍然持續。

實質上，南京國民政府由蔣介石進行個人獨裁、一人專政。他相信武力是解決問題的最佳選擇和推動中國現代化的槓杆，他又缺乏法治和法定程序的觀念和意識。因此，蔣在政治決策中出現高度的個人化和隨機性。

3.2 經濟方面

在發展經濟方面，無可否認南京國民政府作出了很大貢獻。

3.2.1 奠下現代經濟基礎結構

1928—1937 年間，中國的現代經濟部門取得了長足的發展，這實有賴南京國民政府為現代經濟發展鋪設了許多基礎設施。政府在這方面的努力包括：

- (1) 確立現代銀行體系，成立：
 - (a) 中央銀行，負責保持貨幣穩定；
 - (b) 中國銀行，負責外匯管理、發展外貿；
 - (c) 交通銀行，負責協助國內工業、企業。

政府還批准這三家銀行無限地買賣外匯以穩定匯率，令政府銀行第一次控制外匯。另外還成立中國農民銀行，負責農村信貸和土地抵押業務。商業銀行數目這時也不斷增加，從 1927 年的 57 家增至 1934 年的 138 家、1936 年的 146 家；

- (2) 統一幣制：1933 年 3 月通過《銀本位鑄造條例》，廢兩改元（0.715 上海兩兌換 1 銀元）；1935 年 11 月放棄銀本位，用「法幣」，可直接兌換外國貨幣，對工商業及貿易發展有很大裨益；
- (3) 統一度量衡：採用「米制」（metric system）；
- (4) 改善、發展交通、運輸體系：

- (a) 擴建鐵路網絡：從 1928 年的 8,000 公里增長至 1936 年的 13,000 公里；東西主幹線隴海鐵路於 1934、1935 年分別延伸到西安、寶雞；中南主幹線粵漢鐵路於 1936 年竣工兼全線通車；
- (b) 擴建公路網絡：從 1921 年的 1,000 公里增長至 1936 年的 115,703 公里；
- (c) 發展國內航空事業：分別於 1930、1931、1933 創辦中國、歐亞、西南航空公司；
- (d) 擴展郵政業務：郵路從 1921 年的 400,000 里增長到 1936 年的 584,800 里；
- (e) 擴展電訊業務：長途電話線從 1925 年的 4,000 公里增長到 1937 年的 52,200 公里。

3.2.2 發展工商業

有利工商業發展的因素包括：

- (1) 列強同意廢除關稅限制；
- (2) 國民政府飭令廢除厘金；
- (3) 國民政府實業部、資源委員會聯合民間資力，設立示範工廠——紙廠、工業酒精廠、植物油加工廠、煉鋼廠、機器製造廠、電器用具製造廠等，帶動工業發展；
- (4) 國民政府制訂新政策——免除原料和出口稅、減低鐵路運輸費、發放現金獎勵、給予專利權、通過交通銀行提供低息貸款，鼓勵私人投資發展實業；
- (5) 民間發起杯葛日貨運動；
- (6) 國民政府提倡國貨運動。

值得探討的一個問題，是有關南京國民政府與資本家的關係。從 1930 年代

直到 70 年代，一般人（尤其是政治評論員與學者）都把南京政權定性為一個「資產階級政權」（a capitalist or bourgeois regime），即是認為南京政權代表資本家的利益、為資本家的利益服務。這個看法主要基於四個原因：

第一，上海資本家於北伐期間支持蔣介石；

第二，掌管財政的宋子文與孔祥熙二人與資本家有密切的關係；

第三，蔣介石與資本家皆強烈反共；

第四，受馬克思學說影響，認為任何政權都有階級基礎；南京政權既與資產階級的關係最密切，它很明顯是一個「資產階級政權」。

上述看法到 1980 年代受到質疑。一些專門研究南京政權性質的美國學者提出了新的看法，其中較具代表性的三種觀點如下：

第一，認為南京政權是一個「自主政權」（an autonomous regime）：指出南京國民政府不為任何階級服務；它只謀求自己本身的利益，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勢力（見 Parks Coble, *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1927-193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第二，認為南京政權是一個「多元化政權」（a pluralistic regime）：指出南京國民政府同時兼顧不同階級的利益，故其對各階級的政策常常出現矛盾（見 Richard Bush, *The Politics of Cotton Textiles in Kuomintang China, 1927-1937*, New York: Garland Publications, 1982; Bradley Geisert, *Power and Society: The Kuomintang and Social Elites in Kiangsu Province, China, 1924-1937*, Ann Arbor, Michigan: University Microfilm International, 1986）；

第三、認為南京政權是一個「專制協合政權」（an authoritarian corporatist regime）：指出南京國民政府強調階級調和，但缺乏明顯的意識形態（見 Joseph Fewsmith, *Party, State and Local Elites in Republican China: Merchant Organizations and Politics in Shanghai, 1890-1930*,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5）。

三種較新的觀點都不認同南京國民政府是專為資產階級的利益服務。那麼，

2009年4月修訂版

應如何看待蔣介石與資本家的關係呢？蔣介石一直視資本家為合作夥伴，但要他們絕對服從政府的指令。他特別緊張資本家的動向，是因為政府靠他們提供龐大的經費。實際上，蔣與資本家的關係取決於資本家是否聽從政府的指令，所以他對資本家軟硬兼施，造成政策上的搖擺不定。

總之，蔣不允許任何階級或階層建立起獨立的權力基礎，以防止敵對勢力出現。這包括農民、工人、地主、資本家和知識分子。

3.2.3 改良農業

農業方面進行了改良。南京國民政府在這方面的努力包括：

- (1) 組織中央農業推廣委員會，致力普及農業知識、改進生產方法、促進農民合作；
- (2) 成立中央農業實驗所，進行各種農業改良試驗；
- (3) 成立全國稻麥改進所，從事稻麥的改良與推廣；
- (4) 組織農村復興委員會，輔助農村建設；
- (5) 在全國經濟委員會下設水利委員會，統一水利行政。

3.3 社會方面

3.3.1 現代教育制度的確立

南京國民政府強調實用課程：大學注重理工科；中學注重職業訓練；小學注重勞作訓練。此外注意發展社會公民教育，鼓勵公私費出國留學。

3.3.2 新生活運動的推行

1934 初，眼看第五次「圍剿」快要取得勝利，蔣介石便在江西南昌發起一場「新生活運動」，並通過不同形式的公共媒介向全國推展開來。運動主要針對兩種思想和信念，包括共產黨主張的階級鬥爭，以及五四新文化運動宣揚的反傳

統和個人主義。爲了確立一套有利其統治的信仰行爲模式，蔣要求國民生活規律化和軍事化，即要養成衛生健康、勇敢迅速、刻苦耐勞、信守諾言、禮貌待人等習慣。蔣又認爲真正的軍事化，乃植根於「禮、義、廉、恥」，故須全面恢復傳統美德來建構「一種新的民族意識與群眾的心理」，以達成「中國的社會新生」。運動的主旨，可見於《新生活運動綱要》和《新生活須知》這兩種刊物。1934—1935 年間，運動由南昌的軍事領袖領導；1936 開始由蔣夫人及教會人士在南京領導。新生活運動因流於繁瑣及形式化而收效甚微，甚至有時人譏諷它是一場「復古」運動。

3.3.3 土地改革的失敗

南京國民政府爲了改善租佃關係，曾經提出過一項「二五減租」政策。所謂「二五減租」，即佃農先得每年收獲的 25%，剩下之 75% 由佃農和地主平分，地主得 37.5%，故又名「三七五減租」。該政策只在浙江推行有些成績，其他地區功效甚微。

有論者認爲，蔣介石之敗北，是因爲他沒有如毛澤東那樣去策動群眾、搞土地革命，結果失去廣大農民的支持。但我們不能希冀蔣介石推行激烈的土地革命。他雖未能統一中國，但始終是統治者，自然反對破壞安定的群眾運動。蔣也許有先見之明，知道群眾運動是奪權的有效工具，但不利於國家的建構（state building）。毛澤東時代一連串的群眾運動導致天下大亂，證明蔣是對的。

3.4 南京國民政府推行現代化的模式

南京國民政府所選擇的現代化模式，主要是基於「三民主義」理論，並吸取了蘇俄、德國、日本的現代發展經驗。它是一種：

- (1) 以國家集權和工業—軍事一體化爲主導的、自上而下的現代化；
- (2) 以資產階級爲骨幹和強調自由市場作用的、同時帶有強烈的國家資本壟斷經濟色彩的現代化；

(3) 主要在通商口岸發展起來的、沒有整體的農業產業化發展政策的現代化。

4. 值得探討的問題

4.1 有關「十年建設」的成效

至於「十年建設」的成敗得失，論者意見不一。有人說南京國民政府在 1928—1937 年間的表現可稱得上是「黃金十年」(the golden decade)，亦有人說這十年所體現的是「流產的革命」(the abortive revolution)。

「黃金十年」一說，見 Paul K.T. Sih (ed.) , *The Strenuous Decade: China's Nation-Building Efforts, 1927-1937*, New York, 1970；薛光前：《艱苦建國的十年》，台北：正中書局，1971 年。

「流產的革命」一說，見 Lloyd Eastman, *The Abortive Revolution: 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 1927-193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易勞逸：《流產的革命：1927-1937 年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2 年。

4.2 有關南京政權的性質

以下形容詞可供借鑒和參考：

現代的 (modern)；

傳統的 (traditional)；

儒家的 (Confucian)；

基於人際關係的 (personalistic) / 人治的 (rule by man)；

精英的 (elitist)；

極權的 (totalitarian)；

專制的、相信威權主義的 (authoritarian)；

- 一黨專政的 (one-party dictatorship)；
- 一人專政的 (one-man dictatorship)；
- 法西斯的 (Fascist)；
- 軍事化的 (militaristic)；
- 資產階級的 (capitalist)；
- 「自主的 (autonomous)；
- 「多元化的」(pluralistic) ；
- 「專制協合的」(authoritarian corporatist) 。

4.3 有關「十年建設」時期中國經濟、社會的性質

以下形容詞可供借鑒和參考：

- 傳統的 (traditional)；
- 現代的 (modern)；
-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 (semi-feudal semi-colonial)；
- 農業的 (agrarian)；
- 商業的 (commercial)；
- 工業的 (industrial)；
- 勞力密集的 (labour-intensive)；
- 資本密集的 (capital-intensive)。

上面每一個形容詞都適用於說明當時政權、經濟或社會的性質，但那個（那些）形容詞最（較）貼切則可謂見仁見智。最要緊的是能夠拿出相關史實來支持所選用的某一個或某數個形容詞。有些形容詞是相互矛盾的，如「現代的」與「傳統的」、「勞力密集的」與「資本密集的」便是。為什麼它們可以被選用來描述同一個現實的性質呢？理由是每一個歷史實際都是錯綜複雜、充滿矛盾的。1920、30 年代的中國更是一個新舊交替的時代——傳統與現代因素並存不足為怪。例

2009 年 4 月修訂版

如，當時中國的政治制度是「現代的」，但政權或管治的本質還是「傳統的」，因為它是「專制的」和「基於人際關係的」，是「人治」。經濟、社會結構亦如是：通商口岸是「現代的」，其生產方式是「資本密集的」；但內地農村是「傳統的」，其生產方式是「勞力密集的」。這正好反映出中國在現代化的歷程中有「變革」的一面，也有「延續」的一面。

第 4 章 國共鬥爭、第二次國共合作、國共內戰與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1927—1949 年）

1. 國共鬥爭（1927—1937 年）

1.1 國共分裂後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兩條革命路線

第三共產國際主張城市、工人革命，而毛澤東則主張農村、農民革命。如何選擇革命的路線，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受到兩方面的矛盾影響，其一是中共與國民黨的矛盾，另外是中共內部的矛盾。

1.2 由第三國際指導的城市、工人武裝鬥爭

國共分裂後，中共中央局書記瞿秋白、李立三忠實地執行第三國際的革命路線，但他們因領導起義失敗而相繼下台。他們可說是執行第三國際錯誤路線的代罪羔羊。

1.2.1 瞿秋白領導時期（1927 年 8 月—1928 年春季）

瞿秋白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與當時蘇聯斯大林和托洛斯基的鬥爭有很大的關係。當時，斯大林與托洛斯基對「大革命」失敗後的形勢有不同意見。斯大林抱有較樂觀的看法，認為「大革命」失敗後「革命浪潮」仍將來臨；托洛斯基則相反地認為會出現無限期的「反革命形勢」。

瞿秋白接任中共中央局書記後，發現自己正面對非常嚴峻的局勢。南京、武漢已相繼反共，導致工人對中共失去了信心，大多傾向於加入國民黨組織的工會，藉以爭取經濟利益。斯大林則堅持中共搞政治罷工，強調追求經濟利益是走托洛斯基「改良主義」、「經濟主義」之路。

瞿的任務是去尋找「革命浪潮」。令人沮喪的是，當時只有農村呈現斯大林所說的「革命浪潮」，這是因為農民對交稅交租有強烈的抗議，故瞿秋白派毛澤東去策動農民起義。1927 年 9 月，毛澤東在湖南領導秋收起義，但以失敗告終。

2009 年 4 月修訂版

瞿秋白承認這次起義犯了策略上的錯誤，即沒有好好地把工人和農民聯繫起來，但他將責任全推在毛澤東身上。

斯大林很快又傳達新指示，囑咐瞿秋白注意國民黨軍隊在廣州一帶爭奪地盤。這正好展示「革命浪潮」已來臨；況且，廣東農民運動領袖彭湃於 11 月中旬在廣州附近建立了海陸豐蘇維埃政權，正好讓工人與農民聯合起來。瞿秋白遂依照指示，於 1927 年 12 月發動廣州起義，但三天便被鎮壓下去。

起義失敗，瞿秋白下台，他被指責犯了「『左』傾盲動主義」的錯誤。蘇聯方面，布哈林（Bukharin）重新詮釋「革命浪潮」理論，以表示斯大林並沒有犯錯。他說，當時的革命形勢只處於兩個「革命浪潮」之間的凹處（trough），策動起義的時機還未成熟。

1.2.2 李立三領導時期（1928 年夏季—1930 年秋季）

李立三當上中共中央局書記後，同樣面對繼續尋找斯大林所說的「革命浪潮」這艱巨的任務。當時上海雖有工潮，但全都是以爭取經濟利益為目的，並由國民黨工會領導。李立三明白，不發動武裝起義便會犯「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一旦發動起義而失敗，便會犯「『左』傾盲動主義」錯誤。

1929 年，蔣介石與地方軍閥矛盾激化，第三國際於是通知李立三充分準備「革命浪潮」的來臨（即革命形勢不再處於兩個「革命浪潮」之間的凹處）。1930 年爆發中原大戰，蔣從湖南調軍北上。7 月，李立三乘機發動長沙起義，但亦以失敗告終。

此時中共黨內也出現分裂。剛好回到中國的「國際派」（亦被稱為「留學生幫」或「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對李立三展開猛烈抨擊。他們包括王明（陳紹禹）、博古（秦邦憲）、張聞天等人，是 1926—1930 年間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留學生。由於他們找不出所謂「李立三路線」與第三國際路線有基本上的差異，只好由他們的老師米夫（Pavel Mif）對「革命浪潮」理論再次進行詮釋。他說道，「革命浪潮」（pod'em）不等於「直接革命形勢」，而只有「直接革命形勢」才是

2009 年 4 月修訂版

發動革命的最佳時刻。李立三因犯「『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而下台。

1.2.3 「國際派」領導時期 (1931—1934 年)

「國際派」堅決執行第三國際的城市革命路線。他們搞政治性罷工，但失去更多工人的支持；又採用公開式鬥爭，以致組織機關被國民黨逐一殲滅。1933 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被迫撤出上海，遷到江西蘇維埃根據地的首都瑞金，激化了「國際派」與毛澤東之間的矛盾和鬥爭（詳情參看下文）。

1.3 由毛澤東領導的農村、農民武裝鬥爭

1.3.1 從開闢井岡山根據地到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誕生 (1927 年 11 月—1931 年 11 月)

1928 年 4 月，朱德、陳毅率領的南昌起義餘部與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於井岡山會合；6 月，成立紅四軍。1929 年 1 月，毛、朱率領紅四軍主力到贛南、閩西建立新的根據地。1930 年，中國已出現了 15 個根據地（蘇維埃）。當中只有毛澤東組了軍隊，故有「實力（權）派」之稱。7 月，李立三借助紅軍攻打長沙，失敗後想以紅軍攻打武漢，但毛不聽命。

毛澤東就在此時確立他的革命理論。其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武裝奪取政權是中國革命的主要鬥爭形式。這是因為中國沒有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沒法經過長期合法鬥爭以積蓄力量，只能首先在局部地區建立革命政權，然後在一個長時間裏逐部地、波浪式地把這種政權推向全國。

第二，武裝奪取政權應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這是因為鄉村是反革命力量比較弱的地方，又可以在脫離城市的條件下相當獨立地存在下去。

第三，走武裝奪取政權、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必須有一個革命政黨和一支人民軍隊。黨是整個鬥爭的組織者和領導者；軍隊有「三大任務」：打仗、做群眾工作、籌款。

2009 年 4 月修訂版

第四，軍隊和黨的關係必須建立在「黨指揮槍」的原則上。1929 年 12 月的古田會議批判了「純粹軍事觀點」，指出「軍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務的工具之一」，是中共建黨、建軍的里程碑。

第五，革命要摒棄「教條主義」，必須從實際出發、作實際調查。毛說：「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他於 1930 年 5 月寫〈反對本本主義〉，目的是批評盲目執行第三國際指示的中共中央局領導人。

第六，革命要得到廣大群眾的支持。毛澤東從井岡山推行激烈土地政策失敗取得了教訓，決定縮少打擊面以爭取最廣大群眾的支持。根據地的土地革命路線是：「依靠貧農，聯合中農，限制富農，保護中小工商業者，消滅地主階級」。他在這個時期奠定了日後「群眾路線」的基礎。

毛澤東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有國內學者稱這一發展為「新的啓蒙運動」。

1930 年 10 月，中原大戰完畢，蔣介石集中兵力對付共產黨。從 1930 年 12 月到 1931 年 7 月，蔣發動了三次「圍剿」。而毛澤東則制訂了反「圍剿」戰略戰術。毛認為，敵人人數及武備都比自己優勝，不能打陣地戰。反「圍剿」的戰略戰術可概括為：「誘敵深入」、「集中兵力，先打弱敵」、「避敵主力」、「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毛澤東的聲譽隨著反「圍剿」的勝利而上升。

1931 年 11 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工農兵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召開。各根據地的 610 個代表參加了這次大會，毛澤東當選共和國主席。會上通過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勞動法》、《土地法》。

這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重要發展時期。毛澤東不單建立了一套基於中國實際的革命理論，還在建設根據地的過程中把一向游離於政治外的廣大農民納入政治體系之中，因而創立了一套自下而上、全民政治動員、全面社會整合的發展模式，與國民黨當時推行的一套分庭抗禮。

1.3.2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困境與覆亡 (1931 年 11 月—1934 年 10 月)

削弱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其內部鬥爭不斷。「國際派」得到米夫在背後支持，強烈攻擊毛澤東。他們批評毛不打擊富農是走「富農路線」，是「右傾機會主義」；又批評紅軍不是一支真正的工農紅軍，沒有脫離「游擊主義」的傳統。

「九一八事變」後，瑞金政府於 1932 年 4 月發出《對日宣戰通電》，並提出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任務。但「國際派」認為日本侵略中國東北「是最露骨的反蘇聯戰爭的序幕」，並提出要「武裝保衛蘇聯」。

蔣介石於 1932 年 6 月與日本妥協後便發動第四次「圍剿」。中共湖南、湖北、安徽各根據地相繼失守，在華中的勢力被迫向西撤退。1932 年 10 月，寧都會議召開，毛澤東挨批。其「誘敵深入」戰略方針被指責為「專去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值得注意的是，代表第三國際主持這次會議的是周恩來，因此他在此次批評中擔當了重要的角色，這件事對他與毛往後的關係有重大影響。會議撤銷了毛的紅軍總政委職務。1933 年初，蔣調集 50 萬兵力圍攻江西蘇維埃，周恩來、朱德指揮反「圍剿」，並取得成功。

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這個關鍵時刻遷入瑞金，進一步激化中共黨內鬥爭。1933 年 6 月，「國際派」開展「查田運動」，改變了毛澤東推行的溫和土地政策。富農只分得較差的土地，甚至被劃為地主；不少中農被劃為富農。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覆亡後，「國際派」被批判推行極「左」路線，破壞了農村的群眾基礎。

1933 年 9 月，蔣介石發動第五次「圍剿」。他在南昌對部下訓話時說：日本不過是「皮膚小病」，共產黨才是「心腹之患」。蔣的新戰略是「步步為營，堡壘推進」。他因此集中 100 萬軍隊，動用 200 架飛機，築起了 2,900 座碉堡，重重包圍瑞金。毛澤東此時已失勢。負責保衛江西蘇維埃的主要是蘇聯軍事顧問李德（Otto Braun）。他與「國際派」把紅軍「正規化」，並主張「全線出擊」、「禦敵於國門之外」、打「陣地戰」。

「國際派」還把蔡廷鍇與蔣光鼐成立的福建人民政府（1933 年 11 月－1934 年 1 月）看成是國民黨的把戲，認為它與國民黨反革命資產階級政府沒有任何區

別，拒絕援助合作。結果，福建人民政府垮台，而中共也失去一次突破「圍剿」的機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最終在 1934 年 10 月覆亡。

1934 年 10 月，紅軍開始長征，到 1935 年 10 月，在陝北延安一帶建立了新的革命根據地。長征有 10 萬人參加，到陝北時毛的部隊只剩下 8,000 人；其後各路人馬會合加起來約 3 萬。期間，1935 年 1 月開了遵義會議，毛澤東雖在政治上翻了身，但還是周恩來的副手。

中共撤到陝北後，蔣介石還是窮追猛打，直到 1936 年 12 月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才停止內戰，並奠下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基礎。

2. 第二次國共合作（1937—1945 年）

2.1 國民政府在八年抗日戰爭中的處境

2.1.1 蔣介石的抗日戰略：打「持久戰」、「消耗戰」

蔣介石認為對付日本大舉入侵的最佳方法是打「持久戰」、「消耗戰」。他明白日本沒有足夠能力長期佔領幅員遼闊的中國；只要他能撤入及堅守西部，必然取得最後勝利。現介紹抗日戰爭的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從 1937 年 7 月起到 1938 年底止，是國民政府逐步撤入四川的時期。戰爭爆發後，華北很快淪陷。日本若派軍隊沿（北）平漢（口）或（天）津浦（口）鐵路南下，蔣介石便無法實施「以空間換取時間」（trading space for time）的戰略。幸好日本最後決定在華東開闢新戰場，目的是要摧毀蔣的經濟基地，以收速戰速決之效。蔣遂派最精銳的部隊到上海、南京一帶攔阻日軍，以爭取時間撤退到武漢；期後又派大軍與日軍於黃河以北及津浦鐵路一帶交戰，以爭取更多時間撤到重慶（上海、南京、武漢分別於 1937 年 11 月、12 月，以及 1938 年 10 月棄守）。在這個階段，蔣失去最精銳、最忠誠的部隊。中共亦趁機在廣大的農村腹地建立起抗日根據地。

2009 年 4 月修訂版

第二個階段從 1939 年起到 1945 年 8 月止，是國民黨中央軍與日軍對峙僵持的時期。蔣介石乘機派軍隊去封鎖中共的西北根據地。1941 年 1 月，中共新四軍與國民黨第四十師發生大規模衝突（史稱「新四軍事件」或「皖南事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宣告結束。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介入遠東戰場，成立中緬印戰場指揮總部，以蔣為最高統帥。

在這階段，日軍佔領著「點」、「線」，加強對佔領區的控制（包括於 1940 年 3 月成立南京汪偽傀儡政權），轟炸和封鎖國統區，又對中共建立在「面」的根據地展開「掃蕩戰」，嚴重削減中共的勢力。1944 年 5—12 月，日軍再次發動針對中央軍的強大攻勢，稱為「一號作戰」(Operation Ichigo)，亦即豫湘桂戰役，中共因此獲得喘息機會，得以重建根據地。而國民黨也因國統區面對的困境無暇顧及中共勢力的再次擴張（「點」、「線」、「面」是軍事用語。「點」即沿鐵路的市鎮，「線」即鐵路，而「面」是指廣大的農村腹地）。

2.1.2 國統區面對的困境與重慶國民政府的對策

在國統區，國民政府在面臨一系列嚴重問題時，作出了各種對策。

首先是糧食短缺。四川雖是產米省分，但由於大量難民湧入國統區，再加上華中產米區淪陷、日本實施經濟封鎖，故產生嚴重的糧食短缺問題。政府的對策是禁植罌粟以及推廣穀物栽植。1940 年旱災失收，投機活動導致通貨膨脹，政府遂將田賦劃為國稅，徵收實物，並施行糧食配給政策。

財政拮据是另一嚴重問題。日本開戰後，政府支出大增，收入則大減。撤入重慶後，軍隊人數大增，從 1940 年的 250 萬增到 1941 年的 450 萬，1944 年又增加到 570 萬。田賦劃為國稅後，行政費又大增。儘管政府提高稅率、開徵新稅、發國債、借外債，仍未能扭轉入不敷支的局面。政府終於採用濫發紙幣的方法去解決問題，導致嚴重的通貨膨脹，受薪階級影響最大。

另外，傳統農業經濟基礎不足以支援打「持久戰」，政府對策是發展工業。戰爭初期，大量工廠、機器、技工遷入內地。政府亦大力鼓勵私人投資，國統區

2009 年 4 月修訂版

的工業年均增長率達 27%。工業發達的原因包括：戰時軍需品需求大增、日本實施封鎖消滅了競爭對手、大量廉價勞工從敵佔區湧入、政府銀行提供低息貸款。但必須指出，國統區內國營工業佔工業總產值 80%，而國營工業中最發達的當然是國防工業。

2.1.3 中日戰爭對國民政府的影響

總體來說，中日戰爭對國民政府有極大的負面影響：

第一，軍力衰竭。國民政府在戰爭早期已失去其最精銳的部隊。中後期雖然擴軍，但軍隊的素質和士氣則大不如前。

第二，政府官員士氣日益衰落，政府內部也更趨分裂。1938 年成立的三民主義青年團亦批評政府的不是。1944 年，部分國民黨黨員推行「革新運動」，以表達其對政府的不滿。

第三，農民不滿情緒高漲。這是因為國民政府的權力未達基層，要依賴地方傳統勢力管治農村，以致農民怨聲載道。

第四，通貨膨脹日益嚴重。通貨膨脹雖是一個經濟現象，但帶來嚴重的政治後果，尤導致貪污成風。

第五，中共有了擴大的機會（詳情參看下文），直接影響國共兩方力量的對比。

2.2 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在八年抗日戰爭中的發展

2.2.1 抗日戰爭期間中共勢力的消長

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在八年抗日戰爭中有很大發展。中日戰爭爆發時，中共只控制陝北的一部分，黨員及紅軍只有數萬人；到戰爭結束，黨員及紅軍已增至 100 萬人。八年抗戰可說是國共鬥爭的一個轉折點。不過，在這八年中，中共的勢力並非持續擴張。現分三個階段說明。

第一個階段從 1937 年 7 月起到 1938 年底止，是國民黨中央軍與日軍正面交鋒的時期，也是中共開闢抗日根據地、迅速發展的時期。由於國民政府撤入四川，日軍又只能佔據「點」與「線」，故中共能在敵後廣大的農村腹地（「面」）建立起抗日根據地，主要在華北地區。但要注意中共不是控制一個個完整的根據地，而只控制根據地範圍內的若干分散地帶而已。每個根據地可分為「鞏固地帶」、「半鞏固地帶」、「游擊地帶」。中共只能在「鞏固地帶」內建立起政權。一般地圖所顯示的根據地實在誇大了中共在這階段的勢力範圍。中央根據地（即陝甘寧邊區政府的所在地）是唯一一個最鞏固的根據地。

第二個階段從 1939 年起到 1943 年底止，是抗日根據地面臨困難、嚴重萎縮的時期。國民政府撤入四川後，日本集中兵力對付中共，在華北進行「掃蕩戰」及實施「三光政策」，即「殺光、燒光、搶光」。1940 年 8 月，中共發動「百團大戰」還擊，卻招來更大規模的報復作戰。「掃蕩戰」令中共失去近一半的根據地。中共又要同時應付中央軍的封鎖。1941 年 1 月更發生「新四軍事件」（見上文），令「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名存實亡。

1942—1943 年間，中共為爭取生存空間推行一系列新政策，主要以「運動」方式進行：

第一，在組織方面，推行「整風運動」、「審查幹部運動」、「精兵簡政」。「整風運動」批評「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三股歪風。所謂「主觀主義」，是指以王明為代表的「教條主義」及以周恩來為代表的「經驗主義」。「整風」是思想上的清黨；「審幹」是組織上的清黨。由此，毛澤東真正樹立起他的領導地位。

第二，在政治方面，推行「三三制」，即政府機關由共產黨員、非黨的進步人士、中間派人士組成。

第三，在思想、教育方面，推行「下鄉運動」、「時事教育」。

第四，在經濟方面，推行「大生產運動」、「減租減息運動」、「互助合作運動」。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政策、運動基本上在中共根據地推行。

第三個階段從 1944 年起到 1945 年 8 月戰爭結束止，是抗日根據地再度擴張的時期。由於日本決定要摧毀美軍在中國的轟炸機基地，故在 1944 年 5—12 月期間向中央軍發動自 1938 年以來最強大的攻勢，稱為「一號作戰」，導致國民政府損失 50 萬士兵，中共趁機再度擴張勢力。在中日戰爭的最後一年，始見陝甘寧邊區於 1942—1943 年間所推行的政策在其他根據地試行。到戰爭結束時，中共控制華北、華中、華南共 16 個根據地，人口合計 9,000 萬。

2.2.2 解釋戰時中共勢力擴張的原因：評價西方史學界中三種具有代表性的觀點

首先看看 Chalmers A. Johnson(查默斯·約翰遜)所著的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37-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他的觀點是中共利用日軍暴行所喚起的「農民民族主義」(peasant nationalism) 而取得廣泛的支持；它所領導的是一場「民族主義運動」(a nationalist movement)。問題是，為什麼大部分抗日根據地並非建立在日軍暴行最猖獗的地區？最鞏固的根據地是陝甘寧邊區政府的所在地，這是日軍從未猖獗過的地區。

另一位學者 Mark Selden (馬克·塞爾登) 在 *The Ye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中提出與中共本身相同的說法：中共實行「群眾路線」(the mass line) 而取得廣泛的支持；它所領導的是一場「社會革命」(a social revolution)。在此提出疑問，作者所稱的「延安道路」(the Yen-an way) 是否體現於各抗日根據地？其實，「延安道路」基本上反映中央根據地的革命經驗；直到戰爭結束前的一年，始見它在其他根據地試行。

另一種觀點見於 Ralph Thaxton (拉爾夫·撒克斯頓) 所著的 *China Turned Rightside Up: Revolutionary Legitimacy in the Peasant Worl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首先，Thaxton 把中國的傳統區分為「大傳統」(the Great Tradition) 與「小傳統」(the Little Tradition)：「大傳統」體現於士人的儒家文化

(the literati Confucian culture)；「小傳統」則體現於庶民（老百姓）的文化（the folk culture）。他進一步指出，中共以順應「小傳統」作為其制定政策的基本考慮而取得廣泛的支持；革命並非傳統的否定，而是傳統的肯定。問題是，中共是否無條件地順應農民的「小傳統」？答案是否定的。儘管中共的政策以農民的利益為依歸，但它絕不會在原則方面讓步。譬如，華北農民想消滅地主階級，但由於中共正在致力組織包括地主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農民最終被勸服暫時放下階級仇恨，接受黨的「減租減息」政策。

要注意的是，Johnson 與 Selden 的觀點雖然不同，但二人皆強調中共在抗日戰爭中所擔當的先鋒角色（vanguard role）。無論中共是領導一場「民族主義運動」（這是 Johnson 的觀點）或者是領導一場「社會革命」（這是 Selden 的觀點），其結果是促進「農民的政治化」（the politicization of the peasants）。在這方面，Thaxton 的意見與 Johnson 及 Selden 的意見恰好相反。中共迎合「小傳統」（這是 Thaxton 的觀點），其結果是促進「政治的庶民化」（the folklorization of politics）而非「農民的政治化」。上述三人對中共在戰時的擴張可說具獨特的見解，但各人的論點也有不足之處。

無可否認，中共領導抗日民族主義運動相當成功。它實施「統一戰線」策略，推行較溫和的土地政策，縮小打擊面，故能爭取到廣泛的支持。不過，民族主義並非導致中共勢力擴張的唯一因素。抗日根據地的建立，實取決於地形和軍事因素。但根據地一旦建立，其成功與否則取決於領導的素質和政策的成效。我們該承認中共在組織群眾運動方面的努力及成就。

從現代化的角度而言，八年抗戰對中國現代化帶來了沉重的打擊。戰前所建立的現代化產業部門幾乎全被摧毀。國民政府在戰時建立的統制經濟體系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西部地區的現代化發展，但同時造成了官僚資本和國家資本主義的畸形發展，又帶來了通貨膨脹的惡性循環。另一方面，共產黨在其根據地（主要是陝甘寧邊區）推行了一套動員各階級（層）、全面整合社會的發展模式，為日後現代化範式的轉換奠下基礎。

3. 國共內戰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1946—1949 年）

抗戰勝利，中國獲得自 1895 年以來最好的一次現代化發展契機。這麼說是因為戰後出現了一個寬鬆的國際環境，以及有利於現代化發展的新因素。後者包括民族主義高漲，有助社會的整合；民眾參與意識高漲，體現於輿論議政和政黨組織（如走「第三條道路」的近百個政黨）的湧現。可惜，中國很快便爆發內戰，失去了這個契機。

抗戰結束後，國共雙方都爭先到達敵佔區接受日本投降，並接收大量軍備武器。中共佔到地利，但蔣介石得到美國援助，把國民黨部隊空運和海運到淪陷區。國民政府因此在這個回合中取得了勝利。

1945 年 8—10 月，國共兩方在重慶進行和談。國共和談的主要障礙，是國民政府要求中共在成立聯合政府之前交出軍隊，而中共則堅持這只能發生在聯合政府成立之後。1945 年 12 月到 1946 年 3 月，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來到中國斡旋國共問題。期間國共兩方雖然達成停火協議，並在停火期間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但停火協定與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只是一紙空文。馬歇爾一走，和談便宣告失敗。1946 年 7 月，中國爆發全面內戰。

3.1 全面內戰（1946 年 7 月—1949 年）

3.1.1 國民黨軍隊的潰敗

1946 年 7 月到 1947 年 6 月，國民黨軍隊發動全面攻勢，而中共則採取全面退卻的戰略。1947 年 3 月，中共放棄延安。蔣介石爲了收復東北，把供給線拉得太長了，只能守著「點」和「線」，四面被共軍包圍。偽滿洲的 30 萬部隊被解散後，轉投共方。

1947 年 7 月後，中國人民解放軍全面反攻，而國民黨軍隊卻節節敗退。三

2009 年 4 月修訂版

大戰役——遼瀋戰役（1948 年 9—11 月）、淮海戰役（1948 年 11 月—1949 年 1 月）、平津戰役（1948 年 12 月—1949 年 1 月）是國共內戰的轉折點。1949 年 1 月，北平失守，蔣介石辭職，李宗仁任代總統。中共至此已坐擁長江以北一半江山。4 月，中國人民解放軍渡過長江，向各方迅猛推進。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澤東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3.1.2 國民政府的崩潰

內戰期間，國民政府除了在戰場上兵敗如山倒外，在施政方面亦大失民心，連一向支持它的人也心灰意冷。

明顯的一個問題是通貨膨脹失控，具體情況可見於下表數字：

<u>年/月</u>	<u>法幣（元）：美元</u>	<u>物價指數（1937 年=100）</u>
1940	20：1	
1945/12	3,500：1	160,000
1946/12	6,500：1	600,000
1947/12	75,000：1	10,000,000
1948/5	2,000,000：1	
1948/6	4,000,000：1	
1948/7	8,000,000：1	
1948/8	11,000,000：1	280,000,000

內戰初期，蔣介石還狡辯說通貨膨脹只是共產黨的宣傳把戲。到 1948 年 8 月，失控的財政形勢迫使國民政府決定放棄舊的法幣，改發行新的金圓券，匯率定為 3 百萬法幣兌換 1 金圓券。可惜，金圓券無法奏效。到 1949 年 4 月，金圓券的發存量已增加了 4,500 倍，通貨膨脹再次失控。受害最深的，當然是收入固定的受薪階級，包括工人、職員、教師，甚至一般政府公務員。總之，物價飆漲嚴重影響國民的生計，又徹底破壞政府的信譽。

資源短缺又激化貪污。部分高級官員更挪用美國提供的援助大量收購工廠企業，使他們擁有全國工業資產的 70—80%，變成了「官僚資產階級」。

至於「民族資產階級」（即一般工業家、企業家、商人），他們對國民政府越

2009 年 4 月修訂版

來越失望和不滿。戰後，中國的貿易變得越來越依賴美國市場。1946 年 11 月，國民政府又與美國簽署《中美友好航海通商條約》，實際上協助美國將其戰時生產過剩的物資向中國平價傾銷。這直接打擊中國的民族工業，只有買辦得益。

知識分子和學生亦深感不滿。國民政府在內戰期間變得更加專制。1946 年 12 月新憲法通過，把更多權力交給蔣介石。1947 年 5 月，上海爆發了由學生領導的「反饑餓」、「反迫害」運動（有人稱之為「新五四運動」），政府以強硬手法回應，竟將罷工、罷課、示威，以及多過十人的請願定為非法活動。運動因此擴大而變成一場保衛公民權益運動。1948 年 4 月，美國向國民政府提供一筆 4 億美元的資助，但要求國府與日本和好。5 月，公民運動再演變成為一場反美運動。

可見社會上一般人都對國民政府失去了信心。

3.2 誰丟失了中國？

1949 年後，很多人揶揄蔣介石，說是他丟失了中國（the man who lost China）。這個批評合理嗎？先看看蔣怎麼說。

3.2.1 蔣介石的證言／自辯

蔣介石在大陸最後掙扎的日子裏，坦率地承認了其政權的種種弊端。他對國民黨、軍隊、政府機構內部的積弱，作出了嚴厲的批評。研究蔣介石的專家指出，蔣對下屬的批評一向切中要害，並不會無的放矢。

1947 年 6 月，即在中共反攻的前夕，蔣還表示有信心。他說：「無論就哪一方面看，我們都佔有絕對的優勢：軍隊的裝備，作戰技術或經驗，共軍不如我們，至於軍需補給，如糧食彈藥等，我們也比匪軍豐富十倍。」

到 1948 年 1 月，蔣又說：「物質上我們有很好的裝備，有很精良的武器，可以說具備了一切勝利的條件。……但是，我們勦匪為什麼還要遭受挫折，遭受損失呢？」

蔣介石認為軍官表現差勁是主要原因。以下是蔣對其屬下軍官的批評：

2009 年 4 月修訂版

第一，他們缺乏軍事學識和專業技能（「打糊塗仗」）；

第二，他們對屬下士兵不聞不問，還侵吞軍餉（「士兵不叛變，不逃跑已算很好」）；

第三，他們「精神疏懈，道德低落」；

第四，他們不能彼此合作（「大家都養成了自保自足的惡習，只看到自己的一部的利益，對於友軍的危難，整個戰爭的成敗，幾乎是漠不相關。」）；

第五，他們邀功爭寵，推卸責任（「如果我們打了敗仗，就彼此怨恨，互相攻訐，將自己的過失，盡量掩護，將打敗的責任，推得乾乾淨淨。」「勝利卻爭功爭賞。」）；

第六，他們虛報及不聽命令。

蔣介石又對國民黨和三民主義青年團作出嚴厲的批評：

「老實說，在古今中外任何革命黨都沒有像我們今天這樣頹唐腐敗；也沒有像我們今天這樣的沒有精神，沒有紀律，更沒有是非標準，這樣的黨早就應該被消滅被淘汰了。」

「我們黨和團沒有基層組織，沒有新生的細胞，黨員和團員在群眾間發生不了作用，整個黨的生存，差不多完全寄託在有形的武力上，這是我們真正的危機，也是我唯一的憂愁。」

1949 年，眼看敗局已定，蔣悲痛地說：「軍事和政府部門對過去的失敗都負有責任。但是最主要的責任，這一點不能否認，是因為黨的癱瘓，黨員、黨的組織機構和黨的領導方式問題重重。因此，黨成了行屍走肉，政府和軍隊也就喪魂失魄，結果是軍隊崩敗，社會動亂。」

「今天，我痛心地指出，從抗戰後期到現在，我們革命軍隊中表現出的貪污腐敗，真是無奇不有，簡直難以想像。……這樣的軍隊就不能不走向失敗。」

（此節引文錄自〔美國〕易勞逸 Lloyd Eastman 著，王建朗、王賢知譯：《蔣介石與蔣經國，1937－1949》，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9 年。原書名《毀滅的種子》*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37－194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3.2.2 難道蔣介石沒有責任？

從蔣介石的證言可得悉，他把國民政府垮台的責任全推在下屬身上。他苛責下屬是絕對有理由的，因為他們的表現確實令他太失望和痛心了。其實蔣也難辭其咎，因為維護他個人權力的整套制度，是完全缺乏問責性（accountability）的。這正好解釋為何在他保護傘下工作的人員變得如此貪污腐敗和不得人心。

同時卻有人認為蔣介石丟失了中國這個說法並不能成立。原因是蔣未嘗真正擁有過中國（Chiang Kai-shek [Jiang Jieshi] never had China in the first place），故怎麼會說他丟失了他從未擁有過的東西呢？事實是否如此，可謂見仁見智。

3.2.3 蔣介石為何不撤掉失職、貪污的部下？

美國「飛虎隊」司令陳納德將軍（General C.L. Chennault）曾詢問蔣介石為何他不把所有失職、貪污的部下撤掉。蔣講了兩句話就走了。蔣夫人替蔣作翻譯說：「他〔蔣介石〕說能夠與他同事的也就是這些人了，如果我們把他們都罷免，那誰留下來幹事呢？」

3.3 結論

可以說 1949 年國民政府垮台，主要是由於其自身倒行逆施，使整個機體變得腐朽所造成的。戰後的國民政府已變得像一所結構上出了問題的房子，遇到暴風雨便自然倒塌下來。

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於 1949 年 2 月 5 日所講的一番話，正好支持上述觀點。他說道：「戰後，尤其是去年下半年，我們親眼目睹了傳統型的中國政府體制的衰敗和末落。……至於蔣介石本人，他無疑為人正直，富有獻身精神，但其觀念和手段，仍是非民主的。政府也不乏正直、自由人

2009 年 4 月修訂版

士，但體制則滋生培育著罪惡，並進而導致自身的毀滅。它變得如此的腐敗無能，如此的不得人心，以致哪怕是任何自身的有序改革都少有希望，即使沒有共產主義運動，恐怕也會爆發出另一場革命。」

在此引用《孟子·離婁》的三句話來為 1949 年國民政府垮台作總結：「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以下是 James Legge（理雅各）此幾句的翻譯：

“A man must first despise himself, and then others will despise him,

A family must first destroy itself, and then others will destroy it.

A kingdom must first smite itself, and then others will smite it.”

第二部分：
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的不斷革命與告別革命

緒論：有關學習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的幾點意見

首先，說說有關學習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應注意的幾點事項：

第一，要考慮用什麼態度去對待這段歷史。

個人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可作為一個「範式」(paradigm)去研讀。「範式」一詞之原義見 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孔恩著，王道還編譯：《科學革命的結構》，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85[?])。簡而言之，它指一個科學共同體的宇宙觀——“A paradigm is what members of a scientific community share”。其實，孔恩所謂「範式」可解釋為一種「概念的架構」(conceptual framework)。每當概念發生革命性之變化時就會出現新的「範式」。《科學革命的結構》是一本從嶄新的角度去理解科學發展的專著。傳統的觀點認為，科學的發展基本上是科學知識積累的過程；孔恩卻認為，科學的發展乃由一場又一場的革命所構成，每場革命勢必推翻前人的宇宙觀及帶來「範式的轉變」(paradigm change)。

「範式」這個概念及後被自然科學界以外的許多學術領域廣泛應用，如社會科學、歷史學、語言學、文學、文化研究等等。就人類活動的範疇而言，「範式」可被理解為一個獨特的思維、行為模式的框框。而生活在某一個「範式」裏的人，很難明白（遑說接受）生活在別的「範式」裏的人的思維、行為模式；他們也許不知道在這個世界上有其他「範式」的存在。這種情況確實妨礙了人類之間的了解和溝通。上文提議將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一個「範式」去研讀。意思是說，若想了解它的歷史，就要承認它有自己一套邏輯與規範，並去認識這套邏輯與規範，即去理解中國共產黨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必須指出，理解並不等於接受。認識到新的「範式」並不意味著要摒棄自己的一套思想方法與工作方法；但在堅持己見的同時，我們該承認有無數的「範式」存在這個世界上。承認這些「範式」各自有其存在的價值（即承認矛盾可共存）和嘗試去認識這些「範式」（即嘗試去認識別的文化），實有助我們培養出一個寬

容的人生觀(a tolerant outlook on life), 固可利己, 亦可利人(I think that's how the study of history can contribute to the betterment of self and humanity)。

第二, 要考慮用什麼方法去研讀這段歷史。

既然本書專為歷史科老師而寫, 我們將不會用「中國問題觀察家」(China-watcher)或政治學家(political scientist)的方法, 而用史學家(historian)的方法去研讀這段歷史: 即從「延續和演變」(continuity and change)的角度去了解當代中國的發展。其實史學家與「中國問題觀察家」或政治學家是沒有什麼優劣之分的, 只是用史學家的角度更可了解中國歷史的延續性。

第三, 要注意這段歷史的分期。大致上可分為:

- (1) 毛澤東時代, 這是一個「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時代;
- (2) 華國鋒主政時期, 這是一個過渡時期, 它有強烈的毛澤東時代的色彩, 但同時有創新的一面;
- (3) 鄧小平時代, 即「改革開放」的時代;
- (4) 後鄧小平時代, 這是江澤民、朱鎔基, 胡錦濤、溫家寶「繼續改革開放」的時代。

毛澤東和鄧小平時代, 甚至包括華國鋒時代, 都是「強人政治」的時代; 而後鄧小平時代的政治, 則是「常人政治」。這個時期, 只有做出政績, 才能獲得支持。

說到鄧小平時代與毛澤東時代最基本的不同, 在於鄧小平否定了毛澤東「以階級鬥爭為綱」這個基本原則。兩個時期都出現混亂, 但原因不同。毛澤東時期的混亂是政治運動帶來的, 而鄧小平時期的混亂是經濟改革帶來的。

第1章 由確立新民主主義到開展社會主義建設（1949—1960年）

1. 新民主主義的確立（1949—1953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社會主義建設並不是立即進行的，而是經過了新民主主義時期作為過渡。這個時期有兩項特色：

第一，在經濟方面，它允許私有制存在；

第二，在政治方面，它體現了由四個階級組成的聯合政府。

1.1 政治體制的確立

建國初期，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制度——由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兩個權力機關構成。

基本政治原則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國家生活。

根據中共黨章規定，黨的最高領導機關是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它所產生的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以及中央委員會主席（1982年「十二大」改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各級領導機關由選舉產生。

黨的根本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它的運作方式是由黨的上級組織聽取下級黨員和群眾的意見以制定政策，當上級組織作出了決定，下級組織便要不折不扣地服從。這個制度規定了黨中央與黨的各級組織的關係，又規定了黨與群眾的關係。理論上，它就是在高度民主的基礎上實行高度的集中。問題是：倘若群眾（多數）的願望與黨（少數）的基本原則出現矛盾衝突時該怎辦？

在政權方面，其本質是「人民民主專政」，即對「人民」實行「民主」，對反動、反革命分子實行「專政」。「人民」的定義由黨決定，且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含義。比如，在抗日戰爭期間，中共把所有持仇日態度的國民視作「人民」，無論其階級出身如何。到新民主主義時期，又將大資產階級和地主以外的、凡是

擁護新民主主義建設的國民黨「人民」看待。問題是：怎樣才算是擁護新民主主義建設呢？有法理可依嗎？很多時候，一個人是否「人民」，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當權者的主觀判斷。

另外，由於大局未定，設軍事管制制度。軍事管制制度下設六大行政區：東北（人民政府）、華北（中央人民政府）、華東、中南、西南、西北（軍政委員會）。1952 年 11 月，六大行政區行政機關全改行政委員會。

1949 年 9 月，召開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政協）。政協是建國初年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被邀參與第一屆政協會議者包括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人民解放軍、無黨派民主人士、各地區、各少數民族和海外華僑的代表 662 人。明顯地，政協體現了戰時中共實行的「三三制」（即權力機關由黨員、左派、獨立人士組成，各佔三分之一）及其主張的聯合政府。當時有民主黨派領袖宣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制度最民主，因為政協最具代表性，又有很大的包容性。他們尚未認識到，民主黨派是不能與共產黨爭奪領導權的。在此首先說明什麼是「民主黨派」。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主黨派並非泛指以民主為目標的政黨，而是專指在建國前與中共一起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建國後又與中共一起建設新中國的八個黨派。它們包括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國致公黨、九三學社及台灣民主自治同盟。這些黨派的存在體現了由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政治制度，而多黨合作的指導方針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政協會議又通過《共同綱領》，它具有臨時憲法的性質。其中規定了設立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聯合政府。聯合政府由四大階級組成，即工、農、小資產階級（小商販、知識分子、手工業者等）及民族資產階級。政府實由共產黨領導，因為它是工人階級的代表。

當時基本政治策略是「統一戰線」，主要的鬥爭對象是大資產階級和地主。在此說明「統一戰線」（united front）與「聯盟」（alliance）的分別。儘管兩者都有相同的目標，即聯繫起利益一致的人士來對付共同敵人，但「統一戰線」卻多

2009 年 4 月修訂版

了一個目標，即進行內部鬥爭，故「統一戰線」可概括為一個「既聯合、又鬥爭」的策略。毛澤東在抗日戰爭時期曾解釋說：「統一戰線」與共同敵人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而「統一戰線」內部的矛盾是「次要矛盾」；「統一戰線」內部有三個組成部分，包括進步、中間和頑固勢力；進行內部鬥爭的方針是孤立頑固勢力、爭取中間勢力、發展進步勢力，但內部鬥爭必須有限度，以防止影響「統一戰線」的共同對外，待主要敵人消滅後，才重點解決內部的矛盾。中共採用「統一戰線」去完成革命，反映出他們相信革命是要分階段來進行的，把敵人一小撮地、逐步地消滅。

1.2 工商業政策的制定

中共在城市的主要打擊對象是大資產階級。所謂「大資產階級」，即官僚資產階級、買辦資產階級及外國資產階級。官僚資產階級是國民黨政府的高級官員，他們擁有當時三分之二的工業資產，這包括 2,858 個大型企業，僱用 75 萬個工人。當時中國另有 1,000 家外資企業，政府當初以徵收稅項及控制市場的手段進行監督，直到中國加入韓戰後才沒收外資企業。政府沒收了大資產階級的企業，將其轉化為國營企業，從此把國家的經濟命脈控制在其手中。

民族（中等）資產階級則是統戰對象。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是利用、限制和改造：

第一，利用：由於中共在工商業方面沒有經驗，所以決定暫時保留私有制，並利用民族資產階級的管理經驗、技能來協助新民主主義建設；

第二，限制：為了防止私有制弊端滋生，中共同時限制民族資產階級的活動，具體辦法是將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置於國家資本主義的模式下運作。國家資本主義有初級和高級之分。初級國家資本主義即由政府控制私營工商業的利潤，主要方法是政府劃定生產指標及成品銷售價格；高級國家資本主義體現於公私合營企業，由政府派幹部到私營工廠、企業直接控制。直到 1950 年代中期，初級國家資本主義是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的主要運作模式；

第三，改造：這體現於兩場政治運動。其一是發生於 1951 到 1952 年的「三反運動」。「三反」即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矛頭直指在財經部門工作而跟民族資產階級有瓜葛的幹部。該運動把一些貪污、腐化分子清洗，淨化了黨組織。其二是發生於 1952 年的「五反運動」。「五反」即反對資本家「行賄、偷稅漏稅、盜騙國家資財、偷工減料、盜竊國家經濟情報」，它由工人、店員組成的「五反」工作隊領導，矛頭直指整個民族資產階級。「五反運動」是一場激烈的階級鬥爭，其結果是一方面加強了中共對工商業的控制，另一方面卻削弱了民族資產階級在統戰上的地位。

1.3 農村政策的制定

1950 年 6 月，中央人民政府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土地改革正式開展。土改最初強調解放生產力，為工業化鋪路。由於共產政權剛剛成立，很多地方的農民仍不敢放膽清算地主。中國加入韓戰後，全國氣氛變得緊張，土改遂發展成爲一場激烈的階級鬥爭運動。爲得到廣泛的支持，中共並不打擊富農，針對的只是地主（富農與地主的分別在於是否參與勞動）。土改的總路線是：「依靠貧農、雇農，團結中農，中立富農，有步驟地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發展農業生產。」

土改分爲四個階段進行。首先，發動群眾，由土改工作隊到農村組織農民協會。第二，劃分階級，包括宣傳、劃分、評定、批准四個步驟。第三，開訴苦大會。最後，沒收、分配土地。之後還頒發土地證，以滿足一般農民渴望得到土地的願望。這意味著土地私有制仍然存在。

土改的結果可分爲四點。第一，它消滅了地主階級，鞏固了中共於農村的基層政權。當時中共認爲推翻了地主制就等於消滅了封建主義，因爲地主階級是封建主義的政治代表。但土改是否真的消滅了封建主義？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第二，土改訓練了一批新的、對階級鬥爭有親身經驗的農村幹部。第三，土改確認了土地私有制，以致土地集中及貧富分化的現象很快再度出現。這是由於

2009 年 4 月修訂版

很多貧農不懂如何耕種，只好把分得的土地賣給富農的緣故。第四，40% 的農民於 1952 年底土改結束後參加了農業互助合作組織。

1.4 1949—1953 年的經濟發展

1949 到 1953 年，中國的經濟有很好的發展。在這個時段，工農業年均增長率為 24.45%；其中工業年均增長率是 34.8%，農業年均增長率是 14.1%。增長率高是因為政局趨於穩定。

還須指出，新民主主義時期的經濟形態是「混合經濟」(mixed economy)，即有多種經濟成分（如國營、高級國家資本主義、初級國家資本主義、個體）同時並存。

1.5 過渡時期總路線和總任務的提出（1953 年 12 月）

1953 年 12 月，中共根據毛澤東的建議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和總任務，即「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基本實現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為何急於過渡到社會主義？這大概是因為當前形勢起了急劇的變化：

第一，國內政治、經濟秩序恢復得比預期快；

第二，民族資產階級普遍涉嫌行賄、漏稅等違法行為，被「五反運動」鎮壓後，已無力量對抗中央政府；

第三，富農經濟在土改後迅速冒起，令中共擔憂及不滿；

第四，中共於 1953 年 7 月韓戰結束後決定開展大型工業建設，故急需加強經濟統制，走計劃經濟 (planned economy) 之路，即從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

當時毛澤東估計總任務要到 1967 年才基本完成，並強調要「逐步過渡」。毛警告說：「把社會主義看作是遙遙無期是不對的，但急躁冒進也是不對的。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過渡，最後全部過渡完。」

在此有需要簡單解答幾個問題：何謂「左」？帶引號的「左」與沒有引號的左有何分別？何謂右？不加引號的左是指與右派對立的左派。至於帶引號的「左」，則有特殊的涵義。共產黨相信所有事物的發展都要符合客觀規律，做事做得不對，就會犯「左」或右的錯誤：時機未成熟就去做是「左」；時機成熟還不去做是右。問題是：可有科學標準來判斷時機是否已成熟？在毛澤東時代，犯「左」的錯誤彷彿情有可原。原因是「左」的錯誤乃犯錯者對形勢估計失誤的結果，其過急行爲也許反映出一份過激的革命熱忱。而右的錯誤則意味著犯錯者違抗中央的既定政策，是極其嚴重的態度問題。變成右派就要被踢出「人民」的圈子，要受到「專政」。所以一般人的心態是「寧『左』勿右」，其影響之深遠，下文將有交代。

2. 從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1954—1956年）

2.1 政制的變更（1954年）

1954年，中國的政治制度出現了重大的變更。首先，取消了六大行政區，即撤銷大區、省、縣、鄉四級制，恢復傳統的省、縣、鄉三級制。這標誌著軍事管制制度的終結。

同年又召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人大）。此後，人大取代政協成爲最高的國家權力機關，政協則主要發揮統戰功能。會上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這是第一部國家憲法，取代具有臨時憲法功能的《共同綱領》。（直至今日爲止的四部國家憲法分別是「五四憲法」、「七五憲法」、「七八憲法」、「八二憲法」）。

2.2 過渡時期的目標

過渡時期有兩個主要目標，分別是：

第一，使中國成爲工業化國家；

第二，消滅私有制，確立公有制。

2009 年 4 月修訂版

中共為達到上述目標採用了兩種方法，分別是：

第一，推行第一個五年計劃；

第二，推行農業合作化與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2.3 第一個五年計劃（「一五計劃」）：斯大林式工業化的翻版（1953—1957 年）

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執行時間是從 1953 到 1957 年，但編制該計劃的草案於 1951 年已開始，經過多次修改，直到 1955 年 2 月才完成。由於中共對工業化不熟悉，故全盤照搬斯大林發展工業的經驗。「一五計劃」可說是斯大林式工業化的翻版，其特色如下：

第一，按重（工業）、輕（工業）、農（業）次序安排國家進行投資，即優先發展重工業。整個工業計劃建基於 156 間由蘇聯協助興建的工廠，包括：7 所鋼鐵廠、24 所發電廠、63 所機器廠。蘇聯主要提供技術上的幫助，貸款只佔工業總投資額的 4%；

第二，工廠管理制度跟隨蘇聯的「一長制」，即廠長責任制，以專家治廠，強調物質刺激；

第三，強調科技教育。蘇聯派了 10,000 個專家來華；中國則派了 28,000 個技術工人到蘇聯受訓；

第四，建設內陸工業區。重工業的設置，盡量向西北、東北等腹地分散發展，主要為減低核打擊的破壞；輕工業的布局則以接近原料和及市場為原則，主要為減低生產和運輸成本；

第五，強調中央策劃，即計劃經濟。

工業化的良好表現明顯地反映出先工業、後農業的發展策略。「一五計劃」期間，工業年均增長率是 19%，其中重工業和輕工業的年均增長率分別是 25.4% 和 12.8%；農業年均增長率只有 4.5%；工農業年均增長率為 11.75%。

總的看來，「一五計劃」相當成功，其缺點在於過分重視工業的建設而忽視農業的發展。而共中央領導人在「一五計劃」推行後，始察覺到工業與農業之間

實有不可分割的關係。首先，中國靠農產品出口來支援重工業的投資，農業低增長直接影響農產品出口及外匯收入，間接影響重工業的長遠發展；其次，輕工業所用的原料主要來自農業部門，農業低增長直接影響輕工業原料的供應，間接影響輕工業的長遠發展；再其次，工業化令城市人口激增，農業低增長自然導致城市出現缺糧問題，直接影響工人的生活。儘管斯大林式工業化在短期內奏效，但長遠來說，它實不利於中國走工業化的道路。

歸根結底，斯大林用農業來支援工業的發展，因此這種蘇聯模式只適合農業有盈餘的國家應用。中國是個人口過剩、自然資源相對稀缺的落後農業國，其當務之急是替農業創造盈餘，哪有盈餘支援工業發展？

中央政府面臨農業低增長採取了相應的措施：

第一，對穀、油、棉花、棉布進行「統購」（即計劃收購）和「統銷」（即計劃供應）；

第二，加速農業合作化，這是 1955 年毛澤東提出的主張。在此說明，合作化（cooperativization）是集體化（collectivization）的一種形式，而集體化是改變生產關係的一種方式。毛澤東認為：改變生產關係就會促進生產力的發展。生產力指勞動者、生產工具、勞動對象（如土地）；生產關係指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各種不同社會集團在生產過程中的地位 and 相互關係、產品分配形式；

第三，改變投資策略。中共於 1956 年制定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提出「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發展方針，即在堅持工業化的同時，改變優先發展工業的政策，更加重視農業、輕工業，推行按比例的经济發展。由於毛澤東於「二五計劃」執行時期推行「大躍進」，這個計劃沒有實施。

2.4 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開展

按照原本的計劃，農業過渡到社會主義會分三個階段進行，每階段成立不同性質的生產組織，實行「逐步過渡」：

第一階段，組織非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互助組，目的是集中人力物力以收增

2009 年 4 月修訂版

產之效，但土地和生產資料仍由組員擁有，收穫亦歸土地擁有者；

第二階段，組織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按「土地入股、土地分紅」的原則運作，即土地屬於合作社，但投入更多土地的社員可獲更多收入；

第三階段，組織社會主義性質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按「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運作，即取締初級社的「土地分紅」。（「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和「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的兩個準則；「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是共產主義的準則）

據當初的估計，中國需要十五到十八年的時間，才可令農業從非社會主義的合作形式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集體化形式；但實際上，三年就完成了，這似乎是不可思議的事。我們可以從農業合作化的過程看出箇中的原因：

1952 年底土改宣告完成，40%的農民已參加了農業互助組。

1953 年 12 月，中共中央通過了《關於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由於當時只有 14,000 個試驗性質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中央遂訂定指標，要在 1954 年秋收時達 35,800 個。到 1954 年春已超額完成，達 95,000 個。

1954 年 10 月，中央提高指標，要在 1955 年春耕時達 60 萬個。為了響應中央的合作化政策，很多地方幹部在 1954 年冬至 1955 年春這個時段違背自願原則，強迫農民組織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影響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1955 年春，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達到 67 萬個，再次超額完成；至此，15% 的農民已參加了這種組織。由於得悉合作化運動趨向冒進，中央領導人鄧子恢、陳雲、劉少奇一致主張放緩發展步伐。毛澤東則用「停、縮、發」三字方針來表達他的意見，這彷彿與鄧、陳、劉的主張並無矛盾之處，其實不然。原來毛認為各地情況不一，因此，政策要區別情況、因地制宜，故有「停（止）、（收）縮、發（展）」的指示，意謂不同地區要實施不同的政策。而最重要的是，毛認為合作化要保持強勁的勢頭，運動總的要「發展」。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長鄧子恢大概不明白毛的意思，聽了指示後即表示合作化運動應「停止發展、全力鞏固」。

1955 年 6 月，毛澤東寫〈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指出合作化運動的高潮就快到來，並批評「我們的某些同志卻像一個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裏走路，

2009 年 4 月修訂版

老是埋怨旁人說：走快了，走快了。」結果，鄧子恢被批判犯右傾錯誤。毛澤東估計，到 1958 春，50%的農民將會參加了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到 1960 年底，餘下的 50%也將會參加了。儘管毛當時的估計未算過激，但他把鄧子恢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一種偏激的「寧『左』勿右」心態頓時蔓延全國，導致所謂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的出現。一般人認為，毛澤東於 1957 年開展反右運動是中國轉向「左」的標杆；但 1955 年下半年「寧『左』勿右」心態的湧現，已寫下了毛澤東時代「左」傾歷史的第一章；這種心態，最終使中國掉進極「左」的深淵。

農村社會主義高潮很快席捲全國。1955 年 10 月，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從半年前的 67 萬個增至 131 萬 3 千個；12 月，更達 190 萬個。這時，60%的農民已參加了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1956 年 3 月，達到 88.9%。從 1955 年夏開始，中央一再收到各地超額完成合作社的報告，於是中央又一而再，再而三提高指標，誰也不敢提議放緩發展步伐，連毛澤東也認為自己低估了農民的積極性。

1956 年 4 月，部分農村開始組織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使合作化運動步入新階段。中央一再三令五申地方幹部切不可急躁冒進，並要遵守自願互利的原則，但一般幹部惟恐別人說自己右傾保守，都爭先恐後地辦起高級合作社來。同年 7 月，63.2%的農民已參加了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到 12 月，達到 87.8%，基本實現了高級農業合作化。

中國與蘇聯在農業集體化的經驗上是有分別的。蘇聯走「先機械化、後集體化」(mechanization before collectivization)之路，無怪 1937 年農業集體化完成時，90%的土地已用拖拉機耕作。中國原先打算走蘇聯這條路——先發展重工業，待農業機械化條件成熟後立刻開展集體化。但毛澤東在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期間因為相信改變生產關係是解決當前農業問題的最佳方法，故棄用蘇聯模式而採用「先集體化、後機械化」(collectivization before mechanization)的策略，無怪 1957 年農業集體化完成時，只有 5%的土地用拖拉機耕作。及後，農業現代化一直處於低水平。

2.5 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當時改造的目標是要將資本主義工商業逐步轉化為公私合營企業。改造的過程具體如下：

1954 到 1955 年夏，實行「以大廠帶小廠、以先進帶落後」，將資本主義工商企業逐個轉化為公私合營企業。

1955 年 10 月，由於農村合作化運動出現高潮，令城市工商業改造顯得遠遠落後。當時只有 4,800 個私營工廠、企業已轉化為公私合營。據估計，如跟以往方針進行改造，大概需要 10 年時間才能把餘下的 88,000 家工廠、企業完全轉化為公私合營。為了使工商業改造向農業改造看齊，中共領袖會見了最有影響力的資本家，大家達到了加快改造的共識。

1955 年 11 月，中共提出《全行業公私合營規劃》，所訂定目標是要全國在 1957 年底完成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

1955 年 12 月，北京市長彭真為首都制定目標，要在 1956 年底（即比全國提早一年）完成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

1956 年 1 月 10 日，北京公布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基本完成。本來需要一年來完成的任務，只用了十天。這是由於最具影響力的資本家起了帶頭作用，小資本家只好跟他們走。

1956 年 1 月 31 日，118 個大城市同時公布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基本完成。

1956 年 12 月，中國所有資本主義工商業已轉化為公私合營企業。資本家每年拿取 5% 股息，但失去了擁有和管理企業的權利。

2.6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1956 年 9 月）：「八大」的歷史意義

「八大」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它標誌著社會主義過渡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建設開始。

「八大」的召開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國際背景。1956 年 2 月，蘇共召開「二十大」。會議結束前，蘇共領袖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全盤否定前任領導人斯大林，又猛烈抨擊他的「個人崇拜」，結果令共產主義陣營掀起了一場「非斯大林化」運動（de-Stalinization），這對中共「八大」有很大影響。由於不想被批評搞「個人崇拜」，中共在「八大」通過加強集體領導，除主席外增設四個副主席（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擔任）；又復設總書記一職，由鄧小平出任；另外，修訂黨章，刪去了 1945 年「七大」時寫進去有關毛澤東思想是黨的指導思想這句話。

共產黨在每個歷史時期的首要任務是界定該时期的主要矛盾。既然中國快要成為社會主義國家，中共的當務之急就是要界定進入社會主義後的主要矛盾。劉少奇在「八大」宣告，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基本解決，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與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與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黨和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來解決這個矛盾。

這是很重要的一點。「八大」對當前主要矛盾的界定，本應令中共走經濟發展的路，但翌年的反右和毛澤東對主要矛盾的重新界定，使中共走向階級鬥爭的路，直到 1970 年代末鄧小平啓動改革開放為止。值得注意的是，中共於 1980 年代初所界定的主要矛盾其實與劉少奇在「八大」所界定的主要矛盾相同；即是說，中共從 1980 年代開始再走經濟發展的路。

3. 社會主義建設的開始（1957—1960 年）

3.1 由整風轉為反右（1956—1957 年）

毛澤東一向著眼於端正黨紀黨風，因他相信這是增強黨與群眾團結的關鍵所在。1956 年春，正當中國邁向社會主義的新時代，毛察覺到黨內出現了一股脫

離實際、不了解群眾的歪風；比如，不少被派去管理公私合營企業的幹部，被民族資產階級指責其行為不當。毛爲了挽回黨的聲譽，決定對黨員進行整頓批評。

1956 年 5 月，毛澤東提出要貫徹「雙百」方針，即「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好讓黨外人士批評黨內的種種問題。簡而言之，毛想借助黨外鳴放以配合黨內整風。他還指示要集中批評「三害」：「主觀主義」（用舊方法去解決新問題）、「官僚主義」（官僚作風）、「宗派主義」（瞧不起黨外人士）。可是，鳴放運動收效甚微，令毛大感失望。反應冷淡的主因有二。其一是 1955 年文藝理論家胡風因批評中共的文藝理論和政策被捕及引發一場「肅反」（肅清暗藏反革命分子）運動，令知識分子噤若寒蟬；其二是絕大部分中共幹部都反對毛澤東發動黨外人士整黨，他們恐怕鳴放會嚴重打擊中共的權力及威信，最終造成失控的局面。

1957 年 2 月 27 日，毛澤東爲了闡釋他對當前社會矛盾的看法，在最高國務院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作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毛把錯綜複雜的社會矛盾區分爲「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並解釋說：「這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類矛盾」、「敵我之間的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人民內部的矛盾，在勞動人民之間來說，是非對抗性的」、「敵我之間和人民內部這兩類矛盾的性質不同，解決的方法也不同」。他毫不含糊地指出，解決「敵我矛盾」的唯一辦法是進行「階級鬥爭」；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正確方法是「團結——批評——團結」，即用說服、教育、批評、自我批評的方式。其實，這篇講話的目的是要說明「三害」基本上是「人民內部矛盾」的反映，只有鼓吹鳴放才是解決這個「人民內部矛盾」的正確方法。

3 月 12 日，毛澤東對宣傳部講話，號召「放手讓大家講意見，使人們敢於說話，敢於批評，敢於爭論。」值得注意的是，毛在 2、3 月的講話並沒有馬上在黨的官方報刊上發表，這大概是因爲黨內仍有不少人反對他搞鳴放運動。但毛似乎終於得到宣傳部的支持。5 月 1 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共中央於 4 月 27 日發出的〈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號召「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鳴放運動由是全面展開。

毛澤東想聽到的，是針對個別官員處事失當或行為不檢的批評，但批評的言論很快便超越了他心目中的界限，矛頭直指整個共產黨制度。人民大學的學生領袖林希翎指出，「三害」的根本原因是政治制度、人事制度、等級制度不好；另外，她又要求按照法律程序公開審訊胡風以伸張正義。《光明日報》的主編儲安平則指責中共「搞家天下」，並派記者到各大城市組織討論會，讓黨外知識分子發表意見。而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鈞、羅隆基，以及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彭文應、宣傳部部長陳仁炳亦在不同場合帶頭大鳴大放，強烈批評現行政策。例如，羅隆基要求共產黨傾聽知識分子的意見及取消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章伯鈞則建議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成為政治上的設計院，並要求中共在制定政策前和這些組織交換意見。為何特地提及上述六人？下文將會交代。

當運動開始脫離毛澤東當初的預計時，有人勸他及早剎車，但毛認為這是「引蛇出洞」的好時機，又說他發動鳴放是「陽謀」；直至形勢超出了毛的控制範圍，他才改變初衷。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這是為什麼？〉，結束鳴放運動。18日，又發表毛澤東2月有關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但加進了六條新定的標準——包括擁護共產黨及社會主義建設等，以識別正確與非正確的批評，於是反右派鬥爭正式展開。對於早前言論過火的人來說，這些新定的標準實在來得太遲，他們難逃被打為右派的命運，首當其衝的是部分民盟負責人。7月初，中共揭露所謂「章羅聯盟」，指控這個聯盟在鳴放期間到處煽動，企圖將所有民主黨派組成一個政黨，與共產黨分權掌政。反右運動隨即擴大化，主要原因是知識分子工作單位的領導幹部大多執行劃定右派數目的政策，不湊夠數不肯罷休。1957—1958年間，全國劃定右派分子55萬多人，他們自此成為「黑五類」分子。（「黑五類」指「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

整風演變成反右究竟是什麼一回事？是一般人所說的「陰謀」？是毛澤東所說的「陽謀」？還是另有內情？這是值得探討的問題。反右並不是一個由毛預早布設以達「引蛇出洞」的「陷阱」（毛的確說過要「引蛇出洞」，但這是他在鳴放過火後才講的話）；它亦非「陽謀」（這大概是毛惱了一肚子氣才說的話）。有理

由相信：一、毛在鼓吹鳴放當初真的相信大部分知識分子是擁護共產黨的，因此，他希望知識分子支持他整黨；二、知識分子聽了 5 月 1 日整風指示後亦相信毛號召鳴放以達整風目的是真心的。當年「大右派」章伯鈞的女兒章詒和在憶述這段往事時說道：「無論是儲安平，還是父親，都對毛澤東發動整風的誠意，深信不疑。」（見章詒和：〈兩片落葉，偶爾吹在一起——儲安平與父親的合影〉，《最後的貴族》，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 年） 問題是毛想聽到知識分子所批的與知識分子想批的，完全是兩碼子事。到過火的言論湧現後，毛才恍然大悟，原來黨外的知識分子是這麼渴望與共產黨輪流坐莊的，他們對共產黨的不滿又是這麼深。毛覺得被知識分子出賣了，其自尊亦受損。據悉，毛最後決定將整風轉為反右的其中一個具體原因，是聽了羅隆基「現在是無產階級的小知識分子領導資產階級大知識分子」這句帶有歧視性的話，令他感覺心痛惱火，反右隨即展開。這次又輪到響應鳴放的人覺得被毛出賣了，毛不是說過「言者無罪」嗎？為何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者訂定新的標準來判斷其批評是否正確？毛與知識分子的關係從此惡化，直至毛死，雙方的隔閡仍未消除，這是鳴放變反右的一個有深遠影響的結果。

鳴放變反右的另一個嚴重後果是毛澤東相信階級敵人還存在。1958 年 5 月，「八大」二次會議修改了「八大」一次會議關於國內主要矛盾的分析，提出在社會主義社會建成以前，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始終是我國內部的主要矛盾。由於這個主要矛盾屬毛所說的「敵我矛盾」，所以他一直堅持要「以階級鬥爭為綱」。

從 1956 年開始，毛一而再，再而三鼓動黨外的人帶頭整黨：1956—1957 年，他鼓動黨外知識分子批「三害」；1963—1965 年，又鼓動貧下中農領導「社會主義教育（四清）運動」；到 1966—1967 年，再鼓動青年人（「紅衛兵」）奪黨委的權。究竟什麼原因令毛一直堅持這個獨一無二的整黨方式？恐怕只有他自己才知道，我們只能作一些推測。毛這份執著其實在很大程度上與他心裏兩個相互矛盾的信念有關——他一方面深信權力會使人腐化，故共產黨抓權後必然走上腐化

的路，而另一方面又堅信共產黨非抓權不可，不抓權必然天下大亂。對他而言，只有借助黨外的純潔力量來端正黨紀黨風才能解決這個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最後要講的是有關後毛澤東時代右派平反的問題。1980 年代初，中共平反了 1957—1958 年間被劃定為右派分子的 55 萬多人，彷彿承認當年的反右運動是個失誤。令外界非常不解的是，上文特地提及的六個人——章伯鈞、羅隆基、彭文應、陳仁炳、儲安平、林希翎，一直未予平反。為何如此？中共中央於 1981 年 6 月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解答了這個問題：「在整風過程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黨和新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鬥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幹部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後果。」換言之，中共至今仍然認為毛澤東策動反右基本上是沒有錯的，因為當時真的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搞事，錯就錯在毛把反右擴大化。這個說法反映出中共絕不允許任何挑戰其權力的言論或行動。

3.2 「大躍進」：毛式社會主義建設試驗的失敗（1958—1960 年）

「大躍進」是根據毛澤東的設想推行的。

3.2.1 目標、策略與特色

「大躍進」的目標是：第一，高速發展經濟；第二，達到自力更生；第三，消滅「三大差別」，即城鄉差別、工農差別、體力與腦力勞動的差別。

「大躍進」的基本策略是所謂「一馬當先，萬馬奔騰」：「一馬」指糧和鋼（即「以糧為綱，以鋼為綱」），「當先」指以高指標、高速度帶領經濟發展；「萬馬」指其他經濟部門，「奔騰」指追趕糧和鋼的高速生產。在此說明，當時制定生產指標的終極目的並不是要達標而是要突破指標。「大躍進」的基本方針如下：先

定第一個指標，組織第一個平衡，同時放手發動群眾，釋放其潛力，突破第一個平衡，編制第二個指標，組織第二個平衡，突破第二個平衡，一直重複上述的做法，以達到生產建設的高速度。這就是所謂「積極平衡論」的實踐方式，即不要平衡，人為地破壞平衡，追求高速度；破壞平衡就是「大躍進」。

在工業方面，主張「兩條腿走路」，故有「五並舉」的提法，分別是：

第一，農業與工業同時並舉；

第二，輕工業與重工業同時並舉；

第三，大型企業與中小型企業同時並舉；

第四，中央工業與地方工業同時並舉；

第五，土法生產（中間技術 intermediate technology）與洋法生產（先進技術 advanced technology）同時並舉。

最廣為人知、最爲後世詬病的土法生產無疑是全民大煉鋼鐵運動——廣建「土高爐」，用土法煉鋼，要在生產鋼鐵方面「超英趕美」。在「大躍進」期間，這個群眾性運動席捲全國城鎮農村，導致「小土爐」、「小高爐」星羅棋布、遍地開花；煉鋼又往往不分晝夜，令全民進入了瘋狂的狀態，嚴重影響其他經濟活動。還有，由於煉鋼的原材料不足，所以很多人竟將鐵製的門窗欄杆、家具、飯鍋，甚至農具都送進「土高爐」作爲煉鋼材料，可惜煉不出合標準的鋼，甚至煉不出鋼來，造成嚴重的浪費及損失。

在農業方面，於 1957 年秋收後出現了大規模興築水利工程的運動，到 1958 年下半年又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深翻和改良土壤的運動。過分的熱忱和無知令上述的活動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農民一窩蜂似地在山坡上建池蓄水，又在農田上大搞積肥、深耕、密種，結果在短短一兩年間就將整個中國的自然環境和生態系統徹底破壞，導致到處出現水災、旱災。其他群眾性運動更加劇了危機，如爲了防止麻雀偷吃稻穀，全國搞了一場史無前例的滅殺麻雀運動——辦法是日夜不停地敲鑼打鼓製造噪音致使麻雀不停地飛直至倦死，結果是麻雀被大規模滅殺，而新一季的稻穀在剛成熟時就給蟲吃光了。在「大躍進」期間，全國各地還大肆宣

揚搞高額豐產的「衛星田」(指產量如衛星般高)，其實到處都在虛報生產數字以表示先進，完全脫離實際。

可見工業、農業「大躍進」是體現於一連串反智的 (anti-intellectual)、盲目的群眾運動，這反映出毛澤東在發動反右運動後不再信任知識分子，不再依靠他們搞經濟建設。他要打破專家領導經濟發展的迷信，並想證明群眾的積極性可掃除一切客觀經濟規律所構成的障礙。

爲了組織大規模的農業生產單位以便調動人手進行各式各樣的「大躍進」運動，黨中央又開展了人民公社化運動。1958 年 8—12 月，全國 74 萬個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合併爲 24,000 個人民公社，一般是一鄉一社，每公社平均有 5,000 戶。人民公社實行三級所有制：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其特點是「一大二公」，即「大」型及「公有化」程度高的組織。總而言之，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工農商學兵五位一體」的大綜合體，在當時被認爲是「建成社會主義和逐步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最好的組織形式」。

毛搞工業、農業「大躍進」，除了想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外，還希望消滅「三大差別」。故「大躍進」不是一般的現代化而是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社會主義現代化」。

3.2.2 「大躍進」發展過程中的政治鬥爭

農業「大躍進」已於 1957 年秋收後進入醞釀發動時期。1958 年 5 月，「八大」二次會議通過兩個月前由毛澤東提出的「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這標誌著「大躍進」從醞釀發動階段全面進入開展階段。

毛澤東早於 1957 年 11 月提出，中國在 15 年左右在鋼鐵產量方面可趕上或超過英國。到 1958 年 5 月，毛肯定了「七年趕上英國，再加八年或十年趕上美國」的口號。6 月，毛又宣佈「我們三年超過英國，十年超過美國，有充分把握」。從這時開始，一些報章竟然作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不怕做不到，就

怕想不到」的宣傳報道，口號越來越不切實際。8 月，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及後，人民公社化運動、全民大煉鋼鐵運動出現高潮，「五風」（「共產風」、「瞎指揮風」、「強迫命令風」、「浮誇風」、「幹部特殊化風」）亦泛濫起來。值得一提的是，人民公社成立後普遍出現貧富拉平及無償地調動生產隊的勞動力、土地、物資和糧食的現象，當時叫做「一平二調」，是「共產風」的主要特徵，結果導致「平均主義」（egalitarianism）泛濫。此外，「大躍進」、總路線、人民公社當時統稱為「三面紅旗」。

北戴河會議後的三個月中，毛澤東、黨中央的其他領導人及地方負責人相繼到農村調查，察覺到各地的經濟工作犯了很多「左」的錯誤。從 1958 年 11 月到 1959 年 7 月初，毛先後召開一系列會議，嘗試糾正這些「左」的錯誤。他提出要學習明朝清官海瑞批評嘉靖皇帝的勇氣，又表示不當下屆國家主席候選人——1959 年 4 月，劉少奇當選國家主席。在這個時候，毛批評「有些人太熱了一點」，「只愛熱」；同時又批評「另有一些人愛冷不愛熱」，是「觀潮派、算帳派」。儘管毛承認運動在實踐方面出了「左」的毛病，但這不表示他認為「大躍進」是「左」傾；糾「左」是在充分肯定「大躍進」的前提下進行的。毛打算在糾正「左」的錯誤後更好地「大躍進」。

1959 年 7 月初，黨中央為總結「大躍進」的經驗教訓和討論未來的工作任務，在廬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把當前形勢歸納為「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並強調「大躍進」的成績與缺點是「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關係」（意思是 90% 做得好，只有 10% 做得不好）。在分組討論中，國防部長彭德懷表示：「人民公社我認為早了些，高級社的優越性剛剛發揮，還沒有充分發揮，就公社化，而且未經過試驗，如果試上一年再搞，就好了。」又說：「我們黨內總是『左』的難糾正，右的比較好糾正，『左』的一來，壓倒一切，許多人不敢講話。」由於擔心「左」傾錯誤難以克服，彭於 7 月 14 日送給毛一封信，反映「浮誇風」普遍出現，並指出「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須知，彭上廬山之前剛從東歐訪問回來，期間他曾與赫魯曉夫會晤，當時

2009 年 4 月修訂版

莫斯科盛傳中國經濟出了問題，令毛對彭起了疑心。毛讀過彭給他的信後，於 16 日在信上加上「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的標題，印發給山上開會的人看。在廬山公開支持彭德懷的有三人，包括 17 日發言的解放軍總參謀長黃克誠，19 日發言的湖南省黨委第一書記周小舟及 21 日發言的外交部副部長張聞天。在遠方的赫魯曉夫又於 18 日公開批評「大躍進」，令毛澤東更懷疑彭德懷與赫魯曉夫早有預謀。毛遂於 23 日發動對彭的批判，指他表現了「資產階級動搖性」，「把自己拋到右派邊緣去了，距右派還有三十公里」。

1959 年 8 月 2—16 日，黨中央繼續在廬山召開八屆八中全會議。毛澤東說：「我們反了九個月『左』傾了，現在基本上不是這一方面的問題了，現在廬山會議不是反『左』的問題了，而是反右」。會議議決彭德懷在廬山會議的發言和意見書是「具有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性質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是「有目的、有準備、有計劃、有組織的活動」；彭德懷、周小舟、黃克誠、張聞天四人調離國防、省委第一書記、外交工作崗位。毛還說：「廬山出現的這一場鬥爭，是一場階級鬥爭，是過去十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鬥爭的繼續。」

1959 年 8 月 18 日到 9 月 12 日，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批判彭德懷、黃克誠的所謂「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問題。同時，外事部也召開了外事工作會議，揭發彭德懷、張聞天所謂「裏通外國（蘇聯）」問題。彭德懷被撤職後，林彪出任國防部長。

1960 年，出現了「反右傾，鼓幹勁，繼續大躍進」的「左」傾口號，而一度下降的「一平二調」又重新湧現，令「平均主義」再次泛濫。另外，在過去兩年中所盛行的各種反智的「大躍進」運動最終導致農業生產大幅度下降。由於地方幹部繼續虛報生產數字，令國家統購穀物後無餘糧留給農民，大大加劇了農村的災情；1960 到 1962 年的大饑荒使一千五百萬到三千萬人死亡。

1960 年 9 月，黨中央提出「八字方針」（即「調整、鞏固、充實、提高」），11 月又發出周恩來起草的《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即

2009 年 4 月修訂版

《十二條》），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至此，「大躍進」名存實亡。

值得注意的是，1959 年 7、8 月在廬山上對彭德懷等人的批判反映出澤東時代的一個特色：儘管毛一貫「左」傾，但當他察覺到政策在執行上出現了「左」的毛病時，便會帶頭糾「左」，不過，由於糾「左」往往引出右的觀點，糾「左」終以反右收場。這與及後鄧小平時代的一個特色剛好相反：鄧雖然一貫偏右，但當他察覺到出現了極右的傾向時，便會帶頭批右，不過，由於批右往往引出「左」的觀點，批右終以反「左」收場。

第 2 章 由「兩條路線的鬥爭」到「文化大革命」(1961—1976 年)

1. 「兩條路線的鬥爭」的緣起：所謂「劉少奇路線」的制定 (1961—1962 年)

中國在 1960 年代初實現了現代化範式的轉變。當時毛澤東已退居政治局第二線，日常工作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雲等人負責。他們摒棄了「大躍進」時期所謂「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另按「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制定了一條與毛構思截然不同的務實路線，藉以挽救面臨崩潰的經濟。下面先談這條務實路線的具體內容與特色，再談路線背後的政治形勢。

1.1 根據「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制定的具體政策

在財政方面，壓縮對基本建設的投資：從 1960 年投資的 389 億元削減到 1962 年的 71 億元。結果是轉虧為盈：1960 年，財政虧損 80 億元；到了 1962 年，財政盈餘達 10 億元。

在工業方面，關閉所有虧本的工廠企業，精減職工，下放城市居民：1961 年，關閉了 25,000 間工廠企業，一千萬工人在農村重新定居；1962 年，又關閉了 18,000 間工廠企業，再有二千萬工人遷居農村。另外，集中發展重點工業，強調物質刺激（如實行獎金制度），恢復專家領導，又設法糾正「大躍進」時期重量輕質的失誤。這裏所說的「質」，不但指工業製成品的質量，還指整個生產過程中對生產資料的運用、對生產的管理等各方面的質量。

在農業方面，當務之急乃解決農民生計問題，辦法是：一、減少公糧；二、提高糧食的統購價格。不過，上述政策並不能促使農業持續發展。毛澤東一直相信改變生產關係是促進農業發展的基本方法，故他自 1950 年代中期便帶領中國農民走「集體化」的道路——先辦農業生產合作社，然後把它們合併為「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但擔當「調整」任務的劉少奇卻有不同的見解。他認為生產關係亟須符合生產力發展的水平，而人民公社所體現的生產關係實際上比當時中國

2009 年 4 月修訂版

的生產力先進得多，因此，劉帶領中國農民走「集體化」的反方向——即「非集體化」(de-collectivization)的道路，以爭取農業的持續發展。1960 年代初的「非集體化」路向體現於下列政策：

第一，縮小人民公社的範圍，這導致人民公社的數目由 1958 年底的 24,000 個增加到 1964 年的 74,000 個；每社則由大約 5,000 戶減少到 1,620 戶；

第二，在確定人民公社三級（即人民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三級）所有制的同時，決定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每生產隊大約有 20—30 戶，其規模相等於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

第三，實行「包產到戶」，即以個別農戶為單位進行經營的、以聯繫產量來計算報酬的生產責任制。有需要說明，「包產到戶」並非官方制定的政策，而是一些災情嚴重的地方（如安徽省）的農民自發推行的一種生產方式，後來獲黨中央允許搞下去；

第四，恢復「自留地」，即允許每個生產隊劃出 7% 的土地來種植經濟作物或搞農村副業，產品不徵農業稅，歸社員所有及支配；

第五，恢復「自由市場」，即允許集市貿易，以增加農民收入（見古華：《芙蓉鎮》的女主角在「自由市場」賣米豆腐賺錢）；

第六，允許公社企業「自負盈虧」。

上述政策中的第三至六項一般統稱「三自一包」，其目的是要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隨著這些政策推行，農村經濟逐漸恢復。

在教育方面，著眼於提高教育水平：發展正規全日制學校（有別於半工半讀學校）、重點學校（即大學的預備班），重視書本知識及考試成績；上述政策提高了知識分子的子女進讀高等學校的機會。

在學術研究及文藝創作方面，糾正「大躍進」重「紅」（革命意識）不重「專」（專業知識）的失誤，以發揮知識分子的積極性。這個政策其實並非允許思想多元化，而是鼓勵知識分子多用時間做研究，好為祖國的現代化作出貢獻，比如：

（1）鼓勵科學工作者多些研究科學理論；

- (2) 鼓勵社會科學工作者探索不同的研究方法、提出不同的假設；
- (3) 鼓勵經濟學家以利潤和效率，而不是以政治標準，作為促進中國經濟發展的根據；
- (4) 鼓勵作家和藝術家風格多樣化。

由於黨中央對知識分子的政策進行了調整，特別是改善了他們的工作條件，提高了他們的待遇，又公開強調專家的作用，因此，學術、文藝界出現了一片活躍、寬鬆的氛圍，更出現了一股批判時弊的熱潮。但這股批評熱潮與 1957 年的大鳴大放不同，這次提出批評的並非黨外人士而是黨內（尤其是北京市委和中宣部裏）的知識分子，而他們抨擊的對象並非一黨專政而是毛澤東的領導和政策（尤其是按其設想推行的「大躍進」）。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可算是鄧拓（北京市委祕書處主任、記者、史學家、詩人）、吳晗（北京副市長、明史專家）及廖沫沙（中央統戰部長、作家）——他們三人在《前線》雜誌的專欄〈三家村劄記〉上用筆名吳南星發表了 67 篇雜文，利用古代人物及歷史事件，並以含蓄及諷刺的手法隱諱地批毛。此外，在 1960 年代初，不少文學作品不再單一描述英雄和壞蛋的典型，轉而描繪所謂「中間人物」的普通中國農民——他們不是黨一向歌頌的完美英雄，而是處於「落後」和「先進」思想之間的、兼有積極和消極因素的、搖擺不定的中間階段人物。作家寫「中間人物」的目的，是要隱諱地批評毛澤東盲目信任農民可以創造奇跡。

1.2 「調整」政策制定過程中的政治鬥爭

1961 年 1 月，中共召開八屆九中全會，會上批准了「八字方針」。毛澤東號召發揚實事求是的精神，並說「1961 年要搞一個實事求是年」。會後，中央及各省的主要領導人分別率員到基層作實地調查，為制訂新政策尋找依據。是年 5—9 月，黨中央通過了《人民公社 60 條》、《商業 40 條》、《手工業 35 條》、《林業 18 條》、《科研 14 條》、《文藝 8 條》、《工業 70 條》及《高教 30 條》，「調整」政策立竿見影。（有關上述新政策的內容與特色，見上節）

1962 年 1—2 月初，中共召開中央擴大工作會議（又稱「七千人大會」）。劉少奇在《書面報告》中指出工作上的四點錯失：第一，生產指標過高，基建戰線過長；第二，人民公社實際工作中「平均主義」泛濫；第三，權力下放過多，各自為政的「分散主義」（decentralism）傾向嚴重；第四，城市人口過多，加重了城市供應和農業生產的困難。同時他又指出錯失原因在於：第一，建設工作的經驗不足；第二，不夠謙虛謹慎；第三，不依民主集中原則，以致不能及時糾正工作中的錯誤。劉說：「責任首先在中央，其次是省一級領導機關」。

毛澤東沒有逃避責任，他在講話中作自我批評時說：「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拿我來說，經濟建設工作中的許多問題，還不懂得。……我注意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問題，生產關係方面的問題，至於生產力方面，我的知識很少。」毛似乎同意劉的整體分析，但二人在兩個問題上有嚴重的分歧：第一，有關「大躍進」失敗的原因，劉認為政策上的錯誤決定佔 70%，蘇聯取消援助和連續幾年的惡劣氣候佔其餘的 30%，而毛則認為實際情況正好相反；第二，劉認為經濟仍然處於危急時期，而毛則認為現在形勢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恢復正常。

值得注意的是，其他中央領導人如周恩來、鄧小平、陳雲、彭真等儘管完全認清「大躍進」災難的嚴重程度，又明知是毛澤東所犯的錯，卻不敢當面批評他；周與鄧還公開支持毛澤東思想，雖然在會後又與劉少奇一起落實「調整」政策。唯有林彪的態度最明確，他表示「毛澤東的思想總是正確的」，經濟困難的發生「是由於沒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會後還繼續鼓吹個人崇拜。

1962 年 2 月下旬，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又稱「西樓會議」），當時毛澤東不在北京。會議決定按劉少奇的觀點落實各項「調整」政策；另外，劉、鄧在會上正式批准農業生產責任制。

1962 年 8 月的北戴河工作會議上，毛澤東首次表露他對時局的不滿。他批評生產責任制，並提出三個問題：

第一，階級——社會主義國家究竟存在不存在階級？

第二，形勢——國內形勢是不是一片黑暗，還是有點光明？

第三，矛盾——社會主義是不是就沒有矛盾了，有些什麼矛盾？

毛指出，階級還存在，有階級就有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他又提出，「右傾機會主義」(rightist opportunism)就是「修正主義」(revisionism)，黨內有人搞「修正主義」。

1962年9月，中共召開八屆十中全會，毛澤東在會上表示：「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他指出社會上還存在資產階級的影響、舊社會習慣勢力及小生產的自發資本主義傾向。他又批評所謂三「風」：

第一，「黑暗風」，指中央一些領導人「只講一片黑暗」，「不講一片光明」，毛認為這是「右傾」；

第二，「單幹風」，指黨中央批准的農業生產責任制，毛認為這是「走資本主義道路」；

第三，「翻案風」，指對「七千人大會」後甄別平反工作進行申訴的活動，毛認為這是「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

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後，上層建築(superstructure)與經濟基礎(economic base)的矛盾明顯地擴大，毛澤東於是展開戰略部署以解決上述矛盾，最終引發「文化大革命」。如今回顧這段歷史，不難理解「文化大革命」為何會發生，可是，當時一般人卻鮮有覺察到中央領導的高層在政策上出現了嚴重的分歧，而雙方的衝突已如箭在弦，一觸即發。

2. 毛澤東的戰略部署與黨的進一步分裂（1963—1965年）

2.1 毛澤東戰略部署之一：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四清運動」）

「大躍進」之後的大饑荒，令社會上下士氣變得很差。有見及此，黨中央一

致贊成對基層幹部進行整風，但對於整風應採取什麼方法卻出現嚴重的分歧，進而激化了黨內的矛盾。現詳述如下：

1962 年冬到 1963 年春，部分地區進行了「清帳目、清倉庫、清財物、清工分」（俗稱「小四清」）的整風整社工作。1963 年 5 月，毛澤東根據 11 個省的情況，頒發《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即《前十條》），作為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綱領性文件，號召基層的貧下中農領導整風。

1963 年 9 月，鄧小平、彭真頒發《中共中央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即《後十條（草案）》），改變了毛的整風策略，整風改從省一級而非從人民公社開始，由工作組而非由群眾領導。鄧、彭視整風為黨內的事情，故應由黨去領導；毛澤東當然非常不滿。

1964 年 5—6 月，毛澤東認為中國已經出現了「修正主義」，並且認為全國基層「有三分之一的權力不在我們手裏。」

1964 年 9 月，劉少奇頒發《後十條（修正草案）》，強調「扎根串連」，派工作組到人民公社去領導整風。

1964 年 12 月，毛澤東在一個批語中首次提出「官僚主義者階級」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的概念，這為毛在 1960 年代中期策動階級鬥爭提供了新的理論依據。值得探討的，是這兩個概念的由來。毛起初認為基層幹部的種種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的反映，他因此主張動員群眾去領導整風，及後由於鄧、彭、劉改變了他的整風策略，致使毛認定「人民內部矛盾」已轉化為「敵我矛盾」；即是說，毛相信部分基層幹部已蛻化為一個敵對的「官僚主義者階級」，而它的催生者正是毛所說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1949 年之後的所有政治運動，全都是從階級鬥爭的立場出發的，其打擊對象不外「地、富、反、壞、右」的所謂「黑五類」分子，所以，當毛重申「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時，一般人實想不到毛這次針對的，並非「黑五類」而是黨內的一些領導人。

1965 年 1 月，毛澤東作出反擊，頒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其中規定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今後一律簡稱「四

清」，即「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又提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進一步鞏固和發展城鄉社會主義陣地」。到1966年春，全國大約有三分之一的縣進行了「四清」運動。毛再一次策動黨外勢力（貧下中農）去整幹部，反映出他一貫作風。

2.2 毛澤東戰略部署之二：開展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整風運動

毛澤東組織理論班子——包括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姚文元、關鋒、戚本禹等人，準備向黨內異見分子進擊。1963年5月，江青公開點名批判昆劇《李慧娘》和《有鬼無害論》，開展了文藝界的批判運動。是年9—12月，毛澤東批評文化部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他說：「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將相的、才子佳人的東西很多，文化部不管。」「如不改變，就改名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國死人部。」1964年下半年，文化部對文藝界進行整風，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各個文藝領域，都逃不了被批判的命運。文藝界的批判運動，迅速波及到學術、理論界。還在1960年代初，不少學者趁當時較寬鬆的政治環境發表具爭議性的學術觀點，比如：哲學家馮友蘭提出儒家主張的「仁」不獨有階級特性，更體現了所有階級的普遍倫理標準；歷史學家劉節、翦伯贊認為階級調和（而非毛澤東所強調的階級鬥爭）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動力；經濟學家孫冶方斷言利潤和效率是投資的首要考慮，忽視物質刺激在經濟上是不合理和有害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楊獻珍表示「合二而一」（而非毛澤東所主張的「一分為二」）才是永恆的、絕對的。他們在這次整風運動中都被點名批判。

在此有需要多說一些有關楊獻珍與毛澤東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即辯證唯物論 *dialectical materialism*）方面的爭辯。對以馬列理論權威自居的毛澤東而言，楊獻珍以中共中央直屬高級黨校校長的身分散佈「合二而一」的哲學觀點，當然是個莫大的威脅。其實，「合二而一」只是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綜合」（*synthesis*）這個概念的另一種提法，它承認事物自身的辯證發展是通過「正 *thesis*（肯定

affirmation)、反 antithesis (否定 negation)、合 synthesis (否定的否定 negation of negation)」這個「三段式」進行的。馬克思(Karl Marx)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將黑格爾(G. Hegel)的(唯心)辯證法與費爾巴哈(Ludwig Feuerbach)的(機械)唯物論整合為辯證唯物論，目的是要建構一套不僅能「解釋世界」，且能「改變世界」的哲學。但恩格斯只重複了黑格爾(唯心)辯證法的要點，即沿用上述「三段式」發展的辯證法。毛澤東從「發展」馬克思主義的角度大膽地批判了恩格斯這個做法。自 1950 年代開始，毛就否定了「正、反、合」的辯證法中所包含的「綜合」(即否定的否定)的概念，他認為只有矛盾的對立統一(即肯定的否定)才是唯物辯證法的唯一基本規律。毛解釋說：「最根本的是對立統一。……沒有什麼否定的否定。肯定、否定，肯定、否定。……事物發展，每一環節，既是肯定，又是否定。奴隸社會否定原始社會，對於封建社會它又是肯定。封建社會對奴隸社會是否定，對資本主義社會又是肯定。資本主義(社會)對封建社會是否定，對社會主義(社會)又是肯定。」若以觀點來說，「對立統一」就是「一分為二」。

可以說，共產黨對矛盾的普遍性與事物自身的辯證發展這兩個概念是無異議的，但在毛澤東時代，黨內對事物的辯證發展基本上是走向「合」還是走向「分」這個問題，則有嚴重的分歧。由於毛認為「什麼事情都是可分的，都是一分為二的」，所以他相信矛盾的對立的鬥爭是永恆的、絕對的。對毛來說，宇宙萬物都依「肯定、否定，肯定、否定」的辯證方式發展，這體現於他以下三段講話：

(1)「共產黨和民主黨派都是歷史上發生的。凡是歷史上發生的東西，都要在歷史上消滅。因此，共產黨總有一天要消滅，民主黨派也總有一天要消滅。消滅就是那麼不舒服？我看很舒服。共產黨，無產階級專政，那一天不要了，我看實在好。我們的任務就是要促使它們消滅得早一點。」

(2)「一個消滅一個，發生、發展、消滅，任何東西都是如此。……社會主義也要滅亡，不滅亡就不行，就沒有共產主義。……我就不相信共產主義就沒有質變，就不分質變的階段了！我不信！完全一種性質，幾百萬年不變了，我不信！

按照辯證法，這是不可設想的。」

(3)「我說馬克思主義也有它的發生、發展與滅亡。這好像是怪話。但既然馬克思主義說一切發生的東西有它的滅亡，難道這話對馬克思主義本身就不靈！說它不會滅亡是形而上學。當然，馬克思主義的滅亡，是有比馬克思主義更高的東西來代替它。」

其實「合二而一」與「一分為二」的爭辯，不單是一場哲學上的鬥爭，它還有重大的現實意義。簡而言之，「一分為二」的辯證法是毛澤東「繼續革命」理論的哲學基礎，而「繼續革命」的主張又是「階級鬥爭」路線和政策的理論依據。可見，在那個時代，哲學、理論、路線和政策是聯繫起來的。問題是：毛是否從鑽研哲學中發現永遠鬥爭（繼續革命）的必要性？抑或是為了使長期發動政治鬥爭有合法性而去尋找理論和哲學依據？這恐怕只有毛自己才知道答案。

1965年3月，劉少奇、鄧小平認為整風運動「過火了」，要「剎車」。毛澤東則認為有人搞「小集團」和「獨立王國」。11月，江青、張春橋慫恿姚文元寫〈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對該齣京劇的作者吳晗提出批判，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2.3 毛澤東戰略部署之三：抓緊軍權

1963年，毛澤東開展「學習解放軍運動」。1964年，黨政機關學習解放軍，成立政治部。1965年，主張部隊正規化、專業化的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失勢；國防部長林彪恢復解放軍前身（即紅軍）的傳統，將部隊全盤政治化，並取消1955年成立的軍銜制度。1966年2月，林彪委託江青在上海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毛、江、林」集團形成。

3.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之前對若干問題的看法

3.1 毛澤東對「大躍進」失敗的看法

儘管毛澤東承認「大躍進」失敗，他卻始終相信「大躍進」的理論是正確的。對毛來說，「大躍進」未能收效主要有三個原因：第一，蘇聯突然取消對華援助；第二，連續幾年的惡劣氣候令農業大幅度減產；第三，地方幹部在執行政策時犯錯。毛在 1960、70 年代再沒有動員群眾大煉鋼鐵或建池蓄水，這反映出他對上述那種翻天覆地的經濟建設模式有所保留，但他始終堅信社會主義革命必須依靠群眾運動。

3.2 毛澤東對以劉少奇為首的務實派的看法

「大躍進」帶來三年饑荒，黨中央的高層領導大多明白這是毛澤東闖的禍，但由於廬山會議的情景還歷歷在目，他們為了明哲保身只好表示支持他的政策，雖然私底下搞另一套，這使毛懷疑他們另有陰謀。毛極不滿他們陽奉陰違，在他的背後搞「資本主義復闢」的一套，又認為這一套與赫魯曉夫搞的一套相同，於是集中批判蘇（聯）修（正主義），希望國內同志引以為戒。

3.3 毛澤東對接班人的看法

毛澤東在 1960 年代初已屆 70 高齡，身體又比之前差，故此著急找個了解他心意的接班人，以確保其革命路線能貫徹到底。毛曾有起用劉少奇和彭真為接班人的打算，但由於兩人的表現令他失望，毛遂感到極度困擾。最後，他決定發動紅衛兵運動來進行「文化大革命」，藉以培養年青人的革命意識，希望在他們當中找到合適的接班人，結果又令他大為失望（見下節：「文化大革命」）。

3.4 毛澤東對 1963—1965 年間經濟復蘇的看法

「調整」政策成效顯著，令經濟迅速復蘇，這可從 1963—1965 年間的經濟數據看出。當時的工農業年均增長率為 15%，其中工業年均增長率為 18%（重工業 15%、輕工業 21%），農業則為 12%。可見，中國的經濟在短短數年間不但快速地增長，其發展也比以前均衡得多。毛澤東卻將重點放在經濟增長所帶來的

負面影響方面，並將「調整」政策批判為「修正主義」。

毛還分別突出大寨、大慶為農業、工業的兩面紅旗。由於大寨體現了「政治掛帥」及「自力更新」的原則，而大慶則落實「兩參、一改、三結合」（「兩參」指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一改」指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三結合」指工人、幹部、技術人員三結合）的社會主義管理方式，因此得到毛的表彰。

3.5 毛澤東對「資產階級」的看法

毛澤東在私有制被消滅後仍然鼓吹「階級鬥爭」（即鼓吹與「資產階級」繼續展開鬥爭），實在令人費解。要明白的是，自 1957 年以來，毛是以意識形態作為界定「資產階級」存在的基本準則，他解釋說：「改變了生產資料所有制，不等於解決了意識的反映。社會主義改造消滅了剝削階級的所有制，不等於政治上、思想上的鬥爭沒有了。……資產階級是可以再生的。」

毛在八屆十中全會後一再告誡人們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當時恐怕沒誰真正了解毛的用意；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當前的「階級敵人」無疑是一直企圖搞「資本主義復闢」的「黑五類」分子。事後回顧這段歷史，才知道毛所指的「階級敵人」（「資產階級」）是誰。在「文化大革命」爆發前夕，毛澤東心目中的「資產階級」主要包括下列五類人：

第一，公有制建立以前的資本家、地主、富農——即舊剝削階級的殘餘分子（即使這些人在生產方式的意義上已喪失了作為剝削階級的客觀存在，但在政治上、在意識形態上仍然長期被劃定為「資產階級」）；

第二，仍然受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價值標準、思想方式、理論學說等）影響的知識分子——包括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如「民主黨派」人士），也包括感染了東歐「非斯大林主義化」影響的部分共產黨知識分子和新一代知識分子（如大專學生）；

第三，展現「自發資本主義傾向」的小生產者——即一般追求回復「單幹」及想「發家致富」的小農，他們在毛澤東看來是「小資產階級」；

第四，「官僚主義者階級」——即於1960年代初至中期在黨國綜合體裏蛻化出來的一大批官僚主義者，他們形成的一個「藉權營私」的「官僚特權階級」或「新資產階級」；

第五，「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當權派）」——即由掌握國家最高權力的共產黨領導層分化出來的派系，這班人實際上催生及支持上述的「官僚主義者階級」（見前「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四清運動」一節），自己亦成為「新資產階級」的有機組成部分兼領導人。

當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之初，一般人（包括早期由高幹子弟組成的紅衛兵）都以為「文化大革命」與過去政治運動的性質無異，故將矛頭一再指向「黑五類」，直至毛號召「奪權」、「造反」，人們才知道毛的真正打擊對象原來是上述的最後兩類人，亦即早期紅衛兵的父兄輩。可見當時一般人對中央領導高層內的鬥爭及毛澤東的心意是不理解的。

4.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的政治鬥爭（1966—1976年）

可以說，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文化大革命」。至於毛發動「文化大革命」純粹是為爭奪權力，還是要確保其革命主張永垂不朽，實在無法得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文化大革命」自開展後就演變成一輪又一輪、完全沒有意義的權力鬥爭。每個運動的發展都有其自身的動力，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文化大革命」的過程可謂迂迴曲折，其結局亦非毛始料所及，現詳述如下：

4.1 政治鬥爭的第一個回合：「毛、江、林」集團與所謂「走資派」的鬥爭（1965年11月—1969年4月）

1965年11月，由江青、張春橋策劃，姚文元寫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在上海《文匯報》刊登，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姚文抨擊《海瑞罷官》作者吳晗借古諷今地批評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罷」彭德懷的「官」，指

吳有為右派分子翻案之嫌。當時北京市長彭真不知文章早已得到毛澤東肯首，對姚不向中央打招呼就批判他的副市長吳晗感到非常不滿，故實行抵制，不予轉載。姚文在上海發表後，文藝、學術界一度展開了圍繞著《海瑞罷官》問題的學術性辯論，直到毛澤東表態支持姚文元，這場學術性辯論頓時變成一場針對吳晗、鄧拓、廖沫沙三人（即所謂「三家村」）的政治鬥爭（吳、鄧、廖乃《前線》專欄〈三家村劄記〉的執筆者，見上文有關「調整」政策的一節）。

1966年5月，黨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倒彭真（北京市長）、羅瑞卿（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陸定一（中宣部部長）、楊尚昆（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的所謂「反黨集團」。會議通過《五·一六通知》，指出「《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又確立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根據《通知》，黨中央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員包括陳伯達（組長）、康生（顧問）、江青（副組長）、張春橋（副組長）、姚文元（組員）等人；它是「文化大革命」正式發動後的權力機關，完全掌握了中央實權。

5月底，中央文革小組指使北大激進師生聶元梓等7人聯名張貼大字報批判校長、黨委書記陸平，開創了群眾批判黨委的先例。由於黨委一向是權威的象徵，而北大黨委當時正在領導學生批判「三家村」，但忽然他們變成被鬥爭的對象，頓時令學生摸不著頭腦，因而學生大多採取觀望的態度。當毛澤東表揚聶元梓的大字報時，清華附中部分學生隨即成立全國第一個以「紅衛兵」命名的組織，意謂「保衛紅色政權的衛兵」；其他紅衛兵亦相繼成立，以響應毛提出要打碎舊世界的號召。這些早期的紅衛兵皆由高幹子弟發起及領導，因為在年青人當中，他們的政治觸角最敏銳，而他們又自視為同輩中最「紅」、最有資格領導運動的人物。這些紅衛兵當時還不知道毛心目中的「階級敵人」就是他們的父兄；他們堅守中共的一貫階級立場，以整社會上的「黑五類」為己任。

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要求徹底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學生變得更加激進。劉少奇面對學校的混亂，決定派遣工作組進駐學校。為了控制局勢及響應毛澤東「階級鬥爭」的號召，工

作組一方面認定紅衛兵為非法地下組織並勒令解散，另一方面又把運動的矛頭指向有「黑五類」背景的師生，令局面變得更加混亂。劉少奇在不知所措的情況下，遂於7月中旬邀請正在華東視察的毛澤東返回北京。

8月1—12日，毛澤東召開並主持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正式發動「文化大革命」。毛於開會前已宣佈撤銷各大專學校的工作組，在會上又批評劉少奇「鎮壓學生運動」的「路線錯誤」。他還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指出黨中央有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全會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其中要求放手發動群眾，規定將鬥爭矛頭指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強調要充份利用大字報、大辯論的形式讓群眾在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並確定中央文革小組為「文化革命的權力機關」等等。

毛澤東又於8月初公開支持由年青人組成的紅衛兵，一度被工作組壓制的紅衛兵運動在全國範圍內迅猛發展，並開展了翻天覆地的「破四舊」、「抄家」、「大串連」等運動。從8月中到11月底，毛澤東先後八次在北京接見從各地來「串連」的一千三百多萬紅衛兵。這是否毛的精心部署？他是否計劃先把年青人對他的個人崇拜推到巔峰，然後才發動他們去奪權？他是否放心把重大的奪權任務交給高幹子弟組成的紅衛兵？有關毛澤東接見紅衛兵的背後動機，我們只能作一些猜測。可以肯定的是，造當權派的反和革「黑五類」的命完全是兩回事，社會上根本沒有人有心理準備和膽量去衝擊當權派，更難想像那些對自己家庭充滿自豪感的高幹子弟會去革其父兄的命。毛大概明白只有這班自認高人一等的高幹子弟才有膽響應他發動「文化大革命」，所以沒有選擇地利用他們衝鋒陷陣，搞個天下大亂，營造好鬥爭氣氛，再等待適當時機發難，以達最終奪權的目的。

由於奪權運動還未展開，各地的紅衛兵當時仍由黨委領導，「大串連」亦由官方安排，故可稱其為「官辦紅衛兵」。8、9月間，這些由清一色高幹子弟組成的官辦紅衛兵大事宣揚「血統論」，鼓吹「自來紅」的思想（即強調階級成分）——「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個順口溜風靡一時。要了解「血統論」，

就要對 1949 年後中國社會的等級差別有基本認識。據當時官辦紅衛兵的通俗說法，中國社會的成員可分為三類十五等：

- 一、「紅五類」——革命烈士、革命幹部、革命軍人、產業工人、貧下中農；
- 二、「麻五類」——小商、中農、上中農、職員、自由職業者；
- 三、「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

高幹子弟就是憑仗其純正的革命血統和優越的社會地位，壟斷早期的紅衛兵運動。他們氣焰之囂張，可謂一时无倆——官辦紅衛兵不但排斥所有非「紅五類」，連普通（平民）「紅五類」也被排斥不准加入。這些紅衛兵採用一貫階級立場，集中對付「傳統上」被整的「黑五類」，他們這樣做實際上轉移了毛澤東訂定的鬥爭方向。

10、11 月間，運動起了變化。10 月下旬，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講話時說：「文化大革命這個火是我放起來的，運動才五個月，可能要搞兩個五個月，或者還要多一點時間。」毛在這時大概感到官辦紅衛兵已完成其歷史任務，任由他們搞下去將會成為鬥爭當權派的阻力，於是通過中央文革小組掀起批判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浪潮；又否定「血統論」，批評高幹子弟一直把持紅衛兵運動，排斥工農兵、普通幹部子弟。上述的立場轉變，實際上標誌著造反紅衛兵的興起。所謂「造反」，即以下犯上、犯上作亂，造當權派的反。造反紅衛兵由普通（平民）「紅五類」與非「紅五類」（包括部分「黑五類」）子女組成，其成員在前階段受到官辦紅衛兵的歧視，現在起來響應毛澤東策動的「路線鬥爭」。

12 月，黨中央批判劉少奇、鄧小平等領導幹部，奪權運動正式開展——造反紅衛兵在這場運動中擔當主要角色；強調出身的官辦紅衛兵則成為保守派（或稱保皇派），開始失勢。

1967 年伊始，「文化大革命」進入了全面奪權的新階段。當時社會上一向受等級歧視和政治迫害的弱勢（邊緣人）群體都起來參與造反、奪權，加入「革命造反派」的陣營。造反派成員大抵上包括：造反紅衛兵、工人、職員、藝員、幹部及農民中的激進分子。毛澤東利用他們去奪權，而他們亦藉此機會尋求解放、

肯定自我、表現自我。爲什麼奪權運動會如此轟轟烈烈，在這裏就可看到原因。

1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陶鑄因抵制批判劉少奇、鄧小平，被誣蔑爲「中國最大的保皇派」，隨即被打倒。與此同時，奪權運動從北京擴展到各地（時稱「一月風暴」），反映出毛澤東下定決心剷除劉少奇在地方上的「代理人」。上海是北京以外第一個造當權派的反的地方。1月初，「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在張春橋、姚文元等人的操縱下打倒了市委；2月初，成立模仿1871年巴黎公社的「上海人民公社」（建立巴黎公社形式的政權，即以普選形式產生領導，是《十六條》提出的）。但毛澤東於2月下旬指令「上海人民公社」改名爲「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又提出臨時權力機關（即革命委員會）必須實行革命「三結合」（即群眾組織的領導人、當地駐軍的代表、革命領導幹部的三結合）。毛反對巴黎公社形式的政權，大概有兩個原因：第一，他堅持一黨專政：「如果都改公社，黨怎麼辦呢？黨放在那裏呢？……公社總要有個黨，公社能代表黨嗎？」；第二，人民解放軍不能接受上海造反派主張的「群眾武裝專政」。

2至6月，形勢急轉直下，黨政機關陷於癱瘓狀況。

首先發生了二月抗爭事件。2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委員譚震林等人強烈批評「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的錯誤做法，並提出三個原則性的問題：第一，運動要不要黨的領導；第二，老幹部應不應該都打倒；第三，要不要穩定軍隊。儘管這班老幹部企求力挽狂瀾，其行動卻適得其反，受到毛澤東的責難。中央文革小組遂以此作爲借口，對所謂「二月逆流」事件進行批判。從這時起，中央文革小組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成爲全國的唯一權力機關，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及造反組織都在它控制之下。國務院各部門成立的文化革命委員會，也直接向中央文革小組匯報。至此，黨中央正式成爲一個「以毛主席爲首的黨中央」。在林彪、江青等人的鼓吹下，民眾對毛的個人崇拜發展到了瘋狂的地步（如對毛尊稱爲「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極「左」之風一時蔓延全國（如舉國流行向毛像「早請示、晚匯報」）。

3月，中央軍委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決定派人民解放軍實行「三支兩軍」（即執行支〔持革命〕左〔派群眾〕、支農、支工、軍管、軍訓）。由於各地方大部分軍隊（毛澤東、林彪所統轄的嫡系部隊除外）都站在中共的一貫階級立場上（而非「路線鬥爭」的立場上）去「支左」，故他們實際上支持的乃階級成分純正的保守派，而對階級成分混雜的造反派則持敵視態度，致使社會更趨分化。另一方面，造反派因不滿「三結合」和軍管、軍訓，故極力阻止革命委員會的成立，這又激化造反派與軍方之間的矛盾。

令形勢變得更加複雜的是紅衛兵及群眾組織內部的嚴重分裂——各派皆借毛主席之名互相傾軋，導致全國陷於失控的局面。二月抗爭後，造反派實際上成了政治主流；保守紅衛兵普遍瓦解，繼續存在的則與造反派對抗到底。在保守、造反兩派的持續鬥爭中，保守派以「階級鬥爭」理論和「無產階級專政」思想批造反派被階級敵人操縱；造反派則以「路線鬥爭」理論和「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思想批保守派被「走資派」操縱。與此同時，造反派也分裂為兩派：穩健派（成員以社會下層靠上的人居多）和分裂出來的激進派（成員以社會下層靠下的人居多）。其分裂的主因有二：一、在「保」哪一位領導的問題上出現了分歧；二、造反派內亞等級（sub-stratum）利益的衝突。還須指出，保守紅衛兵普遍瓦解後，其成員大多加入了造反行列。但奇怪的是，他們不是加入穩健造反派，而是加入激進造反派，這是因為激進派是從原造反派分裂出來的，而原造反派（即分裂後的穩健派）就是保守紅衛兵的老敵人。總而言之，毛澤東動員群眾去造反、奪權，儘管達到其打倒政敵的目的，兼且製造了對他個人的極度崇拜，但他卻沒法防止群眾分裂及沒法控制由此而造成的紛亂局面。1967年初夏之際，各派之紛爭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全面內戰可謂如箭在弦，一觸即發。

7至9月，爆發了第二次奪權運動，掀起全面內戰。

這次是激進造反派企圖奪軍隊與周恩來的權，起因是他們不滿軍隊站在保守派的一邊，又誤以為毛澤東要打倒的下一個目標是周恩來。7月中旬，中央文革小組以武漢軍區領導在「支左」中犯了「路線錯誤」，派謝富治、王力到武漢煽

2009 年 4 月修訂版

動造反派群眾揪「軍隊一小撮不好的人」，結果是武漢軍區領袖把這兩名「中央代表團」成員扣留，引發震驚一時的武漢「七·二〇」事件。江青立即提出「文攻武衛」的口號，煽動武鬥，在全國掀起衝擊軍事機關的浪潮。8月初，極度激進的「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在北京散發誣蔑攻擊周恩來的傳單，煽動打倒周恩來。至此，全國陷於分裂與內戰的困境。9月，毛澤東決定把「五一六（紅衛）兵團」打成「反革命集團」，於是全國又掀起揪「五一六」的新浪潮；由於缺乏明確的政策界限，各對立的派系趁機展開互揪對方的所謂「五一六分子」，造成極其混亂的情況。

從 1967 年底開始，局面慢慢地回復正常。是年 11 月，《人民日報》在社論中傳達了毛澤東的「大、中、小學都要復課鬧革命」的意見。1968 年 7 月，中共中央先後發出《七·三佈告》和《七·二四佈告》，正式宣佈解散群眾組織，藉以制止敵對派系繼續武鬥。8 月，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工宣隊）進駐學校；姚文元的〈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在《人民日報》發表，傳達了毛的指示：「工人宣傳隊要在學校中長期留下去，參加學校中全部鬥、批、改任務，並且永遠領導學校。」9 月，全國 29 個省、市、自治區都已先後建立了革命委員會（20 個由軍人控制、9 個由革命幹部控制），形成所謂「全國一片紅」的局面。10 月，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在北京召開，作出了把國家主席劉少奇開除出黨的決議（劉於 1969 年 11 月 12 日在河南開封病逝；直到死前，他才得悉自己已被開除出黨）。

從 1968 年底開始，全國又掀起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浪潮。很多知青因長期呆在落後的農村裏，故感到苦悶、悲傷、徬徨、憤怒。他們可說是失落的一代，又可說是覺醒的一代，因為殘酷的現實激發他們去思考、懷疑、反省。從這個角度看來，知青上山下鄉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

4.2 政治鬥爭的第二個回合：「毛、江、林」集團的內部鬥爭與「九·一三」事件的發生和影響（1969 年 4 月—1973 年 8 月）

1969 年 4 月，中共「九大」在北京召開，選出了第九屆中央委員 170 人、

候補中央委員 109 人；其中只有 53 人（19%）是八屆的中央委員及候補中央委員，反映出前期的奪權、造反運動打倒了中央領導機構的絕大部分成員。此外，「九大」亦標誌著軍人勢力的上升，因為九屆中央委員及候補中央委員當中，軍人佔 45%；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及候補委員 25 人，其中軍人佔 13 個席位；全國 29 個革命委員會當中，由軍人控制的有 20 個。

說軍人得勢，是指林彪與（第）四野（戰軍）的勝利（除了林彪統率的四野外，還有其他四支野戰軍——彭德懷、賀龍統率的一野；劉伯承、鄧小平統率的二野；陳毅統率的三野；聶榮臻統率的華北野戰軍）。此外，「九大」還修改了黨章，把林彪作為「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寫入總綱。不過，林彪的勝利並非絕對。儘管「九大」之後取消了由江青把持的中央文革小組，但江青集團的幾個主要成員都進入了中央政治局，與林彪派系的人分庭抗禮，其中張春橋更被林彪視為他的最大政敵。

1969 年 7—8 月，中共中央先後發出了緊急的《七·二三佈告》和《八·二八命令》，飭令各地民眾徹底解散群眾組織並交出所有武器。至此，三年造反正式結束（有論者提出「三年文革」而非「十年文革」之說，個人認為正確的命題應是「三年造反」與「十年文革」）。

與此同時，中共中央開展整黨建黨運動，藉以重建黨的威信及遏止四野軍人的坐大。1969 年 6 月，黨委重新在基層出現。11 月，第一個縣委重新在湖南省出現。1970 年 8 月，中央報刊大肆宣揚「黨指揮槍」的革命傳統。12 月，第一個省委重新在湖南出現。隨著各處省委的重建，作為臨時權力機關的「三結合」革命委員會逐步淡出政治舞台。

1970 年 8—9 月，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召開。林彪一夥在會議上推舉毛澤東擔任國家主席（前國家主席劉少奇已於 1969 年 11 月 12 日病逝），但由於毛不願重新擔任這個職務，又看破林彪謀取國家主席職位的意圖，故提出不設國家主席的意見。江青一夥也反對由林彪任國家主席，因此與毛一起堅持不設國家主席，這反映出林、江兩派之間權力再分配的矛盾和鬥爭。林彪不甘計劃敗露，借

機攻擊張春橋，結果林在這次會議上的代言人陳伯達遭到清算。10 月，黨中央開展「批陳（伯達）整風」運動，矛頭直指林彪。

九屆二中全會後的一段歷史，可謂撲朔迷離，令人摸不著頭腦。按官方的說法，林彪集團為了解決林想「接班」的問題，密謀叛變。其主要成員包括林立果（林彪的兒子）、葉群（林彪的妻子）、黃永勝（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吳法憲（空軍司令員）、李作鵬（海軍政委）及邱會作（總後勤部長）。據悉，由林立果成立的一個組織（代號「聯合艦隊」）於 1971 年 3 月在上海秘密據點炮製了一個「武裝起義」計劃，稱《「571 工程」紀要》（「571」為「武（裝）起義」的諧音），以「打倒當代的秦始皇—B—52」（「B—52」是毛澤東的代號）、「推翻掛著社會主義招牌的封建王朝」作為他們的口號和綱領。8 月中旬，毛澤東南巡，在各地與黨政軍負責人談話時指名批評林彪，說廬山會議（九屆二中全會）是「第十次路線鬥爭」、「兩個司令部的鬥爭」，又說「廬山這件事，還沒有完，還沒有解決」。9 月上旬，林彪、葉群、林立果眼見事態嚴重，遂向「聯合艦隊」下達進入一級「戰備」的命令，企圖用炸毀蘇州附近一鐵路橋的辦法殺害正在南巡的毛澤東，但由於毛保持高度警惕兼改變行程，暗殺計劃未能得逞。事敗之後，林彪數人於 13 日零時左右從山海關機場乘 256 號三叉戟飛機逃往蘇聯，但座機最後因沒有足夠的燃料墜毀在外蒙古的溫都爾汗荒漠，此乃震驚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有關林彪之死，一直引起外界的猜測。在過去的 30 多年中，先後在海內外出現了許多不同於官方公佈有關林彪死亡的版本，主要有下列四種說法：第一，「軟禁之說」——斷言林彪不是死於「九·一三」事件中，而是被關押在某個地方；第二，「擊斃之說」——斷言林彪沒上出逃的飛機，他是在北京西山被擊斃的；第三，「導彈擊落之說」——斷言林彪乘飛機逃往前蘇聯途中，被導彈擊落；第四，「綁架出逃之說」——斷言林彪是被老婆兒子劫持出逃的，最後機毀人亡。其中「綁架出逃之說」最值得注意。此說見於 Frederick C. Teiwes & Warren Sun, *The Tragedy of Lin Biao: Riding the Tiger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ondon: C, Hurst & Co.;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6。這是一本嚴謹的學術

專著。作者指出，林彪一向身體欠佳、處事低調、無政治野心；至於「政變」一事，全是林立果和葉群搞出來的，林彪其實不知情，到最後關頭才被拖上飛機。該書對「九·一三」事件的分析，主要是根據林彪女兒林立衡提供的資料；但林立衡與葉群的關係極度惡劣，她事後一直想將「政變」的責任全推在母親身上，為父親脫罪。

可以肯定的是，林彪死於外蒙。這樣說是因為前蘇聯派去飛機失事現場的意外調查組人員割下了飛機殘骸中那個歲數最大的男人的頭顱回去鑒定，證實了它「正是林彪的頭骨」（林彪的頭部在抗日戰爭時受過傷，其位置正好與該頭骨的傷痕吻合，而且前蘇聯保有林彪於 1938—1941 年在莫斯科治病的詳細病歷，有關林彪牙科紀錄也與頭骨的實際情況絲毫不差）。個人認為，林彪有野心，這可從他利用「文化大革命」打擊其他軍事派系得到佐證；而「政變」一事非同小可，實難以想像林彪對此全不知情。倘若林彪真的是被蒙在鼓裏，則黨中央在「九·一三」事件發生後就沒有需要煞費苦心地向人民交代為何「最最高舉」、「最最緊跟」的林「副統帥」竟然背叛毛主席——只需解釋說謀反是林彪的妻兒搞出來的就好辦了。但黨中央沒有這樣做，它堅決進行批林，並且在黨內公開了有損毛澤東聲譽的《「571 工程」紀要》。毛大概知道林彪是「政變」的主謀，自尊心受到嚴重的創傷，因此對林深惡痛絕，寧願付出代價，也不肯讓他脫罪。

1972 年夏，黨中央開展「批林整風」運動，說林「語錄不離手，萬歲不離口，當面說好話，背後下毒手」，是「反革命兩面派」。「批林」的理據明顯欠缺說服力，它激發人們去懷疑、反省：林彪真的想謀害毛主席？如果林彪是「反革命兩面派」，那麼，毛主席當初為何相信他並指定他為接班人？莫非毛主席也上了林彪的當？還是人們一直太輕信毛主席的話？毋庸諱言，「九·一三」事件使毛澤東「天縱英明」的神話在一夜之間破產，它深化了由知青上山下鄉所引發的信念危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另一個轉折點。此外「批林整風」還激化了周恩來與江青之間的矛盾。周恩來主張批判林彪集團的「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江青認為批「左」有影射「文化大革命」之嫌，故指出林彪的錯誤是

「形『左』實右」，號召批判「右傾回潮」。而毛澤東深知開展批判「極左」一定會導致從理論上否定「文化大革命」，所以他堅決支持江青一派，認定林彪是「極右、修正主義」。

「九·一三」事件無可避免地導致權力再分配。林彪死後，四野軍人紛紛垮台；另一方面，不少在「文化大革命」早期被打倒的老幹部（包括鄧小平、陳雲、葉劍英、王震、王稼祥等人）依毛澤東指示被解放復職。周恩來的地位也起了變化：他長期以來只是黨內的第三號人物，現在取代了以前劉少奇、林彪的地位，首次成為黨內的第二號人物。復職老幹部、實力軍人首腦都站在周的一邊，形成一股新勢力（可稱為「務實派」或「穩健派」），並旋即與江青為首的極「左」派處於激烈的抗衡中。

4.3 政治鬥爭的第三個回合：周恩來、鄧小平、復職老幹部與「四人幫」的鬥爭（1973年8月—1976年10月）

1973年8月，中共「十大」在北京召開，選出了第十屆中央委員 195 人、候補中央委員 124 人。其中軍人佔 30%（林彪四野的勢力已被清除），復職老幹部佔 36%，其餘的 34%是「文化大革命」中崛起的人（這些人不一定隸屬江青集團，如華國鋒就是一個例子）。「十大」又選出了第十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 25 人，當中「左」派佔 15 人，而復職老幹部、軍人則佔 10 人。周恩來在會上宣讀了政治報告，而江青集團的王洪文則作了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周的政治報告指出「『九大』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是正確的」；要求繼續搞好「批林整風」，發展國民經濟；而王的修改黨章報告說明，刪去「九大」黨章總綱中關於林彪接班的規定；又要求黨員須具有「反潮流」（即「造反」）的精神。「十大」明顯反映林彪死後黨中央權力再分配的新格局。

1973年11月，基辛格（Henry Kissinger）首次以美國國務卿的身份訪華，在告別晚宴結束後臨時提議與周恩來舉行一次單獨會談，繼續討論中美雙方的軍事合作問題。周恩來由於來不及向毛澤東請示（毛當時正睡覺），便不敢作出任

何具體的承諾，只是表示中美雙方今後可各指定一個人繼續交換意見。這就給江青找到一個借口，說周犯了擅自接受美國核保護傘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江青於是提議並經毛澤東批准，成立由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汪東興、華國鋒六人組成的批周「幫助小組」。期後汪、華退出，剩下清一色的極「左」派。據悉，這就是「四人幫」正式形成的開始。

1974年1月，由江青指使北大、清華「大批判組」編寫的《林彪與孔孟之道》經毛澤東批准轉發全黨，「批林批孔」運動由此全面展開。問題是：為何將林彪與孔子聯繫起來？據當時官方解釋說，這是因為林彪私下曾推崇過孔孟之道。另一問題是：為何特別針對孔子？這是因為毛澤東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深刻的歷史變革和進步，但當時仍有不少人反對它，這和歷史上法家堅持變革和儒家反對變革有某種相似之處，因此，他希望通過「批林批孔」來進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線方面的教育」，進一步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在運動推行其間，中國的歷史被歪曲為「儒法鬥爭史」——法家「厚今薄古」，是「進步派」；儒家「厚古薄今」、「開歷史倒車」，是「復關派」。江青集團積極推動「影射史學」，實際上是借題發揮，用「批林批孔」為幌子，大批「周公」、「宰相」、「宰相儒」、「現代的大儒」、「黨內的大儒」，矛頭所指呼之欲出。奇怪的是，周恩來是主動、積極地參與這場針對他的運動，他是「批林批孔」七人小組成員之一，親自起草有關會議通知，並在政治局內部組織學習討論。周這樣做，當然是為了自保和穩住大局起見。他知道「批林批孔」是毛澤東發動的，所以絕對不能流露出半點抵觸情緒；對江青的意見，他也只好附和，以免與她正面衝突。無怪這場運動使當時很多不太熟悉中國政情的「中國問題觀察家」大惑不解。

在此對毛澤東與周恩來的關係作簡單的交代。1932年10月，周恩來主持寧都會議令毛澤東挨批，埋下了兩人歷史恩怨的種子。延安整風時，毛把周當作黨內「經驗（主義）宗派」的代表批，周自此擁毛，並多次公開承認寧都會議是他「一生最大的錯誤和罪惡」。可是毛對寧都會議一直耿耿於懷，動不動就要翻出來算老賬。他知道周內心反對「文化大革命」、知道周保護過不少他要打倒的人、

知道周得到很多幹部支持、知道周不公開地反對他是因為周沒有別的選擇，毛因此認為周是應該挨整的。不過，毛亦知道周沒有野心取代他、知道周要不惜一切「保持革命晚節」，而他又需要周打理國務，畢竟周始終不渝地貫徹他的政策，故毛要確保周不會如劉少奇那般被整死。鄧小平曾說：「沒有總理，『文化大革命』可能更慘，但可能短一些。」其所言甚是。

毛澤東與江青的關係又如何？毛曾多次對江青作出批評：「江青有野心，她想叫王洪文作委員長，她自己作黨的主席。」毛又與她劃清界線：「她並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他知道江青不懂謀略，樹敵太多，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所以告誡她：「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組閣（當後台老板），你積怨甚多，要團結多數」，不要「動不動就給人戴大帽子」，不要和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搞成「四人小宗派」。另一方面，毛澤東很清楚江青階級立場堅定，知道她是其「文化大革命」路線的最忠實支持者，絕對不會搞兩面派，因此，毛對江青的批評實際上是以教育、告誡為前提的。他認為江青的毛病並非嚴重：「我看問題不大，不要小題大作。但有問題要講明白，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

1974年10月，黨中央發出通知，在最近期間召開四屆人大。通知又傳達了毛澤東希望結束「文化大革命」的意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11月，廣州青年李正天、陳一陽、王希哲三人利用「批林批孔」運動、毛澤東批准貼大字報，以及四屆人大快將召開的機會，貼出了〈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的大字報（俗稱〈李一哲大字報〉）。該大字報以針對「林彪體系」為幌子，暗裏抨擊極「左」派的「封建」、「法西斯」統治。它進一步提出對四屆人大的期望：第一，用法制保護人民應有的民主權利；第二，限制特權；第三，保證人民對國家和社會的管理權；第四，對鎮壓人民者實行鎮壓；第五，落實政策；第六，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由於〈李一哲大字報〉體現了年青人對「文化大革命」的反省，它在當時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的反響。

1975年1月，周恩來向四屆人大作《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在本世紀內，

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這是重申 1964 年底三屆人大首次提出的「四個現代化」建設)。會議又通過修改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即「七五憲法」)。四屆人大以後，周恩來病重，鄧小平在毛澤東支持下主持黨中央及國務院工作。鄧曾於 1930 年代在江西與毛一齊挨批，他靠實幹起家，沒有什麼理論。鄧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與劉少奇一起被打倒，1973 年復出。有說毛決定讓鄧重返權力核心，是出於在政治上防範挾制周恩來的考慮，後來由於鄧靠緊周，兼且展示強勢作風，使毛意識到重新起用鄧的失算。此說是否屬實，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四人幫」在周恩來病重後密切注視鄧的一舉一動。

2—6 月，黨中央在全國掀起了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運動，大肆鼓吹「全面專政論」，即在政治方面強調階級鬥爭、繼續革命；在經濟方面限制「資產階級法權」，推行「平均主義」及否定農村自留地、搞副業等政策；在思想文化方面實行專制和箝制。運動的實質是把所有反對「文化大革命」的人當作「走資派」、「復闢派」，對他們實行專政。

8 月，開展「評《水滸》」運動，把《水滸傳》一書當作反面教材，說宋江(影射周恩來)是「投降派」，一上山就請盧俊義(影射鄧小平)坐了第二把交椅，把晁蓋(指毛澤東)架空了。運動的主題就是要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所謂「投降派」，矛頭直指周恩來、鄧小平以及大批在 1973 年復職的老幹部。

10 月，鄧小平在領導「整頓」時制定了三個綱領性的文件，分別是：一、《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草稿)》；二、《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草稿)》；三、《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草稿)》。鄧又提出要以毛澤東的「三項指示為綱」，即：一、學習無產階級專政、反修防修；二、促進安定團結；三、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由於毛澤東的侄兒兼聯絡員毛遠新多次向他匯報，說鄧小平「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又說鄧的「三項指示為綱……其實只剩下一項指示，即生產搞上去了」，毛遂於 11 月決定要解決鄧小平的所謂「右傾」問題。他在批評鄧時說：「什麼三項指示為綱，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小平……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歷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啊，

2009年4月修訂版

不管帝國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毛又指出「有些人總是要對這次文化大革命不滿意，總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帳，總是要翻案」，由此展開了一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

1976年1月，周恩來逝世。中央政治局通過毛澤東的提議，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對華表示：「你辦事，我放心」。可以說，華的任命是毛澤東力圖調和「四人幫」與務實派幹部、軍人之間的矛盾的結果。

4月初，天安門廣場發生了上百萬群眾悼念周恩來、聲討「四人幫」的運動。4月5日，中央政治局出動民兵、公安清理現場所有花圈，還逮捕了一些人；群眾提出「還我花圈，還我戰友」的口號，最後遭到鎮壓。7日，政治局撤銷鄧小平黨內外的一切職務，並委任華國鋒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及國務院總理。8日，《人民日報》批判天安門事件為「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地製造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8月，開展「批鄧」運動；鄧的三個「整頓」文件被誣蔑為「三株大毒草」。

9月，毛澤東逝世。他在開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後曾表示：「文化大革命」犯了兩個錯誤，即「打倒一切」及「全面內戰」；「文化大革命」是「三七開」，即「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總的看法是「基本正確，有所不足」。毛又指出他一生幹了兩件大事：第一，趕走蔣介石和日本人，並沒有爭議性；第二，發動「文化大革命」，支持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

10月，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等人把「四人幫」逮捕，結束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雖已過去，中國卻面對「三信危機」（「三信」即信仰、信心、信任）。

5. 對「文化大革命」的反思

下面提出幾個值得我們去思考的問題，並略加分析：

(1)「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文化大革命」在當時被說成是：

- 一、一場發展教育、科學、文化事業的文化革命；
- 二、一場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革命；
- 三、一場自覺地改造世界觀的思想革命；
- 四、一場發展社會生產力的經濟革命；
- 五、一場基於人民要求及需要的、自發的群眾運動。

但事實證明，「文化大革命」是：

- 一、一場大革文化命的浩劫，它導致教育水平下降，文藝學術界停產十年，科學技術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拉大；
- 二、一場自己人整自己人的鬥爭（林彪曾說：「文化大革命」就是「革我們原來革過命的人的命」）；
- 三、一場用粗暴、強制手段去改造群眾思想的運動；
- 四、一場對經濟造成嚴重的混亂、破壞和倒退的大災難；
- 五、一場由最高領導人動員和利用群眾去達到其目的而造成的內亂。

(2)「文化大革命」所反映的是什麼問題？

「文化大革命」反映了兩個嚴重的問題：

第一，中國在當時欠缺健全的法制，因此無法節制群眾過激的行為，最後導致局勢全面失控；

第二，在那個年代，人們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達到瘋狂的程度，結果是一般人都失去了獨立的思考和判斷能力，只會盲目地遵從最高指示。

(3)「文化大革命」最壞的影響是什麼？

「文化大革命」在全國的範圍內導致經濟的破壞、文化遺產的破壞、教育的停頓、文藝創作與學術研究的停頓，以及人性的扭曲。至於哪一樣是最壞的影響，可謂見仁見智。

(4)「文化大革命」是否全無意義？

儘管「文化大革命」在各方面都產生了極負面的影響，但卻不能說它全無意義。「文化大革命」始於毛澤東把群眾對他的個人崇拜推到頂峰，但它卻以個人崇拜的破產告終。它喚醒了整整一代中國人，又使中國最終放棄階級鬥爭，走上改革開放之路。「四人幫」倒台、「文化大革命」結束，是中國命運的大轉折。

6. 毛澤東時代的結束：對毛澤東的評價

毛澤東是一個魅力（具有感召力的）領袖（charismatic leader）。毛澤東時代，實際上是一個以階級鬥爭為綱，以群眾運動方式辦事的一人專政的極權（totalitarian）時代。要了解這個時代，就需要了解毛澤東這個人。

6.1 認識毛澤東

(1) 毛澤東的性格特點是什麼？

要認識毛澤東，就要從他的性格特點開始，這又可從他的行事看出來。總而言之，他一生反叛、任性、自信心強、不怕邪、倔強、不求人、不認錯、有領袖慾、有霸氣。

我們可從毛澤東的詩詞看出他的霸氣：

「獨坐池塘如虎踞，綠楊樹下養精神。春來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作聲？」

（《詠蛙》，1909年，16歲。）

「獨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頭。看萬山紅遍，層林盡染；漫江碧透，百舸爭流。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萬類霜天競自由。悵寥廓，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沁園春·長沙》，1925年，32歲。）

「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

2009年4月修訂版

還看今朝。」(《沁園春·雪》，1936年，43歲。)

「多少事，從來急；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祇爭朝夕。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滿江紅》，1963年，70歲。)

(2) 毛澤東喜歡什麼？

他喜歡接受挑戰、讀書、游泳、吸煙、吃辣椒和紅燒肉、看京劇、看雪。

(3) 毛澤東討厭什麼？

他討厭錢、搞特殊化、貪污。

(4) 毛澤東日常生活的大問題是什麼？

他的大問題是失眠、便秘、孤寂。

最後指出，毛澤東是個集矛盾於一身的人：

- 一、他享有極權，卻享受不到普通人可以隨意到處走動的自由；
- 二、他想聽真話，卻不能容忍不合自己心意的真話；
- 三、他喜歡挑戰權威，卻不容許別人挑戰他的權威；
- 四、他深信抓權會令共產黨腐化，但又深信共產黨非抓權不可；
- 五、他有仁慈的一面，又有無情的一面；有追求理想的一面，又有務實的一面；有時儼如學者，有時卻像個土包子。

6.2 評價毛澤東

儘管毛澤東的治國手法備受非議，但他確實是二十世紀中國最具魅力和影響力的領袖。他一生反叛、倔強、任性、自信；從不肯約束自己的個性，亦從不會掩飾自己的好惡。他最討厭搞特殊化；窮一生之力去改造人性、追求他那個永遠

追求不到的理想。毛勇於迎接挑戰，並善於在劣勢中取勝。他領導革命成功，絕非僥倖。可惜，勝利令他自我膨脹，以致他在晚年容不得不得合他心意的真話。他執政 27 年，凡事一意孤行，用自己的過去經驗來判斷當前一切是非、解決當前一切問題，終於導致悲劇收場。可以說毛一生都是過著反抗的生活，並習以為常，且視之為普遍真理，強迫人們接受。他認為「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又作出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總結。無怪中國在毛一人專政下，長期處於翻天覆地的動亂中。毛所謂「抓革命，促生產」，最終被他自己的革命實踐否定。

毛澤東在後革命時期堅持繼續革命，在沒有階級的中國社會不斷搞階級鬥爭，造成災難和悲劇。他的可悲之處，不在於清算了那麼多階級敵人（革命基本如此），而在於犧牲了無數忠誠於共產黨與共產主義的人士。然而，我相信這不是毛澤東本人的意願（If Mao had created a tragedy, it was a tragedy that never meant to be）。他具有敏銳的觀察能力，覺察到社會上存在很多問題，但他誇大了這些問題的嚴重性，又錯定了這些問題的本質。結果是，他用錯誤的方法去解決社會上的問題，最後釀成大悲劇。中國在毛澤東統治下，可謂災來如山倒。個人認為：毛雖無心造孽，卻難辭其咎。

第 3 章 改革開放：「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資深記者和評論家楊繼繩在他寫的《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中指出，毛澤東逝世後，中國出現了四股政治力量，這四股力量的代表人物企圖按自己的意願選擇中國未來的道路。

第一種選擇：在政治方面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在經濟方面維持計劃經濟體制。上述取向意味著在政治和經濟上都走毛澤東晚年的路線，其代表人物是毛澤東的繼任人華國鋒。

第二種選擇：在政治方面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原來的意識形態、中共的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在經濟方面走 1950 年代的路，但在計劃經濟體制的前題下，允許搞一點市場調節，這體現於 1980 年代中期城市經濟體制改革開展後所提出的「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方針。堅持這種取向的代表人物是財經專家陳雲。

第三種選擇：在政治方面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原來的意識形態、中共的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在經濟方面放棄計劃經濟體制，走市場取向的改革，這體現於 1992 年 10 月中共「十四大」所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路線。堅持這種取向的代表人物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

第四種選擇：在經濟方面放棄計劃經濟體制，搞市場經濟；在政治方面放棄無產階級專政，實現政治民主化，即背離前三種選擇的方向。堅持這一取向的是一些可稱為自由民主派的在野知識分子。

楊繼繩又指出，在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實際上是上述四種政治力量的較量，其中當以鄧小平為代表及以陳雲為代表的兩股力量最強。鄧、陳二人勢均力敵，互相制衡。遇到一些重大決策，更必須要兩個人都同意才可實行。所以，中國改革開放年代的政治力量呈雙峰狀態，但由於鄧小平是實際上的一把手，這個山峰稍高一些。楊繼繩對後毛澤東時代政局的分析，確是簡明扼要。下面先談

華國鋒主政時期的特色，然後說明鄧小平時代中國全面走向改革開放的實況。

1. 華國鋒時代（1976—1978 年）：走向改革開放的過渡期

1.1 延續的一面

毫無疑問，華國鋒是毛澤東路線的忠實追隨者。爲了貫徹毛的主張，華於 1976 年 12 月召開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又於 1977 年 4、5 月間召開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藉以發揚「政治掛帥」及「群眾路線」的革命精神（大寨、大慶是毛澤東在 1960 年代中期爲農業、工業樹立的兩個楷模）。1977 年 2 月，華國鋒支持《人民日報》在一篇社論中正式提出「兩個凡是」的觀點，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值得注意的是，華國鋒把毛澤東的一套與「四人幫」的一套區分開來。他一方面叫人繼續高舉「文化大革命」的旗幟，另一方面卻批判「四人幫」把持「文化大革命」，認爲「四人幫」別有用心，「另搞一套」，違背了「文化大革命」本身的精神，造成災難。

1977 年 8 月，華國鋒向中共「十一大」作政治報告時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結束，決不是階級鬥爭的結束，決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結束。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始終存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的鬥爭，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這種鬥爭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文化大革命這種性質的政治大革命今後還要進行多次。」上述說法充分反映出華國鋒仍然堅持「以階級鬥爭爲綱」的立場。

1.2 轉變的一面

由於「文化大革命」嚴重阻礙了中國的經濟發展，致使中國遠遠落後於世界上的先進發達國家，華國鋒遂於「十一大」宣告「文化大革命」結束的同時，強調建設現代化強國的目標。他的方法是實行開放政策，放手利用外國資金，並大

2009 年 4 月修訂版

量引入外國先進技術，以實現農業、工業、國防、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中國對外開放，從此開展起來。

1978 年 2 月，五屆人大第一次會議通過《發展國民經濟十年規劃綱要》，預算在 1977 年的基礎上加開百多個投資項目，並撥大量資金購買先進科技。大概是由於不熟悉國際行情關係，中國在 1977—1978 間引進了不少陳舊、過時的設備。此外，在大幹快上（即大規模從事及快上馬的意思）的思想指導下，進口整套設備的規模往往過大，超過了國家的財政及配套能力所能負擔的。盲目投資引進，浪費了龐大的資源，造成國家外匯不足，更使中國已經失衡的經濟結構進一步失調。華國鋒因此被反對他的人批評搞「洋躍進」，即重覆了 1958 年「大躍進」的急躁冒進錯誤。

1.3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華國鋒失勢與鄧小平時代的開始

1977 年 7 月，鄧小平在以陳雲、王震為首的高幹支持下復職，擔任黨副主席，引發新一輪的權力鬥爭，即以鄧小平為首的「實踐派」與以華國鋒為首的「凡是派」的鬥爭。幸虧雙方都以「安定團結」為重，致使這場鬥爭與「文化大革命」時殘酷的鬥爭有很大的不同。鄧小平所針對的，是「兩個凡是」理論，故此，他在復出之前和之後都明確表示要全面地、整體地分析毛澤東思想體系，實事求是地解決問題。兩派的爭論，隨著 1978 年 5 月 11 日《光明日報》發表經胡耀邦精心策劃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而推向高潮，使鄧小平獲得更多的支持。

1978 年 11 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平反了 1976 年 4 月 5 日發生的天安門事件，這表明鄧小平在現階段的鬥爭中已佔上風。12 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上批評華國鋒的「兩個凡是」，又批評他的「洋躍進」。誠然，十一屆三中全會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因為它標誌著華國鋒過渡時期的終結與鄧小平改革開放時代的開始。鄧小平後來指出，「華國鋒只是一個過渡，說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沒有一個獨立的東西，就是『兩個凡是』。」

2. 鄧小平時代（1979—1997年）：「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我們從幾個方面來看鄧小平推行的改革開放：第一，鄧推行改革開放的目的；第二，鄧推行改革開放的特色；第三，改革開放的過程及影響。

扼要而言，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的目的，是要藉搞活經濟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解決「三信危機」及鞏固中共的統治地位。

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的主要特色如下：

第一，他摒棄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主張——鄧小平認為，放棄階級鬥爭是實行改革開放的先決條件；

第二，他摒棄了用動員群眾的方式（the mass mobilization approach）來建設社會主義——鄧小平糾正了毛澤東時代不信任知識分子、不尊重專業知識的失誤，他重新重用專家，但同時要求專家全心支持黨的政策；

第三，他擺脫了教條式的意識形態的掣肘——鄧小平堅信「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故能突破意識形態框框的限制，用務實的態度去領導改革；

第四，他採用試探法（the trial-and-error method）及循序漸進的方式（the incremental approach）進行改革——鄧小平形容改革的過程為「摸著石頭過河」，其政策具高度的靈活性，但往往欠缺周詳的應變方案（contingency plans）；

第五，鄧小平始終在一方面推行經濟自由化，另一方面竭力防止政治自由化。外界很多人因為相信經濟自由化和政治自由化是相輔相成的，因此認為中國改革開放在這方面的特色實構成一個弔詭（paradox）。然而中共斷不會認為推行經濟自由化與防止政治自由化這兩種政策有矛盾的地方，因為改革開放不但要發展經濟，其最終目的就是要鞏固中共的統治地位。從這個角度來看，任何對中共的統治造成威脅的勢力——無論是真正存在的還是潛在的，都必須被消滅，以確保改革開放能完全收效。

2.1 農村改革的開展與經濟特區的創立：農業的黃金時期（1979—1984 年）

鄧小平時代的改革是從農村開展的，到 1984 年底才將改革的重點轉移到城市。

2.1.1 農村改革的開展

農村改革從 1979 年開展，它體現於農村經濟形態的根本轉變，即由一個「指令經濟」（command economy）轉化為一個以「承包制」（contracting out system）為基礎的經濟。所謂「承包制」，是指國家把土地劃分給農民經營耕種，雙方協定一個生產指標，若產量超過協定指標，則超標部分的農作物算是農民所擁有，從而達至「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的結果。誠然，1970 年代末出現的「承包制」，其實並非政府制定的政策而是農民的創舉。它首先由安徽省某些農民私下實行，隨即迅速普及，之後更獲得官方批准。上述情況與 1960 年代初所發生的情況無異：當時同樣是安徽省某些農民為了解決生活困苦而私下實行「包產到戶」，經普及後才得到官方批准。無怪鄧小平在談及「承包制」時這樣說：「（它的）發明權是農民的」。總而言之，「承包制」使農民多勞多得，它把農民在生產上的積極性調動起來，故能收到立竿見影之效。

此外，1970 年代末、1980 年代初的中國農村又呈現了經濟多元化（economic diversification）的新趨勢，即農村副業的復興與鄉鎮企業的出現。中國的鄉鎮企業由於所處地理環境不同而各自有著不同的特色，例如以鄉鎮集體經濟為主的「蘇南模式」、以家庭工業為主的「溫州模式」及以來料加工為主的「珠江模式」（蘇南是指蘇州、無錫、常州一帶地區；來料加工是指從鄰近的港澳地區運來生產原料，按產品樣式加工，產品則返回港澳並由那邊的廠商銷售）。上述趨勢不只為中國農民帶來更多收益，還有助於解決中國長期以來因農業人口過剩、耕地不足而導致的勞動率下降問題（the problem of decline in labour productivity）。

2009 年 4 月修訂版

從 1979 到 1984 年，農業總產量增加了 50%。在同一時期，糧食生產的年均增長率達 4.8%。1984 年，農產量創了歷史高峰。上述數字反映出農村改革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然而，中國農村還有不少舊的、新的問題仍待解決：

第一，農業產量大幅度增加，全賴生產積極性得到充分的發揮，但由於農業現代化水平並沒有提高，故農業難以取得持續發展；

第二，農村人口在多勞多得的鼓舞下持續增長，使人均經濟得益繼續偏低；

第三，儘管糧食產量在短期內猛增而收到紓解民困之效，但隨著農村形勢普遍好轉、「指令經濟」失效、農村副業復興，越來越多農民選擇栽種經濟作物，導致糧食產量在 1980 年代中期以後大幅度減少；

第四，人民公社於 1983—1985 年間解體，這使農民失去了他們一向享有的福利，生活缺乏保障。

總而言之，1979 至 1984 年是中國農業走出低谷的黃金時期，但好景不常。自 1984 年底城市進行經濟體制改革以來，農村的境況每況愈下，並出現所謂「三農」（即農業、農村、農民）問題，詳情容後再作交代。

2.1.2 經濟特區的創立

1979—1980 年間，中共中央創立了四個經濟特區，即廣東省的深圳市、珠海市、汕頭市，以及福建省的廈門市。這些並非一般特區，而是「經濟」特區，即中央用來試行特殊經濟政策的區域。經濟特區的主要作用包括引進外資和先進技術，試辦中外合資企業，以及發展對外貿易。1992 年鄧小平南巡時說：「回過頭看，我的一個大失誤就是搞四個經濟特區時沒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現在長江三角洲，整個長江流域，乃至全國改革開放的局面，都會不一樣。」但該承認，劃定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為經濟特區是當時領導人周詳考慮的結果。首先，這幾處地方鄰近香港和台灣，有利於吸引僑商及外商投資設廠；其次，它們遠離北京，要是出了什麼問題也好控制。誠然，設立經濟特區，是黨中央按循序漸進

方式進行改革開放的一個具體表現。

2.1.3 「四項基本原則」的提出與第一次「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的開展

1979 年 3 月，鄧小平在一次講話中指出，中國若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就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分別是：第一，社會主義道路；第二，無產階級專政（1981 年改為人民民主專政）；第三，共產黨的領導；第四，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他在討論黨的領導時說：「事實上，離開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誰來組織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軍事和文化？誰來組織中國的四個現代化？在今天的中國，決不應該離開黨的領導而歌頌群眾的自發性。」可見他尤其重視這項原則。

鄧小平提出「四項基本原則」（或稱「四個堅持」），是因為他覺察到社會上吹起了一股「資產階級自由化」之風，這主要體現於：第一，傷痕文學的湧現；第二，民間民主運動的興起。

以批判「文化大革命」為主題的傷痕文學，是從 1978 年開始流行的。當時正好是「實踐派」與「凡是派」交鋒的關鍵時刻，鄧小平為了結合反「左」勢力與「凡是派」抗爭，自然對任何反「左」的言論都給予支持，傷痕文學因此應運而生。惟鄧小平掌權後，發覺不少這類作品不僅暴露「文化大革命」的慘況，還嚴厲指控整個社會主義制度，實有加劇「三信危機」之嫌。他遂決定取締傷痕文學。1981 年 3 月，鄧小平點名批判白樺寫的《苦戀》，並指出「這是有關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苦戀》這個文學劇本所描寫的，是中國知識分子在極「左」年代生活的悲劇，劇中主人翁是一個在 1950 年代從美國回歸祖國的名畫家，卻被「文化大革命」弄至家破人亡。白樺通過畫家女兒的口說：「爸爸，您愛我們這個國家，苦苦的留戀這個國家，可是這個國家愛您嗎？！」鄧小平在 1981 年 7 月進一步解釋他為何認為有需要批判《苦戀》：「無論作者的動機如何，看過以後，只能使人得出這樣的印象：共產黨不好，社會主義制度不好。這樣醜化社會主義制度，作者的黨性到哪裏去了呢？……這樣的作品和那些所謂『民主派』的言論，實際上起了近似的作用。」

鄧小平所說的「所謂『民主派』」，是指參與 1978—1981 年間民主運動的人士。1978 年 11 月，受到平反 1976 年天安門事件的影響，北京、上海及廣州等地掀起了一股被外國評論者稱為「北京之春」(Peking Spring) 的民主浪潮。具體來說，這是一場群眾自發的、以「四大」(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 方式進行的民間民主運動。當時北京市西單長安街的一片牆的大字報最引人注目，因此這裏「民主牆」(Democracy Wall) 之名不脛而走。除大字報外，以論政為主的民辦油印刊物亦像雨後春筍一樣蓬勃起來。據估計，到 1980 年就有 120 多份不同的民間刊物出現在全國各地，其中比較有名的包括《北京之春》、《四五論壇》及《探索》等。這次民運的活躍分子，大多屬於所謂「覺醒的一代」，即是說，他們是經過「文化大革命」洗禮，並進行過反省的年青人。他們有抱負、有理想，不滿現實、不滿意「人民當家作主」只是一句口號，故借「凡是派」失勢的歷史契機，希望使這個「人民當家作主」的口號成為事實。由於中國剛剛實行改革開放，所以這班年青人當中絕大多數並不認識西方的自由主義民主。可以說，「北京之春」的中堅分子如徐文立、劉青、傅申奇、王希哲、陳爾晉等人，皆可稱為「社會主義民主派」——他們主張的，是馬克思主義民主；嚮往的，是巴黎公社形式的政權；鼓吹的，是建立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當時只有極少數人是反馬克思主義的「資本主義民主派」，其代表人物是主張「第五個現代化」(即歐美人權、民主) 的《探索》主編魏京生。1979 年 3 月，魏京生因在〈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一文中呼籲「人民必須警剔鄧小平蛻化為獨裁者」而被捕；10 月，他被判 15 年徒刑。由於鄧小平認定這次民主運動「破壞安定團結，妨礙經濟發展」，因此民運的主流派——「社會主義民主派」亦難免於難。1981 年 4、5 月間，中共在取締傷痕文學、大字報及民間刊物的同時，全面逮捕民運人士，以遏止「自由化」傾向。

2.1.4 統一認識：《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制定

爲了統一認識以解決「三信危機」，中共中央遂於 1979 年 11 月開始著手起

2009 年 4 月修訂版

草一份重要文件，對毛澤東及毛澤東時代作一個總結。這份文件就是先後經過 4,000 名高級幹部討論，及七次修改才定稿，即最後在 1981 年 6 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討論期間，外界盛傳中國將爆發「非毛化」(de-Maoization)，即「貶毛」運動，然而，它沒有發生。據悉，在起草和討論《決議》的過程中，的確產生了分歧——有人提出廢棄「毛澤東思想」，另外有人認為《決議》對毛澤東批評得不夠，還有人對毛的品格提出了質疑。惟鄧小平與陳雲這兩位元老級人物同時指出，全盤否定毛澤東就等於否定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就會動搖中共的領導地位，因此，不能丟掉毛澤東這面旗幟。中國沒有出現像 1956 年蘇聯全盤否定斯大林一樣的「貶毛」運動，可以說是鄧小平與陳雲的決定。

《決議》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指出毛的領導以 1957 年為分界線：前期一貫正確；後期犯了一連串的「左」傾錯誤，包括將階級鬥爭擴大化、在經濟建設上急躁冒進，以及「錯誤發動」了一場「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總而言之，《決議》否定了毛澤東的晚年，但肯定了他的一生。

《決議》將「毛澤東思想」重新加以解釋，它把「毛澤東思想」與毛澤東個人的思想區分起來，前者是中共集體智慧的結晶，並可概括為「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及「獨立自主，自力更新」三個原則。至於毛澤東主張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決議》指出這是一個「左」的理論，不是「毛澤東思想」的一部分。上述說法其實並不合理，因為我們可以完全反對「繼續革命」，但我們不可以說該理論不屬於「毛澤東思想」，因為「繼續革命」實際上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

《決議》又指出，社會主義中國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與 1956 年劉少奇在「八大」所指出的一樣，即意味著當前的工作重點將重新「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

《決議》還指出，實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必須同時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2.1.5 中共「十二大」的召開

1982 年 9 月，中共「十二大」在北京召開，確立了外界所稱的「鄧胡趙體制」或「三頭馬車」領導局面。處於第一線的是胡耀邦和趙紫陽，前者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十二大」不再設中共中央主席），後者出任國務院總理。鄧小平則只出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沒有擔任黨和國家的最高職務，這成為鄧小平時代權力結構的一項特色。

「十二大」制定了中共在 1980 年代的三項主要任務，包括，第一，「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鄧小平語）；第二，爭取祖國統一；第三，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鄧小平又強調要抓緊四項工作：第一，實現幹部隊伍的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及專業化（即「幹部四化」）；第二，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第三，整頓黨風；第四，力爭使全國工農業的年總產值由 1980 年的 7,100 億元增至 2000 年的 28,000 億元（即翻兩番）。

「十二大」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它標誌著「實踐派」全面掌權，並確定經濟建設是解決國內外問題的基礎。

2.1.6 「清除精神污染」運動的開展

「十二大」前後，由於政治上出現比較寬鬆的氣氛，知識界又再次活躍起來。當時不少黨政機關內的高級知識分子紛紛發表言論，一方面批評時弊，另一方面敦促政府維護人民的權益。他們借馬克思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異化」（alienation）概念，來解釋中國在社會主義下的消極現象（馬克思抨擊資本家把工人創造的勞動及財富異化為統治工人的力量），又援用馬克思的經典論著來說明社會主義社會應十分關注「人道主義」（humanitarianism）問題。當中最具代表性和影響力的兩個人物分別是《人民日報》的副總編輯王若水及當過中共文藝主管的周揚。

王若水在〈社會主義異化論〉一文中指出，社會主義仍然存在著異化現象，

2009 年 4 月修訂版

如人民公僕往往變成了人民的老爺就是一個好例子。他又在〈抽象的人道主義〉中說，人道主義是一種把人和人的價值置於首位的觀念，它不應該成為資產階級的專利。周揚也在 1982 年的一次講演中談過「異化」問題。周揚雖然在 1950 年代推行文藝界反右，但由於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到衝擊，故進行了自我反省，並承認「整人者沒有挨整，不會知道被整的滋味」；他自此支持改革及思想解放。

1983 年 3 月 7 日，周揚以中國文聯主席的身份在全國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學術報告會上作了一個〈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的講話。他認為社會主義在發展的過程中，其政治、經濟、思想等方面都會異化，都會走向自己的反面。他又解釋說，在經濟建設上無經驗做了蠢事，是經濟上的異化；人民公僕濫用權力變成人民的老爺，是政治上的異化；個人崇拜，是思想領域的異化。此外，周揚指出馬克思十分關心人道主義問題，因此，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一切問題都應該以人為出發點。當時任中共意識形態總管的胡喬木看過周揚的發言稿後，認為問題不少，他遂於 3 月 10 日找周揚詳談，建議發言稿經修改後作為學術文章，在《哲學研究》上發表。惟王若水把周揚的講話全文刊登在 3 月 16 日的《人民日報》上，立即引起了廣泛的震動。

1983 年 10 月，鄧小平在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上強調「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並發出清污指示，於是展開了一場「清除精神污染」運動。領導這場運動的要員，是主管意識形態的胡喬木和鄧力群，還有中央黨校校長王震。他們都發表了反「精神污染」的講話和文章，從理論層面批判「抽象的人道主義」與「社會主義異化」的觀點，矛頭直指王若水及周揚。清污運動的目的本來是批判衝擊「四項基本原則」的過右言論，但運動一開始，保守派就興風作浪，且氣焰逼人，弄得全國人心惶惶。鄧小平因為擔心繼續批右會導致「左」傾回潮，嚴重影響快將上馬的城市經濟體制改革，所以在 1984 年 5 月便結束了清污運動。

2.1.7 政治體制改革的初試與困境

鄧小平早在 1980 年就指出中國必須實行政治體制改革，並且提出了很多重大的改革措施。鄧所講的「政治體制改革」(political system reform) 與外界所認識的「政治改革」(political reform) 其實是有分別的。中國推行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並非要取締現行的社會主義政體，而是要使它更趨完善，以提高行政效率，為「四個現代化」服務。實際上，政治體制改革即外界所稱的「行政改革」(administrative reform)。

政治體制改革由於受到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遠遠落後於鄧小平原先的設想。直至 1984 年底，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成績包括通過了 1982 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恢復了黨總書記、國家主席與副主席的職位；改善了人大選舉法（如引入差額選舉）；通過了刑事法和一系列經濟法規；建立了幹部退休制度；並在某程度上精簡了中央的領導機構。

2.2 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開展、發展及波折：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趙紫陽下台；六四事件；治理整頓（1984 年底－1991 年）

由於農村改革取得卓越的成就，鄧小平決定將改革帶到城市，因而開展了以城市為中心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新局面。

2.2.1 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的召開

1984 年 10 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上通過《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這標誌著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開展。

會議決定經濟體制改革的大方向是發展「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即一方面縮減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計劃 (mandatory plans)，另一方面加強無約束力的指導性計劃 (guidance plans) 及市場調節 (market regulation) 的比重。儘管「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是一種語詞矛盾的提法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它包含著「計劃」和「市場」兩個相互矛盾的概念，但它卻能滿足支持計劃經濟

及支持市場改革的兩派（即以陳雲為首及以鄧小平為首的兩派），因此具有實際意義。但問題是「計劃」與「市場」之間的關係應作何解釋？陳雲為解決上述問題提出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這個基本原則，即在肯定計劃經濟體制的前提下，允許搞一些市場調節。陳雲是眾所週知的計劃經濟旗手，但他相信國有經濟不必統得太死，應留點空間讓多種經營和小生產發展，所以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作為發展商品經濟的規範。其實，這個提法與晚清改革派主張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如出一轍，它反映出陳雲承認「計劃」和「市場」各有好處與不足之處，並主張拿「市場」的好處去補「計劃」之不足。誠然，直到 1992 年 10 月中共「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止，「計劃」和「市場」的關係純粹是「主」與「輔」的關係。可以想見，陳雲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中，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2.2.2 經濟體制改革的全面開展

十二屆三中全會結束後，中國進入了經濟體制改革全面開展的新階段。重要的改革包括價格改革、企業改革及擴大對外開放。

2.2.2.1 價格改革的推行

推行價格改革與創立經濟特區一樣，均採用循序漸進的方式。政府排除了一下子全面開放價格的可能性，因為政府恐怕沒法應付震蕩治療式改革的風險。

準確地說，價格改革是從擴大企業自主權開始的。1984 年 5 月，國務院發出指令，企業在完成指令性計劃之後，其自銷產品（即超產部分）可在不高於計劃價格 20% 的範圍內浮動。到 1985 年 1 月，國務院乾脆把 20% 的限制也取消了，自銷產品的價格由企業根據市場自行決定，或由供需雙方自由協定，政府不加干涉。這樣，同一種產品就有兩種價格——計劃內的計劃價格（官價）和超產部分的市場價格（市價），即人們所說的「雙軌價格」。新訂政策無疑使中國經濟走上「雙軌制」（double-track pricing system）的道路，它更為某些人提供發大財

2009 年 4 月修訂版

的機會。價格改革一開始，社會上就出現一批投機分子，人稱「倒爺」(profiteers)，因為他們把計劃價格的商品倒到市場上去賣而賺大錢。當然，能當「倒爺」的都是有權力和背景的人，故群眾又稱之為「官倒」(official profiteers)。對「倒爺」或「官倒」藉權營私的行為，社會深惡痛絕。

市場價格具有三項功能：其一是傳遞市場信息；其二是為生產提供刺激；其三是分配收入。社會主義中國雖然走上了開放價格之路，但由於價格改革是在「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及「雙軌制」的條件下進行，因此，當時中國的價格尚未能發揮市場價格的正常功能，是「扭曲價格」(distorted price)。在此一提，當時外界（主要是香港與台灣）的中國問題分析家用「鳥籠經濟」(birdcage economics)來說明價格改革在陳雲主導下有先天的局限性——開放了的價格是「鳥」，計劃經濟是「籠」，意謂任憑「籠」內的「鳥」怎樣飛，牠也飛不出那個預設的「籠」。但問題不在「籠」的存在與否，因為自由市場並非沒有「籠」；「籠」的大與小，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2.2.2.2 企業改革的推行

簡而言之，企業改革包括：

第一，實行政企職責分開，以擴大企業的自主權；

第二，實行廠長負責制，即由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改為實行廠長負責制，將企業的生產、經營、盈虧交廠長全盤負責；

第三，實行勞動合同制，但只限於法例通過後受聘的勞工；

第四，試行企業破產法；

第五，首次發行中國企業的股票，並在上海和深圳設立股票市場。

2.2.2.3 對外開放的擴大

開放政策始於華國鋒的主政時期。由於 1979 年 2、3 月間爆發中越戰爭，導致國家財政出現困難，剛掌權的鄧小平遂宣佈中國自該年 6 月起將進入三年經濟

2009 年 4 月修訂版

「調整」期；開放政策因此一度受到影響，並體現於外商對中國投資環境質量下降表示不滿。1984 年初，中外經濟關係重現生機。10 月，城市經濟體制改革開展，對外開放亦隨之擴大。當時的主要政策包括：

第一，擴大對外貿易，准許地方外貿公司保留部分外匯，另對人民幣實行貶值，以提升中國在國際貿易上的競爭能力；

第二，鼓勵外商作直接投資，其形式採取中外合資或外商獨資皆可，並通過法令保護投資者的利益；

第三，繼四個特區之後，又將天津、上海、大連、秦皇島、煙台、青島、連雲港、南通、寧波、溫州、福州、廣州、湛江、北海 14 個港口城市對外開放，並給予優惠政策及准許（溫州和北海除外）設立經濟技術開發區；

第四，劃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及閩南廈、漳、泉三角地區的 61 個市、縣為沿海經濟開放區，建立以外向型為主的經濟，爭取多出口、多創匯；

第五，向國際金融機關貸款以加速國內的經濟建設；

第六，以中外合資形式在國外進行投資；

第七，擴大旅遊事業，爭取多創外匯；

第八，鼓勵學生、學者出國留學、交流，學習外國先進科技。

2.2.3 政治體制改革再上馬

如前所述，鄧小平早於 1980 年已指出中國急需推行政治體制改革，惟這方面的改革離他的要求還差得遠。城市體制改革開展後，鄧再次強調推行政治體制改革的迫切性。他於 1986 年 9 月 3 日談到這個問題時說：「現在經濟體制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前進，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阻礙四個現代化的實現。」

9 月 13 日，鄧小平在另一次談話中指出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是「調動群眾的積極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義。」至於改革的內容，他又解釋說：「首先

是黨政要分開，解決黨如何善於領導的問題。這是關鍵，要放在第一位。第二個內容是權力要下放，解決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同時地方各級也都有一個權力下放問題。第三個內容是精簡機構，這和權力下放有關。」

2.2.4 八五、八六學運：胡耀邦下台與第二次「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的開展

大刀闊斧的經濟體制改革開展後，社會上很快便出現複雜的情緒，一方面是樂觀及高升的期望，另一方面是不安和怨憤。經濟改革上了新台階原本是一件令人震奮的好事，但過熱的經濟發展卻帶來通貨膨脹、貪污腐敗及分配不公等問題，以致民怨沸騰。1985 年 9 月，北大學生藉紀念「九·一八」事件發起以「反對日本經濟侵略」及「抵制日貨」為號召的學運，部分學生更將矛頭直指「北京的腐敗」。由於黨中央做了大量的游說及宣傳工作，又作了嚴密的部署，學潮終於平息，但引發這次學潮的種種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

1986 年初，被外界稱為「開明派」的中央高層人物（包括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啓立、朱厚澤、王蒙等人）爲了防止 1985 年學運的重演及對學生的訴求作出回應，決定雷厲風行地端正黨紀、擴大反貪污、打擊經濟犯罪活動，並在深化改革開放的基礎上落實「鞏固、消化、補充、改善」的新八字方針。他們開創了一個寬鬆的政治局面，好讓改革開放在不受困擾的條件下順利進行。由於出現了這個新的歷史契機，黨內外不少著名的高級知識分子（如嚴家其、蘇紹智、李洪林、方勵之、溫元凱、于浩成、王滬寧、劉賓雁及王若望等人）又活躍起來了。他們相繼發表大膽開放的言論，主要是批評腐敗現象及要求加快民主化進程。社會上改革的輿論迅速升溫。可惜的是，期望愈高，失望愈大。儘管中央一再三令五申各級領導幹部必須按照指示辦事，惟各項改革仍因阻力重重停滯不前，而貪污腐敗之風不但未被遏止，反而變本加厲，人們對此無不義憤填膺。

1986 年 12 月，中國再次爆發學生上街示威遊行運動。這次示威由安徽合肥的大學生發起，並迅速蔓延至武漢、成都、昆明、西安、長沙、南京、杭州、廣州、深圳、上海、北京及天津等地。不少人還將矛頭指向「四項基本原則」。面

對全國性的激烈學潮，鄧小平遂於12月30日召見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啓立及李鵬等人，批評他們未能平息學潮：「學生鬧事，大事出不了，但從問題的性質來看，是一個很重大的事件。……凡是鬧得起來的地方，都是因為那裏的領導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這也不是一個兩個地方的問題，也不是一年兩年的問題，是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的結果。」鄧繼而作出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指示：「沒有專政手段是不行的。對專政手段，不但要講，而且必要時要使用。當然，使用時要慎重，抓人要盡量少。但是如果有人要製造流血事件，你有什麼辦法？我們的方針是首先揭露他們的陰謀，盡量避免流血，寧可我們自己人被打傷，對為首鬧事觸犯刑律的依法處理。不下這個決心是制止不了這場事件的。如果不採取措施，我們後退了，以後麻煩會更多。」

1987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批評胡耀邦後接受了他辭去中共總書記職務的請求，但保留其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職務。政治局又將一批進行「自由化」活動的黨內知識分子開除出黨。到1月底，持續了一個多月的學潮終於平息。

當時外界盛傳鄧小平是受陳雲的壓力才讓胡耀邦下台的。其實，這是沒有根據的揣測。胡耀邦下台的根本原因是鄧小平及一些黨內元老對他完全喪失了信任。據悉，鄧小平很不高興胡耀邦在兩方面的表現。其一是胡反「自由化」不堅決，讓「自由化」泛濫；其二是胡在1985年5月10日接受香港《百姓》雜誌主編陸鏗訪問時談了一些在改革中改革派和保守派鬥爭的情況。陸鏗回去後寫了《胡耀邦訪問記》，讚揚胡耀邦，批評保守勢力。鄧小平知道後大為不悅，並在某個場合對楊尚昆這樣說：「陸鏗打著奉承耀邦的幌子來反對我們！」及「這幾年我如果有什麼錯誤的話，就是看錯了胡耀邦這個人！」

胡耀邦落馬、知識分子被開除黨籍、學運被遏止、反資運動開展——上述的一連串事件確使不少外界人士（尤其是學者和投資者）擔憂。他們對中國政局的穩定性產生疑問，並認為改革開放正在倒退中。其實，鄧小平對改革開放的決心絲毫沒有動搖，只是他相信若要改革開放成功，就必須要有一個穩定的局面，所

2009 年 4 月修訂版

以有需要消除破壞穩定的「自由化」活動。1987 年 4、5 月間，當鄧小平覺察到黨內的「思想警察」（如胡喬木、鄧力群等人）企圖利用這場反資運動來攻擊整條改革開放路線時，他便公開表示「搞四個現代化……著重反對『左』，因為我們過去的錯誤就在於『左』，「我們既有『左』的干擾，也有右的干擾，但最大的危險還是『左』。」鄧小平再次當機立斷結束反資運動，阻止了「左」傾回潮。從 5 月開始，改革開放的言論又高唱入雲了。

2.2.5 中共「十三大」的召開

1987 年 10 月，中共「十三大」在反「左」的氣氛中召開。趙紫陽接替倒台的胡耀邦向大會作《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報告，並在報告中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該理論有兩層含意：第一，中國社會自 1950 年代中期開始已經是社會主義社會，要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不能倒回去搞資本主義；第二，中國的社會主義社會還處在「初級階段」，要循序漸進，以達到基本實現現代化為止。趙紫陽指出，中國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將會延續到廿一世紀中葉；現階段的基本路線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及堅持開放政策為基本點。

「十三大」確認「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在強調發展生產力的前題下，會議進一步提出「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即國家只會用宏觀控制經濟的手段來調節市場，而不會參與個別企業的微觀決策。值得注意的是，「十三大」首次把政治體制改革提到議事日程上來；有關政治體制改革的具體內容，容後再作交代。

2.2.6 經濟及政治體制改革的全速前進

「十三大」閉幕後，趙紫陽領導中國向改革的深度和廣度全速前進，由此而引起一場軒然大波。現先說明各項重大改革的主要內容，再談趙紫陽加速改革所引起的反響。

2.2.6.1 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的實施

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的整個構思，實際上來自國家計委副研究員王建所提倡的「國際大循環」理論。該理論建議中國首先利用農業的剩餘勞動力重點發展四類勞動密集型出口產業——紡織和服裝加工業、食品加工和飲料業、輕工雜品產業，以及勞動密集型機電產業，然後用出口產品賺取外匯，再用外匯來購買設備和技術以發展重工業，從而建立農業和重工業之間的循環關係。

趙紫陽於 1987 年底到上海、浙江、江蘇、福建等沿海省、市考察後指出，世界上隨著勞動費用條件的變化，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正向勞動費用低的地方轉移；因此，中國沿海地區應利用其相對優勢，抓緊這個機遇，大力發展勞動密集的外向型經濟，把大批外資吸引進來，並在生產和經營的過程中堅持「兩頭在外」（即把原料來源和產品銷售都放到國際市場上去），以避免和內地爭原料、爭市場。從 1988 年 3 月開始，政府大力推行這套經濟發展戰略，這體現於沿海地區「三資企業」（即外商獨資企業、中外合資經營、中外合作經營企業）長足的發展。趙紫陽更鼓勵在中外合資、合作企業中試行「一企兩制」，即在同一企業中劃分若干廠房給有管理經驗的外商直接管理，或由外商在國外聘請人才來管理，好讓國內廠長學習按照國際慣例管理企業。對思想比較保守的人來說，讓外商管理企業實有導致喪失國家主權之嫌。

2.2.6.2 「勇闖物價關」

1988 年春，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和國務院總理李鵬在經濟體制改革的方針上出現了分歧。是年 3 月，李鵬還公開強調當前最迫切的任務是要完善「企業改革」，惟趙紫陽於 4、5 月間又公開表示經濟改革的重點是推行「價格改革」，要「勇闖物價關」，取締「雙軌制」，以達官價與市價兩價歸一的目的。

5 月底，中央政治局議決推行「價格改革」。6、7 月間，先後開放了白糖、鮮蛋、大白菜、豬肉、彩電、棉布、棉紗、名酒、名煙等物品的零售價格，導致

2009 年 4 月修訂版

各地物價全面大幅上升。6 月，通脹達 16.5%；7 月更上升到 19.3%。8 月，一般老百姓為保值起見紛紛從銀行提出存款，盲目搶購貨品。趙紫陽「勇闖物價關」的希望，至此可謂全盤落空。自 9 月起，中國經濟進入了「治理整頓」的階段。

2.2.6.3 政治體制改革的全面推行

儘管鄧小平在城市經濟體制改革開展後一再指出，只有實行政治體制改革才能保障經濟改革的成果，但由於受到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政治體制改革一直收效甚微。「十三大」後，趙紫陽銳意推行以下有關政治體制改革的措施：

- 第一，實行黨政分開，逐步撤銷黨組；
- 第二，進一步下放權力，直到基層為止；
- 第三，精簡政府工作機構；
- 第四，改革幹部人事制度，包括引入公務員制度；
- 第五，建立社會主義協商對話制度；
- 第六，完善人大、政協制度；
- 第七，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的建設。

上述措施反映出趙紫陽主張的政治體制改革是全面和徹底的，並意味著權力和利益會重新分配，這正好解釋為何一般黨政幹部視趙的政改措施為洪水猛獸，以致在執行方面舉步為艱。

2.2.7 改革進退維谷：八九民運、趙紫陽下台、「六四事件」

「十三大」後，趙紫陽為了打破改革的困局，決定大膽闖關，結果以失敗告終。闖關觸礁，一方面是由於改革步伐太快，亂了陣腳；另一方面是因為某些體制上的重大改革措施觸動了現存勢力的切身利益，引起他們的集體對抗，令改革停滯不前。趙紫陽受到建制內部強大的阻力，又面對知識分子和學生越來越難滿足的要求，可說是處於進退兩難的境地。令他感到更為難的，是物價闖關未見其利先見其害——通脹、搶購潮的湧現，使他束手無策，備受反對其政策的人責難。

2009 年 4 月修訂版

1989 年，趙紫陽步前任總書記胡耀邦的後塵，即因處理學潮失當而黯然下台。

現將 1989 年學生民主運動的爆發、過程、轉折及結果簡述如下：

1989 年 4 月 15 日，胡耀邦逝世，北京學生藉悼念胡耀邦分別向人大代表及總理李鵬提出他們的政治理想和要求，學潮再起，並迅速蔓延到西安、長沙等大城市。由於學生爭取民主的行動得到教師、知識分子及新聞界的普遍支持，運動遂向社會蔓延，形勢急轉直下。

4 月 24 日，即在趙紫陽出訪朝鮮的次天，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將學運定性為「動亂」。26 日，《人民日報》根據這個決定的精神發表〈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1995 年 12 月，趙紫陽在接受楊繼繩訪問時表示：「『六四』的根本問題是【四·二六】社論」，因為該社論「引出空前規模的群眾抗議」。）

5 月 13 日，數千北京學生藉蘇聯改革派領袖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 快將訪華到天安門廣場絕食，藉此行動向中央施壓，以爭取成立壓力團體。儘管趙紫陽勸說學生必須克制，以免破壞中蘇高峰會議的進行，學生的情緒卻轉趨激烈，並否定所有妥協的主張。

5 月 15 日，戈爾巴喬夫抵京。16 日，趙紫陽與戈爾巴喬夫會晤時公開表示：「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仍然需要鄧小平同志掌舵」。17 日，北京爆發了百多萬人上街聲援絕食的大遊行，不少人將矛頭直指鄧小平。同日，全國有 27 個城市的 170 所高校學生上街遊行，聲援北京的絕食學生。

5 月 19 日晚，李鵬在中共中央、國務院首都黨政軍機關幹部大會上宣佈戒嚴令，並從外地調派解放軍進京，這反映出黨內強硬派取得勝利、溫和派徹底失敗。

5 月下旬，北京學生及市民無懼戒嚴令，繼續大規模地上街遊行示威，並組成糾察隊和各類自治團體，使首都陷於半癱瘓、無政府及人民自治的狀態。至此，學運已轉化為一個龐大的民眾運動。隨著大量外地學生陸續湧進北京，整個運動變得更加強大、複雜、激烈及難以控制。

由於戒嚴令未能生效，而民眾又堅守天安門廣場，中共強硬派終於在 6 月 4

日出動軍隊清理天安門廣場，以武力結束八九民運，造成震驚一時的「六四事件」。

2.2.8 穩定壓倒一切：「六四事件」後的政局與中共對當前危機的回應

「六四事件」發生後，中共不單要面對國內人心不穩與經濟滑坡的困境，它還備受國際社會輿論的指責及眾多西方國家的制裁，再加上東歐劇變與蘇聯解體的衝擊，可以說，中共正陷於自改革開放以來最深的危機。在這四面楚歌的情況下，鄧小平提出了「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的「十六字方針」，帶領中共渡過難關。

鄧小平首肯同意中共中央政治局用武力平息八九民運，是無可諱言的事實。當時只有鄧小平一個人有權調動軍隊，因為他仍是中共中央軍委主席。6月9日，鄧小平在接見戒嚴部隊時說道：「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而現在來，對我們比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們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他們是支持對暴亂採取堅決行動的。雖然有一些同志一時還不理解，但最終是會理解的，會支持中央這個決定的。」鄧繼而提出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正確不正確？……第二個問題，黨的十三大概括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對不對？」他接著作了十分明確的回答：「改革開放這個基本點……沒有錯。沒有改革開放，怎麼會有今天？……以後我們怎麼辦？我說，我們原來制定的基本路線、方針、政策，照樣幹下去，堅定不移地幹下去。」可見，儘管鄧小平認為中共有需要用強硬手段消滅任何挑戰其領導權威的勢力，但他卻一直堅持要把市場改革及開放政策貫徹到底。

當時要急需解決的，是中共總書記的接班問題。據悉，正當鄧小平考慮由誰來接替趙紫陽的時候，李先念和陳雲一再向鄧推薦上海市領導人江澤民，說江是堅持「兩個基本點」的好幹部，力主調江到中央。鄧小平很快接納了二人的建議。6月23—24日，中共中央召開了十三屆四中全會，議決撤銷趙紫陽所有職務；

2009 年 4 月修訂版

任命江澤民為中共中央總書記。9 月 16 日，鄧小平在會見美籍華裔學者李政道教授時談到胡耀邦與趙紫陽下台的問題，並解釋說：「過去兩個總書記都沒有站住，並不是選的時候不合格。選的時候沒有選錯，但後來他們在根本問題上，就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上犯了錯誤，栽了跟頭。四個堅持中最核心的是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四個堅持的對立面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些年來每年我都講多次，但是他們沒有執行。在這次動亂中趙紫陽暴露了出來，明顯地站在動亂的一邊，實際上搞分裂。好在有我在，處理不難，當然也不是我一個人的作用。」

江澤民當上中共總書記後，由於面對嚴峻的形勢，所以實施了一系列針對時局的政策。在政治方面，其政策的重點包括加強思想工作、加強黨的建設和領導、推行廉政建設、懲治貪污腐敗，以及抵抗西方對中國推行「和平演變」（即「打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以改變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經濟方面則強調繼續「治理整頓」，將過熱的經濟降溫，遏制通脹，並從穩定中求適度的發展。

「六四事件」發生後，中央高層對中國改革的大方向問題產生了分歧。如前所述，鄧小平始終不渝地堅持市場改革的路向，但以陳雲為首及以鄧力群為首的一些較保守的高層幹部則將近年來中國社會出現的通貨膨脹、貪污腐化、分配不公、政治動亂等問題，全歸咎於市場改革。他們認為要辨清改革的性質，並要對各項改革措施問清楚究竟是姓「社」（社會主義性質的改革）還是姓「資」（資本主義性質的改革），以防止發生「資產階級自由化」及「和平演變」。為了回應保守派對其改革開放路線的挑戰，鄧小平遂於 1992 年春節期間作出了南巡之舉。

2.3 改革不走回頭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立（1992—1997 年）

2.3.1 鄧小平南巡

1991 年底，蘇聯瓦解。當時不少西方國家預言，中共也很快會垮台。東歐與蘇聯變天，使中共中央高層傾向於保守，並藉強化意識形態來防止「和平演變」

在中國發生。保守派反覆宣傳，市場取向就是資本主義取向，而市場經濟就是「和平演變」的溫床。惟鄧小平指出，東歐共產政權崩潰與蘇聯解體，基本上是因為它們推行經濟改革失敗，所以，中國若要避免遭受同一命運，必須繼續走改革開放的道路。1992 年 1 月的中、下旬，鄧小平南下深圳、珠海、廣州等地，大力表彰市場經濟的成效，藉以扭轉當時國內的保守局面。

南巡期間，鄧小平作了多次重要的講話，說明：「特區姓『社』不姓『資』」，「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發展才是硬道理」，要「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在反駁有關社會主義必須是計劃經濟的提法時，鄧小平解釋說：「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他還特地指出當前的基本任務是防「左」：「現在，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這些就是『左』。」鄧小平在講話中不點名批評了陳雲、鄧力群等人，旨在為深化市場改革亮起綠燈。

鄧小平南巡講話傳返北京後，一度受到掌管意識形態的保守派封鎖。但由於各地傳媒紛紛發表支持進一步改革開放的文章，而與鄧小平一起南巡的楊尚昆又在軍中展開學習鄧的南巡講話，中共中央遂於 1992 年 2 月底整理了這個講話的要點，以中共中央 1992 年 2 號文件下發全體黨員，由此結束了歷時三年半的「治理整頓」，並掀起了新一輪的經濟熱潮。

2.3.2 鄧小平南巡掀起的經濟熱潮

鄧小平南巡後不久，全國掀起搞「翻番」狂潮；所謂「翻番」，即追求當地國民產值或工業產值成倍增長的高速度發展。各地同時又出現投資狂熱，這主要

2009 年 4 月修訂版

體現於下列三大熱點：

第一，房地產熱——1992 年，全國房地產公司冒出近萬家，出讓土地為前 5 年總和的 5 倍，地價與房價因此持續上升；

第二，開發區熱——僅 1992 年上半年計，全國各地自辦的開發區就有 1,800 多個，然而，大部分並無足夠資金進行基建（如通電、通水、通訊及平整土地等工程）；

第三，股票熱——1992 年，僅上海一地之股民就從 3 萬多人增至 120 多萬人。10 月，中央政府成立國務院證券委員會。大批國營企業被轉化為股份制公司，並在上海及深圳股票市場發行 B 股，以吸引外資。

此外，中央政府在 1992 年先後開放了 571 種商品的價格。到 1992 年底，由市場調節的商品比重已達 80%。通脹因全面開放價格捲土重來，高達 13%。

中國又於 1992 年實行全方位的對外開放——一方面以上海浦東為龍頭，開放長江沿岸城市，西至四川重慶；另一方面開放東北、西北、西南沿邊界的城市，形成周邊對外開放格局。到 1992 年 10 月，經國務院批准的開放城市已達 300 多個。國務院又批准逐步開放交通、商業、飲食、金融、保險、房地產等第三產業（即廣泛意義上的服務業）予外商投資。

2.3.3 中共「十四大」的召開：中國走向市場經濟的里程碑

1992 年 10 月，中共「十四大」在全國刮起「鄧旋風」的氣氛中召開。江澤民在會上指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由於「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在歷史唯物論中是處於矛盾的對立面，「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概念，反映出中共已掙脫傳統馬克思主義的束縛。從實際意義而言，「十四大」標誌著市場改革派的勝利——中共自此以「計劃」和「市場」的不同「功能」來界定兩者在經濟發展中所起的作用，而不再把「計劃」和「市場」看做「主」與「輔」的關係。換言之，「計劃」不再擔當發展經濟的主導角色，它只為宏觀社會經濟發展制定理順戰略目標而已。從這個角度看，「十

四大」可以說是中國走向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標竿。

「十四大」確認了鄧小平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要求把鄧小平理論與毛澤東思想看齊。會議又提出要審慎地推行政治體制改革，並強調精簡機構以提高行政效率，但不提撤銷黨組。

2.3.4 經濟失衡與宏觀調控的開展

1992 年刮起「鄧旋風」，使沉寂了三年多的中國經濟再度活躍起來，並朝著市場經濟的方向大步邁進。然而，由於市場法規未能及時建立起來，又由於政府未能及時制定有效的調控經濟措施，致使中國在 1992—1993 年間出現經濟局部過熱及金融秩序混亂的失衡現象。以下簡單分析上述現象的成因及政府的對策。

經濟過熱的基本原因是各地上馬項目過多，兼且投資規模過大。但要指出，當時中國的經濟只是「局部」過熱，因為資金大部分集中在新興的、投機性很強的領域裏，而正常的投資領域資金則極為短缺。至於金融秩序出現混亂情況，大抵是社會非法集資風氣泛濫及銀行違章拆借失控所致。當時不少金融機構人員及企業領導人濫用本身職權，調動銀行及社會上的閑散資金，往沿海各地進行炒賣股票及房地產等投機活動，導致金融形勢日益嚴峻。有中國經濟學者把這些炒房地產、炒股票、炒期貨的「官倒」稱為「貨幣倒爺」，並指出他們的破壞性遠大於 1987—1988 年間倒賣汽車、化肥等商品的「物資倒爺」。毋庸諱言，經濟局部過熱與金融秩序混亂，不但使全國生產資料及資金陷於緊張狀態，更加劇了 1992 年全面開放價格所帶來的通貨膨脹。1993 年 6 月，通脹上升到 25%。

為了解決當前的經濟危機，中共決定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措施，由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負責推行。1993 年 6 月 24 日，黨中央及國務院聯合公佈《宏觀調控十六條》，旨在「治亂」和「治熱」。有關「治亂」方面的主要措施，包括嚴格規管銀行業務、嚴禁非法拆借及集資、加強股票市場及房地產市場的宏觀管理，以及強化稅收管理。至於「治熱」方面的主要措施，則包括嚴格審批新投資項目、嚴格控制銀行信貸規模、提高利率以增加儲蓄存款、限期完成國庫債券的發行，

2009 年 4 月修訂版

以及遏制通脹。要澄清的是，加強宏觀調控並非如某些中國問題分析家所說的是恢復計劃經濟或全面緊縮——它是在肯定市場改革的前題下進行的，是以經濟立法來進行結構調整，而且範圍主要限於金融領域。

誠然，中共在加強宏觀調控的同時，還加速推行經濟體制邁向市場化的改革。1993 年 11 月 14 日，中共中央通過由朱鎔基制定的《(市場)改革五十條》。該文件說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作用」；文件又為企業、金融、財稅、投資及外貿等改革訂下目標和策略，故可以說是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總體規劃和行動綱領。

總而言之，一年多的宏觀調控確實收到「治亂」和「治熱」之效。至於同期推行的多項經濟體制改革中，財稅體制和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尚算成功；相反，國有企業、金融體制及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則明顯滯後。

2.3.5 鄧小平時代的終結

鄧小平因身體原因自 1994 年開始就不管國家大事了。陳雲也於是年 8 月動了大手術，並於 1995 年 4 月逝世。到此，中國的「雙峰政治」格局正式瓦解。1997 年 2 月，鄧小平逝世，中國遂進入後鄧小平時代。

鄧小平個性很強。他不喜歡空談，喜歡快刀斬亂麻，是一個作風強硬務實、急於抓出成效來的強人，故有「鋼鐵公司」之稱。此外，他還是個意志堅定不移、老是按照自己的一套想法去幹的人。葉劍英曾這樣評論鄧小平：「他這個人歷來如此，自以為是，聽不進別人的意見，喜歡一個人打天下，不撞南牆是不會回頭的。」

若說毛澤東時代是一個以階級鬥爭為綱，以群眾運動方式辦事的一人專政的極權（totalitarian）時代，那麼，鄧小平時代可說是一個以發展經濟為中心，社會走向開放但仍須堅持共產黨領導的專制（authoritarian）時代。

3. 二十世紀末的中國

鄧小平逝世後，外界一度揣測中國會否繼續由他開創的改革開放事業。1997 年 9 月召開的「十五大」終使外界釋疑，因為該會不單肯定鄧小平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還將「把鄧小平理論確立為中共的指導思想」這個提議明確寫進黨章。

爲了回答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急需解決的問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江澤民於 2000 年提出了「三個代表」理論，即：「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黨要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基本利益。」

以下簡述二十世紀末中國農村及城市的一般情況，以展示現今中國所面對的重大問題。

3.1 二十世紀末的中國農村

二十世紀末，中國農民人口約 9 億，佔總人口的 70%；其中失業或就業不足人口約 2 億，離村流動人口約 7,000—8,000 萬。1998 年，湖北村幹部李昌平上書總理朱鎔基，論述「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反映出嚴峻的「三農」問題。

如前所述，1979 至 1984 年是中國農業走出低谷的黃金時期。從 1982 到 1986 年，中共中央每年下發的「一號文件」都以改善農業爲主題，這反映出黨中央對農業及農民問題十分關注。惟自城市經濟體制改革開展以來，由於國家對農業的基本建設投資大幅度減少，又由於農用生產資料價格不斷上漲，加以農業勞動力大量轉向非農業的生產，因此，主要農產品產量就出現滑坡下降趨勢，嚴重影響務農者的生計。誠然，農村形勢每況愈下，亦涉及到基層政府的管治素質問題，而這又與人民公社解體不無關係。中國的 52,789 個人民公社於 1983—1985 年間全部解體，而在此之前，鄉鎮政府所有辦公經費一律由縣撥給，它既無權也無錢增設機關或增聘人員。人民公社解體後，中國出現了 61,766 個財政獨立的鄉鎮

2009 年 4 月修訂版

政府。由於國家允許它們將地方收益（如鄉鎮企業上繳的利潤、集資款項、捐款、罰款等等）作為鄉鎮財政的自籌收入，不少鄉鎮政府便乘機增設機構、增聘人員，攤子越鋪越大。同時，地方上又普遍出現所謂「三亂」——「亂徵收、亂集資、亂罰款」的情況，總之是苦了農民。在改革開放當初，據估計農村一畝地平均負擔鄉鎮政府經費約 10 元，到二十世紀末，少的負擔要 100 多元，多的更漲到 200—300 元。儘管中央政府曾三令五申遏制「三亂」，地方政府卻聽而不聞，更嚴厲對待上訪告狀的人。有關情況，詳見陳桂棣和春桃寫的《中國農民調查》。該書作者花了三年時間跑遍安徽，發現省內有 50 多個縣沒有一個按照國務院規定辦事，地方主義的膨脹可謂表露無遺。還有一項值得注意的是，自 1980 年代中期開始，地方政府往往購買農業副產品不交現金，長期發「白條」（即欠單），令農民生計大受影響。1990 年代又掀起房地產熱潮，農民更飽受「圈地運動」之苦。

人民公社解體後，農民再不能獲得社會福利保障，而中國又沒有獨立的農民協會為他們爭取經濟權益，故動亂隨農村情況轉壞而劇增。據有關資料顯示，在 1992 年，農民請願、示威、暴動事件有 9,000 起；到 2000 年，激增至十萬起。一些農民更為了生活而參加了地下組織，包括地下教會。

1990 年代中、後期，中央政府為了紓緩農村的緊張局勢而制定了一系列新政策，這主要包括：

- 第一，精簡基層行政機構，重建基層黨組，改善及提高地方領導的質素；
- 第二，規定公糧不得超過農民收入的 5%；
- 第三，在鄉村選舉中實行全民投票；
- 第四，建立中、小型市鎮以吸納更多農民；
- 第五，開發中國西部，為農民提供更多就業機會。

由於「三農」問題繼續日益惡化，中共中央終於在 2004 年再次下發以改善農民生計為主題的第 6 個「一號文件」，反映出黨中央下定決心要解決「三農」問題。

3.2 二十世紀末的中國城市

改革國營企業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項重點工作。1998 年，國務院總理朱鎔基依「抓大放小」的方針整頓國企。他首先選擇了 500—700 個大型國企作為改革對象，然後向它們提供優惠貸款，再將這些經過整頓、合併的國企在上海和深圳上市。一般而言，國家擁有它們 20—30% 的股權。其他中、小型國企則以低價賣掉。

工人失業在二十世紀末的中國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官方有關數字顯示，城市工人的失業率為 4%，但據不少外界專家估計，城市失業率實不低於 10%。1999 年，經國家仲裁的勞工糾紛有 50,000 起，至於沒有記錄可稽查的糾紛則數不勝數。工人對處境不滿常常引發暴力事件，尤以西部、華中、東北三個地區最為嚴重，但各地所發生的暴力事件大抵沒有聯繫。由於中國沒有獨立的工會組織為工人爭取經濟權益，為了緩和失業工人的不滿，政府向他們發放生活補助金；到 1999 年，補助金增至每月 300 元。

二十世紀末的中國城市出現了一股以「中產階級」為代表的新興力量。所謂「中產階級」，是指社會上有消費能力的人，主要包括私營企業主、個體工商戶及各類專業人士。中共把這個新興的富裕群體視為有助於穩定社會的進步勢力。2001 年 7 月，中共在江澤民推動下准許「中產階級」人士入黨。儘管這個決定只是確認一個既成事實——即小部分黨員已於 1990 年代蛻變成「中產階級」，但該項決定乃中共歷史上一破天荒之舉（二十世紀末，在 6,600 萬中共黨員中，大約有 50 萬是「中產階級」）。可以說，中國共產黨正由一個工農黨慢慢轉化為一個「全民黨」。

4. 1980、90 年代改革開放的總評價

中國經濟在二十世紀末業取得長足的發展，是無可諱言的事實。1978 年，

2009 年 4 月修訂版

中國的 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 國內生產總值) 為 3,624 億元；到 2003 年，增至 116,694 億元。人均 GDP 則從 1978 年的 379 元增至 2003 年的 8,469 元。1979—1990 年，中國經濟的年均增長率為 9.7%；1991-1994 年為 11%；1995 年以後為 7%。上述數字充分反映出改革開放的卓越成就，但中國的經濟增長實靠赤字開支 (deficit spending) 來推動，這對中國經濟的長遠發展是不利的。此外，中國還面對嚴重的糧食短缺問題，主要原因包括：第一，人口龐大，兼且繼續膨脹；第二，生態環境日益惡劣；第三，耕地日漸減少。上述現象又反映出中國有很多重大問題仍待解決。

在社會方面，改革開放為中國人民帶來了一個相對寬鬆的工作和生活環境，使人們在工作和生活中有較多的選擇和機會。但改革開放亦導致若干不良現象湧現。其一是商品化的現象——勞動力、土地、文化全都被商品化；其二是分配不公的現象——地域之間與社會階層之間皆出現嚴重分配不公的現象；其三是貪污腐化、道德淪亡的現象，促使罪案日增、治安日壞。上述現象解釋為何改革開放年代的中國社會仍然呈現不安和不滿的情緒。

改革開放令中國變好還是變壞，這屬見仁見智的問題。毫無疑問，中央領導人是有意去搞活經濟、安民恤眾的；然而，很多重大問題仍沒法解決，其中一個原因是地方越來越不受中央管制。縱然如此，中共至今仍佔統治地位，亦即是說，改革開放已達到它的基本目標。

倘若你問當今的中央領導人對於改革開放有何評價，我相信他們心底裏會如毛澤東於 1959 年 7 月在廬山上那樣說：「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蘇聯與東歐共產主義國家已成為歷史，中共領導人一定慶幸社會主義中國沒有步它們的後塵。至於現今的中國是否社會主義國家，這亦是一個爭議性的問題。

第三部分：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外關係

緒論

在論述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係之前，首先要說明兩點值得注意的事項：

第一，對中國政府而言，外交是一個高度敏感的議題，原因是外交跟主權和國防這兩個重大問題有密切的關係。2004 年 1 月，中國國務院外交部宣布將部分外交檔案解密（declassified），並向社會開放。這次解密開放的檔案，涉及 1949—1955 年間的部分外交檔案，共一萬多件，佔該時期所有外交檔案約 30%。儘管開放比例較外國低，兼且涉及敏感議題的檔案依然無法看到——例如有關朝鮮戰爭的檔案就因為涉及第三個友好國家而仍未解密，但外交部這種依照國際慣例的做法乃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破題兒第一遭。2006 年 5 月，外交部檔案館又開放了第二批自 1956 至 1960 年間的解密檔案二萬五千多件，佔那個時期外交檔案總數的 60%。外交部還擬在今後每兩年解密檔案一次。實際上，自 1980 年代以來，不少學者已充分利用西方國家與前蘇聯的解密外交檔案，以及知情人士的憶述，對毛澤東時代中國的外交進行了較深入的研究，並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基於上述原因，下文將會對這個時段的中國外交作較詳細的交代。

第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外關係經歷了無數次的急劇轉折，但從北京的外交策略來看，中國在過去半個世紀的對外關係大概可歸納為「對抗」（confrontational）與「非對抗」（non-confrontational）兩個主要時期：

第一個時期從 1949 年新中國成立開始，到 1982 年 10 月中共「十二大」提出「獨立自主」（即「不結盟」）的外交路線為止。在這個時期，中國的對外關係基本上取決於中國與美國及蘇聯兩個「超級大國」（superpowers）的戰略關係（strategic relationships）。當時中國認為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迫在眉睫；因此，中國一直採取辨清及對抗「主要敵人」的策略。在 1950 年代初期，美國因為中國參與朝鮮戰爭而對中國實施「圍堵政策」（policy of containment），致使中國採取「聯蘇反美」的策略。到 1960 年代中期，由於美國在越南發動戰爭，又

2009 年 4 月修訂版

由於中蘇關係日益惡化，中國在堅持美國為「主要敵人」的同時，更提出「反美排蘇」的口號。1969 年「珍寶島事件」發生後，中國認為蘇聯已取代了美國成為「主要敵人」，所以中國在 1970 年代採取「聯美反蘇」的策略。

第二個時期是從 1983 年起直至現在。由於中國這時期估計世界將趨於和平而非戰爭，所以它認為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世界大戰是打不起來的。還有，中國已走上改革開放的道路，它需要一個和諧及穩定的國際環境以發展經濟。基於上述原因，中國遂摒棄了對抗策略，實行「獨立自主」的外交路線，並強調「和平」與「發展」。

第 1 章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外關係（1949—1965 年）

1. 從「一邊倒」到「和平共處」及中蘇分歧的出現（1949—1957 年）

1.1 建國初期中共中央規劃對外關係的三大基本方針

考慮到建國後即將面臨的形勢，中共中央在建國前夕規定了執行外交政策要遵守三大基本方針：

第一，「另起爐灶」，即是：「不承認國民黨政府同各國建立的舊的外交關係，而要在新的基礎上同各國另行建立新的外交關係」，並另行訓練一支新的外交隊伍；

第二，「一邊倒」，即是：「我國站在以蘇聯為首的和平民主陣營之內」，對抗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陣營；

第三，「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即是對於帝國主義同中國建交的問題，「我們的方針是寧願等一等」，把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殘餘勢力清除後才跟他們建立新的外交關係。

1.2. 「一邊倒」方針的制定與實施情況（1949—1953 年）

1.2.1 毛澤東提出「一邊倒」的歷史背景

1949 年 6 月 30 日，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指出，「一邊倒，是孫中山的四十年經驗和共產黨的二十八年經驗教給我們的，深知欲達到勝利和鞏固勝利，必須一邊倒。積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經驗，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牆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我們反對倒向帝國主義一邊的蔣介石反動派，我們也反對第三條道路的幻想。」這是毛澤東首次提出「一邊倒」的外交方針。從意識形態和實際情況兩個層面來看，

「一邊倒」在當時是一個合理的選擇，但這樣說並非表示中共和蘇共之間沒有矛盾存在。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斯大林認為中共沒有能力打敗國民黨，所以他主張國共兩黨進行和平談判，並且向中共施加壓力，要它作出讓步。國共內戰初期，斯大林仍然堅持上述看法，直至 1947 年夏天中共對國民黨軍隊展開一連串反攻後才覺察到自己低估了中共的實力。1948 年 2 月，斯大林與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人談話時首次坦率承認自己在中國革命問題上犯了錯誤。6 月底，聽命於斯大林的「歐洲共產黨與工人黨情報局」(the Cominform)宣布開除由鐵托(Josip Tito)領導的南斯拉夫共產黨。中共於 7 月下旬獲得通知後隨即表示支持上述決定。從這時開始，蘇聯向中共提供軍事援助。

1948 年，毛澤東為了使中共的政治方針與蘇聯保持一致，曾三番四次提出要到莫斯科進行訪問及協商。但斯大林屢次建議把來訪時間推遲一些，令毛十分著急。1949 年 1 月 10 日，正當人民解放軍重重包圍天津、北平之際，斯大林突然來電，建議中共在兩個條件下接受與國民黨展開直接談判：第一，不讓發動內戰的戰犯參加；第二，不讓任何外國調解人參加。斯大林還解釋說，國民黨是決不會接受上述兩個條件的，所以談判只是裝樣子，不會弄出什麼結果來。當時毛澤東已坐擁半個江山，最怕就是上了國民黨「和平陰謀」的當，所以對來電大為不滿。為了增進兩黨的相互了解，斯大林於 1 月底派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Anastas Mikoyan)到河北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與毛澤東會晤。蘇共與中共雙方於 1 月 31 日至 2 月 7 日進行了八天會談。這是毛澤東第一次直接與蘇共中央成員交換意見，而米高揚亦憑這次會晤對毛的想法取得進一步的了解。值得提出的是，中蘇交惡後一度盛傳斯大林派米高揚到西柏坡勸說中共跟國民黨劃江而治，即由中共統治長江以北地區，由國民黨統治長江以南地區。當時中方的俄文翻譯員師哲在其回憶錄中對此事未有提及，但師哲並沒有出席八天的所有會談。因此斯大林是否企圖在中國搞「南北朝」，不得而知。

1949 年 4 月，人民解放軍渡過長江，佔領南京、上海。至此，國共內戰勝

2009 年 4 月修訂版

負已定。1970 年代末，美國國務院一份解密文件透露，美國於 1949 年 5 月底收到一份非常秘密的、好像是周恩來的「通知」，內容主要談及兩點：第一，當時中共高層分成對立的兩派，即以劉少奇為首的親蘇派及以周恩來為首的親美派；第二，周恩來希望得到美國的實質援助，並想推動中美關係的建立。美國外交檔案文件稱這個「通知」為「周恩來的外交行動」。其實，所謂對立的兩派並不存在。從 1990 年代解密的前蘇聯機密檔案得悉，該項「行動」其實預先徵得斯大林的同意。當時國民黨在美國援助下對中國解放區實行經濟封鎖，中共因此採取此項「行動」，藉以緩和他們所面對的經濟困難。不過，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決定暫時拒絕與中共打交道，並打算等待適當時機來臨才作回應。毛澤東遂於 6 月 30 日正式提出「一邊倒」的親蘇外交方針。還需注意的是，蘇聯一直與國民黨政府保持正常的外交關係，直到 1949 年 10 月 2 日，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第二天，才宣布承認新中國。

1.2.2 「一邊倒」的實際意義

「一邊倒」的實際意義需要從三方面來說明：

第一，中國支持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socialist camp）；

第二，中國對抗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陣營（imperialist/capitalist camp）；

第三，中國反對任何不結盟（non-aligned）（中立〔neutral〕）國家，並支持人民武裝鬥爭（當時亞洲的不結盟國家，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取得獨立的「民族資產階級政權」〔national bourgeois regimes〕）。

「一邊倒」的基本邏輯是：凡是不支持我們就是反對我們。

1.2.3 「一邊倒」的具體表現

「一邊倒」體現於：

（1） 中國與蘇聯締結《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1949 年 12 月 16 日，毛澤東抵達莫斯科（Moscow），準備和斯大林展開會談。作為新中國的最高領導人，毛自信會把一個足以振奮人心的平等條約帶回去。故當斯大林問他想要什麼時，毛直截了當地說他想要一個「既好看、又好吃」的東西——毛的意思是雙方最好能夠達成一個既有體面、又有實質的條約，但斯大林聽了半天還是不得要領。實際上，斯大林從開始的一刻就不肯改動他與蔣介石於 1945 年簽訂的那個《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會談因此陷入僵局，直到 1950 年 1 月初斯大林改變了主意，會談始露曙光。1 月 20 日，中國國務院總理兼外長周恩來抵達莫斯科，會談取得較快的進展。不過，雙方在協定新條約時，斯大林又開出不少苛刻的條件，例如：他答應派遣大批專家來華，但中方須支付相等於中國一般工作人員十倍的薪金；中國獲得三億美元的低息貸款，但須在 14 年內把所有過剩的工業原料統統賣給蘇聯；中國又獲得蘇聯幫助建立航空、造船、石油及有色金屬工業，但這些工業須要實行合營；還有，中國須確保東北和新疆地區沒有第三國勢力存在。由於中國急需蘇聯的援助，故只好在各方面作出讓步。無可否認，中國也從新條約得到很多好處。除了取得實質的技術和經濟援助外，中國更與蘇聯結成長達 30 年的軍事聯盟；換言之，新條約給予中國一個軍事保護傘，好讓它專心搞建設。蘇聯還答應於 1952 年底交還它通過 1945 年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在中國東北取得的所有權益。可以說，新條約對中蘇雙方皆有利。

1950 年 2 月 14 日中、蘇兩國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歸根結底，是一條防止美日勾結的反美軍事條約。對中國來說，它得來不易。1956 年，毛澤東向蘇聯駐華大使尤金（P.F. Yudin）透露，斯大林當年不想簽約，故意回避他、不見他，使他很生氣，所以他決定呆在別墅裏，以致有關他被斯大林軟禁的流言不脛而走。1957 年，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告訴毛澤東當年斯大林在別墅裏安裝了竊聽器，令毛更加憤怒。毛因此向赫魯曉夫進一步透露，他和斯大林吵了好幾次架，其中一次，斯大林把電話掛斷了，之後便派人來請他去參觀，他說沒興趣，還說他現時的任務只有吃飯、睡覺、拉屎三樣，繼而拍起桌子來，大罵

斯大林王八蛋，目的就是要來者回去告訴斯大林，他呆在莫斯科沒事辦多麼不高興。毛澤東曾在不同場合對人說，他和斯大林在莫斯科經歷了一場鬥爭。值得注意的是，中蘇分裂後，毛澤東在批判蘇聯時並沒有指責蘇聯對中國援助不足，而是猛烈抨擊蘇聯領導人在援助中國的問題上顯得不可一世。

(2) 中國參與「抗美援朝」戰爭（又稱「朝鮮戰爭」或「韓戰」）。

1948 年 8 月 15 日，美國支持朝鮮南半部成立以李承晚為首的大韓民國，造成南北分裂。9 月 9 日，北半部成立以金日成為首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並得到蘇聯支持。自此，南北嚴重對峙，武裝衝突不斷，終於在 1950 年 6 月 25 日爆發內戰。

四個月後，即 1950 年 10 月 25 日，中國「人民志願軍」渡過鴨綠江，投入「抗美援朝」戰爭。中國為何在大局未定、百廢待舉的關鍵時刻出兵朝鮮？這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下文將闡明中國介入朝鮮戰爭的由來，藉以解開疑團。

1949 年 3 月，金日成在莫斯科首次提出武力統一南北朝鮮的設想。斯大林明確表示，除非北朝鮮受到進攻，否則「你們不應當進攻南部」。

4 月下旬，金日成秘密訪問北平，強調武力解決南朝鮮問題的迫切性。毛澤東勸金日成等待中共打敗國民黨、統一中國後才動手，並說這樣的時候不會太久。金日成此行的唯一收穫是得到一項保證：若北朝鮮受到進攻，中國會給予實際援助。

1950 年 1 月 12 日，美國國務卿艾其遜（Dean Acheson）發表聲明，表示美國的防衛線既不包括台灣，也不包括南朝鮮，故此美國不會為了保護這些地方採取直接的軍事行動。這個聲明自然壯了金日成及毛澤東的膽子——金要武力統一朝鮮；毛要武力「解放台灣」。

金日成急不及待要搶先解決統一朝鮮的問題。3 月 30 日至 4 月 25 日，金日成秘密訪問了莫斯科，期間向斯大林表明他有足夠能力統一朝鮮。由於蘇聯情報系統剛好得到了麥克阿瑟將軍（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給華盛頓

(Washington)的一份秘密報告，建議若南北朝鮮發生衝突，美國不要進行干涉，斯大林因此相信，統一朝鮮的時機已成熟。但斯大林要金日成首先把計劃告訴毛澤東，並說如果毛同意，他不會有反對意見。

5 月 13 日，金日成到達北京，通報了他與斯大林會談的結果。毛澤東從蘇聯駐華大使羅申 (N.V. Roshchin) 處得悉金日成的說法屬實後，覺得除了同意斯大林的意見外別無選擇。15 日，毛對金說，他原來是想首先「解放台灣」，再解決朝鮮問題的，但既然統一朝鮮的問題已經在莫斯科得到批准，他也同意首先統一朝鮮，只是擔心美國會干預這項行動。當金斷然說美國參戰「幾乎不可能」時，毛告誡金說：「帝國主義的事，我做不了主，我們不是他們的參謀長，不能知道他們心裏想的是什麼。……帝國主義不過三八線，我們不管；如果過了三八線，我們一定打過去」。

6 月 25 日，朝鮮戰爭爆發了。27 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命令美軍直接參戰，同時宣布台灣未來地位尚未確定，並命令第七艦隊 (the Seventh Fleet) 進駐台灣海峽，阻止任何對台灣的進攻，由此引起了「台灣問題」。毛澤東「解放台灣」的計劃，因此告吹，無怪他後來批評金日成開戰「是百分之百的錯了」，完全是「盲目冒險」。

北朝鮮人民軍起初節節勝利，但自 9 月 15 日美軍登陸仁川以後，人民軍便節節敗退。9 月底，美軍直搗三八線。10 月 1 日，美國公然向北朝鮮政府發出最後通牒，要它無條件投降，同時準備越過三八線。面臨嚴峻形勢的金日成，只好向中國求助。10 月 3 日，周恩來約見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 (K.M. Pannikar)，請印度轉告美國，如美軍越過三八線，中國要管。但美國無視中方警告；10 月 7 日，美軍越過三八線，並向中朝邊境進逼。

自 10 月初，毛澤東一連召開數次緊急會議，商討應對辦法。他吃驚地發現，幾乎所有中央領導人對出兵朝鮮都持懷疑和反對的態度，而軍隊領導人幾乎一致對同美軍作戰表示沒有把握。誠然，新中國的財力、物力和軍力並不足以支持它與美國在朝鮮半島上決一雌雄，況且中國在當時最關注的問題畢竟是「解放台灣」

而非朝鮮的統一，無怪出兵朝鮮不獲支持。但毛有別的考慮：第一，他曾對金日成許過諾，說「帝國主義……如果過了三八線，我們一定打過去」，現在美軍已越過三八線，他必須履行諾言；第二，中國不出兵，他根本沒法向斯大林作交代；第三，他慣從宏觀的戰略角度分析局勢，認為美國這次干預朝鮮內戰又同時把台灣海峽中立化是其霸權主義的反映；既然美國在亞洲有擴張野心，它勢必與中國交戰，等待美國向中國攻擊倒不如及早與它一戰於中國境外。毛最終說服了中共中央出兵援朝，條件是蘇聯為中方軍隊提供空中掩護。

10 月 8 日，周恩來和林彪飛抵莫斯科商談有關中國「抗美援朝」事宜。由於斯大林拒絕馬上提供空中掩護，雙方最後只好決定放棄北朝鮮，讓金日成及其政權和軍隊退到中國東北地區去。但讓金日成在東北建立流亡政府，把美軍帶到邊境來，是中共中央最不願見到的局面。中國的主要重工業大多集中在東北，而為這些重工業提供能源的水力發電廠，都建築在鴨綠江邊，倘若發電廠受到破壞，必嚴重影響新中國的整個經濟復蘇計劃，因此，中國絕不能讓戰火蔓延到邊境。有見及此，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出兵朝鮮的決定。

10 月 14 日，周恩來把出兵的決定向斯大林通報。斯大林這時又似乎改變了主意，答應以最快速度出動蘇聯空軍掩護中國「志願軍」入朝作戰。不過，周恩來在進一步的談判中發覺斯大林答應的空中掩護，只是掩護「志願軍」的後方而已。事至於此，已無別的辦法。10 月 25 日，中國「志願軍」渡過鴨綠江，正式介入朝鮮戰爭。

朝鮮戰爭一直延續到 1953 年 7 月（即斯大林逝世後四個月）才結束，它直接影響了新中國的對外關係。首先，「抗美援朝」的行動大大改變了斯大林對中國的態度：他首次承認中國並不是另一個南斯拉夫、承認毛澤東並不是「亞洲的鐵托」、承認中國所奉行的確實是「國際共產主義」。可以說，朝鮮戰爭促使中蘇關係步上一個新台階。恰恰相反，朝鮮戰爭使中美兩國陷於水火不相容的境地。中國參戰後，美國立即實施一套針對中國的政策，這包括在軍事上圍堵中國、在經濟上封鎖中國、在外交上不承認中國。直至 1960 年代末，中美關係始露轉機。

2009 年 4 月修訂版

此外，由於亞洲的不結盟國家在朝鮮戰爭中證明了它們不是美國的附庸，所以中國不再敵視這些中立國家，並於戰爭結束後爭取與它們建立友好關係。

(3) 中國支持東南亞及南亞人民的武裝鬥爭。

1950 年代初，中國公開宣布支持東南亞及南亞各地由共產黨領導的武裝鬥爭，這包括越南共產黨對法國殖民主義者的鬥爭、馬來西亞共產黨對英國殖民主義者的鬥爭，以及緬甸共產黨、菲律賓共產黨、印尼共產黨、印度共產黨對當地資產階級政權的鬥爭。實際上，中國除了首先承認由胡志明領導的越南民主共和國及遣派軍事顧問團到越南外，根本沒有能力為海外的反帝、反殖、反資武裝鬥爭提供實質援助。到 1954 年，由於中國確認「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所以中共停止了公開支持武裝鬥爭的言論（詳情見下文）。

1.3 推行溫和的外交路線：確認「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及發揚「萬隆精神」(1954—1957 年)

1.3.1 推行溫和外交路線的主要原因

朝鮮戰爭結束後數年，中國的外交路線在一定程度上趨向溫和。要了解這個轉變，首先要明白朝鮮戰爭對亞太地區地緣政治及戰略形勢所帶來的變化。誠然，中國推行溫和外交路線正是為了在新的地緣政治環境中爭取生存空間而對其外交路線作出了適當的調整。

自中國介入朝鮮戰爭以來，美國就分別與日本、南朝鮮、菲律賓及泰國簽訂了雙邊軍事防衛和援助條約。美國原本想拼湊一個東北亞聯盟，但由於日本與南朝鮮之間存在強烈的矛盾，這個計劃宣告流產。1954 年春，對新中國持敵視態度的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著力組織一個類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的軍事集團，藉以遏制共產主義在東南亞的擴張。同年 9 月，美國、英國、法國、澳大利亞、新西蘭、泰國、

2009 年 4 月修訂版

菲律賓、巴基斯坦八國代表於馬尼拉會議（Manila Conference）簽署了《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Southeast Asia Collective Defense Treaty）；締約國代表又於 1955 年 2 月在泰國首都曼谷正式成立「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組織」（SEATO，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1954 年 12 月，美國又與台灣簽訂了《共同防禦條約》，將台灣納入美國的戰略防禦圈。

在四面楚歌的情況下，中國感到亟須廣交朋友，以求突破美國及其盟友的軍事圍堵。基於上述原因，亞洲的不結盟國家自然成爲中國要爭取的對象。如前所述，中國當初不止不信任和敵視這些不結盟國家，還公開支持企圖推翻它們的武裝鬥爭。惟朝鮮戰爭使中國改變了它對不結盟國家的態度。當美國在聯合國提出譴責中國爲「侵略者」（aggressor）的動議時，印度和緬甸一起投了反對票，而印尼與巴基斯坦則棄權；又當聯合國表決對中國實行「禁運」（embargo）的美國提案時，印度、巴基斯坦、緬甸及印尼皆棄權。上述行動充分反映出這些不結盟國家真正能夠堅守中立，不受大國指揮。朝鮮戰爭結束後，中國終於調整了它對東南亞及南亞不結盟國家的政策，力圖與它們建立友好關係。爲了達到這個目的，中國不再公開宣稱它支持該地區反資產階級政權的武裝鬥爭了。

1.3.2 開展溫和外交路線的里程碑

1954 年 4 月 29 日，中國和印度簽訂了《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並一起確認「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即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及和平共處）。自此，中國的對外關係進入了一個短暫的溫和時期。

「和平共處」的基本邏輯是：不反對我們就是支持我們。

當時選擇站在中國和印度一邊的東南亞和南亞國家包括緬甸、錫蘭、柬埔寨及印尼。泰國、菲律賓、巴基斯坦則參加了「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組織」，成爲美國的盟友。

2009 年 4 月修訂版

1.3.3 日內瓦會議

1954 年 4 月下旬，中國國務院總理兼外長周恩來率團往瑞士參加日內瓦會議（Geneva Conference），這是新中國首次參加大型國際會議。日內瓦會議原本為解決朝鮮戰爭遺留下來的問題而召開，但由於胡志明正在領導越南人民擺脫法國殖民主義的桎梏，並於 5 月初在奠邊府大敗法軍，與會國遂轉向集中討論解決印度支那問題。

胡志明決定要好好地把握奠邊府戰役為他帶來的歷史契機，因此，他要求在解決越南問題的同時，一起解決老撾和柬埔寨問題；換言之，他想趁機把越南的勢力擴展到鄰近的老撾和柬埔寨。然而，蘇聯當時不想得罪美國和法國，而中國又剛剛公開表示支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蘇中雙方因此規勸胡志明放棄在老撾和柬埔寨那裏攫取利益的計劃。胡迫於形勢，只好就範。

日內瓦會議的停戰協議規定，越南以北緯 17° 線為臨時軍事分界線；此線以北為越南人民軍集結地區，以南則為法國軍隊集結地區。又根據會議的最後宣言，與會國保證「尊重越南、老撾和柬埔寨三國的民族獨立、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並對其內政不予任何干涉」；法國軍隊將從印度支那三國撤軍；越南將在 1956 年 7 月舉行全國自由選舉。胡志明相信，他到時會在全國普選中取得勝利並統一國家。惟美國自 1954 年底便向南越吳庭艷政權提供軍事援助。吳因獲美國撐腰，遂以南越沒有在日內瓦協議上簽字為借口，拒絕同北越進行任何關於普選的協商。普選計劃結果胎死腹中，而越南一直處於分裂狀況，到 1975 年才得以統一。

1.3.4 萬隆會議

1955 年 4 月，印度、巴基斯坦、錫蘭、緬甸及印尼這五個「科倫坡計劃」（Colombo Plan）的成員國在印尼萬隆主辦了首次大型的亞非會議，即萬隆會議（Bandung Conference）。出席這次會議總共有 29 個國家，包括 15 個反共國家、12 個中立國家及兩個共產國家（中國和北越）。蘇聯表示不高興，因為它沒有被

邀請出席會議。

會議開始時，有某些國家的代表別有用心地提醒與會者，要特別關注共產主義的威脅，令會場氣氛一度緊張起來。代表中國的周恩來則開宗明義地指出，「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而不是來吵架的」，「是來求同而不是來立異的」。他用耐心聆聽各方的意見，又幫助調解與會國之間的糾紛，終於贏得各國代表團的普遍讚揚，並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當時一般亞非國家對中國的猜疑。有關這次會議，值得特別注意的是：

第一，中國在是次會議上與泰國、菲律賓、巴基斯坦這三個《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組織》成員（即美國的盟友）達成諒解並建立友誼；

第二，中國在是次會議上與印尼簽訂了《關於雙重國籍問題的條約》，規定「凡屬同時具有中國和印度尼西亞兩國國籍的成年人，應在條約生效後兩年的限期內，根據本人自願的原則，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和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國籍中選擇一種國籍」，由此解決了有關華僑雙重國籍（即雙重效忠）的問題；

第三，周恩來在閉會前一天（4 月 23 日）發表聲明，聲稱中國願意就緩和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進行談判，包括舉行國際會議或中美直接會談。該聲明全文如下：「中國人民同美國人民是友好的。中國人民不要同美國人民打仗。中國政府願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討論緩和遠東緊張局勢的問題，特別是緩和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問題。」這是新中國第一次公開表明它願意跟美國用談判方式來解決問題。

總而言之，中國在萬隆會議上的表現標誌著中國正在實行溫和的外交路線。但中國對美國的態度基本上沒有改變，它只是作出了策略上的調整，以符合強調友好、團結、合作及維護世界和平的所謂「萬隆精神」而已。由此可見，中國的外交策略具有高度的靈活性。4 月 26 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表示不排除與中國進行雙邊談判。從 1955 年 8 月起，中美兩國先後在日內瓦和華沙（Warsaw）斷斷續續地舉行了長達 15 年的大使級會談，主要討論緩和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問題。兩國雖未達成協議，卻為中美兩國政府保持了一條聯繫渠道。

1.4 赫魯曉夫上台與中蘇分歧的出現（1955—1957 年）：中國是否仍然倒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

斯大林逝世後，蘇聯掀起了新一輪權力鬥爭。1954 年，蘇共中央委員會和部長會議決定，由赫魯曉夫率領政府代表團訪問中國。9 月 29 日，代表團抵達北京。在訪問期間，赫魯曉夫為了博取中共對他的支持，答應為中國提供更多技術、經濟及軍事援助，致使中蘇關係登上另一個新台階。返國後，赫魯曉夫旋即向他的政敵展開攻擊，並於 1955 年初鞏固了他的政治地位。

1.4.1 蘇共「二十大」的召開

1956 年 2 月 14—25 日召開的蘇共「二十大」，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里程碑，也是中蘇關係的一個轉捩點。1963—1964 年中蘇公開大論戰期間，中共把中蘇兩黨的分歧開始追溯到那次代表大會，並指出它是蘇共領導走上「修正主義」道路的第一步。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在開會期間甚至在閉會後的三數年間皆未嘗作出上述批評。

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期間的言論的確引起了廣泛的震蕩。他首先出乎意料地在會上宣布，蘇聯的外交路線將以「和平共處」（peaceful co-existence）、「和平過渡」（peaceful transition）及「和平競賽」（peaceful competition）三項原則為依歸（這三項原則，即是後來被中共抨擊為「修正主義」的「三個和平」）。赫魯曉夫解釋說，核時代的來臨已使列寧（Vladimir Lenin）的「戰爭不可避免」（inevitability of war）學說變得過時，原因是核武器不懂得尊重階級鬥爭的法規，它只會不加區別的毀滅一切，因此，現今人類如不選擇和平共存，就會遭到全體滅亡的命運。他又解釋說，由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不一定需要經過激烈的階級鬥爭，用非暴力的議會政治形式達到社會主義是可以的；至於帝國主義（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陣營的對抗，則應採取經濟競爭而非軍事競爭的方法來解決，顯而易見，赫魯曉夫把蘇聯的利益放在首要地位。他提出「和

2009 年 4 月修訂版

平共處」及「和平競賽」，主要是因為他急於緩和蘇美的緊張關係，以防止核災難在蘇聯發生；他提出「和平過渡」，主要是因為他想得到鐵托的支持（1948 年，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人鐵托因主張通過議會政治達到社會主義，被斯大林驅逐出社會主義陣營）。就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前途而言，赫魯曉夫的新路線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影響的。

赫魯曉夫的出人意表之舉，還不止於此。大概是為了爭取曾遭斯大林清算的人的支持，赫魯曉夫於 2 月 24 日深夜至 25 日凌晨突然向蘇共代表宣讀了一份全盤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Secret Speech），並分別向幾個大黨的代表團負責人提交了該份報告的副本。3 月 16 日，《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的駐東歐國家記者披露了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大反斯大林的消息。6 月，美國中情局（CIA,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更泄露了「秘密報告」的全文，令舉世震驚。

當時毛澤東對赫魯曉夫的做法既喜又怒——喜是因為赫魯曉夫打破了思想的束縛，使大家可以公開批評斯大林；怒是因為他認為赫魯曉夫獨斷獨行及打倒一切的做法，沒有顧全共產主義運動的大局。最重要的一點是，「秘密報告」使毛心底裏相信赫魯曉夫這個人缺乏革命道德、信不過，正如他後來再三批評赫魯曉夫說：「你從前那麼擁護（斯大林），現在總要講一點理由，才能轉過這個彎來吧！理由一點不講，忽然轉這麼一百八十度，好像老子從來就是不擁護斯大林的，其實從前是很擁護的。」赫魯曉夫在斯大林死後不到三年就搞「非斯大林化」，毛自然覺得赫魯曉夫立了個壞榜樣。

1.4.2 中共對「非斯大林化」的回應

中共對「非斯大林化」的態度，可見於《人民日報》兩篇社論，分別是 1956 年 4 月 5 日發表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與同年 12 月 29 日發表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兩篇社論並沒有直接批評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只說明中共認為對斯大林要三七開，即須承認斯大林的功過是「七分功勞、

三分錯誤」。

當時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對斯大林錯誤性質的看法，也產生了分歧——蘇共中央認為這是斯大林個人品質和個人崇拜的問題；歐洲共產黨一般認為這是斯大林獨裁和民主退化的問題；毛澤東則認為這是肅反擴大化的問題，是好心犯錯誤的結果，屬認識上的問題。至此，各兄弟黨可謂各唱各調了。

1.4.3 中共對東歐「波（蘭）匈（牙利）事件」的回應

受到赫魯曉夫大反斯大林的影響，長期受制於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Stalinism）的東歐國家紛紛爆發改革運動。改革派一方面要求「自由化」（liberalization），另一方面要求蘇聯少管別國的內政。1956 年 10 月，波蘭和匈牙利反蘇浪潮高漲，形勢急轉直下，這個發展當然並非赫魯曉夫始料所及。10 月中旬，正當赫魯曉夫準備出動蘇軍鎮壓波蘭改革派之際，毛澤東通過蘇聯駐華大使尤金向蘇方宣布，中共堅決反對蘇聯武裝干涉波蘭，又提出協商解決問題。10 月下旬，經過蘇、波、中三國共黨的代表團在莫斯科輪流雙邊會談後，一度十分緊張的波蘇關係終於告一段落。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雖然反對蘇聯武裝干涉波蘭內政，他卻反對波蘭改革派摒棄「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這個提法。

10 月底，匈牙利改革派上台，要求蘇聯撤走駐軍。由於反蘇情緒達到難以控制的地步，赫魯曉夫遂下令撤兵。改革派政府獲得通知後，竟宣布匈牙利退出「華沙條約組織」（Warsaw Pact），取消一黨專政，實行多黨制。消息傳到北京，毛澤東認為匈牙利已出現了反革命動亂，況且，匈牙利退出「華沙條約組織」將會破壞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他因此建議蘇軍留在匈牙利，盡快恢復秩序。結果，赫魯曉夫取消撤兵決定，並把改革派趕下台。

中共對解決波、匈問題採取了截然不同的態度，這是因為它認為「波蘭事件」與「匈牙利事件」的性質有異。「波匈事件」也反映了當時中共對蘇聯的立場——它一方面承認蘇聯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領導地位，另一方面卻反對蘇聯干涉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內政，認為每個社會主義國家都有權走自己選擇的、適合自己國

情的道路（到 1956 年，中國已發現照搬斯大林那套發展模式行不通，它開始尋找一條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

1.4.4 《國防新技術協定》的簽訂

毛澤東沒有公開批評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的做法，除了不想令赫魯曉夫尷尬及不想破壞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外，大概還有一個實際的考慮——他希望蘇聯幫助中國（他亦知道只有蘇聯能夠幫助中國）走核武器道路。赫魯曉夫起初不肯幫中國搞核武器。他解釋說，既然蘇聯已為中國提供了核保護傘，中國便無需擔心受到核打擊。毛卻鍥而不舍，因為他相信鞏固國家主權必須擁有核武器。

1957 年夏天，蘇共領導層發生了莫洛托夫（V.M. Molotov）、馬林科夫（G.M. Malenkov）等人聯合起來反對赫魯曉夫的所謂「反黨集團」事件。風波平息後，赫魯曉夫決定把滋事者開除出黨，並得到中共中央表態同意。為了答謝中共對他的支持，赫魯曉夫遂於 1957 年 10 月與中國政府簽訂了毛澤東期待已久的《國防新技術協定》。根據這一協定，蘇方將於 1961 年底前向中國供應原子彈樣品和生產原子彈的技術資料。由此可見，儘管中蘇兩黨在若干問題上已出現了分歧，整體關係還是良好的。

1.4.5 莫斯科會議

1957 年 11 月，毛澤東出席了莫斯科會議（Moscow Conference），那是毛第二次也是他最後一次出國。會議召開前，國際上發生了兩件令毛大為鼓舞的事：其一是蘇聯在 8 月成功試射了世界上第一枚洲際彈道導彈（ICBM,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其二是蘇聯在 10 月成功發射了世界上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進入太空軌道。對毛來說，這是了不起的成就，足以證明蘇聯是社會主義陣營中名副其實的領袖。

當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正好出現了多元化的趨勢，有需要解決以誰為首的問題。毛澤東在會上公開支持赫魯曉夫，並當眾對赫魯曉夫說：「好花還要綠葉扶，

你這朵花比我毛澤東好看，我們這次就是來扶助你的。」毛所謂「扶助」，就是要把赫魯曉夫扶到「班長」（毛澤東的說法）的位置上來。11月14日，毛澤東第一次向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發言時，就公開承認中國還不具備當「班長」的實力：「我們中國是爲不了首的，沒有這個資本。我們經驗少。我們有革命的經驗，沒有建設的經驗。我們在人口上是個大國，在經濟上是個小國。我們半個衛星都沒有拋上去。這樣爲首就很困難，召集會議人家不聽。」

11月18日，毛澤東作了他在大會期間的最後一次講話，講了「形勢」及「團結」兩個問題。當日所有發言者都按照預先提交的講稿進行發言，只有毛澤東發言時沒有講稿；所有發言者都走到主席台前站著講話，只有毛澤東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發言。

講到「形勢」時，毛澤東指出蘇聯在戰略核武器上的成就已改變了世界上兩個敵對陣營的力量對比，他說：「我認爲目前形勢的特點是東風壓倒西風，也就是說，社會主義的力量對於帝國主義的力量佔了壓倒的優勢。」當他講到要壓倒「美帝國主義紙老虎」時，公開主張與美國「和平共處」的赫魯曉夫就顯得尷尬。意想不到的，毛這段講話令許多在場人士不安。首先，「東風壓倒西風」這句話，令敏感的俄國人立刻想到在他們東面的、日趨壯大的中國。從俄國人的習慣上來說，「東風壓倒西風」也是不好的一種形容，因爲只有西風才能夠爲他們帶來雨水，東風帶來的只是乾燥的空氣，對農作物不利；說「東風壓倒西風」，亦難免使他們想起成吉思汗所帶來的「黃禍」。至於毛澤東說「美帝國主義」和原子彈都是「紙老虎」，沒有什麼好怕，「極而言之，死掉一半人，還有一半人」，這個觀點對大部分與會代表來說，是難以接受的。

講到「團結」時，毛澤東說：「社會主義陣營必須有個頭，這個頭就是蘇聯。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必須有個頭，這個頭就是蘇聯共產黨。」。惟毛又引用了中國俗話「蛇無頭而不行」，令到與會者不滿，因爲多數歐洲國家的共產黨人認爲蛇是不吉利的象徵；他們對毛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比喻成蛇，很不以爲然。

最後，會議還是達成《莫斯科宣言》這個共同綱領而宣告圓滿結束。毛澤東

祝酒時再次勸勉大家要團結，並當眾對赫魯曉夫朗誦了一首中國古詩以表手足之情：「兩個泥菩薩，一起打碎囉。用水一調和，再來做兩個。我身上有你，你身上有我。」

有論者指出，中共在斯大林死後即與蘇共不和，原因是毛澤東相信自己比蘇共的新領袖赫魯曉夫更具資格當社會主義陣營的首領。這個說法很值得商榷。在 1950 年代中期，毛澤東深知中國實力有限，沒有蘇聯幫助不行，更遑論領導社會主義陣營與美國抗衡。毛確實不喜歡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的所作所為，甚至瞧不起他，對他懷有戒心。但二人發生爭執、關係變得惡劣，則是莫斯科會議以後的事。因此直到 1957 年底，中蘇關係雖然出了些矛盾，但大致上還是良好的；用毛的話來說，是「十個指頭中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即是「有一個指頭不同，其他九個指頭是相同的」。

2. 從中蘇關係開始惡化到「反美排蘇」（1958—1965 年）

2.1 中蘇分裂的過程：從交惡開始到赫魯曉夫下台（1958—1964 年）

中蘇關係惡化，實際上始於 1958 年。下文將簡單論述中蘇交惡的緣起及中蘇分裂的過程（論述以 1964 年 10 月赫魯曉夫下台為下限）。

如前所述，中國在 1950 年代中期實行溫和的外交路線，為整個亞太地區帶來了比較寬鬆的政治氣氛。萬隆會議後，由於美國積極介入南朝鮮、印尼、老撾、西藏、黎巴嫩等地的政治及軍事活動，國際形勢頓時緊張起來。相對來說，美國在台灣地區的活動，最令毛澤東不放心。自美國與台灣於 1954 年 12 月簽訂《共同防禦條約》以來，蔣介石便不斷調整軍事部署，在兩三年間把台灣三分之一的軍隊（大約 10 萬人）屯駐在金門和馬祖這兩個與福建省近在咫尺的島嶼上。1957 年 1 月，美國宣布撥款 2,500 萬美元在台中建立空軍基地；5 月，又宣布在台灣裝置「鬥牛士」（Matador）地對地中程導彈，瞄準中國大陸。這些充滿敵意的舉動使毛澤東感到中國的安全大受威脅，進而認定溫和路線只會產生適得其反的效

果。1958 年 2 月，主張及負責執行溫和外交路線的周恩來受到毛的批評，遂失去外交部長一職，由陳毅繼任。

面臨日益嚴峻的形勢，毛澤東自然希望得到蘇聯的幫助，然而，赫魯曉夫不單不拔刀相助，反而在這個關鍵的時刻向中國提出兩個要求，令毛覺得他是個喜歡落井下石、混水摸魚，完全沒有道義的人。中蘇交惡，亦因此而起。1958 年 4 月 18 日，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Rodion Malinovsky）寫信給中國國防部長彭德懷，表示希望雙方合作，用四年時間在中國南方建設一座長波電台，以便蘇聯核潛艇艦隊在太平洋地區活動時，可以通過這個長波電台與莫斯科聯繫。馬利諾夫斯基建議，長波電台由蘇方出資 7,000 萬盧布，中方出資 3,000 萬盧布，共同建設，共同使用。由於毛澤東認為外資介入必會損害中國的主權，因此，在 6 月 12 日的覆函中，彭德懷明確表示中方同意建台，但全部費用由中方負擔，即該台的所有權屬於中國，技術方面則請蘇聯專家協助，建成後由中蘇共同使用。馬利諾夫斯基稍後又來電報，堅持蘇聯也出錢，但避談所有權問題，令毛感到惱火。

7 月 21 日，蘇聯駐華大使尤金緊急會見毛澤東，說赫魯曉夫希望中國考慮與蘇聯建立一個共同艦隊。原來中國海軍司令部的蘇聯顧問，在早些時候提議中方要求莫斯科幫助，提供核潛艇以加強海軍力量。周恩來因此致信赫魯曉夫，希望蘇聯能夠在生產核潛艇和快艇方面為中國提供技術幫助。蘇方認為蘇聯海軍軍港受自然條件的限制，戰時容易被敵人封鎖，相反，中國海岸線很長，條件很好，故希望中國能考慮與蘇聯建立一支共同艦隊，把蘇聯的核潛艇編入這支艦隊，越南也可以參加。對毛澤東來說，長波電台也好，海軍潛艇也好，都是所有權的問題，沒有什麼好談。毛對尤金說，倘若赫魯曉夫真的想談，就叫他自己來談好了。

赫魯曉夫於 7 月 31 日抵達北京，並展開了一連四天的會談。令人感到詫異的是，在 7 月 31 日舉行的第一次會談就發生了毛澤東怒斥赫魯曉夫的尷尬場面。據悉，當時赫魯曉夫正在忙著解釋共同艦隊的「共同」就是「共同商量商量的意思」，毛突然大發雷霆，伸手一指，指著赫魯曉夫的鼻子大聲說：「什麼叫共同商

量，我們還有沒有主權了？你們是不是想把我們的沿海地區都拿去？」毛跟著將手一劃，劃出中國海岸的弧形，語帶譏嘲的說：「你們都拿去算了！」赫魯曉夫眼見毛發火，隨即轉了個話題道：「毛澤東同志，我們能不能達成某種協議，讓我們的潛水艇在你們的港口加油，修理，短期停泊，等等？」「不行！」毛斷然拒絕了這個請求，把手向外一拂說：「我不想再聽到這種事！」赫魯曉夫還是沉住氣，用討價還價的語氣道出另一項建議：「爲了合情理，假如你願意的話，毛澤東同志，你們的潛艇也可以使用我們的摩爾曼斯克（Murmansk）基地。」毛不假思索說：「不要！我們不想去你們的摩爾曼斯克，不想在那裏搞什麼名堂，也不希望你們來我們這兒搞什麼名堂。」他又好像給赫魯曉夫上課一樣繼續說道：「英國人、日本人，還有別的許多外國人已經在我們的國土上呆了很久，被我們趕走了。赫魯曉夫同志，最後再說一遍，我們再也不想讓任何人利用我們的國土來達到他們自己的目的。」赫魯曉夫一向脾氣暴躁，每以強者作風示人，這次因有求於毛而竭力克制愠怒，然而心底裏必然已冒出火來。儘管8月1—3日的會談如常舉行，但由於雙方的一把手心存芥蒂，自然談不出甚麼實質的東西來。

赫魯曉夫離開中國的第20天，即1958年8月23日，人民解放軍福建前線部隊開始炮轟金門。這是毛澤東所作的決定，但此行動並非表示毛馬上要「解放台灣」，而是要打擊一下國民黨和美國的氣焰，同時希望對美國在黎巴嫩的軍事行動起一些牽制作用，以支援亞拉伯人民的鬥爭。由於中共這次軍事行動是衝著美台《共同防禦條約》去的，赫魯曉夫的反應顯得異常謹慎。爲了避免承擔戰爭風險，赫魯曉夫不作任何表態，直至蘇聯外交部長葛羅米柯（Andrei Gromyko）秘密訪京並獲悉中方不會和美國打仗後，赫魯曉夫才於9月7日向美國放了一個空炮，裝模作樣地宣布：任何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侵略也就是對蘇聯的侵略，蘇聯一定要援助中華人民共和國保衛領土主權的完整。至此，中蘇同盟可謂名存實亡。

1959年6月20日，赫魯曉夫以蘇美兩國正在討論簽署禁止核試驗條約爲借口，中斷供應原子彈樣品及生產原子彈的技術資料給中國；換言之，赫魯曉夫單

2009 年 4 月修訂版

方面撕毀了中蘇兩國早先簽訂的《國防新技術協定》。

7 月 18 日，赫魯曉夫在波蘭公開批評「大躍進」屬「左傾」，是「冒險主義」；又於 12 月 1 日在匈牙利提出社會主義各國「必須對錶」（即是說各國要向莫斯科看齊），藉以影射及攻擊中共所推行的「大躍進」。

9 月 9 日，赫魯曉夫通過塔斯社（TASS）發表關於中印邊境衝突的聲明，聲稱蘇聯對中印邊境發生衝突表示「遺憾」，還進一步說該事件是「那些企圖阻礙國際緊張局勢緩和的人搞的」。無可置疑，赫魯曉夫的目的是要討好印度和美國（中國和印度於 1959 年因兩件事情再度交惡——其一是印度總理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於是年 3 月底為逃離西藏的達賴喇嘛及其 15,000 個支持者提供政治庇護；其二是兩國邊境糾紛再起，終於 8 月下旬爆發武裝衝突）。

9 月 15—28 日，赫魯曉夫訪問了美國，並在美國總統休假地戴維營（Camp David）和艾森豪威爾（Dwight Eisenhower）舉行高峰會談。對中共來說，赫魯曉夫在訪美前撕毀《國防新技術協定》及發表塔斯社聲明，分明是做給艾森豪威爾看的，是罔顧中方利益的行爲。9 月 30 日，赫魯曉夫抵京，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舉行正式會談。據悉，赫魯曉夫在會談的過程中抱怨中共把中國與印度的關係搞壞了，又用教訓的口吻告誡中共不要「用武力去試探資本主義制度的穩定性」，結果，赫魯曉夫與中國外交部長陳毅吵翻了天。毛澤東在爭論過程中沒有多說話，到會議快結束時就對赫魯曉夫說：「我聽了半天，你給我們扣了好些頂帽子：沒有看著達賴，沒有團結尼赫魯，不該打炮（炮轟金門），大躍進也不對，就是說我們『左』。那麼我也送你一頂帽子，就是右傾機會主義。」會議終於不歡而散。赫魯曉夫一到西伯利亞，就公開批評中共，甚至影射毛澤東是「好鬥的公雞」。毛也在內部批評赫魯曉夫說：「赫魯曉夫很幼稚。他不懂馬列主義，易受帝國主義的騙。他不懂中國達到極點，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確的情報，信口開河。……他有兩大怕：一怕帝國主義，二怕中國的共產主義。他怕東歐的各黨和世界各共產黨不相信他們而相信我們。他的宇宙觀是實用主義，這是一種極端的主觀唯心主義。他缺乏章法，祇要有利，隨遇而變。」

2009 年 4 月修訂版

1960 年 4 月，中共中央發表了三篇有關列寧的理論性文章，說明列寧主義（Leninism）沒有過時，並指名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義」，矛頭其實指向蘇共中央（這三篇文章後來印成小冊子，用《列寧主義萬歲》做標題公開發行）。

5 月，毛澤東與到訪的朝鮮勞動黨領導人金日成談話時公開批評蘇共當時大力宣傳的「和平共處」、「和平過渡」及「和平競賽」。

6 月，中蘇兩黨的代表分別在北京召開的世界工聯理事會會議與在布加勒斯特（Bucharest）召開的羅馬尼亞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發生爭執。赫魯曉夫甚至對在布加勒斯特開會的中國代表團說：「如果你們要斯大林，我們可以把他的屍體搬到你們北京去，供你們欣賞」。當中國代表團團長彭真在大會上批評赫魯曉夫搞「父子黨」時，赫魯曉夫非常激動，二人你一句我一句，你來我往地吵起來。

7 月，蘇共中央停止在蘇聯出版發行中方俄文刊物《友好》周刊，又通知中共中央蘇聯政府將於一個月後撤走所有援華專家及終止所有協定。這全是赫魯曉夫個人的決定。對正在面臨「大躍進」失敗的中共來說，消息傳來猶如晴天霹靂，連當時的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Stepan Chervonenko）也感到通知難以理解，半信半疑地向赫魯曉夫求證，並指出這個做法有違國際慣例。惟赫魯曉夫一意孤行，按照原定計劃撤走專家 1,390 人，撕毀 343 個專家合同及廢除 257 個科學合作項目。毛澤東只好無奈地說：「這正好迫使我們自力更新。壞事一定會變成好事。不是嗎？」「中國沒有專家，人會死光，我就不信！」

從 1961 年春開始，赫魯曉夫對亞爾巴尼亞不斷施加壓力——3 月，蘇共代表在華沙條約國首腦會議上通過一個點名譴責亞爾巴尼亞的決議；5 月，蘇聯宣布終止對亞爾巴尼亞的一切援助；8 月，華沙條約國首腦會議拒絕亞爾巴尼亞出席，實際上把亞爾巴尼亞開除出華沙條約國組織。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有十足的理由支持亞爾巴尼亞：第一，兩國皆認為南斯拉夫領導人鐵托搞的一套是「修正主義」，故雙方都不滿赫魯曉夫跟鐵托修好；第二，亞爾巴尼亞是產銻國家（銻是製造原子彈的一種必須原料），同亞爾巴尼亞保持良好關係實有助中國發展核武器；第三，亞爾巴尼亞瀕臨地中海，有助中國在北非擴展其影響力。

7 月底，蘇共中央發表了它準備提交蘇共「二十二大」討論的《蘇共綱領草案》。這個所謂「現代的共產黨宣言」宣稱，蘇聯已徹底消滅了所有階級，將成爲「全民國家」，蘇共亦將成爲「全民黨」。

10 月，蘇共「二十二大」在莫斯科召開。一如中國代表團所料，赫魯曉夫在會上公開點名大肆攻擊亞爾巴尼亞。但中方沒有估計到赫魯曉夫又來一次大反斯大林，在會上大聲疾呼要把斯大林遺體遷出列寧墓，焚屍揚灰。赫魯曉夫還當眾宣布，蘇聯將在二十年內實現共產主義。周恩來以中國代表團團長身分致詞時表明，中方不同意赫魯曉夫在兄弟黨面前大反亞爾巴尼亞的做法，他隨後率團提前離會，以表示對赫魯曉夫的不滿。蘇共「二十二大」以後，毛澤東斷定整個蘇共已走上「修正主義」的道路；赫魯曉夫則控訴中國搞「分裂主義」。

1962 年 2 月，中共中央聯絡部長王稼祥（王稼祥是 1949 年 10 月中國派駐蘇聯的第一任大使）給周恩來、鄧小平、陳毅等人寫了一封信，提出包括緩和中蘇關係在內的一系列大膽的建議。3 月，王進一步提出，在支持別國革命問題上要「實事求是，量力而行」。6 月，又更進一步提出了爭取國際和平環境的外交思想，主張堅持和平共處、絕不輸出革命。8 月，毛澤東尖銳地批評了王稼祥提出的那些主張。後來毛又公開批評黨內有少數同志主張「三和一少」（即對帝國主義和氣一點、對反動派和氣一點、對「修正主義」和氣一點、對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革命鬥爭少援助一點），並說這是「修正主義」的路線。

10 月 20 日，印度軍隊在中印邊界的東段和西段同時向中國方面推進，釀成中印邊界戰爭（中國稱之爲「自衛反擊戰」）。24 日，中國政府發表聲明，建議中印雙方軍隊後撤 20 公里，脫離接觸，重開談判，和平解決中印邊界問題。但是印度政府拒絕了中方的建議。奇怪的是，蘇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Pravda*）於 25 日一反常態地發表社論支持中國的立場。原來赫魯曉夫剛好被美國發現他把中程導彈秘密運進了古巴而陷於進退兩難的境地，故一時希望得到中國的支持。由於美國總統肯尼迪（John F. Kennedy）下令封鎖古巴，又下令 20 個中隊的空降部隊整裝待發，準備襲擊正在古巴建造的導彈基地，赫魯曉夫只得接受肯

尼迪的要求，於 28 日將導彈撤走，結束了這場「古巴導彈危機」(Cuban missile crisis)(蘇聯稱之為「加勒比海危機」(Caribbean crisis)，古巴則稱之為「十月危機」(October crisis))。美蘇核對峙危機解決後不久，中國政府單方面宣布 11 月 22 日零時起在中印邊界全線停火，並且從 12 月 1 日起主動撤回部隊，撤到 1959 年第一次發生中印邊境衝突前實際控制線中國一側。中印戰爭隨即結束。12 月 12 日，赫魯曉夫又突然改變立場，從支持中國變為指責中國，暗示仗是中國打起來的，而不是印度入侵中國的領土。中國則批評赫魯曉夫把導彈運進古巴是「冒險主義」，將導彈撤走是「投降主義」。中蘇關係不斷惡化。

1963 年 3 月，中共提出「中間地帶」理論。當時所謂「中間地帶」，是指在政治上處於「主要敵人」美國與社會主義各國之間的國家，是中國要爭取過來的對象。中共自此不再公開用「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及「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陣營」這兩個提法。

7 月，蘇聯、美國及英國簽署了《部分核禁試條約》，遭到中國反對。所謂「部分核禁試」，即禁止在大氣層、外層空間和 underwater 進行核試驗，但不禁止在地下進行核試驗，而當時只有簽署國擁有足夠技術條件搞地下核試驗。中國政府因此發表聲明，揭露該條約旨在鞏固蘇、美、英三國的核壟斷地位；聲明又重申中國政府主張全面、徹底禁止和銷毀核武器的立場。

同月，《真理報》發表了《蘇共中央給蘇共各級黨組織和全體黨員的公開信》，藉以說明蘇共及中共兩黨分歧的由來和實質。《公開信》把分歧追溯到 1960 年 4 月中共發表《列寧主義萬歲》三篇文章，又指出分歧的實質是中共在很多重大問題上採取了一條「獨特的路線」。由於《公開信》對中共和中共領導人指名道姓進行惡毒的攻擊，毛澤東因此認為中共在還擊時也要指名道姓，毫無保留地罵個痛快，他說：「從蘇共『二十大』到 1963 年 7 月，我們比較被動。現在我們轉入了反攻，大有大鬧天宮的勢頭，打破了他們的清規戒律。」從 1963 年 9 月到 1964 年 7 月，中共中央用《人民日報》編輯部和《紅旗》雜誌編輯部的名義，先後發表了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九篇文章(簡稱《九評》)，使中蘇公開大論戰達

到了白熱化的程度。《九評》的第一篇文章指出，蘇共及中共兩黨的分歧，並不是像《公開信》裏所講的是從 1960 年 4 月開始，而是早在 1956 年 2 月蘇共「二十大」時就開始了。據中共的說法，那次代表大會是蘇共走上「修正主義」道路的第一步，是赫魯曉夫背叛馬列主義的開始。中共這樣說，是要對各兄弟黨講清楚它是爲了捍衛馬列主義的基本原則而與蘇共鬧翻的。至此，中共正式公開挑戰蘇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領導地位。

1964 年 1 月，中共進一步闡釋「中間地帶」理論，並提出「兩個中間地帶」的說法：「第一個中間地帶」是指亞非拉發展中的國家；「第二個中間地帶」則指所有發達國家，美國除外。中共在中蘇大論戰期間發表「兩個中間地帶」理論，大概有兩個目的：第一，中國當時正與西德、日本等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擴展貿易關係，更與法國建立邦交，故特地提出「第二個中間地帶」的概念爲上述政策提供理論上的依據；第二，中國要喚起亞非拉發展中國家的注意，使它們明白到「第一個中間地帶」已成爲當前世界的抗美中心。儘管毛澤東一直主張採取強硬路線對付美國，但他從沒有輕視美國的實力；對毛來說，最有效的抗美戰略就是在全球的範圍內打一場基於「自力更生」原則的民族獨立解放戰爭，亦即中共在 1960 年代中期鼓吹亞非拉國家打的「人民戰爭」。

10 月 14 日，蘇共中央委員會解除了赫魯曉夫蘇共中央第一書記的職務，由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繼任。15 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又解除了赫魯曉夫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的職務，由柯西金（Aleksei Kosygin）繼任。16 日，中國第一個原子彈裝置試爆成功，中國政府把核試爆成功和赫魯曉夫下台的消息一同刊登在 17 日《人民日報》的第一版上。

2.2 分析赫魯曉夫下台前中蘇分裂的原因

下文從意識形態、國家利益、領袖個性及作風三個層面探討中蘇分裂的原因：

2.2.1 中蘇兩黨在意識形態上的分歧

探究中蘇分裂的原因，斷不能漠視意識形態所起的作用。毛澤東畢竟是個重視意識形態的人，這解釋毛為何一方面厭惡斯大林看不起中國，但另一方面卻始終維護他，因為毛認為斯大林反對帝國主義夠堅決，一生忠於革命的精神。相反，毛瞧不起赫魯曉夫，主要是因為他認為赫魯曉夫背叛了馬列主義，是個不折不扣的修正主義分子。無怪中共花了很大工夫，在《九評》中引經據典，全面地、有系統地揭露赫魯曉夫如何歪曲、背叛馬列主義。儘管如此，意識形態的分歧並沒有直接導致兩黨分裂，否則中共已早於 1956 年對赫魯曉夫所提出的「和平共處」、「和平過渡」及「和平競賽」大興問罪之師。

2.2.2 中蘇兩國利益衝突

毋庸諱言，任何國家的對外政策都是以維護本國利益為依歸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蘇聯成為國際舞台上的「超級大國」，其勢力範圍之廣，與另一個「超級大國」——美國不相上下；在此情況下，蘇聯政府自然以維持現狀 (*status quo*) 為己任，因為只有這樣做才最符合蘇聯的利益。剛好相反，中國在 1950 年代被孤立、圍堵，其國際地位與它的傳統大國身分並不吻合；在此情況下，中國政府自然不滿現狀，並以改變現狀為目標，因為只有這樣做才最符合中國的利益。當時極力阻止中國改變現狀的國家是美國，所以中國視美國為其「主要敵人」，並期望其盟友——蘇聯幫它對抗美國。不言而喻，中蘇關係在很大程度上乃取決於蘇聯對美國的態度。赫魯曉夫一上台，就把蘇聯的外交路線建基於所謂「和平共處」及「和平競賽」兩大原則上，令毛澤東大失所望。對毛而言，赫魯曉夫的基本外交路線就是「蘇美合作，主宰世界」。但 1950 年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實際上卻是一條反美條約，由於赫魯曉夫不支持甚至反對中國跟美國對抗，該條約遂變得毫無意義。歸根結底，毛澤東把赫魯曉夫看成是屈服於帝國主義壓力的懦夫，他認為赫魯曉夫為了討好美國就罔顧中國的利益。從這個角度看來，中蘇分裂只是時間上的問題而已。

此外，毛澤東深信「革命時外援，勝利後援外」是「國際主義」的基本精神。

他又相信援助是無償的，不應計算利潤——「要買、要還賬，這沒有道理，不是國際主義」。在蘇聯援助中國的問題上，毛極為不滿，這並不關乎援助多少的問題，而是因為毛認為俄國人恃強凌弱，指手劃腳，對中國人態度傲慢並頗多戒備，事事向中方保密，更常常借機佔中國人的便宜。他批評俄國人自私自利，不重兄弟手足之情，不從「國際主義」的大義出發，搞「老子黨」和「大國沙文主義」。毛在這方面的不滿，實構成中蘇分裂的深層原因。

2.2.3 中蘇兩個一把手（毛澤東與赫魯曉夫）的不和

毫無疑問，在中蘇關係當中，兩國一把手的個人性格和作風是起了決定性作用的，這是因為當時的中國和蘇聯皆處於一人專政的時代。

在中國方面，毛澤東不論在「一線」或「二線」，始終是黨最高的主宰，他的意志決定了黨的命運，也決定了中蘇關係的最終走向。毛自尊心極強，易敏感，愛衝動，不大掩飾其內心感情及愛好。他極好勝，脾氣又不好，愛爭吵，無怪赫魯曉夫把他看成是一隻「好鬥的公雞」。毛曾當面對赫魯曉夫說：「我們的原則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為天下先。但是誰要欺負我們，那是不行的。誰都不行！」毛認為赫魯曉夫有能力幫助中國，但實際上一再罔顧中國的利益，兼且混水摸魚，因此，他必須報復，誰也改變不了他的主意。

至於蘇聯方面，斯大林一向傲慢多疑，但由於他處理外交問題相當小心謹慎，故蘇中雙方雖然常有爭執，惟始終沒有決裂。而赫魯曉夫的性格則與毛澤東同樣過於鮮明，易衝動，心直口快，甚至口沒遮攔。他又常常因心血來潮做出驚人的舉動，最典型的例子包括：在聯合國大會上大發脾氣，脫下皮鞋敲桌子；先答應向中國供應原子彈的生產技術，後來又下令停止向中國提供早已準備好了的原子彈樣品；私自下令撤回所有在華專家；把導彈秘密運進古巴，被發現後又把導彈撤走。無可否認，赫魯曉夫往往自作主張、一意孤行，做了不少傷害了毛澤東和中國人感情的事；他倒台後，蘇聯領導人也承認了這一點。

2.3 勃列日涅夫上台與中蘇矛盾的激化

赫魯曉夫倒台使中蘇關係出現一線曙光。1964 年 11 月 5 日，周恩來率領中國黨政代表團抵達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 47 周年慶典。他們參加了 6 日舉行的慶祝大會及 7 日上午在紅場（Red Square）舉行的閱兵式和群眾游行，各項活動都在友好氣氛中進行。但是，在 7 日晚的招待會上卻發生了一宗意想不到的嚴重事件，使中蘇關係猶如雪上加霜。據悉，在招待會進行過程中，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突然對中方團員賀龍說：「不要讓任何鬼來擾亂我們的關係。不要在政治上耍魔術，不要讓任何的毛澤東，任何赫魯曉夫再妨礙我們。我們已經把赫魯曉夫搞掉了，現在該你們把毛澤東搞掉。」周恩來獲得通知後，馬上向勃列日涅夫正式抗議，並指出中方不能接受這種挑釁。經派人調查後，勃列日涅夫向周恩來解釋說，馬利諾夫斯基喝醉酒了，酒後失言，請中方不必介意。惟周恩來鄭重地回應說，這根本不是什麼酒後失言，而是酒後吐真言，說了他心裏的話。當天晚上，中共中央就收到了中國代表團發來的急電，報告此事的經過。毛澤東一直懷疑蘇共領導企圖搞掉他，現在可以說是證據確鑿；毛因此提出要繼續批判「沒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還要「公開論戰一萬年，少了不行」。

1965 年 2 月，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訪問越南路過北京，先後與周恩來及毛澤東進行了會談。當時正值美國「地毯式」轟炸越南北方，柯西金返國後就建議中蘇兩國在越南搞「聯合行動」，並提出兩項具體建議：第一，中國准許蘇聯通過中國上空向越南運送援助物資；第二，在中國西南興建機場以方便援助越南。對這些明顯侵犯中國主權的建議，毛澤東自然感到惱火。至此，他完全明白到蘇聯的新領導人與赫魯曉夫如出一轍，喜歡混水摸魚、討兄弟國的便宜，無怪他斷然拒絕了所謂「聯合行動」的建議。

5 月，中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彭真訪問印尼時指出，蘇聯的總路線是「為美帝國主義反革命全球戰略服務」，「他們一定要把自己放在全世界人民反美統一戰線的外邊，同美帝國主義像棒打不散的鴛鴦一樣，難解難分，打得火熱。」這是中國領導人第一次公開表示，蘇聯不在「反美統一戰線」之內；換言之，中共

2009 年 4 月修訂版

已決定實行「反美排蘇」的外交路線。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毛澤東在當時仍然認為美國是中國及所有革命人民的「主要敵人」，而蘇聯只是起著「幫兇」的作用而已。到 1969 年 3 月「珍寶島事件」發生後，中共才把蘇聯視為「主要敵人」。

第 2 章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外關係（1966—1982 年）

1. 大轉折時代的外交路向：中國從「文化大革命」到改革開放初期的對外關係

按照中共的說法，除了 1966—1967 年外，1949 年後中國所奉行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上述那個短暫的時段，即是毛澤東發動紅衛兵奪權，結果導致全面內戰的時期。當時極「左」勢力（包括中央文革小組和造反派群眾）干擾外交活動，使中國的外交工作和聲譽受到嚴重的損害，更使中國被國際社會所唾棄而陷於孤立。在「打倒一切」的號召下，造反派紅衛兵擔當了衝鋒陷陣、大肆破壞的重要角色，無怪不少西方學者把中國在這個短暫時期的外交稱為「紅衛兵外交」（Red Guard diplomacy）。

1960 年代末到 1970 年代初，隨著紅衛兵運動的瓦解，中國的外交也逐漸回到正常的軌道上來。儘管當時的政局仍然動蕩不安、社會經濟仍然千瘡百孔、「左」傾思潮仍然到處泛濫；然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外交領域裏卻取得了戲劇性的突破和輝煌的成就——它不僅重返到世界舞台上，更於 1971 年 10 月成為中國在聯合國的唯一合法代表。由此可見，就算在那個「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年代，中共的對外政策也具務實和靈活的一面。這大概又與毛澤東對國防問題及國際戰略形勢特別關注不無關係。毛覺察到蘇聯的軍事擴張不單威脅中國，還削弱了美國的霸權地位，於是決定作出重大的策略調整，一方面盡力爭取修補、改善和拓展中國的對外關係，另一方面實行「聯美反蘇」。中美和好的公開化，又掃除了一些國家與中國發展外交關係的障礙。到 1976 年，和中國有邦交的國家已由「文化大革命」爆發前夕的 51 個增加到 111 個，這當然大大提升了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外交部文革紀實》的作者馬繼森問道：「為什麼毛澤東能改正極左外交的錯誤，而至死不能改正運動（「文化大革命」）的極左錯誤？」這是一個發人心省的問題（馬繼森女士於 1952—1969 年間任職中國外交部）。

到 1980 年代初，由於美、蘇兩個「超級大國」正處於勢均力敵的狀態，又

由於中國需要一個安定的國際環境來進行改革開放，因此，中共決定摒棄它習慣使用的「對抗性」(confrontational) 外交策略，即不再「聯蘇反美」或「聯美反蘇」，轉而實行不與任何一個「超級大國」結盟的「獨立自主」外交路線，旨在維持美蘇之間的均勢，以確保國際局勢繼續安穩下去。上述的轉變正好標誌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上一個舊時代的結束、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2. 「紅衛兵外交」與中國暫別國際舞台（1966—1967 年）

2.1 「紅衛兵外交」的特色

如前所述，1966—1967 年是一個不正常的外交時期。在極「左」派的干擾下，中國外交展示了兩項主要特色：

第一，無論在觀念上或在實際行動上，中國外交只為世界革命服務。不僅如此，當時紅衛兵還大肆宣揚「毛澤東思想最高、最高，北京是世界革命中心」，因為他們相信毛澤東思想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而中國則是現今世界上唯一真正的反帝反資中心。1966 年 10 月，中共中央批准把宣傳毛澤東思想和「文化大革命」作為中國駐外使領館的首要任務，實際上混淆了外交和革命的界限。在這種唯我獨尊心態的驅使下，紅衛兵要求中國承擔起領導世界革命的角色；他們又大反周恩來不許輸出革命的外交方針，強行向外國散發「紅寶書」(《毛主席語錄》、《毛澤東選集》) 和毛像章，更蓄意煽動海外華人在居住地滋事造反，結果引起了無數的外交糾紛，有些還在友好國家發生。無怪當時世界上只有亞爾巴尼亞一個國家對「文化大革命」表示贊同；

第二，在戰略上，中國向美蘇「兩面開弓」，甚至在全球範圍內「四面出擊」。當時紅衛兵熱切擁護剛於 1965 年出籠的「反美排蘇」外交路線，大呼「反帝必反修」(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必須反對蘇聯修正主義) 的口號。此外，紅衛兵把中國自 1949 年以來所執行的外交路線誣蔑為「向帝國主義投降，向修正主義投降，

向各國反動派投降，撲滅人民革命」的「三降一滅路線」；他們堅決執行所謂「三反路線」，即「打倒（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打倒（以蘇聯為首的）現代修正主義，打倒（以印度為代表的）各國反動派」。1967年1—8月，由於革命造反派鼓吹對外實行全面鬥爭，故發生不少遇事就鬥的情況，導致外交事件頻仍。如在該年2月，為了向剛在莫斯科發生的「紅場事件」進行報復，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策動百多萬革命群眾在蘇聯駐華大使館外日以繼夜地遊行示威（1月下旬，69名途經莫斯科返國的旅歐中國留學生在紅場上朗讀《毛主席語錄》，遭蘇聯軍警襲擊，結果30多名學生受傷，造成「紅場事件」）。隨後的4、6、7、8月，北京造反派群眾又製造了「三砸一燒」事件——砸印尼、印度、緬甸駐華大使館和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釀成嚴重的外交風波（英國雖然早於1950年已表示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但由於「英國代表在聯合國安理會及其他組織中竟繼續承認國民黨代表為合法」，而英國政府又未能澄清「英國香港政府對國民黨政府在港的官方代表、機關及其所屬的一切國家資財採取如何態度」，因此，中英建交談判一直拖下去。在此期間，英國沒有正式派大使（ambassador）來華，只派代辦（*chargé d'affaires*）。換言之，中英兩國一直處於「半建交」的狀態，直到1972年3月，兩國關係才升格為大使級全面外交關係）。

總括而言，「紅衛兵外交」使眾多國家與中國疏遠。在「文化大革命」爆發後的一年多時間裏，中國跟建交和「半建交」的51個國家中的大部分國家，先後發生外交糾紛，致使中國在國際舞台上陷於孤立。

2.2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外交部：造反派奪權始末

「文化大革命」中的外交部雖然逃不過被衝擊的命運，但是它在總理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可算是國務院系統中秩序最好的一個部。除了1967年8月19—31日這十多天外，外交部未曾陷於癱瘓。

周恩來確實花了大量心思和精力來保護外交部的領導班子，尤其是外長陳毅。他看清毛澤東支持造反派奪權，又深知不能與毛唱反調，所以公開表明他支

2009年4月修訂版

持造反派。周的策略，歸根結底，是以支持造反派來制約造反派，藉此減少他們的衝擊，把運動納入有序的軌道。故當外交部 200 餘個造反派於 1966 年 12 月下旬決定成立「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簡稱「聯絡站」）時，周恩來立即讓外交部常務副部長姬鵬飛傳達他支持「聯絡站」成立的指示。

1967 年 1 月，奪權運動席捲全國。爲了防止外交部以外的造反派奪權和擾亂外交部的事務，周恩來委託陳毅接見「聯絡站」代表，宣布支持「聯絡站」奪權，同時把外交部奪權限制在「領導運動，監督業務」的範圍內。所謂「監督業務」，即是由「聯絡站」在部、司兩級成立業務監督小組，參加研究及處理具體業務案件，並參與簽署上報的文件，而業務監督小組的參與亦僅此而已。外交部自此形成兩個系統——「文化大革命」運動和「業務監督」由「聯絡站」的造反派領導；日常外交工作仍然由以陳毅爲書記、姬鵬飛爲副書記的中共外交部委員會（簡稱部黨委）負責，這解釋爲何外交部的工作在造反派奪權後仍然正常進行。

2 月中旬後，形勢起了變化。起因是陳毅與一眾老師強烈批評「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的做法，捲入了當時所謂「二月逆流」的漩渦。陳毅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並成爲中央文革小組的批判對象。從 2 月 18 日到 3 月 18 日，陳毅被迫出席了七次所謂「政治生活會」，硬著頭皮聽批判。他兩次寫信求見毛澤東，但是遭到毛的拒絕。

到了 4 月，形勢急轉直下。外交部「聯絡站」先後通過了「炮轟陳毅」的聲明及「打倒陳毅」的口號。從這時開始直到 8 月，外交部造反派對陳毅的批鬥逐步升級。由於陳毅不能再領導外交工作，所以周恩來直接掌管了外交部的運動和業務。爲了順應時勢，同時保護陳毅，周只好一方面支持群眾組織批判陳毅，另一方面盡力防止批鬥場面失控。他親自過問批判的具體過程，如要求「聯絡站」先把控訴要點向他上報，以及將各大中小批鬥會的具體時間交由他安排。他還盡量抽空親自主持批陳大會，藉以控制場面，強調要先批判後定性，又命令警衛部隊保護陳毅進場離場，以防止群眾把陳揪走。

7 月下旬，爆發了第二次奪權運動，這次是激進造反派企圖從軍隊與周恩來

2009 年 4 月修訂版

的手中奪權。8 月 7 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召見「聯絡站」核心組的代表，對外交部造反派監督業務的辦法表示懷疑，並鼓勵他們「動」外交部的領導班子，徹底奪權。當時王力說：「你們一月份奪權，奪了多少權？業務監督權有多少？能監督得了嗎？部黨委班子沒有動吧？革命不動班子？！這麼大的革命，班子不動還行？爲什麼不能動一動班子？」「聯絡站」的激進派於是改組核心組和部級業務監督小組，將溫和派清除。16 日，激進派奪了政治部的權（當時叫「砸政治部」），並向周恩來建議改組外交部領導班子。就在這個關鍵時刻，具體說是 19 日，北京外國語學院「紅旗造反團」學生衝進外交部，封閉了部黨委辦公室，挾持了姬鵬飛、喬冠華兩名負責日常工作的副部長，奪了外交部的權。在同一天，佔領外交部的造反紅衛兵向英國政府發出具有「最後通牒」（*ultimatum*）性質的照會，要求香港當局在 48 小時內宣布取消對三家親中共報紙出版的禁令，並且釋放被關押的 19 名記者，否則一切後果由英國政府承擔。22 日，這些紅衛兵不顧周恩來的勸告，也不聽中央文革小組代表陳伯達的警告，闖進英國駐華代辦處，砸壞了辦公室內所有的東西，然後放火焚燒房屋。25 日，身在上海的毛澤東從周恩來處獲知紅衛兵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一事後，大爲不悅，並於翌日批評肇事者說：「至少是無知，也可能是壞人幹的」。毛又批評王力「八七講話」實在「極壞」，說王「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叫周恩來把他「抓起來」。王力就在當天被逮捕。隨後，奪權的紅衛兵也被逐出外交部。到了 9 月 1 日，外交事務在周恩來的領導下恢復正常。10 月 18 日，外交部召開全體大會，宣布周恩來一項緊急指示：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核心組有成員與外交部之外的「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有「直接間接的聯繫」（簡稱「五一六」的「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是第二次奪權運動中最激進的、煽動打倒周恩來的造反派）。由於「五一六」已被毛澤東打成「反革命」，「聯絡站」激進派核心組因受牽連而頓時瓦解。一場席捲全國的「清查五一六」運動隨即開展，而外交部則是頭號重災區——據 1972 年定案顯示，外交部的 3,000 個工作人員當中，一共抓了 1,700 名「五一六」，其中被周恩來批准定爲「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有 20 人。

3. 聯美反蘇：由中美和好到中美建交（1968 年－1979 年 1 月 1 日）

正當「文化大革命」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國際形勢起了重大的變化。上述變化可導源於兩個主要原因，其一是蘇聯在勃列日涅夫的領導下展開了全球性的軍事擴張，其二是美國在出兵越南後陷入了內外交困的窘境中。

3.1 蘇聯軍事擴張影響之一：中國決定「聯美反蘇」

自從勃列日涅夫上台後，蘇聯在擴充軍備方面速度愈來愈快、規模愈來愈大。由於勃列日涅夫提出既準備打核戰爭，也準備打常規戰爭的戰略方針，因此，蘇聯從 1965 年起就大增軍費以實現常規武器和戰略核武器的現代化。1965—1978 年間，蘇聯的實際軍費開支每年增加 8% 左右；最後五年約為 5%，即 1965—1973 年間每年的遞增率比 8% 還要高。

勃列日涅夫建立霸權的野心很快便見諸行動。1968 年 8 月 20 日，蘇聯揮軍進佔捷克，並封鎖了邊境，令舉世震驚。周恩來在這次事件發生後第二天就指出，蘇聯已經蛻變為「社會帝國主義」，其所奉行的是「霸權主義」，這個轉變標誌著國際政治上一個新歷史時期的開始。11 月 12 日，勃列日涅夫在波蘭講話時說，當東歐某一個國家的問題對「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安全」和「共同利益」構成「威脅」時，蘇聯就有權對這個「大家庭」成員採取「軍事」「措施」。蘇聯報刊隨即宣稱，「大家庭的利益」是「最高主權」，而一國的主權是有限的；「社會主義大家庭」有權「決定性地決定」「大家庭」成員的「命運」，「其中包括它的主權的命運」，這就是所謂「有限主權論」（theory of limited sovereignty）的由來。蘇聯大肆宣揚「勃列日涅夫主義」（Brezhnev Doctrine），大概是要為其佔領捷克的行動製造理論依據，但中共卻認為「勃列日涅夫主義」還包藏著更大的禍心，就是向外擴張，這當然包括大片的中蘇邊界地區。

中共對「勃列日涅夫主義」有這樣的理解，主要是因為當時中蘇邊境衝突已

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中蘇邊界糾紛雖自 1960 年中蘇交惡開始便頻頻發生，惟邊界問題的升級，很大程度上還是 1964 年開始的。1960 年 1 月至 1964 年 10 月，發生在中蘇邊界線上的糾紛共 1,000 餘起；1964 年 10 月至 1969 年 3 月，增至 4,189 起。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蘇共中央政治局在勃列日涅夫的領導下批准大規模調動蘇軍到中蘇邊界去；它又於 1966 年 2 月與蒙古人民共和國簽訂了具有軍事同盟性質的《蘇蒙友好合作互助條約》，還派遣軍隊協助蒙古鎮守中蒙邊界。這樣一來，過去那些在舊的邊界條約中含混不清的地段，很快就成了雙方軍隊發生磨擦的導火線。

1969 年 3 月，雙方軍隊終於在中蘇邊界東段烏蘇里江（Ussuri River）上的珍寶島爆發武裝衝突。據當年瀋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回憶，這是一場「自衛反擊戰」，是經過中央批准，早有準備的。「珍寶島事件」發生後，毛澤東認為中蘇大戰迫在眉睫，自始不止一次號召全國人民「要準備打仗」。4 月，中共九大召開，毛再次強調備戰的重要性。7 月，毛明確地說：「中央領導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顆原子彈就會死很多人，應該分散些」。8 月底至 9 月初，有消息說蘇聯正向東歐國家試探對中國實施核打擊的反應，西方報章又盛傳蘇聯將會對中國設在新疆羅布泊的核試驗基地進行空襲。在此情勢下，中共中央緊急發布文件，號召全國廠礦企業職工及城市居民立即開始「深挖洞、廣積糧」，以備核大戰之需。9 月 11 日，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在參加胡志明的葬禮回途中經過北京，與周恩來在北京機場作了三個半小時的重要會晤，並商定兩國談判代表團從 10 月 20 日起在北京舉行中蘇邊界談判。由於中方不少領導人（包括毛澤東在內）認為這次談判是蘇聯為其大舉侵略中國而放的煙幕，故此中共中央黨政軍領導人在談判開始前幾天已全部疏散完畢。儘管戰爭沒有到來，毛澤東到 1970 年卻仍然反復強調，要「用備戰的觀點，觀察一切，檢查一切，落實一切」。

這裏要特別指出，中共自 1969 年開始就把蘇聯視為其「主要敵人」（俗稱「頭號敵人」）；換言之，在新的戰略形勢下，美國已變成了「次要敵人」。下文將簡單交代這個重大轉變的由來及其對中國之對外策略所產生的影響。

1969 年 2 月，美英報章有消息說蘇聯要出兵中國，而蘇聯又確實在遠東正在秘密進行軍事演習，這使一直深信蘇聯的戰略重心在歐洲的毛澤東感到難於理解。爲了集思廣益起見，毛委托四位老元帥——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研究一下國際問題」。老帥於 7、9 月完成了兩份書面報告，並在總結當前國際形勢時指出，「中蘇矛盾大於中美矛盾，美蘇矛盾大於美中矛盾」。毛對上述觀點表示贊同，於是作出了「聯美反蘇」的考慮和決定。可以說，四老帥是率先提出「打美國牌」這個設想的人。

毋庸置疑，中美和好對中國是有利的：第一，它能協助中國對抗蘇聯；第二，它能激化美蘇矛盾；第三，它能促使中國與美國及其盟友建立經濟和技術關係；第四，它能把台灣孤立於國際舞台上。「聯美反蘇」策略既定，中共宣傳機關便立即製造輿論，指美國在越戰中已經陷入泥潭，實不足以對中國或世界構成嚴重的威脅，這樣說無非是因爲中共需要爲其「聯美反蘇」的新戰略提供理論依據而已。

3.2 蘇聯軍事擴張影響之二：美國決定與中國改善關係

「聯美反蘇」只是中國的主觀願望，若非當時美國的霸權地位受到蘇聯挑戰，使其從自身戰略利益考慮希望與中國改善關係，則一直敵對僵持的中美關係恐難有所改變。因此，中美關係的改善，在某種程度上其實是源於美方主動的。

蘇聯擴充軍備及向外武力擴張固然動搖了美國的霸權地位，另一方面，美國出兵越南也給自己帶來巨大的困難。爲了取得軍事勝利，美國早於 1967 年就把 50 多萬軍隊投入越南戰場；整個戰爭則動用了美國近 1/2 的地面部隊，近 1/5 的空軍和 1/4 以上的海軍。軍費的支出，從 1965 到 1967 年，每年耗費 300 億美元；1964 到 1969 年，一共花費了 1,000 多億美元。由於要支出巨大的軍費，美國在財政上出現了龐大的赤字；1965—1969 年間，財政赤字達 361 億美元。惡性的通貨膨脹也出現了，使人民生活日益惡化。在這情勢下，反戰運動及由它帶動的青年運動、婦解運動、黑人運動等各種反建制運動都蓬勃起來。總之，美國社會

2009 年 4 月修訂版

在各種矛盾激化之下出現了嚴重的政治危機，最終導致民主黨總統約翰遜（Lyndon Johnson）下台。

共和黨的尼克松（Richard Nixon）於 1969 年 1 月成爲美國新總統。他早於 1967 年 10 月在《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提出與中國和解的主張；又在就職演說時，間接提到中美建立關係的問題。尼克松雖然面對蘇聯的威脅，但他沒有「聯中反蘇」的意圖；恰恰相反，尼克松因爲覺察到「蘇聯已經建立了一支可同美國媲美的核力量」（尼克松語），所以他想借「打中國牌」來緩和與蘇聯核對抗的緊張局勢。1969 年底，美蘇在芬蘭的赫爾辛基（Helsinki）開展了「第一階段限制戰略武器談判」（SALT I, 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Treaty Talks），惟談判很快就陷入僵局，原因是蘇聯堅決拒絕將攻擊性武器——如洲際彈道導彈（ICBMs,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s）和多彈頭分導再入飛行器（MIRVs, Multiple Independently-targetable Re-entry Vehicles）包括在談判清單中。爲這個問題困擾的尼克松相信，倘若他擺出與中國和好的姿態，將會大大提升美國在談判桌上討價還價的能力。事後證明他的想法絕對正確——美蘇限制戰略武器談判終於在 1971 年 5 月打破僵局、達成妥協，而勃列日涅夫更於尼克松公開宣布其訪華行程後，邀請尼克松在他訪華三個月後到蘇聯舉行高峰會議。由此可見，中美兩國希望與對方改善關係的出發點截然不同——中國想「聯美反蘇」，而美國則想借「打中國牌」來迫使蘇聯裁減軍備，以消除核戰的危機。儘管雙方的動機並不相同，然而，蘇聯所執行的全球性擴張政策畢竟把中美兩國帶到和好的道路上來。

在某程度上，中美和好實有賴尼克松不斷向中國發出改善關係的信號，而毛澤東和周恩來又能抓住時機，果斷地作出中美和解的戰略決策，對美方改善關係的信息作了積極的回應。以下將 1969—1971 年間中美和好與中國重返國際舞台的歷程作簡要的交代：

1969 年 7 月，美國國務院宣布在對華貿易及旅行等方面逐步放寬限制。

同月，尼克松在關島（Guam）記者招待會上承認美國在越戰中的「挫折」，

2009 年 4 月修訂版

並表示要「擺脫這場戰爭」。他又指出，美國從此要避免捲入亞洲另一場戰爭中，其唯一辦法就是讓美國在越戰結束後「繼續在亞洲起重要作用」。就上述的「重要作用」而言，尼克松解釋說：「我們必須避免採取使亞洲國家太依賴我們，以致使我們捲入類似我們在越南捲入的那樣衝突的政策」；「我們應該幫助他們，而不是發號施令」；「從現在起，我們只準備向那些願意承擔責任以自己的人力來自衛的國家提供物質和軍事經濟援助。」當時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曼斯菲爾德（Mike Mansfield）把尼克松這個新亞洲政策稱之為「尼克松主義」（Nixon Doctrine）。

9 月，美國從越南撤出軍隊 40,000 人。

12 月，美國停止派驅逐艦到台灣海峽巡邏。

1970 年 10 月，尼克松向《時代》（*Time*）雜誌記者發表談話時說：「如果說在我去世之前，有什麼事情要做的話，那就是到中國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夠去。」這是尼克松第一次公開表示願意訪華。

同月，尼克松分別委托到訪的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Yahya Khan）及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Nikolae Ceausescu）作為中間人提供幫助，使中美關係正常化。尼克松就此建立了所謂「巴基斯坦渠道」和「羅馬尼亞渠道」，並通過它們向北京轉達他訪華的願望。此外，在歡迎齊奧塞斯庫的宴會上，尼克松在祝酒時以總統身分第一次使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名稱，藉以作為「一個意義深長的外交信號」（尼克松語）。

12 月，毛澤東向應邀訪華的美國記者兼老朋友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表示歡迎尼克松訪華，他說：「如果尼克松願意來，我願意和他談，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當作旅行者來談也行，當作總統來談也行。總而言之，都行」；「我看我不會跟他吵架，批評是要批評他的。」

在 1970 年中，中國與五個國家建立了邦交——赤道幾內亞、埃塞俄比亞、智利、意大利及加拿大。

1971 年 3 月，美國國務院宣布取消對於使用美國護照去中國旅行的一切限

制。

4 月，中國邀請正在日本參加第 31 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的美國乒乓球隊訪問中國，開展了「乒乓外交」；這一消息引起廣泛的關注，人們稱之為「小球轉動了大球」。

同月，尼克松宣布結束已存在 20 年的禁止中美兩國之間貿易的法令。

7 月，尼克松在美國堪薩斯城（Kansas City）講話中提出「世界五大力量中心」論，他說：「在我們的時代裏，我們將看到五個超級經濟大國——美國、西歐、蘇聯、大陸中國，當然還有日本」；「對抗的時代過去了，我們正進入談判的時代。」

同月，尼克松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亨利·基辛格取道巴基斯坦，秘密到了北京與周恩來舉行會談；中國正式邀請尼克松於 1972 年 5 月之前訪問中國。

10 月，基辛格第二次秘密訪華，為尼克松訪問中國進行具體安排。

同月，第 26 屆聯合國大會表決亞爾巴尼亞提案，以 76 票贊成、35 票反對、17 票棄權獲得通過，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是中國在聯合國的唯一合法代表。這是聯大第 2758 號決議，它使美國提出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權，但同時保留「中華民國」代表權的所謂「雙重代表權」提案成為廢案（具體說，「雙重代表權」提案主張由中國在聯合國享有安理會席位，而由台灣當局繼續佔有聯合國大會席位）。

11 月，中美雙方發表公告，宣布尼克松將於 1972 年 2 月 21 日開始訪問中國。

1971 年，中國再與 15 個國家建立了邦交——科威特、土耳其、伊朗、黎巴嫩、塞浦路斯、尼日利亞、喀麥隆、塞拉里昂、盧旺達、塞內加爾、秘魯、聖馬力諾、奧地利、比利時及冰島。

要特別指出的是，尼克松自上任後就一直擺出友好的姿態及發出有重大意義的外交信號，這使中國領導人覺得他有誠意而樂意加快改善兩國關係的速度。

3.3 中美和好的里程碑：尼克松訪華（1972 年 2 月 21-28 日）

1972 年 2 月 21 日，尼克松抵達北京。他步下飛機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主動和周恩來握手，這無疑是另一個「意義深長的外交信號」。在其《回憶錄》中，尼克松解釋說：「我知道，在 1954 年的日內瓦會議上，周氏由於福斯特·杜勒斯拒絕與他握手，受到很大侮辱。因此，當我到了機梯最低一級時，我特地伸出手來，向他走去。我們的手一接觸，一個時代宣告結束，另一個時代宣告開始了。」

2 月 28 日，中美兩國政府在上海發表《中美聯合公報》（也稱《上海公報》）。《公報》打破了一般外交上的慣例，就是雙方在不掩蓋分歧的情況下各自闡明本身的立場和態度。

中國在《公報》中重申自己的一貫立場：「台灣問題是阻礙中美兩國關係正常化的關鍵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早已歸還祖國；解放台灣是中國內政，別國無權干涉；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必須從台灣撤走。中國政府堅決反對任何旨在製造『一中一台』、『一個中國，兩個政府』、『兩個中國』、『台灣獨立』、和鼓吹『台灣地位未定』的活動」。

美國又按自己的立場在《公報》中聲明：「美國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它重申它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關心。考慮到這一前景，它確認從台灣撤出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的最終目標。在此期間，它將隨這個地區緊張局勢的緩和逐步減少它在台灣的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

尼克松訪華反映出中國願意在「台灣問題」尚未解決之前就和美國改善關係，這可說是中國在處理外交事務上的一個大突破。《公報》的發表啓動了兩國關係正常化的進程。由於美國在「台灣問題」上仍不肯放棄其原有立場，加上其他原因，兩國關係正常化要到 1979 年 1 月 1 日才能實現（詳情見後）。1973 年 5 月，中美相互在對方首都設立聯絡處（liaison office）處理雙方有關事宜。

尼克松訪華更掀起了新一輪的建交活動。在 1972 年與中國建立邦交的國家

包括馬耳他、墨西哥、阿根廷、英國（由「半建交」升格為大使級外交關係）、毛里裘斯、荷蘭（由「半建交」升格為大使級外交關係）、希臘、圭亞那、多哥、日本、西德、馬爾代夫、馬達加斯加、盧森堡、牙買加、札伊爾、乍得、澳大利亞及新西蘭。

由於中共在過去的 20 年一直對內宣傳美國是其「頭號敵人」，因此，中美和好是一般人心目中意想不到及難以理解的事情。爲了釋疑，中共中央就在尼克松訪華前後向群眾宣傳，說中美和好實際上是由美方作主動的，中方只是應尼克松的要求才邀請他來訪，整件事情標誌著中國的勝利。此外，爲了給中美和好提供理論依據，中共中央就採用「統一戰線」的辯證邏輯向全國黨政軍機關交代對美國的新政策。按黨中央的說法，鑒於美國實行「兩面性的反動戰術」（即在侵略印度支那的同時又與中國進行協商），中國就採用「兩面性的革命戰術」（即對美國「既聯合、又鬥爭」）予以還擊。必須說明的一點是，就「統一戰線」的理論和實踐而言，當時美國並沒有被中共視爲其盟友，它只是「反蘇國際統一戰線」的一分子而已（當時中共仍視美國爲其「次要敵人」，是要爭取過來對付蘇聯的對象，但同時也是要繼續進行鬥爭的對象）。明白這個道理，才會明白爲何「聯美反蘇」這個務實的戰略仍可稱得上爲「革命外交」。

3.4 尼克松訪華後「美蘇中大三角」戰略關係下的中蘇、中美關係（1972—1977 年）

到了 1970 年代，蘇聯不僅在常規軍備方面保持對美國的優勢，在戰略核武器方面也逐漸趕上了美國（當時蘇聯在核武器的數量方面已趕上美國，又在核武器的質量方面縮小了差距）。由於美國在越戰中遭到挫折，且在世界各地皆有利益要保護，而蘇聯則繼續大力擴充軍備，決心向美國爭霸，因此，1970 年代中期的全球戰略格局就呈現了「蘇攻美守」的態勢。從 1970 年代初期到中期，中國在蘇聯軍事擴張的威脅下，不斷抨擊蘇聯霸權主義的行徑。按中方所揭示，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2009 年 4 月修訂版

第一，蘇聯大軍壓境，破壞中蘇邊界談判——自「珍寶島事件」發生後，勃列日涅夫在中蘇邊境部署了蘇聯近 2/5 的地面部隊，近 1/3 的坦克車，數千架飛機及數十個導彈基地，使 7,300 多公里長的中蘇邊界長期處於緊張狀態中；

第二，蘇聯在 1969、1973、1975、1976 年四次嘗試拼湊「亞洲集體安全體系」(Asia Collective Security Conference)，企圖圍堵中國——勃列日涅夫在 1969 年 6 月首次提出建立一個以蘇聯為首的集體安全體系，並要求東亞、東南亞、南亞地區的國家參加。他於 1973 年再次大肆宣傳「亞安體系」，又於 1975、1976 年鼓吹將「歐洲安全和合作會議（歐安會）」(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推廣到亞洲。中國認為蘇聯這個做法與美國在 1950 年代拼湊「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組織」來圍堵中國如出一轍。雖然沒有亞洲國家表示願意接受「亞安體系」（蒙古除外），但中國為了防範被圍堵感到極度困擾；

第三，蘇聯利用「華沙條約組織」威脅西歐的安全；

第四，蘇聯利用 1972 年在日內瓦（Geneva）舉行的「第二階段限制戰略武器談判」（SALT II）和 1973 年在維也納（Vienna）進行的「中歐裁軍談判」製造虛假的緩和現象，以掩飾其擴軍的實質——「第二階段限制戰略武器談判」涉及美蘇戰略核武器的問題，而「中歐裁軍談判」則涉及「華沙條約組織」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中歐的 200 萬常規兵力問題。中國指出，蘇聯所謂「裁軍」談判，實際上是為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核軍備競賽「制定新的競賽規則」而已；

第五，蘇聯利用 1973—1975 年在赫爾辛基和日內瓦召開的「歐洲安全和合作會議（歐安會）」與美國劃分勢力範圍——「歐安會」承認二次大戰後歐洲地區的政治地理現狀及「邊界的不可侵犯性」（the inviolability of frontiers）這個原則，亦即承認蘇聯在東歐的已有地位；

第六，蘇聯在越南統一後支持越南搞「地區霸權主義」（詳情見下節）；

第七，蘇聯把印度洋變為其波羅的海艦隊（Baltic Fleet）和太平洋艦隊（Pacific Fleet）的匯合點；

第八，蘇聯向非洲、中東、拉丁美洲國家售賣舊機器及武器以換取珍貴的原料和石油。

在蘇聯持續擴張的情況下，中美兩國理應加速達成關係正常化，但事實並非如此。恰恰相反，中美關係在尼克松訪華後出乎意料地呈現倒退的跡象，其主因有下列四點：

第一，如前所述，中美和好背後蘊藏著截然不同（甚至可以說是相互對立）的動機——中國想「聯美反蘇」；尼克松卻想借「打中國牌」以紓美蘇核戰危機，其動機與中國的「反蘇」意圖大相徑庭。尼克松很快便如願以償。1972 年 5 月，即美國在任總統歷史性訪華後三個月，尼克松就應邀到莫斯科與勃列日涅夫舉行高峰會議，完滿結束了「第一階段限制戰略武器談判」。同年 11 月，尼克松獲得連任並與勃列日涅夫開展「第二階段限制戰略武器談判」。當時中共對尼克松仍抱有期望，並預測在他第二個任期結束前可達成建交的創舉。1973 年 1 月 27 日，美國與越方正式簽署《關於在越南結束戰爭、恢復和平的協定》，理應有助中美關係正常化。惟當時美國的首要目標是和蘇聯建立新的緩和關係（*détente*），這意味著美國在「戰略大三角」（*strategic triangle*）中是以對華關係服從於對蘇關係為依歸的。基辛格又看透了中蘇兩國存著不可彌合的鴻溝，並認為中國除了依靠美國別無選擇。他在尼克松訪華後曾得意地說：「美國既可以繼續飲茅台，又可以飲伏特加了！」（“the US could continue to have our *mao tai* and drink our *vodka* too”）。而尼克松鑒於美蘇軍事實力正處於大致均衡的狀態，故於連任後視完成「第二階段限制戰略武器談判」為他的首要任務。1973 年 6 月，勃列日涅夫訪美，揭開了美蘇關係新的一頁。中共覺察到尼克松的意圖後，就對美國尋求與蘇聯緩和關係表示不滿，同時揭示蘇聯正在蓄意製造虛假的緩和現象：

第二，中共認為美國對解決「台灣問題」缺乏誠意。尼克松訪華後，美國並沒有盡快從台灣撤軍，它還准許台灣當局在美國開設更多所領事館及繼續向台灣售賣武器。對中共來說，這些做法違反了《上海公報》的基本精神；

第三，毛澤東重新評估全球戰略形勢後得出如下結論：蘇聯的戰略重心仍在

歐洲；儘管蘇聯霸權主義的威脅沒有減少，但蘇聯部署在中蘇邊界的軍力已達到了極限；中蘇爆發戰爭的可能性已減低。毛認為當前最值得關注的問題，反而是美蘇兩國領導人大肆渲染緩和現象及歐洲的「裁軍」談判，他恐怕從歐洲撤走的蘇軍會被增派到中蘇邊界去；

第四，中國與美國的政局在 1970 年代中期起了變化，直接影響兩國關係。先說美國。1974 年 8 月，尼克松因「水門事件」(Watergate affair) 被迫辭職。新總統福特 (Gerald Ford) 上任後即致力促進美蘇關係緩和。同年 11 月，福特專程來到鄰近中蘇邊界的符拉迪沃斯托克 (Vladivostok) (中國稱海參崴) 與勃列日涅夫舉行高峰會議。中共認為福特此行有屈服於蘇聯之嫌，故譏諷他執行「綏靖」政策。1975 年 7 月，福特赴「歐安會」簽署承認蘇聯在東歐已有地位的《赫爾辛基文件》(the Helsinki Accords)。12 月，美國國務院顧問赫爾穆特·索南費爾特 (Helmut Sonnenfeldt) 在倫敦召開的美國駐歐洲國家大使會議上發表講話，強調「美國的政策必須是爭取使東歐人同蘇聯的關係成為有機的關係 (organic relationship) 的演變」，以便「使它們 (蘇聯和東歐國家關係) 不會遲早發生爆炸而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據當時從巴黎發出一篇報道指出，這個「講話意思看來是，美國將把承認蘇聯今後長期統治東歐作為一個交換條件」，「再次確認世界劃分為不彼此對立的美蘇兩大勢力範圍」。中共對美國拋出「索南費爾特主義」(Sonnenfeldt Doctrine) 感到懊惱，因它恐怕蘇聯在東歐的勢力範圍獲得確認後便會肆無忌憚地向東推進。至於中國政局方面，由於周恩來在 1973 年底被江青指控對美國犯了「右傾投降主義」錯誤，兼且健康每況愈下，所以從此不再直接參與中美外交事務，由剛復出的鄧小平接管。為了避免給「四人幫」抓到攻擊借口，鄧在處理中美事宜時態度顯得頗為強硬，無怪中美關係正常化的進程停滯不前。儘管福特在 1975 年底應邀訪問中國，但中美關係並沒有因此而取得什麼進展。

總括而言，中美關係在尼克松訪華後不進反退。為了針對美蘇爭霸，周恩來在 1973 年 8 月召開的中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提出「反對美蘇兩個超級大國

的霸權主義」(即「反兩霸」)的新外交路線和戰略思想，中國在「反兩霸」的時候又側重反對蘇聯霸權主義。中共解釋說，蘇聯是一個後起的、依靠軍事力量的帝國主義大國，其侵略性和冒險性比美國更大，故當前世界主要的戰爭危險來自蘇聯。

1974 年 1 月，毛澤東在會見日本外相大平正芳時談到一個「反蘇國際統一戰線」的話題。他認為中國、美國、日本、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歐洲等大致處在同一緯度的各國要團結起來，另外亞非拉一大片亦都要團結起來，共同對付蘇聯霸權主義。這就是中國在 1970 代所提倡的「一條線」和「一大片」戰略方針——不只第三世界和第二世界的國家要團結起來，連第一世界的美國的力量也要利用起來，以集中對付蘇聯。

同年 2 月，毛澤東在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Kenneth Kaunda)時提出了「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為「反兩霸」的新外交路線提供了理論依據。毛說：「我看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他又說：「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亞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個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4 月，鄧小平在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上首次向與會各國代表介紹了這個新戰略思想。他說：「從國際關係的變化看，現在的世界實際上存在著互相關係又互相矛盾的三個方面，三個世界。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和其他地區的發展中國家，是第三世界。處於這兩者之間的發達國家是第二世界。」他還說：「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也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屬於第三世界。」

外界一般人都會覺得中國一方面主張「反兩霸」而另一方面又主張團結「兩霸」之一的美國實在費解。惟若對中共「統一戰線」的辯證法規——「既聯合、又鬥爭」有所認識，就不難理解毛澤東這套看似自相矛盾的戰略主張。毛慣用「矛盾」這個概念來分析局勢。他在分析 1970 年代初的國際形勢後有如下結論：第一，當前世界的「主要矛盾」乃第一世界同第二、第三世界的矛盾，故有需要「反兩霸」；第二，當前世界的「次要矛盾」包括第二同第三世界的矛盾、第二世界

2009 年 4 月修訂版

國家之間的矛盾、第三世界國家之間的矛盾，以及第一世界中兩個「超級國家」之間的矛盾。由於蘇聯是當前最危險的戰爭策源地，又由於美蘇之間存在矛盾，因此有需要利用這個矛盾，把美國納入「反蘇國際統一戰線」中，即是「聯美反蘇」。還有重要的一點是，鑒於美國是「兩霸」其中的一霸，所以有需要對它採取「既聯合、又鬥爭」的策略。

1976—1977 年，中美關係正常化的談判因雙方領導層起了變化而陷於僵局。1976 年是中國政壇多事的年頭——1 月，周恩來病逝；4 月，鄧小平被撤銷黨內外的所有職務；9 月，毛澤東逝世；10 月，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被逮捕。毛的繼任人華國鋒對外交事務不熟悉，又忙於鞏固自己的地位，無暇他顧。恰巧福特在 1976 年 11 月的大選中落敗，而繼任美國總統的是北京不熟悉的民主黨人卡特（Jimmy Carter）。1977 年，卡特在國務卿萬斯（Cyrus Vance）的影響下把尋求與蘇聯緩和關係及促成美越建交置於美國外交的首、次要地位。萬斯使他相信靠近中國只會激怒蘇聯及妨礙他完成「第二階段限制戰略武器談判」。是年 8 月，卡特派萬斯訪華，提出在台北設立美國聯絡處和在北京派駐一個正式外交使團的所謂「倒聯絡處」安排（“reverse-liaison-and-embassy” proposal），但立即遭到中方拒絕。剛復出的鄧小平批評萬斯的建議使中美關係倒退，並重申中美建交的三個先決條件——美國對台灣必須：第一，斷交；第二，廢約（即 1954 年 12 月美台簽署的《共同防禦條約》）；第三，撤軍。萬斯無功而返。另一方面，北京批評卡特政府對蘇聯採取「綏靖」政策。

3.5 走向中美建交（1978 年）

就在 1978 年，中美關係取得了突破性的發展，使兩國終於在 1979 年 1 月 1 日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促成中美建交的主要原因有下列三點：

第一，卡特不滿「第二階段限制戰略武器談判」進行了整整一年仍無絲毫進展，他又對蘇聯在安哥拉、扎伊爾、埃塞俄比亞及索馬里變本加厲地進行擴張感到擔憂。當時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提出與國務

卿萬斯截然不同的戰略觀點——他認為美國若跟中國結為戰略夥伴，便能收告誡蘇聯之效。卡特因沒法與蘇聯緩和關係，遂決定作出策略調整，把美中關係正常化置於當前的首要地位；

第二，中共決定實行開放政策，以實現「四個現代化」。1978 年 2 月，五屆人大第一次會議通過《發展國民經濟十年規劃綱要》，預算在 1977 年的基礎上加開百多個投資項目，並撥大量資金購買先進科技。日本和歐洲共同體隨即與中國簽訂貿易協定。據《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披露，在 1978 年上半年，「（歐洲）共同市場向中國的出口比美國的出口多 3 倍，日本向中國的出口（比美國）多 5 倍」。有見及此，美國一些財團就發起一個簽名運動，要求卡特實現美中關係正常化，以提升他們在中國市場的競爭能力。這迫使卡特下決心展開建交談判；

第三，中國因越南「地區霸權主義」日益猖獗而希望與美國建立戰略夥伴關係。越南在 1975 年統一後即開始實行其「印度支那聯邦」計劃；它首先在政治、經濟及軍事各方面加強對老撾的控制，繼而在 1977 年底入侵柬埔寨。1977 年，越南又推行排華政策——年初實施所謂「淨化」邊境地區方針，把以前從中國遷居越南的邊民成批驅趕回中國境內；年底更大批驅趕越南各地的華僑，並沒收他們的財產。它還蓄意挑起邊境衝突；據統計，由越南當局製造的邊界事件從 1975 年 439 次增至 1978 年 1,108 次。中國深知越南有蘇聯在背後撐腰，才敢肆無忌憚地在區內作出挑釁性的行爲。1978 年 11 月，越南與蘇聯簽訂具軍事同盟性質的《蘇越友好合作條約》。12 月 25 日，越南出動 10 萬多正規軍，對柬埔寨發動大規模的攻擊，並於 1979 年 1 月 7 日佔領了柬埔寨首都金邊。

可以說，《蘇越友好合作條約》的簽訂促使中美兩國迅速完成建交談判。1978 年 12 月 16 日，中美雙方同時在各自首都發表《中美建交聯合公報》。《公報》除載明兩國自 1979 年 1 月 1 日起互相承認並建立外交關係外，還宣布「美利堅合眾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範圍內，美國人民將同台灣人民保持文化、商務和其他非官方關係。」雙方又分別發表建交聲明。美國

2009 年 4 月修訂版

政府在聲明中表示，將在 1979 年 1 月 1 日中美建交時正式通知台灣：第一，「結束外交關係」；第二，「美國和中華民國之間共同防禦條約也將按照條約的規定予以終止」；第三，「在四個月內從台灣撤出美方餘留的軍事人員」。另一方面，中國政府在聲明中指出，「解決台灣回歸祖國，完成國家統一的方式，這完全是中國的內政」。1979 年 1 月 1 日，中美互相承認並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

1970 年代初中美和解也好，1979 年中美建交也好，雙方的決定基本上都是出於國防戰略的考慮，這是無可置疑的事實。

4. 走向「獨立自主（不結盟）」的外交路線（1979—1982 年）

4.1 中美建交後中美關係的曲折發展

1979 年 1 月 28 日—2 月 5 日，鄧小平應邀訪問美國。在訪問中，鄧指出「兩國社會制度不同不應妨礙彼此加強友好關係和合作」；又強調遏制蘇聯霸權主義不能只靠談判和協定，還需要有「更加現實的、更加切實可行的步驟」。無可否認，鄧此行給中美建交帶來一個美好的開端。

鄧小平返國後遂於 1979 年 2 月 17 日至 3 月 5 日向越南發動了一場「自衛反擊戰」。儘管中共聲稱這場懲越戰爭給「霸權主義」以沉重的痛擊，但中越戰爭並沒有解決越南與蘇聯勾結的問題，反而增加了越南對蘇聯的依賴；另一方面，越南又為蘇聯提供各種方便，如准許蘇聯艦隊利用它在金蘭灣（Cam Rang Bay）的港口設施。對中國而言，中越戰爭還導致兩個不良的後果：第一，中國動武引起了亞太區內普遍的恐慌，尤其影響了中國與「東盟」（ASEAN，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國家的關係；第二，戰爭對本已疲弱的國民經濟猶如雪上加霜，它迫使鄧小平宣布中國自 1979 年 6 月起進入三年經濟調整期，這無形中拖延了中國對外開放的進展。

中越戰爭剛結束，中美關係就受到嚴峻的考驗。

1979 年 3 月下旬，美國參眾兩院通過《與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並於 4 月 10 日由美總統卡特簽署，成為法律。該法規定美國要「保持抵禦任何危及台灣人民的安全、社會、經濟的訴諸武力的行為或其他強制形式的的能力」；「美國將向台灣提供使其能保持足夠自衛能力所需數量的防禦武器和防禦服務」。該法還規定，美台之間在 1978 年底以前有效的「條約」和「協定」，除美台《共同防禦條約》及有關「協定」外，一律繼續有效。4 月 28 日，中國政府向美方提交了抗議照會。7 月 6 日，美駐華大使館覆照說：「國會最後通過的美台關係法並不是在每個細節上都符合政府的意願，但它為總統提供了充分的酌情處理的權力，使總統得以完全按照符合正常化的方式執行這項法律。總統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簽署了該法案，使之成為法律的。美國政府一直努力確保該法措詞不損害美國同貴國政府達成的諒解，或迫使美國政府採取背離這種諒解的行動。」惟中方並沒有因上述解釋感到滿意。1980 年初，卡特還宣布將會繼續向台灣售賣武器，這使中方更加不滿。

令中國政府感到極度憂慮的，是共和黨保守右派分子里根（Ronald Reagan）在 1980 年 11 月大選中擊敗了卡特當選總統。里根一向以反共見稱於世。他還毫不諱言地暢談他強烈支持台灣的主張，如在競選時宣稱要與台灣重建「官方關係」。上任後，里根採取被人稱為「雙軌」的對華政策，即一方面表示要繼續發展中美兩國的正常關係，另一方面聲稱要「充份實施」《與台灣關係法》，包括向台出售前所未提供的高性能武器。中美關係於是急劇倒退。為了解決這一問題，中美兩國政府自 1981 年底起在北京經過多個月的談判，終於就美向台出售武器問題達成協議，並於 1982 年 8 月 17 日分別在北京和華盛頓同時發表聯合公報，即《八·一七公報》。美國政府在《公報》中聲明：「它不尋求執行一項長期向台灣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灣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數量上將不超過中美建交後近幾年供應的水平，它準備逐步減少它對台灣的武器出售，並經過一段時間導致最後的解決。」而中國外交部則就此聲明指出，「美國售台武器本來早就應該完全停止。由於考慮到這是一個歷史遺留的問題，中國政府在堅持原則的基礎上，同意分步驟予以解決。」（中共常常宣稱中美關係必須符合三個公報的基本精神，

它們包括 1972 年 2 月 21 日發表的《上海公報》、1978 年 12 月 16 日發表的《中美建交聯合公報》及 1982 年 8 月 17 日發表的《八·一七公報》。

4.2 中國重新評估國際形勢及調整對美蘇的政策

1980 年代初，日益不穩的中美關係迫使中國領導人重新評估全球戰略形勢，藉以制定最符合中國改革開放利益的對外方針。

據北京的分析，里根政府大增軍費以達到大肆擴充常規和戰略核武器的目的，結果是美國體現了自朝鮮戰爭以來最大規模的軍備擴張。里根還鼓勵其盟友日本增加國防預算，又設法使東歐共產主義國家產生「和平演變」。顯而易見，美國的勢力因「里根主義」(Reagan Doctrine) 的推行而迅速膨脹。恰恰相反，蘇聯因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支持古巴入侵安哥拉，以及在 1979 年 12 月揮軍侵佔阿富汗而須肩起沉重的經濟負擔，這對蘇聯本已疲弱的經濟猶如百上加斤。1982 年 3 月，病危的勃列日涅夫向北京表示蘇聯願意與中國緩和關係，澄清「勃列日涅夫主義」並不適用於中國，又重申支持中共對台灣的立場，這反映出蘇聯的勢力正在縮減。中共評估當前美蘇力量對比的結論是，兩個「超級大國」正處於一種基本勢均力敵的局面；換言之，1970 年代「蘇攻美守」的格局已不存在。

有見及此，中共認為中國作為國際舞台上的一股不輕的力量若與任何一個「超級大國」結盟，都會造成國際戰略格局的失衡，這既不利於國際局勢的穩定，也不利於中國的經濟發展。於是，中國決定執行對美蘇都不結盟的新政策，從此不參與兩個「超級大國」的任何紛爭，以保持當前均衡的國際局勢。中國副總理兼外長黃華雖在 1981 年 9 月仍然強調「對付蘇聯霸權主義的挑戰」，但到了 1982 年 8 月則強調「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不管這種霸權主義來自何方」，即是對兩個「超級大國」已不作明顯區分。9 月，中共十二大在北京召開。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在會上作報告時說：「中國決不依附於任何大國或者國家集團，決不屈服於任何大國的壓力。」12 月，中國五屆人大五次會議通過的憲法規定「中國堅持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這標誌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抗性」(聯一方反一

方) 外交時期的終結。

第 3 章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外關係 (1983—2000 年)

1. 歷史新時期的外交路向：中國在冷戰末期及後冷戰初期的對外關係

1982 年 12 月，五屆人大五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即「八二憲法」)，當中規定「中國堅持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中國從此實行以「不結盟」、「和平」及「發展」為基本內容的「非對抗性」外交，原因是中國需要一個和平及安穩的國際環境，好讓其改革開放的政策得以順利推行。論者嘗言：「外交是內政的延續。」毋庸置疑，改革開放年代的中國最能體現這個說法。

由於中國公開表示它不再「聯美反蘇」，因此，長期處於緊張狀態的中蘇關係漸趨緩和，並於蘇聯改革派領袖戈爾巴喬夫上台後向正常化的道路大步邁進。與此同時，中國跟美國結束了十多年的戰略夥伴關係——它們轉而著眼於發展雙邊經貿關係，很快便成為密切的經濟夥伴。概括而言，隨著冷戰局勢的緩和，國際關係已不再取決於國防戰略的考慮，這解釋為何美、蘇、中「戰略大三角」終於在 1980 年代下半葉瓦解。

「六四事件」一度使中國陷於外交困局中。東歐巨變和蘇聯解體更給中國帶來嚴重的衝擊，還迫使它在後冷戰時期的多極化世界裏作出重大的策略調整。為了推動建立一個以「和平」及「發展」為依歸的國際新秩序，中國堅持貫徹務實的外交政策——它一方面實行睦鄰政策及致力於廣交朋友，另一方面則與現今世界上的唯一超級大國(美國)在「求同存異」的基礎上維持以合作和對話為主調的關係。簡單地說，中國在後冷戰時期的外交仍然是為了促進其經濟發展服務的。儘管中國的崛起令某方面人士感到恐懼和不安，但中國務實的外交表現卻令所謂「中國威脅論」不攻自破。

2. 執行以「獨立自主」、「和平」、「發展」為主題的外交路線（1982—1989 年）

2.1 中國對「獨立自主（不結盟）」、「和平」及「發展」的確認和闡述

中共中央領導人在 1982 年正式宣布中國將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路線，後來又在不同場合指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主題。以下摘錄他們闡述有關「獨立自主」、「和平」及「發展」的談話：

1982 年 9 月，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大上說：「中國決不依附於任何大國或者國家集團，決不屈服於任何大國的壓力。」

1984 年 5 月，鄧小平會見巴西總統菲格雷多（Joao Baptista de Oliveira Figueiredo）時指出：「中國的對外政策是獨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結盟。中國不打美國牌，也不打蘇聯牌，中國也不允許別人打中國牌。」

1985 年 3 月，鄧小平會見日本商工會議所訪華團時又指出：「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或者說發展問題。和平問題是東西問題，經濟問題是南北問題。概括起來，就是東西南北四個字。南北問題是核心問題。」（由於發展中國家多數在發達國家的南方，因此國際上習慣把發展中國家同發達國家之間的經濟關係稱為「南北關係」，或稱「南北問題」。人們又習慣把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合作稱為「南南合作」。）

同年 6 月，趙紫陽在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British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演講時說：「維護和平與發展經濟，是互相影響，互為作用的。和平的國際環境是各國謀求發展必不可少的條件；而國際經濟合作的擴大，廣大國家的經濟繁榮與發展，又能增強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的力量。」

1986 年 3 月，趙紫陽在全國人大六屆四次會議上又說：「中國從本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長遠利益和根本利益出發，把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發展各國友好合作和促進共同經濟繁榮，作為自己對外政策的總目標。」

1988 年 12 月，鄧小平會見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時說：「世界上現在有兩件事情要同時做，一個是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一個是建立國際經

濟新秩序。……我認爲，中印兩國共同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最經得住考驗的。……我們應當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爲指導國際關係的準則。」

2.2 中蘇關係解凍及正常化

鄧小平上台後不久就表明中共當年發表《九評》是不對的，他解釋說：「中蘇之間當年的那場爭論，雙方都講了很多空話。爲什麼說是空話呢？因爲每一個國家、每一個黨都有自己的經歷，情況千差萬別，各國的事情一定要由各國人民自己去尋找道路，解決問題，各國黨的方針、路線是對還是錯，應該由本國黨和本國人民去判斷。我們反對人家向我們發號施令，然而我們自己也犯了對人隨便指手劃腳的錯誤。」

1982 年 3 月，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幹（Tashkent）發表講話時表示蘇聯願意改善與中國的關係，又重申支持「一個中國」的原則。8 月，鄧小平委派外交部蘇歐司司長於洪亮赴莫斯科向蘇聯領導人轉達中國對改善中蘇關係的願望。勃列日涅夫隨即答覆說，蘇方願意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以任何級別與中方討論蘇中雙邊關係問題，以便消除關係正常化的障礙。雙方遂通過外交途徑商定輪流在北京和莫斯科舉行副外長級的磋商。9 月，中共召開十二大，自此棄用「修正主義集團」及「社會主義帝國」等針對蘇聯的名詞。又鑒於中國宣布「不結盟」，即不再「聯美反蘇」，中蘇關係於是進一步走向緩和。10 月初，中蘇第一輪磋商在北京舉行。從 1982 年 10 月到 1986 年 4 月，中蘇兩國一共舉行過八輪副部長級磋商。儘管中方一再堅持優先解決嚴重影響中蘇關係的「三大障礙」（即蘇聯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在中蘇邊境和蒙古駐紮重兵，以及武裝佔領阿富汗），惟蘇方每次都以「談判不得損害第三國利益」爲借口，實行不承認、不討論、不行動的「三不政策」。總之，八輪磋商沒有取得實質成果。然而，中蘇關係仍有進一步改善的跡象；如在 1984 年，中國正式承認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同時，中國報刊也沒有像以往般把蘇聯對中國所構成的威脅說得那麼嚴重。

在進行八輪磋商期間，先後作爲蘇聯最高領導人的勃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

2009 年 4 月修訂版

(Yuri V. Andropov) 及契爾年科 (K. U. Chernenko) 相繼於 1982 年 11 月、1984 年 2 月及 1985 年 3 月去世。中國政府利用參加上述三位最高領導人葬禮的時機，展開「葬禮外交」，先後派出外長黃華、副總理萬里及李鵬前往莫斯科出席葬禮，並趁機與蘇聯新領導人直接交換意見，積極地推動了中蘇關係的發展。

1985 年，戈爾巴喬夫成爲蘇聯最高領導人。他上台後立即表示願意和蘇聯的軍事競爭對手洽商軍備管制措施、願意和世界上任何國家擴大經貿關係，以及願意不再以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作爲蘇聯對外政策的指導原則。上述主張，又稱「外交新思維」(New Thinking in foreign affairs)，一方面緩和了冷戰的緊張局勢，另一方面又揭開了中蘇關係新的一頁。

1986 年 2—3 月，蘇共二十七次在莫斯科召開。與會者認爲當前的形勢「要求改革」，隨即提出了「加速」(uskoreniye, acceleration)、「重建」(perestroika, restructuring)、「開放性」(glasnost, openness) 等新概念，最後通過《加速社會經濟發展的戰略》，以達「完善社會主義」的目標。還有值得注意的是，當時中國與匈牙利所推行的改革，在該次會議上得到表揚。

中蘇經貿和科技合作在蘇共二十七次結束後取得了突破性的發展。從 1986 到 1988 年，中蘇貿易增加約 100% (除邊界地區以物換物的貿易以外，蘇聯主要提供重工業生產原料及製成品，中國則主要提供農產品及輕工業製成品)。1986 年 7 月，中國在莫斯科舉辦自 1953 年以來最大型的工業貿易展覽；同年 12 月，蘇聯又在北京舉行同樣性質的展覽。1989 年，兩國貿易總額已超過 30 億美元；至此，蘇聯已成爲繼香港、美國、日本和聯邦德國之後中國的第五大貿易夥伴。在技術合作方面，蘇聯和東歐專家再次大批來華，幫助中國重建 1960 年因中蘇決裂而被棄置的 156 所工廠。此外，新疆政府於 1988 年 12 月獲得蘇聯一項實物貸款，這是蘇聯自中蘇交惡以來首次向中國一個具戰略重要性的省分直接提供貸款。

與此同時，中蘇文化交流也有明顯的進展。1986 年 5 月，兩國簽訂了一個爲期兩年的文化交流合作協議，其範圍包括科學、教育、藝術、電影電視業、新

聞事業、出版事業、廣播事業、體育等各方面。1986 年 6 月，中國科學院和蘇聯科學院又簽署了一項為期兩年的科學合作協議。

至於消除影響中蘇關係正常化的「三大障礙」問題，戈爾巴喬夫執政當初還是採取「三不政策」，企圖繞過這問題去改善中蘇關係。但隨著國際及國內形勢的變化，戈爾巴喬夫對消除「三大障礙」的態度也起了變化：首先，由於面對美國的挑戰，戈爾巴喬夫遂決定對美國採取和平攻勢，結果是國際關係全局由對抗走向對話，而蘇聯對中國的政策也作出了適當的調整；其次，蘇共二十七次通過《加速社會經濟發展的戰略》後，戈爾巴喬夫覺察到「三大障礙」問題不僅妨礙中蘇關係正常化，也妨礙蘇聯的經濟發展，所以決定嘗試消除「三大障礙」；再其次，戈爾巴喬夫所提出的「外交新思維」要求蘇聯對外政策有高度的靈活性，並且重視發展與亞太地區各國的關係，這當然包括中國在內。

蘇共二十七次結束後，戈爾巴喬夫就致力消除不利於中蘇關係正常化的所有障礙。當時中國雖然很希望改善中蘇關係，但是，中國並沒有蓄意加快談判步伐，因為它想藉中蘇談判以增加中美談判桌上的籌碼。此外，中共領導人深明改革開放要成功，就要靠中國跟美國、西歐和日本發展良好的經貿關係。因此，中國的外交策略不宜太過急於向蘇聯傾斜，否則就會影響到整個建基於歐美經濟科技關係的開放改革政策。儘管如此，中蘇關係在 1986—1989 年間還是朝著正常化的方向邁進。以下簡述「三大障礙」消除的過程：

1986 年 7 月，戈爾巴喬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參崴）講話，明確表示將會從阿富汗撤出蘇軍六個團，另從蒙古撤出大部分蘇軍（後來訂定為 75%）。

1987 年 4 月，蘇聯開始從蒙古撤軍。

1988 年 4 月，蘇聯、美國、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四方簽署了關於政治解決阿富汗問題的《日內瓦協議》（*Geneva Accords*），規定蘇軍自該年 5 月起從阿富汗撤出，9 個月內完成撤軍。

同年 9 月，戈爾巴喬夫在克拉斯諾亞爾斯克（Krasnoyarsk）講話，表示願意促使越南從柬埔寨撤軍。

2009 年 4 月修訂版

同年 12 月，戈爾巴喬夫在聯合國大會宣布，蘇聯將從東歐、蒙古撤出部分軍隊，特別是從蒙古和中國接壤地區撤出大部分軍隊。同月，越南宣稱從柬埔寨撤出五萬越軍。

1989 年 2 月，蘇聯外長謝瓦爾德納澤（Eduard Shevardnadze）正式訪華，並與中國外長錢其琛舉行會談。兩國外長隨後發表《聯合聲明》，宣稱越南在 1989 年 9 月底以前將從柬埔寨全部撤軍，之後即由聯合國發揮其在柬埔寨問題上的作用。同月，蘇聯最後一批駐阿富汗軍隊撤走。至此，阻擋著中蘇關係正常化的「三大障礙」已基本上消除。

同年 5 月，戈爾巴喬夫應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的邀請，到中國進行為期四天的正式訪問，並先後與楊尚昆、鄧小平、趙紫陽及李鵬會談，這是 1959 年以來蘇聯最高領導人首次訪華。鄧小平在會見戈爾巴喬夫時說：「我們這次會見的目的是八個字：結束過去，開闢未來。」他繼續說道：「從 60 年代中期起，我們的關係惡化了，基本上隔斷了。這不是指意識形態爭論的那些問題，這方面現在我們也不認為自己當時說的都是對的。真正的實質問題是不平等，中國人感到受屈辱。雖然如此，我們從來沒有忘記在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蘇聯幫我們搞了一個工業基礎。……歷史帳講了，這些問題一風吹，這也是這次會晤取得的一個成果。雙方講了，就完了，過去就結束了。現在兩國交往多起來了，關係正常化以後的交往，無論深度和廣度都會有大的發展。在發展交往方面，我有一個重要建議：多做實事，少說空話。」戈爾巴喬夫聽完後即表示，在並不久遠的過去，在蘇中關係的決裂方面，蘇聯有一定的過錯和責任，但歷史問題是複雜的，蘇方還有些不同的看法。他贊同過去的事情已過去，重點在於向前看。雙方最後發表了《中蘇聯合公報》，確認兩國將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發展雙方關係，兩國的共產黨將在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內部事務的基礎上進行交往。《聯合公報》又提出，「和平」與「發展」已成爲當代世界兩個最重大的問題。至此，中蘇兩國兩黨關係完全正常化。

誠然，這次中蘇高峰會議是中蘇關係史上，也是當代國際關係史上的一個重

大事件。不過，由於戈爾巴喬夫訪問期間北京爆發了百多萬人上街聲援絕食學生的大遊行，所以外界傳媒的焦點都較集中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民主運動。不久就發生「六四事件」。據悉，戈爾巴喬夫在內部曾表示不滿中國領導人處理該事件的手法，但他沒有參與制裁中國。1990 年 4 月，中國外長錢其琛對蘇聯進行訪問。1991 年 5 月，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正式訪問蘇聯，也是對戈爾巴喬夫兩年前來華的回訪。同年 12 月，蘇聯宣告解體了。

2.3 從戰略夥伴到經濟夥伴：在摩擦中穩步前進的中美關係

1980 年代初，由於里根政府向台灣出售先進的高性能武器，又由於中國在中越戰爭後進入了三年經濟調整期使美國對中國的投資減少，導致中美關係走向低谷。1983 年初，中國總理趙紫陽認為，中美關係「仍然欠佳」。同年 10 月，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卻指出，中美關係「不是那麼差勁」。顯而易見，兩國關係已呈現了轉機。究其原因，大概可歸納為下列兩點：第一，美國於 1983 年 6 月放寬對華技術出口規定，打破了僵局；第二，隨著經濟調整期的結束，中美經貿關係得到改善並逐步擴大。1984 年 1 月，趙紫陽應美國總統里根的邀請訪問了美國。4 月，里根回訪中國（這是中美建交後美國在職總統第一次訪華）。兩國高層領導人互訪傳達了一個確實的信息：中美關係正走出低谷。

從 1984 年 10 月中國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發軔到 1989 年 6 月「六四事件」發生，中美關係可說是進入了一個持續及穩定的發展階段。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全面開展——包括企業、價格改革的推行及對外開放的擴大，無疑創造了一個更符合外商願望的貿易和投資環境。另一方面，政治體制改革的重新列入議事日程與相對寬鬆政治氣氛的出現，不止為中外學術和文化交流帶來契機，還迎合了美國某方面人士盼見中國建立美式政經體制的主觀願望。誠然，當時外界一般人都錯誤地認為，中共中央重申政治體制改革的迫切性，就是要趕上西方民主多元化（即多黨政治）的道路。無怪乎不少美國人預料中國將會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摒棄馬列主義而擁抱資本主義和自由民主的共產主義國家。他們更認為，與中國結成經濟

2009 年 4 月修訂版

和文化夥伴將會加快中國的經濟和政治自由化。總而言之，從 1980 年代中期開始，美國政界、商界及學術界中不少人士皆憧憬與中國發展關係。中美兩國實際上很快便成為密切的經濟夥伴，在既合作又競爭的基礎上穩步前進。

1985—1989 年間，中美兩國在經貿和科技合作方面，取得了長足的發展。據資料顯示，中美貿易總額由 1985 年的 74 億美元增至 1989 年的 122 億美元。至此，美國已成為繼香港和日本之後中國的第三大貿易夥伴。美商在華投資總額，則由 1983 年的 1,800 萬美元猛增至 1988 年的 15 億美元；除港商外，美商就是當時最大的海外投資者。至於中美科技合作項目，由 1986 年的 80 個增至 1988 年的 500 個。

中美的文化交流也蓬勃起來。各色各樣的文化藝術交流項目，由 1987 年的 100 起增至 1988 年的 200 起。從 1986 年開始，有數千多個美國教師來到中國教授英文或各類專業科目。另一方面，中國留美學生及訪美學者亦大增——1983 年，美國簽發了 4,300 個護照；1988 年，增至 14,000 個。1988 年，中國留美學生不下 40,000 人，其中公派、自費學生大概各佔一半。

儘管美國希望與中國保持戰略合作以促使蘇聯和越南分別從阿富汗及柬埔寨撤軍，但由於中國正在實行「不結盟」的對外政策，所以它拒絕了與美國建立廣泛的戰略夥伴關係。惟雙方仍保持以下幾個方面的軍事接觸：

第一，舉行解決地區性防禦問題的高層會晤和磋商，如共同討論有關支持阿富汗和柬埔寨反對派的問題、增強巴基斯坦和泰國防禦的問題，以及增加與「東盟」成員國合作的問題等等；

第二，展開有關交換蘇聯軍事情報的合作；

第三，舉行有關美國向北京售武和兩國合作製造武備的磋商，這在 1985 年之前是未曾出現過的；

第四，增進兩國國防機構和國防學院的交流。

在 1980 年代下半葉，中美關係已不再建基於國防戰略的考慮了。當時蘇聯正忙於加速改革及解決國內問題，所以它對中美兩國已不再構成嚴重的威脅。另一方

面，美國和蘇聯已達成軍備管制協議，並取得了合作解決地區性問題的共識。與此同時，中國又與蘇聯不斷擴展貿易、增進文化交流，以及逐步解決邊界問題。上述形勢標誌著美、蘇、中三國雙邊關係的各自發展，亦意味著美、蘇、中「戰略大三角」的瓦解。

自 1980 年代中期開始，由於海峽兩岸非官方及間接的（主要是經香港的）經濟和文化接觸迅速擴大，因此，中美兩國在「台灣問題」上的摩擦也相應地減少。1987 年，台灣當局准許台灣公民回大陸探親，更促進了海峽兩岸的溝通。這時美國已沒有向台灣出售大宗武備，而中國也沒有公開要求美國廢止《與台灣關係法》及停止向台灣售賣武器。因此由「台灣問題」所引起的中美矛盾在這個時段已有漸趨緩和之勢。

然而，中美整體關係在持續發展中依然存在摩擦和矛盾，致使雙方不時發出不滿情緒。中方的不滿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中國保守官員不滿美國某方面人士在華鼓吹資本主義和自由主義，並抨擊這些人蓄意包庇異見分子及企圖改造中國的政經體制；他們又不滿美國大眾文化入侵中國，認為這是「精神污染」，對社會產生了不良影響；

第二，中國政府不滿人才外流（當時大概只有 32% 留美學生回國）；

第三，中國國營企業不滿美國保護主義勢力抬頭；

第四，中國人民解放軍不滿美國批評中國向中東、巴基斯坦及泰國售賣武器。而美方的不滿則表現在：

第一，美國勞工界（尤其是紡織業界）不滿中國廉價產品入侵美國市場，並要求美國政府限制中國貨品（尤其是紡織品和成衣）進口；

第二，美國投資者不滿中國投資環境不穩定、欠缺健全的法制，以及官僚作風泛濫；

第三，美國人權分子不滿中國政府有關節育及對待異見分子和西藏的政策（美國國會對拉薩〔Lhasa〕於 1987 及 1989 年發生騷亂反應激烈——1987 年，美國眾議院通過《西藏人權問題修正案》，批評中國政府侵犯西藏人權，並支持

達賴流亡集團；1988年，達賴來到美國，國會授予他第一個人權獎；1989年，美國參議院又要求布什政府〔Bush administration〕把美國對西藏的態度成爲美中關係的一個重要部分，令中美兩國在這方面的矛盾進一步激化）；

第四，美國防止核擴散組織不滿中國政府沒有盡本分遏止核武器擴散。

中美兩國雖然存在許多解決不了的矛盾，但是還能穩步前進，總體良好，這大概是因爲雙方政府皆願意在「求同存異」的基礎上執行務實的政策。

布什（George H.W. Bush）於1989年2月當選美國新總統，並於同月訪華，與中國領導人就共同關心的國際問題及雙邊關係交換了意見。雙方都認爲中美關係發展是穩定的，儘管存在一些問題和分歧。惟「六四事件」使中美關係頓時逆轉——它不止砸碎了美國某方面人士想按美國的價值觀來塑造中國政經體制的美夢，更使整個中美關係陷入自尼克松訪華以來最嚴重的危機。「六四事件」發生後，美國反華勢力立即結合起來，迫使布什政府對中國實施制裁，項目包括：停止軍售、停止高層官員（包括軍官）的接觸，以及停止新的對華貸款兼美國可以影響的國際對華貸款。而中共中央不少高層幹部則認爲，中國近幾年來一再爆發學潮與民運，主要是因爲它與美國發展過分廣泛和密切的關係。對這些幹部來說，八九民運的最終目的，正如鄧小平指出，就是要在中國「建立一個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整場運動是美國（至少是一些美國人）企圖在中國搞「和平演變」的結果。保守意識形態及反美情緒，再次在中共領導層活躍起來。值得慶幸的是，鄧小平堅決採取低調姿態以渡難關。另一方面，美國總統布什雖然帶頭制裁中國，但他還是暗地裏派特使到北京進行秘密外交。這解釋爲何中美關係在「六四事件」後雖然變得嚴峻，但是沒有完全脫軌。

3. 中國在1990年代（後冷戰初期）的對外關係

3.1 1990年代初期的外交困局與中國的對策（1990—1992年）

「六四事件」後，中國不止陷入人心不穩與經濟滑坡的困境，它還備受美國、

西歐大國及日本的制裁。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又給正在忙於應付西方制裁的中國帶來新一輪的衝擊。在這四面楚歌的情況下，鄧小平提出了「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的「十六字方針」，以指導中國如何應付困境、走出危局。

紓解制裁是當務之急。爲了達到這個目的，中國政府擬訂了三項具體措施：第一，通過外交機構和外交官與制裁國家進行交涉；第二，對實行制裁的國家採取相應的「逆向制裁」；第三，有針對性地做西方國家來訪者的工作。事實證明，上述對策有顯著成效——日本率先撤銷對中國的制裁，兩國政府於 1989 年底簽署了向中國提供無償資金援助 50 億日元的協議；西班牙、葡萄牙、德國、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及歐共體亦於 1990—1991 年間與中國恢復高層接觸以及在各領域裏的關係；美國則於 1992 年底成爲最後一個停止制裁中國的國家。

1990 年 7 月，鄧小平在會見加拿大前總理特魯多 (Pierre Trudeau) 時說：「國際關係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則，應該是不干涉別國的內政，不干涉別國的社會制度。」這番話明顯地是針對西方國家在「六四事件」後譴責和制裁中國而說的。由於中共批評西方國家干涉中國內政，因此，在東歐發生巨變和蘇聯宣告解體後，中共並沒有干預或公開評論東歐、蘇聯的事態，以免給西方國家找借口批評中國干涉別國內政。北京審慎地處理東歐、蘇聯劇變的另一個原因，是它要防止東歐和「獨聯體」（即「獨立國家聯合體」，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的新政權承認台灣。無怪在冷戰結束後，中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保持和發展與東歐各國的雙邊關係；又同樣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跟俄羅斯及俄以外的 14 個「獨聯體」國家建立邦交。這樣做可以說是體現了鄧小平「十六字方針」的精神。

上述精神也體現於中國在處理海灣戰爭 (Gulf War) 的超脫態度上。1990 年 8 月，伊拉克進攻及佔領科威特。1991 年 1—2 月，以美國爲主的多國部隊打敗伊拉克，使科威特恢復獨立。在這被總稱爲海灣戰爭的事件中，中國一方面反對伊拉克對科威特的入侵和吞併，另一方面又反對美國立心控制中東石油。故當美

國帶頭要求聯合國批准它向伊拉克採取軍事行動時，中國代表在安理會投了棄權票。

3.2 世界格局走向多極化時期的中國外交（1992—2000 年）

隨著冷戰結束，國際原有格局不復存在，代之而起的是一個走向多極化的國際新秩序。在後冷戰初期，中國決定遵循「和平」、「發展」、「求同存異」的原則，實行睦鄰政策，並致力於廣交朋友，以「推動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下文分別論述 1992—2000 年間中俄及中美關係。

3.2.1 中俄關係

蘇聯解體後的第一年，因俄羅斯領導人推行親西方政策，在亞洲又將注意力集中在改善與日本的關係，故中俄關係一度處於冷漠狀態。但由於這一政策收效甚微，所以俄羅斯政府進行了一場外交政策的辯論，最後決定把改善和發展與中國的關係放在其亞太政策的優先地位。

1992 年 12 月，俄羅斯總統葉利欽（Boris Yeltsin）首次正式訪華，與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簽署了第一個《中俄聯合聲明》，宣布兩國「互視為友好國家」及「發展睦鄰互利合作關係」。兩國政府官員還簽署了經濟、貿易、科技、文化等多項文件。中俄關係隨著葉利欽訪華走上了第一個新台階。雙邊貿易迅速增長，1993 年，中俄貿易總額達 78 億美元，創兩國貿易史上的最高紀錄。

1994 年 1 月，由於「北約」東擴，葉利欽經外長科濟列夫（Andrey Kozyrev）將一封親筆信交給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建議中俄兩國建立「面向廿一世紀的建設性夥伴關係」。9 月，江澤民對俄羅斯進行友好訪問，簽署了第二個《中俄聯合聲明》，正式宣布兩國要建立「面向廿一世紀的建設性夥伴關係」，還從政治關係、經貿和科技關係、軍事關係、國際關係四個方面規定了中俄兩國應當採取的步驟。這次訪問標誌著中俄關係上了第二個新台階。

1996 年 4 月，葉利欽再次訪華，簽署了第三個《中俄聯合聲明》，宣布雙方

2009 年 4 月修訂版

「決定發展平等信任的、面向廿一世紀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和建立熱線電話，並簽署了一系列具有戰略意義的合作協定。中俄關係上了第三個新台階。

1997 年 4 月，江澤民訪俄，簽署了第四個《中俄聯合聲明》，確立兩國將共同努力建立國際新秩序、通過邊境裁軍實現睦鄰友好的新安全模式，並成立了「中俄友好、和平與發展委員會」。同年 11 月，葉利欽第三次正式訪華，簽署了第五個《中俄聯合聲明》，作為對中俄不斷發展的一個總結。是年，雙方簽署了 17 項國家和政府間的協定。

1998 年 11 月，江澤民訪俄，簽署了第六個《中俄聯合聲明》，另加一個有關中俄邊界問題的聯合聲明，宣布中俄東、西兩段邊界的野外勘界作業已全部結束。

1999 年 6 月，中俄兩國堅持必須由聯合國出面以和平方法解決科索沃問題。12 月，葉利欽最後一次訪華，與江澤民一起重申「推動建立多極世界，加強聯合國在國際事務中的主導地位」。

2000 年 3 月，普京（Vladimir Putin）當選俄羅斯總統，把發展中俄關係作為既定政策。

儘管中俄關係發展良好，但還是存在一些問題需待解決，包括：

第一，中俄經貿合作上的問題——中方批評在俄羅斯投資風險大，又不滿貿易逆差逐步擴大；

第二，中國人移民俄羅斯問題——隨著邊境口岸開放，中國公民越界進入俄羅斯增多，引起俄羅斯的不滿，又加強了所謂「中國威脅論」的說法；

第三，中俄邊界問題——俄羅斯部分地方和軍隊領導人對中俄已達成的邊界協定持反對立場；

第四，台灣問題——俄羅斯內部出現了一股親台勢力，並主張將先進武器賣給台灣。

3.2.2 中美關係

冷戰結束後，中國與唯一超級大國（美國）尚能在「求同存異」的基礎上維持以合作和對話為主調的關係，雖然雙方仍然存在摩擦和矛盾。1990 年代中美關係的曲折發展大致如下：

1990 年代初，中美關係雖憑特使外交得以維持，但由於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及冷戰結束，美國政府認為中國的全球戰略作用已降低，故對改善中美關係呈消極態度。而中國直到 1992 年 12 月（即在美國未正式宣布高層接觸禁令結束前）的對美原則是：「增加信任、減少麻煩、發展合作、不搞對抗」。

克林頓（Bill Clinton）於 1993 年初就任美國總統後，曾在人權、延長最惠國待遇（MFN or most-favoured-nation treatment）、核不擴散等問題上對中國採取強硬的態度，使中美關係繼續下滑。惟中美關係不斷惡化，對美國實無裨益可言。有見及此，克林頓遂於 1993 年 9 月提出對中國實行「全面接觸」政策（“all-out engagement” policy），即既與中國接觸、對話、合作，同時又防範、制約中國，藉以實現美國的利益兼影響中國的發展方向。11 月，美國倡議在西雅圖（Seattle）召開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APEC，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克林頓與江澤民在該會上首次會面，並達成改善兩國關係的共識。此後，克林頓逐步調整對華政策，決定與中國增加建設性的接觸，目的是要把中國納入由美國主導的國際新秩序裏，以減少中國勢力上升所帶來的挑戰。

1994 年 5 月，克林頓宣布人權問題與中國最惠國待遇脫鉤，大大鼓舞了中美經貿交流合作。然而，在隨後的兩、三年間，中美關係又因「台灣問題」蒙上了陰影，面臨倒退危機。究其緣由，可追溯到 1994 年 9 月克林頓批准了美國對台政策調整方案，使美台關係升級。1995 年 5 月，美國不顧中方強烈反對，公然批准李登輝「以私人身份」訪問康奈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對此，中國作出了一系列強烈反應，包括：第一，立即推遲甚至中止了雙方原定的一些高層往來，並召回中國駐美大使李道豫，何時返美沒有說明；第二，於同年 7 月在東海海域進行導彈試射演習；第三，於 1996 年 3 月再次在台灣海峽附近海域進行導彈發射訓練和軍事演習。在上述最後一次演習時，美國居然派遣兩個航空母艦

2009 年 4 月修訂版

編隊到台灣海峽附近巡弋，使中美關係更趨緊張。鑒於中國保持強硬態度，又為自身的戰略利益和經濟利益起見，美國最後選擇與中國恢復對話。1996 年 11 月，克林頓與江澤民在馬尼拉（Manila）舉行的亞太經合會議會晤，雙方就包括兩國元首在內的高層互訪達成一致意見。

1997 年 10 月，江澤民訪美，這是中國國家最高領導人 12 年來首次正式訪美（上一次是 1985 年 7 月國家主席李先念到美國進行國事訪問）。訪美期間，江澤民公開指出，發展面向廿一世紀中美關係的指導方針是：「一、堅持用戰略眼光和長遠觀點來審視和處理中美關係，牢牢把握兩國關係的大局。二、積極尋求共同利益的匯合點，既要考慮自身利益，也要考慮對方的利益。三、恪守中美三個聯合公報，這是發展中美關係的基礎。四、本著相互尊重、平等協商、求同存異的精神，正確處理兩國間的分歧。五、妥善處理台灣問題。」誠然，江澤民此行正式確立了中國對美的新原則——「增進了解、擴大共識、發展合作、共創未來」。

1998 年 6 月，克林頓回訪中國。這是美國總統九年來第一次訪華（上一次是 1989 年 2 月布什訪華）。訪華期間，克林頓在北京大學發表了演講，他說：「我們需要彼此增進了解——了解彼此的利益和願望以及彼此的分歧。我相信，公開、直接的交流將進一步澄清、縮小我們之間的分歧，使人們有信心把生活變得更好。」克林頓在結束訪華前還重申美國「三不」承諾，即美國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灣獨立，以及不支持台灣加入以主權國家為成員的國際組織。中美雙方皆表示同意繼續努力建立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以維護世界和平及穩定。

總的來說，中美兩國自建交以來，雖然歷經了不少波折，但整體關係還是有很大發展的，其中以經貿關係尤其迅速。1979 年，中美雙邊貿易總額只有 24 億美元，1997 年已高達 489.9 億美元，增長了 20 倍。二十世紀末，美國已成爲中國第二大貿易夥伴，而中國則成爲美國第四大貿易夥伴。另一方面，美國是在華最大投資國。截至 1997 年底，美國在華投資項目達 2.44 萬個，實際投入金額 174.9

億美元。至於科技、文化、教育以至軍事和其他方面的交流與合作，也不斷擴大。

最後要交代的，是後冷戰初期阻礙中美關係發展的幾個重大問題：

影響中美關係各問題中最嚴重和最敏感的，可說是「台灣問題」，亦即是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核心問題。冷戰結束後，由於美國運用「以台制中」策略的空間擴大，故台灣對於美國的戰略價值也相應地提高。在此形勢下，美台關係迅速升溫。最影響中美關係的，無疑是美國向台售武及「台獨」問題。1992 年 9 月，美國總統布什宣布向台灣出售 150 架 F-16 戰鬥機，使 1993 年美國售台武器總額比上年度猛增 12 倍多，嚴重損害了中美關係。1992 年 11 月，布什又派美國貿易代表希爾斯（Carla Hills）訪台，打破了美國實行了 13 年的禁止內閣級官員訪台的禁令。克林頓於 1993 年初上台後，先後在不同場合稱台灣是一個「國家」，令北京不悅。1994 年 7 月，美國參議院表決通過一項對《與台灣關係法》的修正案，聲稱「台灣【總統】和其他高級官員可以在任何時間訪美」及「美台官員互訪為美國政策」等等。9 月，美國國務院又宣布了經克林頓批准的美國對台政策調整方案。宣布後不久，美台就簽署了《貿易與投資架構協定》（TIFA，Trade and Investment Framework Agreement），以解決兩地雙邊貿易問題及加強雙方經濟合作。1995 年 5 月，美國公然批准李登輝「以私人身份」訪問康奈爾大學。李於 6 月在該所大學發表了〈民之所欲，長在我心〉的演講，為「台獨」尋求國際承認，迫使中國展示武力——7 月，中國在東海海域進行導彈試射演習；1996 年 3 月，再次在台灣海峽進行軍事演習，引起一場中美外交風波。李登輝又於 1999 年 7 月宣稱，兩岸關係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製造了新一輪的緊張氣氛，最後迫使克林頓公開表態，重申美國支持「一個中國」的立場。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贏得 2000 年台灣總統大選後，「台獨」勢頭猛增，令海峽兩岸形勢及中美關係同時變得更加嚴峻。

其次是人權問題。自 1990 年開始，美國政府每年都發表包括抨擊中國人權狀況的《人權報告》（*Human Rights Report*），矛頭直指中國一系列涉及人口、異見份子、出口勞改產品、西藏等等的政策；又每年帶頭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 上提交反華提案。美國國會還多次通過關於中國人權、西藏和香港的決議、法案，嚴重影響中美關係。眾所周知，美國插手西藏問題最令中方不滿。1991 年，老布什接見達賴喇嘛，這是美國現任總統首次接見達賴，給中美關係投下了陰影。1993 及 1994 年，克林頓又接見達賴，還敦促北京和達賴恢復對話。有消息指出，1989—1994 年間，美國向達賴集團提供經援達 875 萬美元；之後每年給「西藏流亡政府」200 萬美元的經濟援助。1999 年，美國國務院多次公開批評中國對西藏的政策，並以各種形式對北京施壓。

與人權問題拉上關係的，是最惠國待遇問題。中國早在 1980 年已取得最惠國待遇，但由於 1974 年通過的有關條文規定，「最惠國待遇不能給與一個不准人民自由出入的共產主義國家，除非得到美國總統的特別批准」，所以中國一直未能直接享受最惠國待遇。直至 1994 年，美國國會每年都對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這問題進行審議，又每每以中國「違反人權」為借口向北京施壓，使中美經貿關係難以正常、穩定地發展。克林頓終於在 1994 年 5 月宣布，人權問題與中國最惠國待遇脫鉤，這樣才完滿地解決了上述問題，但每年審定一次的程序依然存在。

經濟貿易和知識產權問題也不容忽視。從 1990 年起，美國把通過第三國或地區（如香港）向美國轉口的中國紡織品貿易額計算在中國向美國出口貿易額中。儘管中方指出這種計算方法並不合理，美國卻一而再、再而三地單方面扣減中國紡織品輸美的配額，使中國感到無理受壓。美國又從 1990 年起提出美國知識產權在中國缺乏保護的問題。雙方於是在 1992 年 1 月簽署了《中國政府與美國政府關於保護知識產權審判權，實行統一代碼識別標誌的協定》。1994 年，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關於懲治侵犯著作權的犯罪的決定》；中國國務院隨即下發《關於加強保護知識產權、查處侵權盜版活動的緊急通知》，並要求各地抓緊檢查侵權違法活動。然而，美國認為中國打擊侵權、盜版活動不力，遂向中國提出苛刻的要求，導致談判破裂。同年 12 月，美國公布對華貿易報復清單；中國外經貿部又於同日公布擬對美國的貿易反報復清單，以作回應。一場中美貿

易戰如箭在弦，一觸即發。1995 年 2 月，兩國再度恢復談判；3 月，中國外經貿部部長吳儀和美國總統特使、貿易代表坎特（Mickey Kantor）分別代表中美兩國政府重新簽署關於知識產權的協議，中美貿易戰才免於發生。中國自 1986 年就正式要求恢復在「關貿總協定」（GATT，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這個國際經貿組織中的創始成員國地位，但由於中國爭取用發展中國家的身分「復關」和不願意更大程度的開放市場，故一直受到美國阻撓。1995 年 1 月，「關貿總協定」改組成爲「世界貿易組織」（WTO，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中國「復關」問題於是延續下來成爲中國參加「世貿組織」的問題。之後，中國與美國在這方面的談判、磋商並沒有取得任何突破性的進展，直到 1999 年 11 月美國貿易代表巴爾舍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到北京進行作爲「最後一次機會」的訪問時，始與中國外經貿部部長石廣生達成關於中國「入世」的雙邊協定。至於中國正式加入「世貿組織」，要到 2001 年 11 月才實現。

中美關係也受到一些突發事件影響，如 1999 年 5 月美國所謂「悲劇性誤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事件；又如 2001 年 4 月美國 EP-3 偵察機在中國近海撞毀一架中國戰鬥機事件。這些事件都給中美關係增添不穩定的因素。

幸好，中美雙方存在廣泛的共同利益。更重要的是，這種共同利益在廿一世紀的新形勢下，不是在減少，而是在增加。只要兩國政府能堅守「求同存異」這基本原則，中美關係的發展將會是樂觀的。

4. 「中國威脅論」：西方對中國的恐懼合理嗎？

4.1 「中國威脅論」（the “China threat” theory）有何論據？

1990 年代初首先流行於日本和美國的「中國威脅論」，是昔日「黃禍論」的翻版。第一個炮製此論調的人，應是日本防衛大學教授村井友秀——他於 1990 年 8 月在《諸君》月刊發表了一篇題爲〈論中國這個潛在的威脅〉的文章，從國

力的角度把正在崛起的中國列為一個潛在的敵人，只是該文並未引起廣泛注意。到 1992 年 6 至 9 月，美國和日本新聞媒體開始大彈「中國威脅」的論調——它們聲稱中國正在狂熱地向俄羅斯採購武器以便軍隊現代化，以及向南中國海、東海乃至印度洋擴展以謀求建立海洋霸權；它們又把中國經濟發展與「威脅」一詞聯繫起來，還別有用心地提醒國際社會，說中國的力量如果越來越強大，將可能會仗勢欺壓周圍國家。在美日輿論的推動下，不少亞太乃至西方國家開始對中國抱有疑慮和保持高度警惕。進入 1993 年以後，「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引起了國際社會（特別是政界和學術界）的廣泛注意，其市場至今不衰。至於鼓吹「中國威脅論」者所提出的論據，大致上可從歷史、意識形態、經濟及軍事四方面來說明：

4.1.1 建基於歷史的論據

有論者認為，當今中國已成為亞太地區和平的最主要不穩定因素，這是有歷史因由的。他們指出：

第一，歷史上的中國是一個「霸主」（宗主國），所以當今中國將會力圖恢復這個傳統，重建其在亞洲的「霸主」地位，從而威脅該地區的安全；

第二，中華人民共和國曾在其周邊地區參與甚至挑起戰爭，這顯示當今中國不無侵略他國的傾向。

4.1.2 強調意識形態分歧的論據

另有論者認為，當今中國對世界和平及安全造成了威脅，此乃其意識形態所使然。他們指出：

第一，中國在蘇聯解體後是僅存的一個社會主義大國，對它決不可掉以輕心；

第二，中國政府違反人權，抗拒政治自由化，是西方現代文明的對立象徵，嚴重威脅民主自由的發展；

第三，中國的民族主義一向是一種製造擴張的意識形態，其威脅力因中國海

2009 年 4 月修訂版

外華僑人數眾多而大增；

第四，中國新興的民族主義更具強烈的反美性質，它體現於 1996 年出版的《中國可以說不》一書，以及 1999 年 5 月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後和 2001 年 4 月「EP-3 事件」發生後的反美示威。

4.1.3 把經濟成就等同威脅的論據

很多論者把中國在改革開放後的經濟迅速發展看成是一種威脅。他們指出：

第一，後毛澤東時代中國的經濟增長令人震驚，倘若年均增長率保持在 8% 上下，其經濟實力將會每 21 年翻一翻，這必將威脅國際貿易的正常進行，並影響原來貿易格局和利益劃分；

第二，中國海外華僑人數達 3,000 多萬，而中國謀求建立的「大中華經濟圈」或「大中華共同市場」，實際上是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倡議的「大東亞共榮圈」的翻版；

第三，中國低成本的工業製成品大量進入國際市場，嚴重打擊西方的製造業，並導致全球性貿易保護主義抬頭；

第四，自 1996 年起，美中貿易逆差已超過美日貿易逆差，差幅更逐年擴大；

第五，中國已成為外匯儲備金最多的國家之一；

第六，中國快速的經濟發展嚴重威脅世界自然環境；

第七，中國對能源的需求破壞了地區性的穩定（如對石油的需求就嚴重威脅南中國海的安全）；

第八，中國把經濟力量變成外交工具（如迫使克林頓宣布人權問題與中國最惠國待遇脫鉤）；

第九，中國資助反美活動；

第十，中國的經濟發展與它發展軍事力量是分不開的（有說美國加州很多中國公司有人民解放軍背景，甚至有說加州已成為中國第 22 個省）。

4.1.4 把增強國防力量等同威脅的論據

還有不少論者把中國的軍事發展及國防現代化當作是一種威脅。他們指出：

第一，中國的軍費開支缺乏透明度，應把它加大十倍或以上才能反映真實情況；

第二，中國在冷戰結束後的軍事擴張令人擔心，它將填補前蘇聯和美國從東南亞撤出後所留下來的「真空地帶」；

第三，中國售武問題亦令人擔心（有說美國的敵人就是中國的客戶）；

第四，台灣極可能成為中美戰場。

以上列舉的，都是「中國威脅論」的常見論據。

4.2 西方對中國的恐懼合理嗎？

一個正在崛起的中國，真的具備威脅鄰國乃至全球的實力和野心嗎？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下文嘗試對鼓吹「中國威脅論」者所提出的各種論據逐一分析。

首先要說的，是基於歷史的論據。過去中國曾因當宗主國而傲視「天下」。但到了十九世紀末葉，傳統的天朝觀和它的體現——朝貢制度，已被列強的炮火打得稀爛，最終掉進了歷史的廢堆。可以說，隨著帝制時代的結束及國際秩序的重新整合，中國已捨棄了稱霸之心。有論者認為，中國將乘崛起之機恢復「霸主」地位，這無非是憑空忖度。平心而論，現今中國並沒有稱霸世界的意圖，而客觀環境也不容許它去稱霸。另有論者認為，當今中國政府有參戰甚至挑起戰爭的前科記錄，所以強大了的中國將成為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脅。上述說法聽起來似乎持之有故，其實並不公允，因為論者每每單方面強調軍事行動以突出中國的「侵略性」行爲，對於中國參戰或開戰的動機和歷史背景少加分析。直至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共打過三場戰爭——1950—1953 年的朝鮮戰爭、1962 年的中印戰爭，以及 1979 年的中越戰爭。這三場戰爭分別發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剛成立、「大

躍進」剛剛失敗、「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的時候，亦即是中共急於重建政治社會經濟秩序、落實「調整」政策、推行改革開放的關鍵時刻。面對經濟失調、百端待舉的嚴峻局勢，中共理應集中精力解決國內問題，但它卻在如此緊張關頭面前下令出兵，這是否反映出中共真有「侵略性」傾向，抑或另有因由？其實中共三次出兵，都是回應他國挑釁行為的體現——1950 年出兵朝鮮，是對美國軍隊進逼鴨綠江（中朝邊境）的回應；1962 年出兵印度，是對印度軍隊在中印邊界的東段和西段同時向中國方面推進的回應；而 1979 年出兵越南，則是對越南政府蓄意排華及製造大量邊境衝突事件的回應。為鞏固政權起見，中共一直把處理及解決國內問題視為首要任務，故當邊界地區出現嚴重挑釁情況而直接或間接影響到中國的社會建設和穩定時，它就會對挑釁者作出包括出兵的強烈反應，以表示不滿和抗議。中共大概認為容忍挑釁行為不但不能解決問題的癥結所在，反而會令挑釁者更加氣焰囂張，所以它決定，一旦挑釁行為超越了容忍的極限就主動出擊，以達到徹底解決問題的目的。中共雖然相信展示軍事力量甚至使用武力是應付別國挑釁的有效方法，但這並非意味著中共具有「侵略性」傾向，因為它只會在出於無奈的情況下才選擇動武，藉以消除挑戰和威脅中國的外來力量。

其次是有關意識形態的論據。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仍然奉行馬列主義，這是不可爭辯的事實。但現今中國沒有把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作為指導外交的基本原則，也沒有企圖把自己的制度和價值觀強加於別國。既然如此，中國怎會對世界安全構成威脅呢？此外，把中國的民族主義看作是洪水猛獸，也是不必要的恐懼。國力提升，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自然增強。中國在崛起之後出現《中國可以說不》這類著作，實不足為怪。當中國人聲稱中國有權「說不」時，他們「不是尋求對抗，而是為了更平等的對話」，西方實在無需對此畏懼。況且，不是所有中國人都同意《中國可以說不》的看法——1998 年就出版了持相反意見的《中國不當「不先生」》，惟西方對此書較少注意而已。至於中國各大城市在 1999 年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後，以及在 2001 年「EP-3 事件」發生後出現大規模的反美示威，這不過是中國人對美國霸權行為所作出的本能反應而已。中國政府

亦在上述兩起事件中表現得審慎和冷靜，免使局面失控。

再其次是經濟論據。儘管中國經濟總量因改革開放迅速增長，但它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其人均國民收入還處於很低水平。經濟改革確實令中國逐漸強大起來，但若據此斷言中國將會對他國構成威脅，無疑是妄下結論。如果一個國家強大後，便構成對別國乃至世界的威脅，那麼長期以來居世界首富地位的美國，豈非是全球最大的威脅？其實，中國商品市場與資本市場的不斷擴大，正好為眾多面對經濟困難的西方及發展中國家提供了適時的商機；由此觀之，中國經濟發展非但沒有對世界經濟構成什麼「威脅」，反而發揮了幫助他國擺脫經濟困境的作用。至於「大中華經濟圈」一類說法，只不過是一些海外華人學者提出來的一種設想，既沒有得到中國政府的認同，也沒有人知道其實現的可能性有多大。近年來海外華人向中國投資數量的確大增，究其原因，不外希望獲得豐厚的回報和可觀的比較利益，絕非出於政治認同或受中國政府誘導所致。

最後是軍事論據。有論者認為，中國在冷戰結束後將填補東南亞地區的「真空地帶」，這是沒有根據的。首先，「真空」之說與事實不符，因為美國在亞洲依然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而俄羅斯在越南的金蘭灣基地仍留有龐大的電子偵察設施和不少軍事技術人員。其次，一般東南亞國家在近年來皆改善了其防衛性的軍事裝備，所以它們已有能力肩負起捍衛該區安全的使命；即使美、俄軍事力量全部撤離東南亞，也無需由區域以外的國家前去填補所謂「真空」。再其次，中國從來沒有向國外派駐軍隊，更未曾在國外建立或使用任何軍事基地。況且，冷戰結束後，中國實行睦鄰政策，力主通過和平談判來解決亞太區內的矛盾。為了緩和南中國海海域的爭端，中國主動提出了「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倡議。至於解決「台灣問題」，中國再三表明，若非台灣當局宣布獨立，將必通過和平途徑以達統一的目的。儘管西方猛烈抨擊中國政府拒絕放棄使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北京卻一直堅持保留使用武力的權利。北京這樣做大概是基於下列兩個原因：第一，保留使用武力的權利是防止台獨發生的唯一有效方法；第二，這是行使國家主權的象徵，因為選擇國策的自由是每個獨立自主國家應享有的基本權

2009年4月修訂版

利。還要說明的是，近年來中國的國防預算雖有增加，但新增的國防費用中，很大一部分是用來保障和改善軍事人員生活條件的，這包括提高工資、津貼，以及安置退休、轉業軍人等等。

總而言之，「中國威脅論」欠缺令人信服的論據，實在難於成立。現今中國政府既無意稱霸，更無力威脅他國。它迫切需要一個和平安定的國際環境來進行社會經濟建設，以穩定民生、鞏固政權。

參考書目

Fairbank, J.K.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ol. 10 (1978); Vol. 11 (1980); Vol. 12 (1983); Vol. 13 (1986) [Vols. 10 & 11: 1800-1911; Vols. 12 & 13: 1912-1949]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室譯：《劍橋中國晚清史 1800—1911 年》上、下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 年）

章建剛等譯：《劍橋中華民國史》第一、二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1992 年）

Hsu, I.C.Y.,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6th edition, 2000.

徐中約著，計秋楓、朱慶葆譯：《中國近代史》上、下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2001 年）

MacFarquhar, Roderick & Fairbank, John King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4, *The People's Republic, Part I,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49—196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Vol. 15, *The People's Republic, Part 2, Revolutions with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66—198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謝亮生等譯：《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革命的中國的興起 1949—1965》（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年）

金光耀等譯：《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66—198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年）

金春明編：《評《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

Meisner, Maurice, *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New York: Free Press, 1986.

杜蒲、李玉玲譯：《毛澤東的中國及後毛澤東的中國——人民共和國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年）

Meisner, Maurice, *The Deng Xiaoping Era: An Inquiry into the Fate of Chinese Socialism, 1978-1994*, New York: Hill and Wong, 1996. [未有中譯本]

Spence, Jonathan D.,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 W.W. Norton & Co., 2nd edition, 1999.

史景遷著，溫洽湓譯：《追尋現代中國》

上冊：《最後的王朝》（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01 年）

中冊：《革命與戰爭》（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01 年）

下冊：《從共產主義到市場經濟》（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01 年）

Cheng Pei-kai & Lestz, Michael (eds.), with Spence, Jonathan D.,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A Documentary Collection*, New York: Norton, 1999.

2009 年 4 月修訂版

金耀基(King, Ambrose Y.C.):《中國的現代轉向》[*The Modern Turn of China*] (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 年)

陳勤、李剛、齊佩芳:《中國現代化史綱》

上卷:《無法告別的革命》(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8 年)

下卷:《不可逆轉的改革》(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8 年)

蕭超然、沙健孫主編:《中國革命史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 年)

張憲文:《中華民國史綱》(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年)

彭明、程肅主編:《近代中國的思想歷程,1840—1949》(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 年)

曾業英主編:《五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 年)

郭鐵鎗主編:《台港中共黨史中國現代史研究評析》(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 年)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增訂本(台北:東華書局,2001 年)

張玉法主編:《中國現代史論集》一至十輯(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1982 年)

第一輯 總論

第二輯 史料與史學

第三輯 辛亥革命

第四輯 民初政局

第五輯 軍閥政治

第六輯 五四運動

第七輯 護法與北伐

第八輯 十年建設

第九輯 八年抗戰

第十輯 國共鬥爭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修訂本,上、下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 年)

2009 年 4 月修訂版

朱建華、朱陽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9 年）

張家敏：《建國以來 1949—1997》上、下冊（香港：香港政策研究所，1997 年）

姜華宣、張尉萍、肖甦主編：《中國共產黨重要會議紀事（1921—2001）》（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 年）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新時期歷史大事記〔增訂本〕（1978.12—2002.5）》（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2002 年）

浦興祖等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制度》（香港：三聯書店，1995 年）

鄭宇碩、謝慶奎主編：《當代中國政府》（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2 年）

江山主編：《世紀檔案：影響 20 世紀中國歷史進程的重要文章》上冊（北京：團結出版社，1998 年）

[下列各書有助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的歷史人物、事件及時代特色]

章詒和：《最後的貴族》（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 年）

凌志軍：《歷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國的興起和失敗》（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年）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年）

蘇曉康、羅時敘、陳政：《烏托邦祭：廬山會議紀實》（香港：全真社，1989 年）

張湛彬、劉杰輝、張國華：《「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的中國》（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2001 年）

徐勇：《包產到戶沉浮錄》（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 年）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年）

周明主編：《歷史在這裡沉思：1966—1976 年紀實》

1—3 卷（北京：華夏出版社，1986 年）

4—6 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1989 年）

2009 年 4 月修訂版

- 米鶴都：《紅衛兵這一代》（香港：三聯書店，1993 年）
- 張戎著，張樸譯：《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台灣：中華書局，1992 年）
- 陳凱歌：《少年凱歌》（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1 年）
- 梁曉聲：《一個紅衛兵的自白》（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88 年）
- 鄭念著，鄭凱譯：《上海生與死》（台北：大鴻，1987 年）
- 古華：《芙蓉鎮》（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87 年）
- 梁恆、夏竹麗著，傅依萍、莫昭平譯：《革命之子》（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83 年）
- 凌耿著，劉昆生、丁廣馨譯：《天籟：一個中國青年的自述》（香港：新境傳播公司，1972 年）
- 周倫佐：《「文革」造反派真相》（香港：田園書屋，2006 年）
- 劉愛琴：《我的父親劉少奇》（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 年）
- 人間：《共和國元首之死》（香港：海明文化事業公司，1989？年）
- 許冠三：《劉少奇與劉少奇路線》（香港：中道出版社，1980 年）
- 赤男、明曉等著：《林彪元帥叛逃事件最新報告》（香港：中華兒女出版社，2000 年）
- 汪東興：《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 年）
-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香港：明鏡出版社，2003 年）
- 張佐良：《周恩來保健醫生回憶錄 1966—1976》（香港：三聯書店，1998 年）
- 安建設編：《周恩來的最後歲月，1966—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 年）

2009 年 4 月修訂版

年)

王若水遺著：《新發現的毛澤東：僕人眼中的偉人》上、下冊（香港：明報出版社，2002 年）

李敏：《我的父親毛澤東》（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 年）

林克、徐濤、吳旭君：《歷史的真實：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的証言》（香港：利文出版社，1995 年）

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 年）

權延赤：《走下神壇的毛澤東》（香港：南粵出版社，1990 年）

郭金榮：《毛澤東的黃昏歲月》（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0 年）

蕭延中編：《晚年毛澤東》（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 年）

葉永烈：《1978：中國命運大轉折》（廣州：廣州出版社，1997 年）

鄧力群：《十二個春秋（1975—1987）》（香港：博智出版社，2006 年）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 年）

楊繼繩：《鄧小平時代》（香港：三聯出版社，1999 年）

葉永烈：《陳雲全傳》（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 年）

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香港：太平洋世紀研究所，1997 年）

張良：《中國六四真相》（香港：明鏡出版社，2001 年）

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Hong Kong: Excellent Culture Press，2004 年）

馬立誠、凌志軍：《當代中國三次思想解放實錄》（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 年）

2009 年 4 月修訂版

何中石：《朱鎔基》（呼和浩特：遠方出版社，1998 年）

杜林著，楊鳴鏞譯：《江澤民傳》（香港：明鏡出版社，1999 年）

馬玲、李銘：《胡錦濤》（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2002 年）

楊中美：《中共新領袖——胡錦濤》（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 年）

馬玲、李銘：《溫家寶：他的崛起與管治作風》（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 年）

陳桂棣、春桃：《中國農民調查》（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 年）

[下列各書有助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外關係]

謝益顯主編：《中國當代外交史，1949—1995》（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 年）

唐希中、劉少華、陳本紅：《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1949—2002）》（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年）

鄭宇碩、石志夫：《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係史》

第一卷：1949—1964（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4 年）

第二卷：1965—1978（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6 年）

第三卷：1978—1989（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9 年）

第四卷：1989—1999（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0 年）

徐京利：《解密中國外交檔案》（北京：檔案出版社，2005 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館、人民畫報社編輯：《解密外交文獻——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檔案（1949-1955）》（北京：中國畫報出版社，2006 年）

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 年）